

包天笑著

劍影樓田憶錄

遐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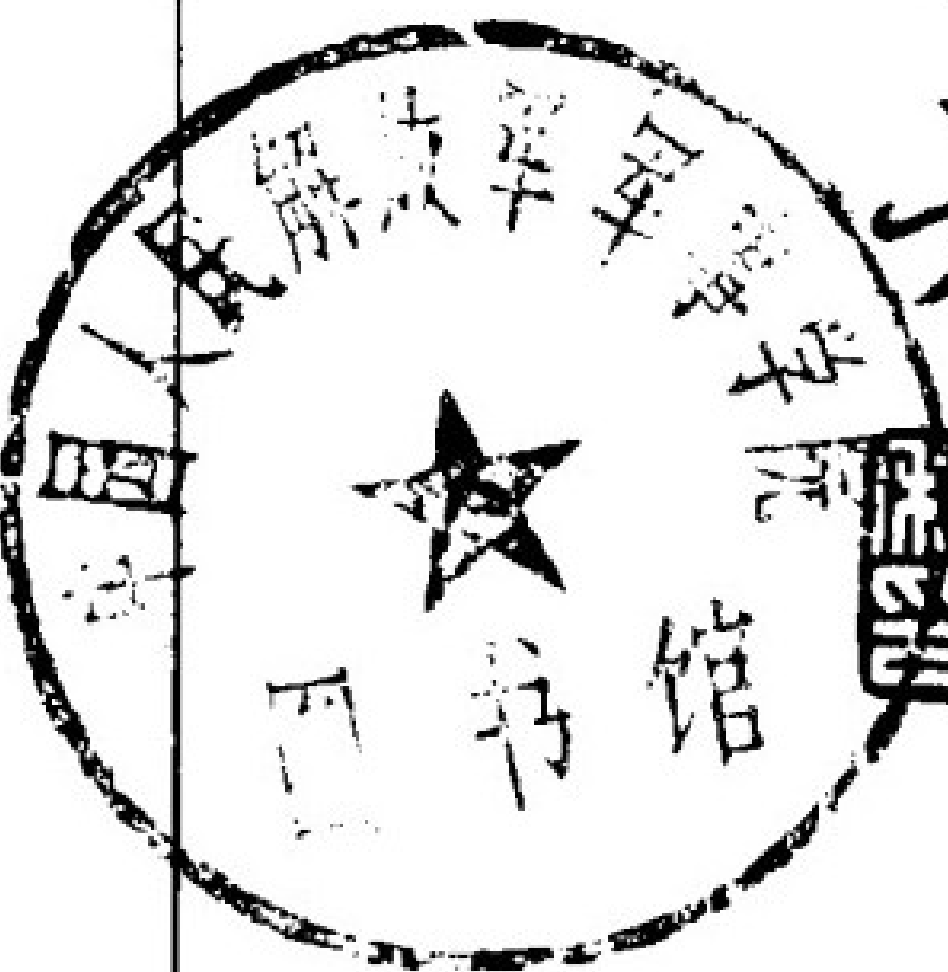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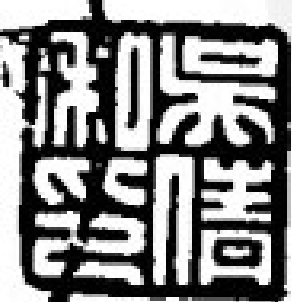




2 032 0148 1

劍影樓回憶錄
色天笑著

吳湖帆署



釧影樓回憶錄

包天笑著

大華出版社出版

香港希雲街三十六號六樓

大同印務公司印刷

香港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1971年6月第一版

定價：平裝本九元
精裝本十五元

釗影樓回憶錄序

姑蘇天笑包先生誕生於一八七六年，距鴉片戰爭祇三十五年，現高壽九十六歲。這本釗影樓回憶錄撰著於先生七十四歲，先後分期刊登於香港大華半月刊，晶報，現由本社出版單行本。

回顧先生誕生以來這九十五年，正是我們祖國在各國帝國主義蹂躪侵畧中，逐漸覺醒，經過兩次大革命，從封建社會蛻化爲資本主義社會，又從資本主義社會革命爲社會主義社會的劇烈與痛苦的變化過程。這九十五年來的洪流，真是波濤洶湧，險惡萬分，不但我們四千年來歷史上從未經歷過；就在世界史上，以短短近百年時間，接連跨越兩個歷史階段，也是僅見的。因此，我們處在這個洪流之中，每一返顧，雖祇三五十年前事，已彷彿隔世，很難了解當時的社會與人民生活情況了。例如，今天四十以下的人，往往無法想像抗戰以前的中國；解放後出生的孩子們，決不會想到蔣介石統治下，中國竟然一盤散沙地漫無組織。就以筆者本人來說，雖然生在五四時代，並且好讀歷史，然而對於清末民初那個時期，總是感覺隔膜。

約畧計來，先生過去這三個世代恰好相當於中國現代史的三個時期：第一個三十年左右，帝國主義的軍艦大炮打破了我國自高自大的閉關孤立，無時無刻不在帝國主義欺侮下，隨時有被瓜分的危機。於是，搢紳階級與知識分子醞釀民族革命與資本主義革命，以期推翻滿清專制統治，挽救國家。第二個三十年左右，則是中國資產階級對封建殘餘勢力與外國帝國主義鬥爭的時期。這個時期的精神可以五四運動的口號：「內除國賊，外拒強權」爲代表。可是，對內則國賊層出不窮，此伏彼起，除不

勝除；對外則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強權拒無可拒。內憂外患，民不聊生，乃引起了第三個三十年的無產階級革命。

先生親身經歷了這三個偉大時代，尤其在第一個階段中，盡了許多啓蒙的責任。他早在光緒二十多年時，就會合同志在蘇州創辦了空前絕後的木刻月刊，這是中國最早的雜誌之一。他又在中國現代教育萌芽之初，就從事教學與教育行政。中國第一個翻譯西洋學術典籍的嚴復所譯「穆勒名學」，「原富」等七書，是中國士大夫認識在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以外，尚有學問的震天巨雷，却又是先生二十歲後任職金粟齋譯書處時經手校印的。從那時起，先生積極參加了上海的文化工作，也結識了那個時期全國第一流的文人學者，巨宦偉人。今天我們覺得已成歷史上人物的嚴復、張謇、蘇曼殊、李叔同、章太炎、汪精衛、史量才……或是先生會親炙過的前輩，或是先生文字之交，或是共同宴游的朋友。是以先生在回憶錄中娓娓敘述當年知識分子、學校、學生、報館種種，使我們對那個時期的社會，以及知識分子的生活思想，增加了許多親切的認識。

尤其難得的是，先生撰著本書時，雖已年逾古稀，記憶力仍非常強。書中隨時記錄着光緒初葉至民國十年前後的物價、薪工等資料。在我們後生小子看來，簡直像讀史記貨殖列傳一般珍貴與驚奇。書中記載家庭與親戚、朋友時，先生又隨時提供了許多民國以前的工商業情況，無一不是經濟史的可靠史料。

左拉對他的傑作「盧貢家族的家運」曾自稱爲法國第二帝國時期的優生學史。一般學者也許之爲那個時期的自然與社會史。我們覺得先生這三十多萬字的回憶錄，確是清末民初的社會史、經濟史，尤其是文化史的最珍貴的資料。相信後世研究中國這個偉大時代歷史學者，必將視本書爲枕中秘籍！

先生是成名近八十年的老文學家，文字優美，有目共睹，無煩詞費。筆者祇願在此提出本書兩個特點：第一是深厚真實的感情。先生於師友、學生、親戚，處處流露出他的真性情；最令人感動的却是先生誠摯的孝思。試想一位皤然老翁，孫曾滿堂，還時常在夢中依戀慈母懷中！這種純孝的孺慕之情，真足以風這個世紀末的澆薄。其次是坦白。本書敘述小火輪烟蓬上的邂逅；在上海花間的應酬；以及訪問日本時的冶遊，毫無諱飾，從此可見先生坦率之一斑了。正因為所述都是真情實事，令人讀來分外動人。輓近港台出版的回憶錄與傳記，可稱汗牛充棟。可是，大概作者都是些英雄好漢吧，寫的都是自己豐功偉績，至少也是交遊的光寵，使人讀來好像走進了一座大廟，觸目皆金碧輝煌的泥塑木雕。本書則不然，所述祇是一個書生的日常生活。就是講到那些奇人逸士，如張謇、陳獨秀、曼殊、弘一等，也各有各的真面目，沒有什麼天縱英明，或不食人間烟火的描寫，既非超人，更不是神聖，有各人的個性，也有人的缺點，是有血有肉的真人。一言蔽之，本書最偉大的地方，就是它真實的平庸。而這些庸言庸行，經先生平淡樸實的素描，都生動地重現於讀者心目中，甚至使我們讀來彷彿處身於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的古老的蘇州與剛剛開始繁榮的上海舊租界中，面對着那些秀才、舉人、學者、作家……。

唯一令人惋惜的，本書似乎只寫到民國十年以前，沒有把以後兩個世紀紀錄在內。我們祈禱先生老而彌健，繼續寫下去，到我們祝賀他老人家百歲華誕之日，能見到以後七十年的回憶錄的出版。

這本回憶錄能由大華出版社出版，是我們大華同人最大的光榮。而先生囑咐我這個後生小子寫一篇序，更是我生平最大的榮寵。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柯榮欣書於大華出版社

自序

距今二十餘年前，清夜夢迴，思潮起伏，因想到年踰七十，蹉跎一生，試把這個在前半生所經歷的事，寫些出來，也足以自娛，且足以自警。先從兒童時代，寫了家庭間事，成數萬字。既而與之所至，從青年時代到中年時代，斷斷續續，一直寫下去，又成了若干萬字。後經流離轉徙，意興闌珊，也遂擱筆了。實在說來，那時的記憶力更不如前了。此種記載，原不足存，更不足以問世，或存之爲兒孫輩觀感而已。但我輩既生存於這個時代，又薰染於這個境界，以欲留此鴻爪的一痕，又何足怪。古人有五十而知非之說，我已耄矣，應更知既往之非，有以自儆。但友朋輩却說我所記述，既可以作近代史的參證，又可以觀世變的遺蛻，那就益增我的慚感了。這個回憶錄，先曾登載於「大華雜誌」，後又連載於「晶報」，今又承柯榮欣先生的不棄，爲之印行成書，而高伯雨先生則爲我訂正，感何可言。迴想舊游，常縈夢寐，亦思追憶前塵，而時不我予。今者衰病侵尋，神思滯塞，眼花手顫，憚於握管，因綴數語，叙其顛末。

一九七一年二月在香港，

吳縣包天笑時年九十六。

緣起

我寫此稿，在一九四九年五月，我那時七十四歲了。我的記憶力已日漸衰退，大不及從前，有許多經歷的故事，忘了它的頭緒，有許多結交的朋友，忘了他的名字，恐怕以後，更不如現在了吧？有時我的兒孫輩，問起我幼時的事，有些是茫然莫知所答了，有些也只是片羽殘鱗，雖然僅是個人的事，也好像是古人所說，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了呀？

昨天夜裏，忽得一夢，夢着我已變成了一個八九歲的兒童，依依在慈母之側。我的母親，還是那樣的年青，還是那樣的慈愛，可惜那不過一剎那之間，我便醒了。母親不會和我說過什麼話，也沒有什麼表示，我醒後却不能忘懷。其時已是天將微明的時候，窗外的白雄鷄，已在喔喔啼了，我再也不能重續殘夢了，我雙目炯炯，至於天曉。

我以行將就木之年，我比中國人最尊敬的孔夫子，已多活了一年，而忽然得了此夢，雖然我對於幼年的夢，常常做的。爲了睡不着，引起了我枕上的種種回憶，但是那種回憶，也是一瞥即逝，似春夢無痕。因此我便把此刻還可以記憶的事跡，隨便的寫點出來，給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看看，以時代變遷的神速，他們也許爲了追思往事，而增添一些興味吧？

目 錄

	頁 數		頁 數
柯序		我的近視眼	四〇
自序		兒童時代的娛樂	四四
緣起		在新年裡	五一
我的母親	一	我的拜年	五四
上學之始	三	自桃花塢至文衙弄	五七
上學以後	七	記顧九皋師	六二
我的父親	一〇	桃塢吳家	六五
三位姑母	一三	扶乩之術	六八
我的外祖家	一六	出就外傳	七二
自劉家濱至桃花塢	二〇	記朱靜瀾師	七六
中落時代	二四	讀書與習業	八一
兒童時代的上海	二七	小考的預備	八四
延師課讀	三二	考市	八八
記姚和卿先生	三六	縣府考	九一

院試	九五	木刻雜誌	一六六
觀場	九九	譯小說的開始	一七〇
讀書與看報	一〇三	蘇滬往來	一七五
自文衙弄至曹家巷	一〇七	烟蓬的故事	一八一
面試	一一二	名與號	一八八
父親逝世之年	一一七	釧影樓	一九三
父親逝世以後	一二二	結婚	一九七
適館授餐	一二六	初到南京	二〇三
訂婚	一三一	記蒯禮卿先生	二〇八
進學	一三四	在南京	二一四
入泮	一三九	金粟齋譯書處	二一八
記徐子丹師	一四三	金粟齋時代的朋友	二二四
求友時代	一四七	重印仁學	二三二
西堂度曲	一五二	金粟齋的結束	二三七
外國文的放棄	一五六	巡遊譯書處	二四二
東來書莊	一六一	回到蘇州	二五〇

	頁數		頁數
吳中公學社·····	二五七	編輯雜誌之始·····	三五七
重韓棄養·····	二六四	還鄉三事·····	三六三
葬事·····	二七〇	一天的臨時記者·····	三六八
到青州府去·····	二七六	編輯小說雜誌·····	三七五
記青州府中學堂(一)·····	二八三	在商務印書館·····	三八五
記青州府中學堂(二)·····	二九一	記余覺沈壽事·····	三九三
青州風物·····	二九八	春柳社及其他·····	三九八
青州歸來·····	三〇六	時報懷舊記(上)·····	四〇七
移居上海之始·····	三一二	時報懷舊記(下)·····	四一三
新聞記者開場·····	三一七	回憶狄楚青·····	四二〇
在小說林·····	三二三	日本之游·····	四二八
息樓·····	三二八	參觀朝日新聞·····	四三七
女學校教書·····	三三四	記上海晶報·····	四四四
女學生素描·····	三三九		
時報的編制·····	三四五		
集會結社·····	三五一		

釧影樓回憶錄

天 笑著

我的母親

在五歲以前，我是完全不能記憶了，我的知識，就算是從五歲開始了吧。因為我是五歲就上學了。

我的出生，是在蘇州城內西花橋巷一個宅子裏。這宅子並不是我家所有，我家只是租着住居而已。及至我畧知事物，以及五歲上學的年齡，我家已遷到閶門內的劉家浜房子裏了。我所出生的花橋巷房子，直到如今，沒有進去看過。僅在十二歲那年跟隨父親，走過西花橋巷，父親指點給我看：「這是你生出的地方！」我只在門口望了一望。

我們只有姊弟二人，姊姊長我三歲。我家不用奶媽，都是我母親乳養大的。自從我生出以後，姊姊是祖母領去同睡了，我是專依戀着母親了。我記得我是常常捧着母親的面頰，勾着母親的頭頸而睡的。

在我七八歲的時候，母親吐過一次血，那時西醫還不會流行到中國內地來，但是中國也知道有些吐血是一種肺癆病，而且要傳染給人的，母親便不許我向地面對面睡在一床了。我因此哭了幾場，母親忍不住了，另設一被，另具一枕，只許我睡在床的另一頭，不許和她親近。

有一天早晨，天還沒有大亮，我便醒了，便爬到母親身上去。那時帳外殘燈未滅，在晨光熹微中，我看見母親面容慘白，似乎是另一個人。我便哭喊道：「噯呀！你不是我的母親呀！你是誰呀？」

母親被我鬧醒，拍我的肩頭說道：「癡孩子！怎的不是你的母親呢？你認認清楚呀！」便對我展開了笑容，遲之又久，我才認清了母親的面容，緊緊的摟着她，惟恐失去了她。後來母親垂淚向父親道：「我的病恐怕是不起了，孩子已不認得我了。」但是後來母親的病，却也漸漸的愈了。

我在七八歲以前依戀母親，沒有一時間離開了她。凡是母親回到外祖家去，我總是跟了去。有一次，母親一個人去了，事前不給我知道。我放學回來（那時我是六歲吧），不見了母親，大發脾氣。祖母說：「母親今天就要回來的，吵什麼呢？」便命家中男傭人黃福，擗在肩頭上，到門口迎接母親去。我一定要黃福送我到外祖家，黃福不肯，只有擗了我兜圈子。見一頂轎子迎面來了（那時蘇州。中上階層人家婦女，出門必坐轎子），便騙我說：「母親回來了。」我見轎中端坐的不是母親，又哭。直到吃夜飯時，母親方才回來，我心中方安定。她告訴我說：「因為外祖家的小妹妹，正在出痧子，所以不帶你去。」

我祖母的母家姓吳，我母親的母家亦姓吳。外祖家叫我母親爲六小姐，或六姑奶奶，但她並不排行第六。在兄弟輩，她沒有長兄，僅有一弟。在姊妹間，她有一姊，嫁蔡家，已經故世了，此外僅有一妹，一弟一妹，均異母所出，無論如何，均不會排行第六。我曾問過母親，母親說：「他們從小就這樣叫我，大概是大排行吧？」（按，大排行者，連堂房的兄弟姊妹，都排列進去，中國的大家庭，有這樣的風俗。）

但我對於母親的被呼爲六小姐，始終不明。因為我從未聽說外祖有兄弟，亦未見過母親有堂房姊妹呀。後來我問母親，「也許是一個小名，聲音與六字相同，並非排行第六吧？」於是寫了許多在吳音中與六字相同的字，請母親選擇一個（那時我已經十五六歲了）。母親說：「我又不識字，不必要

一個名字。」（當時中國婦女十分之八九不讀書，沒有名字）我再三要求母親選一個名，母親徇愛兒之請，隨便在我所寫的許多字上，指了一個，乃是「慕」字，於是便定了慕字。後來直到母親去世時，我寫她的行述，也用了這個名字。

這個慕字，詩經上有一句「慕竹猗猗」，是與竹有關係的，恰好我父親號「韻竹」，也可以算得有些巧合咧。

我的母親，在我的內心中，在我的敬愛中，直到如今，我稱頌她是聖者。我未見世上女人道德之高，過於吾母者。她不識字，不讀書，未受何等教育，然而事姑，相夫，教子，可以說是舊時代裏女界的完人。這不獨是她兒子如此說，所有親戚朋友中，沒有一人不稱讚她賢德的。

上學之始

我五歲就上學，可算是太早了，但近代在五歲時，入幼稚園的，也不是沒有。況且我是在舊曆二月初二生的，也可以算得足四十八個月了。在未上學之先，祖母教我識幾個筆畫簡單的字，我都認識。又以我的父親，在幼年時，適逢太平天國之戰，隨着祖母，奔走逃難，深恨自己從小失學，希望我

成一讀書種子。

我家那時住在城西劉家浜一個宅子裏，這宅子是一個巨宅，裏面住了三家人家。除我家外，一家姓賴，福建人，漢軍籍。一家姓譚似爲安徽人，有些忘了。因爲當時蘇州是個江蘇省城，別省來此做官候補的人很多（清制，本省人不能做本省官）。這賴譚兩家，都是到江蘇來候補的，而在蘇州作寓公。後來賴家有一位叫賴豐熙，譚家有一位叫譚泰來，一個做了吳縣知縣，一個做了蘇州府知府，都是前清時代的地方官，但那時候，他們兩家和我的一家，都已遷出劉家浜這個宅子了。

我的上學動機，和賴家有關係。這一宅子中，譚家住正屋，譚家住花廳，而我們住在花廳對面幾幢樓房中，也有大小八九間房子。雖然花廳前面的庭院很大，院中花木扶疏，還有假山，可是我們和賴家、總是望衡對宇。他們女眷中有一位三太太，和我祖母、母親極爲客氣，以鄰居關係，常常互相餽贈食物。這位三太太，有時穿長袍，作旗裝；有時短襖長裙，作漢裝；因爲她是漢軍的關係也。（漢軍可與滿人通婚，亦可與漢人通婚，成爲滿漢通婚的橋梁。）

因爲三太太有個兒子約摸十三四歲，要請一位西席先生。他們都能說蘇州話，又感於蘇州文風之盛，要請一位蘇州先生。商之於我祖母，我祖母本來預備我要上學，也要請一位開學先生，那就來得正好，便商量兩家合請一位先生。

祖母就託了她的第一女婿，就是我的姑丈尤巽甫先生。巽甫姑丈又託了他的堂兄鼎孚先生，也是我的表姑丈，介紹了一位陳少甫先生（名恩梓），這算是我家與賴家合請的。陳先生朝出暮歸，好在他的家，離館極近，他住在迴龍閣，就在劉家浜南面的一條街，不過是咫尺之間。當時訂明，賴家供一餐午飯，我家供一頓晚點，夜飯是陳先生回家吃了。

我上學的儀式，頗爲隆重。大概那是正月二十日吧？先已通知了外祖家。外祖家的男傭人沈壽，到了那天的清早，便挑了一担東西來。一頭是一隻小書箱，一部四書，一匣方塊字，還有文房四寶、筆筒、筆架、墨牀、水盂，一應俱全。這些東西，在七十年後的今日，我還保存着一隻古銅筆架，和一隻古瓷的水盂咧。那一頭是一盤定勝糕和一盤粽子，上學時送糕粽，諧音是「高中」，那都是科舉時代的吉語。而且這一盤粽子很特別，裏面有一隻粽子，裹得四方型的，名爲「印粽」；有兩隻粽子，裹成筆管型的，名爲「筆粽」，諧音是「必中」，蘇州的糕餅店，他們早有此種技巧咧。

停一刻兒，我的母舅坐轎子來了，他是來送學堂的。蘇俗：父親不送學堂，有母舅的母舅送，沒有母舅的叔伯送，或其他長輩送。在從前送學堂，要穿禮服來的，現在簡便得多了，只戴一頂紅纓帽，但若是紳士人家，還是要穿禮服的。

書房就在賴家花廳的一個耳房裏，有一個天井，天井裏三面都是高大的牆。有六扇長窗，長窗外有一個花砌，有幾枝天竹之類的小樹。學生只有兩人，就是我和賴家的這位世兄。這位賴世兄，他們家裏叫他大少爺，我當面雖然叫他賴世兄，背後也叫他一聲賴大少爺。

母舅一來，送入書房，便要行拜師禮了。傭人們在書房正中，點上紅燭，母舅拈了香，然後教我朝上拜了四拜，這是先拜至聖先師的孔子。然後在正中擺上一張椅子，然後地上鋪下紅氈單，請先生坐在椅子上，受學生拜師之禮。但我們的陳先生，却不肯坐，只站在上首，而且在我跪下去的時候，他便雙手把我扶了起來，這便算拜師禮成了。

我的坐位，就在先生的書桌傍邊。可憐的是我身體太小，因此在椅子上，放了幾個墊子，還襯上那條紅氈單，便抱了上去了。一面家裏又送上「和氣湯」，這也是蘇州的風俗，希望師生們，同學們

，和和氣氣，喝一杯和氣湯。這和氣湯是什麼呢？實在是白糖湯，加上一些梧桐子（梧與和音相近），青豆（青與親音相同），好在那些糖湯，是兒童們所歡迎的。

舅舅給先生作了一個揖，說了「拜託拜託」兩句，他的任務完成，便即去了，我就感到單獨。先生早已預備，用紅紙方塊，給我寫了六個字：「大富貴，亦壽考」。教我認識。這六個字中，第一個「大」字，早就認識了，其餘五個，都不認識。先生教了約摸四五遍，其餘的五個字，也都認識了。這一天下午本來也就放假，大概不到兩小時的光景，我也就放學了。

在放學之前，我們這位陳先生是非常道地的，把我的字版，安放在書包裏。最奇怪的，把我的書包翻轉來包了。說起來我的書包，也大為考究，這也是外祖家送來的。書包是綠綢面子的，桃紅細布的夾裏，面子上還繡了一位紅袍紗帽的狀元及第，騎着一匹白馬。書包角上，還有一條紅絲帶，繫上一個金錢。

臨出書房時，先生還把粽子盤裏的一顆四方的印粽，教我捧了回去，家裏已在迎候了。捧了這印粽回去，這是先生企望他的學生，將來抓着一個印把子的意思。為什麼把書包翻轉來呢，後經祖母解釋，蘇州有一句俗語：一個讀書人飛黃騰達，稱之為「書包翻身」，都是科舉時代祝頌之意。

上學以後

上學以後，我進步倒也不慢，每天認識方塊字，約近二十個字，不到兩個月，已認識了一千字了。這些方塊字，坊間是依着一部「千字文」而刊印的，倘再要認識生字，那就有一種在千字以外的方塊字了。這些認方塊字教法，只認識它的字形、讀音，而不加解釋它的意義，這是中國舊式的幼稚教育。

認識了一千字後，陳先生便給我讀了一本「三字經」，因為三個字一句，小孩子易於上口。「三字經」讀完後，先生便給我讀一本「詩品」，這詩品是司空圖著的，也是四個字一句，如「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坐，時聞鳥聲」之類，比之「千字文」，似乎更易上口。讀完「詩品」後，先生說：可以誦讀長短句了，便教我讀一本「孝經」。

照平常的啓蒙書，那些私塾裏，總是先讀三、百、千。所謂三百千者，乃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的三部書。但我却讀了一本「詩品」，一本「孝經」。三字經不必說了，「百家姓」與「千字文」，在實用上也很有效力的。以識字而言，也要識得人家姓什麼呀，讀了「百家姓」，那就便當得多了。「千字文」裏，一千個字，沒有相同的，於是人家便以此排列號數了，譬如「天字第一號」和「地字第二號」以次排列下去。不但如此，這與讀書人也很有關係，在小考、大考、鄉試、會試，也都以「千字文」排號的。假如在鄉試場裏，你的號舍是標明一個「來」字，你如果讀過「千字文」的便知道有「寒來暑往」的這一句，你的號舍，就在「寒」字與「暑」字之間了。

讀完「孝經」就讀四書了。照例讀四書的順序，先讀「大學」，次讀「中庸」，然後讀「論語」

與「孟子」。但是陳先生却不然，教我先讀「論語」，並不教我先讀大學、中庸。可惜的是論語還沒有讀完，就離開了這位可愛的啓蒙教師陳先生了。

陳先生的愛我，簡直同於慈母。我身體小，爬不上椅子時，他便抱了我上去。每次到學堂去，母親總吩咐我小便一次，然後進去。放飯出來進去，也是如此。偶爾忘記了，在學塾裏內急了，面孔漲得通紅，先生却已知道了，問我：「可是要小便了？」便引我到庭院壁角裏去小便。這位先生，真像一位裸母。

但這位賴世兄賴少爺，却常常侮弄我。把濕紙團裝在筆套管裏，做了紙彈射我。又用水盂裏的水，灑在我身上。因爲先生是個近視眼，他避了先生之眼，就如此作弄我。我生性懦弱，怯不敢响。有一天，我臨睡的時候，母親給我脫衣服，却見我後頸裏一個個的紙團，向我問起，我說：「這是賴世兄把濕紙團塞在我頭頸裏的。」現在那些濕紙團已經乾了。母親說：「那些濕紙團塞在頭頸裏不難過嗎？回來又不告訴人。」母親告訴了祖母，祖母恨極了，後來和賴大少爺的母親三太太說了，三太太把她的兒子罵了一頓，責令他到我家向祖母陪罪。

約在二十五年以後，有一位賴豐熙，做了我們吳縣知縣。我有一位盟弟李叔良（名志仁），在縣考時，賴知縣取了他爲「案首」（即第一名），非常賞識他，要把他的女兒配給叔良（後來沒有成功）。據叔良所談，我疑心這位我們的「父母官」，就是塞紙團在我後頸裏的賴大少爺。他是福建漢軍，又說住過劉家浜，更無疑慮。後來他就調任了，叔良進學以後，留學日本，也和他疏遠了，不會問他。

我的離開我的陳先生，爲了我們是遷居了。我家那時從劉家浜遷居到桃花塢。爲什麼要遷居，我

不知道，大概是家庭經濟緊縮之意。自從這一次離開了陳先生以後，從此就不會見面。我不知道陳先生的學問如何，但是啓蒙的時候，陳先生教我讀一本「詩品」，又教我讀一本「孝經」，是企望我將來成一詩人，又企望我爲一篤行之士，我雖不成器，陳先生可知是有學行的人了。

後來知道陳先生做了外交官，頗爲奇事，不知道那一位駐美欽使（當時無公使之稱，官書稱欽使俗稱欽差）到了新大陸去，陳先生當了隨員。難道陳先生懂得外國語言文字嗎？一定是不懂得，他教我識字讀書的時候，年已三十多歲了，那裏懂得什麼外國文？不過當時的出使外國大臣，也不必要識外國文，即如蘇州的這位洪狀元洪鈞，也出使外國，他何嘗懂得外國文，其餘的隨員，更不必說了。

據說：陳先生到了美國，在使館裏終日閉門家居，不大出來。有人說：他到了美國，好似沒有到美國，仍舊在自己家裏。又聽說他回國以後，曾經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痛罵美國，從政治到社會。中國有許多諳洋務、講新法的人，都以陳先生的出洋爲笑談，說他不通世務。我雖不會讀到陳先生痛罵美國的文章，但不是我迴護師門，必有精刻之論，至少比了那些「月亮也是外國好」的人，多少有些見識。

在辛亥那一年，陳先生放了新加坡領事。這時我的一位朋友畢倚虹（名振達，號幾庵）做了他的隨員。剛到上海就武昌起義了。陳先生不能到任，回到蘇州去了，而倚虹也到中國公學去讀書。我起初不知道先生的行蹤，經畢倚虹談起才知道，我那時已住在上海，幾次想回蘇州去拜謁陳先生，都蹉跎了，先生乃不久即逝世了。

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是一個遺腹子，他在祖母腹中時，我的祖父已經故世了。這不是悲慘的事嗎？我也少孤，但是我到十七歲父親才故世，我還比父親幸福得多。

我的祖母生有兩子三女：第一胎是男，我的大伯，到三歲時候死了。第二胎是女，我的二姑母，嫁尤氏，姑丈尤巽甫（名先庚），二姑母早死，我未見。第三胎是女，我的三姑母，嫁顧氏，姑丈顧文卿（名維煥），三姑母亦早死，續娶亦包氏，我祖的姪女。第四胎是女，我的四姑母，嫁姚氏，姑丈姚寶森（名儀廷）。第五胎是男，是我的父親。所以我父是遺腹子，而不是獨生子。

我家祖先，世業商，住居蘇州闔門外的花步里，開了一家很大的米行。我的曾祖素庭公，曾祖母劉氏，他們所生的兒女，不僅我祖父一人，但是祖父排行最小。

祖父名瑞瑛，號朗甫，因為他的號是朗甫，所以我的號是朗孫，祖母所命，用以紀念祖父。他是一個文人，是一個瀟灑的人，常以吟詠自遣（但他的遺墨，我一點也沒有得到）。不過他並沒有去應試過，不會走上科舉的路，也不想求取功名，只喜歡種花、飲酒、吟詩，對於八股文是厭棄的。大概家裏有幾個錢，是一位胸襟恬澹，現代所稱為有閒階級的人。可是天不永年，將近三十歲，一病逝世，把一大堆兒女，拋給祖母了。

我不曾見過祖父，連父親也不會見過他的父親，這只在祖母口中傳下來的。除了我的大伯，三歲便死以外，其餘有三位姑母，都在幼年，而我的父親，則在襁褓中，中間適逢太平天國之戰，到處奔走，到處逃難，正不知祖母怎樣把一羣孩子撫養成人的。

據祖母說：這是幸虧得她的父親炳齋公（我父的外祖吳炳齋公），逃難一切，都是跟了他們走的。炳齋公只一個女兒，便是我的祖母，當時他們是蘇州胥門外開燒酒行的，燒酒行吳家誰不知道？而我們是在閶門外開米行的，也頗有名氣，論資本還是我們大咧。以燒酒行的女兒，配給米行家的兒子，在當時，也可算得門當戶對的。

父親幼年失學，因為他的學齡時代，都在轉徙逃難中喪失了。祖母說：我父親的讀書，斷斷續續，計算起來，還不到四足年，然而父親的天資，比我聰明，他並未怎樣自己用功自修，而寫一封信，却明白通達，沒有一些拖沓，從不見一個別字。他寫的字，甚為秀麗。想想吧！他只讀了四年書呀！我們讀了十幾年書，平日還好像手不釋卷似的，有時思想見識，還遠不及他呢。

太平之戰以後，父親已是十三四歲了，所有家業，已蕩然無存，米行早已搶光，燒光了，同族中的人，死亡的死亡了，失蹤的失蹤了，閶門外花步里的故宅，夷為一片瓦礫之場了（這一故址，後來為武進盛氏，即盛宣懷家所佔，我們想交涉取回，但契據已失，又無力重建房子，只好放棄了）。我們只是商家，不是地主，連半頃之田也沒有。

在這次內戰以前，閶門外是商賈發達，市廛繁盛之區，所以稱之為「金閶」。從楓橋起，到什麼上津橋，接到渡僧橋，密密層層的都是商行。因為都是沿着河道，水運便利，客商們都到蘇州來辦貨。城裏雖然是個住宅區，但比較冷靜，沒有城外的熱鬧。自經此戰役後，燒的燒，拆的拆，華屋高樓，頃刻變為平地了。我的外祖家，從前也住在閶門外來鳳橋，母親常常說起，爲了戰事而橋被炸斷。

父親到十四歲時，不能再讀書，非去習業不可了。從前子弟的出路，所有中上階級者，只有兩條路綫：一條是讀書，一條是習業。讀書便是要考試，習舉子業，在科舉上爬上去。但是父親因爲幼年

失學，已經是來不及了。而且這一條路，有好多人是走不通的，到頭髮白了，還是一個窮書生。所以父親經過了親族會議以後，主張是習業了。

當時蘇州還有一種風氣，習業最好是錢莊出身。以前沒有銀行，在北方是票號，在南方是錢莊。凡是錢莊出來的，好似科舉時代的考試出身（又名爲正途出身），唱京戲的科班出身一樣。並且錢莊出身的最好是小錢莊的學徒出身，方算得是正途一般。在親族會議中，便有人提出此議，如打算盤，看洋錢（當時江浙兩省，已都用墨西哥銀圓了，稱之爲鷹洋，因上有一鷹），以及其它技術，小錢莊的師父肯教（以經理先生爲師父，也要叩頭拜師）。大錢莊經理先生，都是老氣橫秋，搭臭架子，只有使喚學徒，不肯教導學徒。

從前當學徒是很苦的，尤其當那種小錢莊的學徒，如做童僕一般。祖母只有父親那樣一個兒子，而且是遺腹子，如何捨得？但爲了兒子的前途計，只得忍痛讓他去了。可是父親却很能耐苦，而且身體也很健實，大概是幾年內奔走逃難，鍛鍊過來的了。他却不覺得吃苦，處之怡然。

這家小錢莊，只有一間門面。當學徒的人，並無眠床，睡眠時，等上了排門（從前蘇州無打烊的名稱，而也忌說關門兩字），把鋪蓋攤在店堂裏睡覺，天一亮，便起來捲起鋪蓋，打掃店堂，都是學徒們的職司。吃飯時給經理先生裝飯、添飯，都是學徒的事。他要最後一個坐在飯桌上，最先一個吃完飯。魚肉葷腥，只有先生們可吃，他們是無望的。有的店家，經理先生的夜壺，也要學徒給他倒的。但是這一錢莊的經理很客氣，而且對於我父頗器重，很優待，常教他一切關於商業上的必須業務。

三年滿師以後，我父便被介紹到大錢莊去了。因爲我們的親戚中，開錢莊，做東家的極多，只要

保頭硬，便容易推薦。到了大錢莊，十餘年來，父親升遷得極快，薪水也很優，在我生出的時候，父親已是一位高級職員了。錢莊裏的職員表，我實在弄不清，總之這個經理是大權獨攬（經理俗名「擋手」），亦有什麼「大伙」「二伙」之稱，又有什麼賬房，跑街等名目，大伙就是經理，父親那時是二伙了。一家大錢莊，至少也有二三十人。現在那些吃錢莊飯的老年人，當還有些記得吧？

但我到約摸七八歲光景，父親已脫離了錢莊業了。父親的脫離錢莊，是和那家的擋手（即經理）有了一度衝突，憤而辭職。當時一般親戚，都埋怨他：倘然有了別處高就而跳出來，似乎還合理；現在並無高就，未免太失策了。可是父親很憤激，他說：「這些錢莊裏的鬼蜮技倆，我都看不上眼，我至死不吃錢莊飯，再不做「錢糊猴」了。（按：錢糊猴乃吳人詬罵錢莊店夥之詞。）

三位姑母

我現在要敘述我家的親戚了。我祖母有三個女兒，我有三個姑母，上節已經說過了。

我先說我的二姑母，嫁尤氏早死，我不及見了，但這位二姑丈，我是親炙過的。那個尤家是蘇州大族，尤西堂之後，太平之戰，他們逃難到上海等處，沒有像我家那樣大破壞。我的異甫姑丈，據說

小時也曾到過大錢莊習過業，但他不慣爲學徒，他是個富家公子，家裏有錢，可以讀書，而且是請了名師教授。他的業師，就是楊醒逋，最初在舊書攤上發現沈三白的「浮生六記」的就是他。（當時他在冷攤上所發現的鈔本，不止一種，曾交申報館申昌書畫室印行出版，名爲「獨悟庵叢鈔」。）

巽甫姑丈發憤讀書，進了學後，便不鄉試，他的堂兄鼎孚先生，雖則是中了順天鄉試舉人，但也絕意功名，在家裏當鄉紳。姑丈總說是身體不好，確是閉門家居，懶得出門，但是也沒有什麼大病，以課子爲專業。除課子外，便是吞雲吐霧，以吸鴉片爲消遣。但他是一位文學家，尤其是他的八股文（明清兩代的制藝，俗稱八股文），理路清澈，規律精嚴，而他的教育法也好，對於教人，是一片誠摯。他的兒子，名志選，號子青，別號願公，爲吳縣名廩生，正是他一手造成的；就是我，也受他的教導之惠不少。以後我再要提到他，暫且擱下。

我再說我的三姑母，嫁顧氏，我也未及見，她生了一女一子，生兒子的時候，以難產死了，剩下兩個孩子。祖母便以她的姪女，嫁給文卿姑丈爲續絃，由其撫育初生之子，而把三姑母所生之女，携回自己撫養。所以我的這位顧氏表姊，一直住在我家，及到她的出嫁。雖然是表姊，我們視如同胞姊妹一般。母親也對她如己出，爲之梳裹，教以女紅，她也不大回到自己家裏去。後來她嫁的是一家書香人家，我的表姊丈是朱靖瀾先生，也是我的受業教師，此是後話。

我的顧文卿姑丈，他家本也大族，自經太平之戰，便什麼也沒有了。姑丈的父親，還是殉難死的，因爲我見他有個官銜，叫做「世襲雲騎尉」，我問他是什麼官職？他就告訴我：「凡在長毛時代殉難死的，克復以後，給他後代子孫，一個「世襲雲騎尉」職銜，」我問他：「有什麼用呢？」他說：「一點沒有用，算是撫卹而已。」

姑丈的職業，是同仁和綢緞莊的內賬房。這一家綢緞莊，就是二姑丈家尤氏所開的。在蘇州開綢緞莊，也是一種大商業，因為蘇杭兩處，都以產絲織物出名的。同仁和綢緞莊，開在閶門內西中市大街，最熱鬧繁盛之區。每逢看三節會的時候（即迎神賽會，所謂三節者，乃是清明、中元、下元也）前門看會，後門看船（花船），我們兒童到他店裏，他總添了飯菜，招待我們。

我的四姑母，嫁姚氏，這是祖母最小的女兒。但是一件最悲慘的婚姻，從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雙方不得見面的，怎知我的姚寶森姑丈，是有點癡獸性質的。北方人謂之傻，南方人謂之獸，蘇州人謂之跛頭跛腦，總之也是一種精神病。譬如和他談話吧！起初很正常，後來說越離譜了。我最怕他，當我是兒童的時候，他常常捉住我，高談濶論，批評時事，我不知道他亂七八糟講些什麼。

但他的長兄姚鳳生（名孟起），當時在江南稱得起一位大書家，文學也很好，有許多向他學寫字的學生，都是名門巨宦的子弟。他還刻了許多碑帖，印了許多書法，初學寫字的，都摹臨他的書法，因為清代是重書法的，從兒童入學，以及躋登翰苑，乃至退老園林，也不離此。他印出的書法，是精工木刻的，中楷都用了朱絲九宮格，都寫的是歐字（歐陽詢）。那時歐字最吃香，據傳說最近某一科狀元，殿試卷寫的歐字，西太后甚欣賞，因此造成一種風氣，大家寫歐字了。有一套書法，名叫「率更遺則」，大小楷全是歐字，我也寫過，寫得字像木片一般，真不好看。

這位姚鳳生姻伯，和我的寶森姑丈，是胞兄弟，一母所出，何以智慧相距若此，殊不可解。但是我的四姑母，性情也不大好，却有些執拗與偏見。祖母也說：在三位姑母中，是她最任性，而又以當時的盲目婚姻害了她，她生了一子、一女，都不聰慧，都是有點獸氣，自然是先天關係，得了我姑丈

的遺傳，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因此我的四姑母，在中年便鬱鬱而死了。

姚家也是大族，他們的住宅，在桃花塢有兩大宅，東宅與西宅。這兩大宅房屋總共有百數十間，據說還是明代所建，現在出租給人家居住，共有十餘家。我的姑丈那一支，他們還開了一家緯綫店，店號是姚正和。開設在閩門的東中市大街。這緯綫店是做什麼的呢？原來做前清時代官帽上的紅緯用的，有的暖帽上用的，有的涼帽上用的。此外還有瓜皮小帽上一個紅結子，却是絲綫結成的。他們工作的地方，就是在店裏，雖是一種手工業的商店，却是生意不少，不但是本城的帽子店仰給於此，各地都有來批發的。

我的外祖家

我的外祖蘊山公，姓吳，他的大名，已經忘却，他是蘇州典當公業的總理事。蘇州各業，都有一個公所，似近日的商會一般，典當業也有這個機構，規模較大，因為從前典當業屬於半官性質，須向北京戶部領照，然後開設，不是那些押店可比的。這個典當公業，他們稱之為「公賬房」，理事之上，還有董事，我記得吳大澂的哥哥吳培卿，也是董事之一。

當我七八歲的時候，他家裏可稱爲全盛時代。他家裏人並不多，我的外祖母是續絃，我母不是她生的。她生了一男一女，就是我的母舅和母姨了。母舅已娶了舅母，生了一位表妹，比我小一歲，總共不過六個人，但是家裏很熱鬧。

其所以熱鬧者，第一、家裏的男女傭僕多，主人六人，傭僕倒也有五、六人，有厨子、有僕人、有老媽子、有婢女，人就多了一倍。第二、親戚來得多，他們家裏有不斷的親戚來往，一住就是半個月、二十天。第三、我的外祖母性喜交際，常常約她的女朋友和親戚來打牌（按，當時麻雀牌尚未流行到蘇州，那時所流行的名爲「同棋」，又叫「黃河陣」，是一百零五張骨牌，也是四人玩的）。

我的母親春秋兩季，必回外祖母家，住半月到一月不定。從前上中等人家，婦女出門，必坐轎子，又因爲纏了腳，在街上行走，有失體面。譬如一位少奶奶回母家，必是母家用轎子來接；到她回夫家去，又是夫家用轎子來接，方合禮節。雖然說春秋兩季，回到外祖母家住一陣，但平日或有事故，如拜壽、問病、吃喜酒之類，也必回去；還有在新年裏，也必回去一次，向外祖父母拜年。

新年到外祖家拜年，是我們兒童最高興的一天，常常約定了一天，到他家裏去吃飯。我的表兄弟姊妹，有七八位之多，飯後，外祖父領導一羣孩子到玄妙觀遊玩。他們起初住在祥符寺巷，後來住在史家巷，距玄妙觀都不遠。

蘇州玄妙觀，在新年裏，真是兒童的樂園。各種各樣的雜耍，以及吃食零星店、玩具攤，都是兒童所喜的。有兩家茶肆，一名三萬昌（這是很古的，有一百多年歷史）；一名雅集，外祖父領了我們到茶肆裏，我們許多孩子團團圍坐了兩桌。這裏的堂倌（茶博士）都認得吳老太爺的，當他是財神光臨了，這名爲「吃橄欖茶」，橄欖象徵元寶，以其形似。玄妙觀茶肆裏，每桌子上幾個碟子，如福橘

啊、南瓜子啊，一個堂倌走上來，將最大一隻福橘，一拍爲兩半，稱之爲「百福」（吳音，拍與百同聲，福橘是福建來的橘子）。外祖父臨行時，犒賞特豐，因此他們就更爲歡迎。

在茶肆隔壁，便接連幾家耍貨店（即玩具店），於是一班小朋友，便圍攻了它，你要這樣，我要那樣。但是我對於玩具，就不喜歡那種木刀槍、虎面子、喇叭、銅鼓、泥娃娃、小白兔之類，我却喜歡那些雛形的玩具，如小桌子、小椅子、小風爐、小暖鍋等等，其次，我還喜歡那些機動的東西，有一個翻筋斗的孩童，價較貴，我喜歡它，外祖便特地買給我（這個玩意兒，紅樓夢上的薛蟠，從蘇州買來的也有此物）。還有一對細工的人像，是白娘娘與小青，都是絹製的衣服，開相也美麗，那是一齣「金山寺」的戲劇，我很愛好它，保藏了好幾年。

爲了遊玩玄妙觀，我曾鬧過一個笑話：那時外祖父臨時發給我們每人制錢一百文，以供零用（譬如看玩把戲，買畫張，聽露天說書，吃酒釀等等，都要零碎錢），我這一百文錢，到回去時，還剩十餘文。從玄妙觀後門出去，將近牛角浜，有一個老年的乞丐，向我討錢，他的鬚髮都白了。我把手中用剩的十幾文全都給了他（向來施捨乞丐，只給一文錢）。他很感謝，向我作了一個揖，我童稚的心理，覺得禮無不答，也連忙回了他一揖。

這件事，爲同遊的姊妹兄弟們所譁笑了。他們說：「一個叫化子，給了他錢，那有再向他作揖的道理？」於是故意的形容，故意的描寫，說我是一個慳大，一個欸子，連我的母舅母姨都笑我。我窘得無可如何，面漲通紅，幾乎要哭出來。但是我的母親却回護我，母親道：「好了！我寧可有一個忠厚的兒子，不願有一個過於聰明的兒子。」（按，蘇人當時有一句成語道：「忠厚乃無用之別名」，忠厚在當時不算一個好名詞。）

外祖父在興盛時期，儘量揮霍，一無積蓄，也不置一些產業，以致他一故世後，這個家庭立即崩潰下來。其實他自己非常節儉，以他的所得專供家人濫用。我的舅舅號雲濤，是一位公子哥兒，最初學生意，吃不來苦，逃回來了。加以外祖母溺愛，成爲一位靠父蔭的寫意朋友。他拍拍曲子，還能畫幾筆蘭花，字也寫得不壞，可是吸上了鴉片烟。外祖父死後，一無所恃，立即窮困，不得已住到角直鎮鄉下去了。

舅舅無子，僅有一女，小名珠，比我小一歲。在我七八歲的時候，逢母親歸寧，我也隨去，常常和表妹一同遊玩。不知是那一位姨母說了一句笑話道：「他們不像是一對小夫妻嗎？」爲了這一句話，我們這年長的表姊們，便作她們嘲弄我們的口實。當時我們很害羞，很覺得難爲情。漸漸的我這位表妹不再共遊玩了，到十二三歲，甚至見我去就避面，但是你越是害羞，她們越是嘲笑得厲害。

這一件事，在我十歲的時候，有一位姨母提出過，意思是弄假成真，把這一對表兄妹結成婚姻了吧！但那時候，她家正是興旺，我家日趨中落，我外祖母不贊成，我舅舅也不贊成。在我們這方面，是由祖母做主的，我的祖母也不贊成，她說：「這個女孩子太嬌養了，況是一個獨生女，我們配不上她。」這也不過偶然微露其意，以後也就不提了。

可憐我這位表妹，後來到了二十七歲，還是一位老處女，終身未嫁。大概自從外祖父故世後，他們遷到鄉下去住後，我和表妹從此就不見面。舅舅在鄉下故世，無以爲殮，我那時已是二十多歲了，在蘇州買了一口棺木，僱了一條網絲船，星夜載到鄉下去，辦了他的身後事，那時才和她見了一面。只見她憔悴不堪，舅舅說她是有病，什麼病我不知道，但的確是病容滿面了。

舅舅死後，舅母與表妹，又住到蘇州城裏來了，母女兩人，租了一所小房子，做做女紅，勉強度

日。她們住得很遠，我也難得去看她們。有一天，舅母派人到我家，說她的女兒病危，急切要我去一次。我那時已是有妻的人了，我妻催促我即去，到了她家，她勉強擁被而坐，含着一包眼淚，說道：「有兩件事奉託，」一是懇求我辦她的後事，一是望照應她的母親。我立刻答應了。她嘆一口氣道：「不想還是哥來收殮了我，也可瞑目了！」這話似頗含蓄，而很覺悲淒，但我和她並沒有戀愛的成份，而久經疏遠的。這是為她的父母所害，為什麼不給她早早擇配呢？（那時候，女子不許自行擇配的。）關於這位表妹的事，我曾寫過一篇短篇小說，却是紀實之作。

自劉家浜至桃花塢

我家自劉家浜遷移至桃花塢，在我幼年時期是一轉變。

這一年，我是七歲吧，我們自己沒有置屋，都是租屋居住的。但劉家浜的房子大，對面是一個大庭院，花木扶疏。我記得有一棵山茶花樹，還有兩棵木犀，春來沿壁還有薔薇花。草花無數，則有雞冠、鳳仙、秋海棠，秋來絢爛一時，都是顧氏表妹的成績。桃花塢的房子，是一個石版天井，雖也寬敞，却沒有花木。劉家浜的房子，走出大門很近，只要跨過茶廳，就到大門，門前還有譚宅的門房，

門公。桃花塢的房子，我們住最後一進，到大門外去，要走過一條黑暗而潮濕的長長的備街。

住居劉家浜時，西首斜對門，即是尤宅，我的巽甫姑丈，即住居在此，他們是一個大家庭，上面老兄弟二人，一號春畦，一號省三，我都要呼他們爲公公。春畦生兩子，一號鼎孚，一號詠之，這兩位都是祖母的母家吳家的女婿，祖母的姪婿。省三生一子，便是我巽甫姑丈。這三兄弟中，鼎孚是個舉人，詠之與巽甫都是秀才。再下一代，鼎孚有兒子七人之多，詠之有二子，巽甫有一子，女兒是記不清了。他們是一個巨室，不過有一個家法，不許納妾。蘇州的巨室，恆喜納妾，但他們家裏，却找不到一位姨太太。（按：最後第三代有破除此例者。）

因爲距離很近，我小時常常跑到他們家裏，他們房子多，穿房入戶，也是慣了的，並且他們的小兄弟，和我年相若的很多，更添興趣。他家有一個小花園，也有台榭花木之勝，有一個池子，養着許多金魚，兒童們所歡喜。自從遷移到桃花塢後，可不能再去了。到了十餘年後，尤家聘請西席先生，我便被他們請了去，教我的幾位表姪，此是後話，暫且緩提。

住在劉家浜時，東隣有一狐仙殿，僅有兩間房子，一個老太婆住在裏面，居然有人來燒香，還有一個女癡子，約模三四十歲，不知是否住在狐仙殿內？她認得我，見我一個人，便叫道：「喂！你們弟弟在門前，不要被拐子拐去呀！」再向東去，約數家門前，有一個地址，相傳是金聖歎的故宅。

桃花塢接着東西北街，這條路是很長的，街名既雅，而傳說唐伯虎曾居此，因才人而著名（但後來則因年畫而著名）。我祖母家的吳宅亦居此；不過他們住在東首，我們住在西首，我們租住者，便是親戚姚家的房子。這姚家宗族既繁，房份也多，他們有東西兩宅，各有大門進出，這好似紅樓夢

上的榮甯兩府，不過房子是有些敝舊了，又經過太平天國的兵燹，處處創痕可見。

他們後來都把餘屋出租了，東西兩宅，總共租了不下十餘家人家。一座巨宅，都分析了，譬如某幾處爲甲所有，某幾處爲乙所有，由他們各自出租。我們所租住的屋子，爲姚和卿先生所有（和卿先生後爲我的受業師，此事後述），是他們東宅的最後一進。此宅總共有七進，除茶廳（亦名轎廳）、大廳無樓外，其餘每一進都是三樓三底兩廂房。我們所住最後一進，更特別寬濶，後軒還更大。這一座三樓三底，我們與和卿先生家合住，我們佔三分之二，他們佔三分之一。

這種老式房子，還是在太平之役以前許久時間建築的，在戰役中，攻佔蘇州城後，打過館子的（如行營之類）。大廳上有一張大天然几，留有無數的刀砍痕跡。還有胆小的人說夜間弄堂裏有鬼出現的迷信話。而房子也正不及劉家浜的敞亮，因爲牆高而庭小，又是古舊，住在裏面，不無有點悶沉沉的。要從我們最後一進走到大門外，這條備術，足有半條巷之長，倘在夜裏，又沒有燈，只好摸黑，又說什麼鬼出現。我們小孩子，真有點害怕。

我的四姑母家，他們住在東西兩宅的中間房子，但也是在東宅和我們一個大門出入的，因爲他們把兩宅完全出租與人家了。在那裏有兩間姚鳳生姻伯很大的書室，這個書室，不是書卷琳瑯的書室，而是一個書法大家的書室。四壁掛滿了許多古今名書家的對聯字軸，中間擺着好幾張大書桌，都是他的學生們到此習練大字的，其中更大的一張書桌，是姚鳳生先生自己的書桌，上面有一個大筆筒，插着大大小小許多筆，以及人家來求墨寶的多卷軸兒。

他的書齋外面庭心中，有一棵很大的松樹，那棵松樹是很爲名貴的，它的很粗的樹幹兒，不可合抱，真似龍鱗一般，而顏色却是白的，大家呼爲「白皮松」。據說：這種白皮松，在蘇州城廂內外，

總共只有三棵，都是數百年以前之物。那些亭亭翠蓋，遮蔽了好幾間房子，因此那間書齋，他定名為松下清齋。唐詩有一句詩「松下清齋折露葵」，本來這個「齋」字，不作此解，他却借此作為齋名了。

這個松下清齋，當時在蘇州，却是無人不知的。因為姚鳳生先生那時除了收學生教寫字以外，還印出了許多法帖，是他臨寫了古人的字，刻石印行的。而他寫的書法，大楷小楷，精工木刻（蘇州的刻工最著名），用連史紙印了，十張為一套，作為小學生習字帖，名曰「松下清齋書法」，每套售一百四十文，沒有一個家塾，不是寫他的書法的。

來此習字者頗多官家子弟，有許多在此做官的或是寓公，也常來拜訪姚鳳生先生，所以茶廳中的四人轎，常常停滿。因為當時蘇州是省城，候補官員很多。倘其主人為候補道，則可以坐藍呢四人轎；其有差事者，則前面撐一紅傘，後面可以有跟馬。來訪的人，我記得有一位楊見山，單名是一個峴字，是個大胖子，他的隸書是出名的。（楊見山有個別號曰藐翁，據說他做官，為上司所參劾，說他「藐視官長」，故名藐翁）還有沈仲復、任筱珊等，這些都是寓公，也常來見訪。

中落時代

二四

以遷居而言，桃花塢之侷促，不及劉家浜之寬敞，以孩子的心情，也覺得後不如前了。大概父親脫離了錢莊業以後，景况便不及以前了，那時的舅祖吳清卿公（祖母之弟，名文渠）就很不以為然，以為既然在錢業中，當然要服從經理的指揮，好比在官場中的下屬，應當聽命於上司，那有反抗的餘地。但是父親志氣高傲，不肯屈服，因此便吃了虧。

這時父親雖脫離了錢莊事業，手中還有一點餘資，和友人經營一些小商業，也不甚獲利。後來開過一家毛骨棧，在齊門外下塘北馬路橋堍（那時蘇州並沒有馬路，但舊名詞已有馬路之稱）。這一家毛骨棧，外祖也有一些資本，但他佔少數，我父親佔多數，所有用人行政，都由父親處理。

怎麼叫做毛骨棧呢？就是專在城鄉各處，零星購買了各種獸毛獸骨，而整批出售的一種營業。獸毛中最大部份是豬毛，整担的在堆棧中堆着，其它的各種獸毛，也有如黃狼皮、兔子皮、老鼠皮等等，不過牛皮是少數，因為另有作坊。獸骨中，大部份是牛骨、牛角、羊角，以及其他的獸骨，獸角。除了獸毛、獸骨外，還有鷄毛、鷺毛、鴨毛，以及其它禽毛。關於人身上的東西，就是亂頭髮；還有破釘鞋上爛牛皮也收買的。那些東西，後來都成為出口貨了，經外國人科學製造後，重銷到中國來，化腐臭為神奇。在當時我們孩子心理，覺得這種營業，實在不大高尚。

這毛骨棧的店號，叫作盈豐，在齊門外下塘沿河，這是一條運河，老遠就看見我們雪白牆壁上，寫有一丈多見方的大字：「盈豐棧豬毛雜骨。」我們自己也有兩條沒有篷艙而足以裝貨的船，停在門前。這一帶，不獨是我們一家，還有一家店號同豐的，也和我們同樣的營業。

盈豐毛骨棧僅有踏進去的一間所謂賬房間者，較爲乾淨整理，裏面是一片大場地，排列着棧房，都是堆積着那些豬毛雜骨的，發出了極難聞的臭味。還有那些亂頭髮，有人說：都是死人頭髮，誰知道呢？有一天，有個狼巴巴的人，拿來七條髮辮，正聽得上一天，校場裏殺了七個犯人，明明是這七個死囚的頭髮了，但也不能不收。因此我們住在城裏的太太小姐們，再也不敢到這個毛骨棧裏去了。

這一種貨色，自有客商來收購，各處都有得來，而有一部份是銷到上海去的。那時豬鬃銷到外洋去，已是一宗輸出的大生意，豬毛在國內，也有作爲肥料的。牛骨、牛角，在國內銷場極大，可以精製各種器物；羊角可以製一種明角燈，有掛燈，有枱燈，在國內流行甚廣。尚有許多，我所不知者，未能盡述。頭髮後來也銷到外洋去，倘然如此，那七個斬犯的髮辮，也許會一變而爲歐美各國神聖大法官的假髮哩。

這個毛骨棧，我曾去過好幾次。本來蘇州齊門外，已近鄉郊，不大熱鬧的，但每一兩年出一種迎神賽會，叫做「賢聖會」，也不知是何神道，城裏的士女，傾巷來觀，也很熱鬧一時。我們也便借此去觀光這個毛骨棧。有一次，我們的棧房製造牛皮膏，是一位客商委託的，我以兒童好奇心，想往觀看，和父親住在棧裏，聞了一夜的臭味（煎牛皮膏的臭味），大呼上當。

父親開設了這家毛骨棧，他自己也難得去，委託了一位楊秋橋管理其事。誰知道這位楊先生，大拆其濫污，虧空得一塌糊塗。於是人家又責備父親用人不當，自己又不能常常到棧裏監督他們。我想：父親開設這個毛骨棧，也是一時的高興，後來便覺得這種營業，是不適於他幹的，他也對它興趣淡薄了。這家毛骨棧，在我十歲的時候，便盤頂收歇了。

我的父親雖是商業中人，但他的性情，却是高傲不屈的。我沒見過我的祖父，父親也沒見過，但

據祖母說，父親的性情，和祖父很相似。祖父文筆很好，却不事科舉，不去應試。和父親的走出了錢莊業，誓不回去，倔強的性格，有些相似。所以父親後來雖至窮困，也不肯仰面求人。他的母舅吳清卿公，號稱蘇州首富，他也不肯依附於他，此即孔子所說「君子固窮」吧？

從前並不流行筆算，也沒有近代發明簡捷的算術，商業上就靠一把算盤。但父親可以用左右手打兩把算盤，而核對無訛。用墨西哥銀圓，時常有夾銅、啞版、成色不足等等，但父親一聽聲音，即知其真偽。當時還行用制錢，中有方孔，以一百錢爲一串，但每有不足成色的，父親一望即知其數之足否，此種技術，都是從小錢莊學來。但一到大錢莊，即與今之銀行一般，有種種金融的事業，而範圍亦大，有盈虛消長之策在其中，而我父則以公平持正爲圭臬也。

自毛骨棧收歇以後，父親會去當過一次幕賓。那時有一位王梅仙先生，在桃花塢和我們同居，會試中式成進士（蘇人稱爲兩榜，舉人則稱爲一榜），也是吳縣人。以榜下知縣，發放湖北，補了湖北應城縣知縣的缺，急要聘請一位縣署裏的賬房。由姚鳳生先生推薦，父親就到了應城縣裏去了。可是不到兩年，王梅仙先生便丁艱卸任了，父親也只好回到家鄉來。

湖北應城縣著名的出產，便是石膏，恐怕到今天還取之不竭，行銷國外。也有人說應城縣賬房是個好缺，這都是莫須有的事。王梅仙先生的一個清廉的官，卸任以後，兩袖清風。父親向來是生性狷介，除了每月薪水，託人帶來補助家用以外，到了回家時候，路經漢口，土產也不肯帶一點，倒帶回一部應城縣志。

父親最遠的旅行，便要算是到湖北應城縣了。此外在他年小時，祖母携着他逃難，也會到過安徽的徽州（吳家原籍徽州，我家祖先亦爲皖籍）。以後便不會出過遠門，只是在家鄉的時候多。當然，

那個時候，交通沒有現在的便利，而蘇州人士也憚於遠遊，成了習慣，往往一個保家守產的人，到了頭髮已白，也不會離過家鄉，離家幾里路，就算遠遊，那末我父親到了湖北省，親友間就要算他出過遠門了。

但是父親却去過了上海好幾次，他到上海去，當然是關於商業上的，是何種商業，在我幼稚時代未能明曉。但是有一次，因為父親在上海病重了，我們便全家到了上海。

兒童時代的上海

我初次到上海的那年，記得是九歲（光緒十年）。時光好像是在深秋，日子記不清了。父親到了上海半個月後，忽然上海來了一封電報，電報上除了地址之外，只有簡單的幾個字：「韻病危，請速來。」下面著了一個「鹿」字。那時候，中國設立了電報局，還沒有許多時期，因為蘇州是江蘇省城，也就有電報局了。但是非有急事，民間是不大打電報的，這時我們家裏的驚惶，也就可想而知了。是誰打的電報呢？原來父親有一位好友，姓貝，字鹿巖，這位貝鹿巖先生，還是我的寄父呢。蘇州風俗，孩子往往寄名給人家，或是要好的親眷朋友那裏，這個風氣，不獨是蘇州，可稱全國都流行

，只是名稱不同罷了。我就在周歲時候，寄名給他們的。父親到了上海，就住在他們家裏，電報末尾，注上了這個「鹿」字，我們就知道是他打來的電報了。

我們接到了電報，十分惶急。電報上叫我們去，我們是否立刻動身？以祖母的敏感，就這電報上看來，說不定父親已經故世了。在緊張中，立時召集了一個親戚會議，商量辦法。當時舅祖吳清卿公（每次親戚會議中，他總是當主席，他是祖母之弟，年最長）主張由他那裏，派一位賬房先生，陪同祖母到上海去。母親和我姊弟兩個小孩子，可以不必去。但是母親不答應，哭了。我和姊姊見母親哭了，我們也放聲大哭。還是巽甫姑丈說：「既然要雇了船到上海去，多兩個人與少兩個人，沒有什麼大關係。不如大家去了，可以放心。不過陪同去的人，倒要一位親切妥當的人才好。」於是推了顧文卿姑丈陪同前往，文卿姑丈也立刻答應了。

那時從蘇州到上海，還沒有火車，也沒有小火輪，更沒有長途汽車，只有民船，僱一民船，自蘇州到上海，要經過三天兩夜。全部不用機力，只用人力移動的，順風張帆，逆風撐牽。我們那時僱了一條船，叫做「無錫快」，在這船裏坐臥，倒也舒適。親戚們還送了許多「路菜」，如醬鴨、燻魚、火腿、皮蛋之類，飯是船上燒的，可憐祖母、母親，心中掛念着父親，那裏還吃得下飯？

這條民船，白天開行，夜裏是要停泊的。停泊有停泊的地方，他們船家是曉得的。停泊的船，也不能是一條，往往要和別家的船停泊在一處，船家們也常有互相認識的。雇船的人也往往和人家做了「船鄉隣」，互相交際，成爲朋友。我們的船，第一夜停泊在正儀，第二夜停泊在黃渡，兩處都有「船鄉隣」。船家行船規例，在太陽落山之時，就要停船，明晨天剛一亮，便即開船啓程了。

第三天下午垂暮時，船便到了上海，也是停泊在蘇州河。顧文卿姑丈是來過上海的，是老上海資

格了，但他是一位十分謹慎的人。當我們接到了我的寄父貝鹿巖的電報後，我們曾經有個覆電給他，告訴他，我們要到上海。他的地址，我們也知道的，住在帶鈎橋的什麼里（帶鈎橋，上海人呼之爲打狗橋）。我們來了，先要通知他家才是；而且急急要探聽父親病狀，於是顧文卿姑丈一馬當先，便立刻按着地址，到貝家去了。

我們都在船中守候着，心中惴惴然，捏着一把汗，不知父親吉凶如何？因爲只在十幾分鐘內，便可以揭曉了。祖母只念阿彌陀佛，母親睜大了眼睛，只望着岸上。停了一刻兒，文卿姑丈回來了，衝着祖母說道：「韻竹病已好得多了，請大家放心吧！」於是我們好像胸前的一塊大石頭放下了。

我們正預備上岸的時候，我的貝鹿巖寄父來了。他每從上海到蘇州來的時候，常到我家，有時還帶點上海食物給我，祖母和母親都常見他的。他叫祖母爲伯母，叫母親爲嫂嫂，說笑話的時候，叫母親爲親家母，因爲是乾親家呀！他是一個小胖子，面孔圓圓的，爲人和氣而活潑。他見了祖母也說道：「恭喜！恭喜！韻竹兄這場病，危險非常，現在是好了，大可放心了。」祖母和母親，惟有極力的感激他，深謝他。

自從貝家寄父一來，他便幫助我們上岸，船上岸上的人，好像他都認識似的，指揮如意。那時候，我孩子心理，覺得文卿姑丈不是老上海，而貝家寄父乃是老上海了。他請我們先上岸，坐了車子，到他家裏去，由文卿姑丈領導。一切行李，都交給他，他會押運着送來，可以萬無一失的。

岸上已停着一排東洋車（那時尙沒有黃包車的名稱，叫它東洋車，因爲那種人力車，是日本流行過來的），他講好了價錢，請我們都坐上車。這時姊姊和祖母坐一輛，我和母親坐一輛，文卿姑丈坐一輛，便到帶鈎橋貝家來。貝家寄父押了行李，隨後也就來了。我心想：倘若在蘇州，祖母和母親

，必然是兩頂轎子，至少是兩人抬了走。現在只要踏上東洋車，便拉着走了，到底是上海，何等便利呀！

我們兒童心理，到上海第一看見的就是東洋車。船在蘇州河裏，快到上海碼頭時，已經看見岸上的東洋車了。當時的東洋車，比後來的黃包車，車身爲高，都是鐵輪盤，膠皮輪還不會流行呢。東洋車夫有制定的帽子和號衣。帽子是喇叭式的，一種蕩葉帽，好像蘇州人做醬時候的醬缸蓋。號衣是藍色布的，背上有他的號碼，坐車子的人，可以一望而知的。

第二是那種洋房，在蘇州是沒有看見的。蘇州只有二層樓，三層樓已經是極少的了。我們坐了東洋車，在路上跑，真是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給。一回兒，東洋車拉進一條街堂裏，在一個石庫門前停下，我記得那是一樓一底的房子，後面有個亭子間，樓下是個客廳，樓上就是父親睡在那裏，貝氏夫婦，睡在亭子間。

我們覺得住在他家，打擾他們，心中不安。而且他們房子並不寬敞，使他們非常之擠，我們想去住旅館，但是貝家寄父極力勸止，說是不方便。試想父親還是個病人，不能住到旅館去，而祖母和母親此番來，至少是要看護病人，不能再委託貝家了。住旅館則兩面奔波，多所糜費，即在看護病人上，也有種種不方便處。

因此我們也就住在他家了，這房間裏，除父親外，又加上兩張床，一是祖母和姊姊，一是母親和我，他們早已安排好了。父親本來病已漸愈，見了我們來，心中寬慰，更加好得快了。父親的病，他們說是什麼絞腸痧，又是什麼瀉螺痧，當時醫理不明，實在是一種劇烈的胃腸病，近於霍亂，腹痛如絞，又被醫生一嚇，他們便急起來，打電報到蘇州來了。

父親病愈，我們放心，貝家寄父、寄母，便陪了我們出游。這時從內地到上海來游玩的人，有兩件事必須做到，是吃大菜和坐馬車。大菜就是西菜，上海又呼爲番菜，大菜之名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吃大菜的事，我們沒有辦到，因爲祖母不許。她知道吃大菜不用筷子，只用刀叉，恐怕小孩子割碎了嘴唇。况且祖母和母親，都是忌吃牛肉的，聞到牛油味兒，要起噁心。坐馬車是孩子最高興的事了，出世以來，也從未經歷過。

貝家寄父雇了一輛皮篷馬車；可以坐四五個人，當時上海轎車還不多，只有幾個洋行大班的太太，她們有私家車，把中國人的年青力強的馬夫，打扮得奇形怪狀，在跑馬廳裏出風頭。這一次坐馬車，祖母和母親都沒有去，只有我們姊弟二人和貝家兩個孩子。寄父說：「請你們到黃浦灘去看大火輪船去。」到了黃浦灘，見到那些大火輪船，比了房子還要高好幾倍，真是驚人。馬車在什麼大馬路（南京路）四馬路（福州路）繁華之區，兜了一個大圈子，這便是坐馬車一個節目。

除了坐馬車外，我們又到四馬路去游玩，那個地方是吃喝游玩之區，宜於夜而不宜於晝的。有一個很大的茶肆，叫做青蓮閣，是個三層。二層樓上，前樓賣茶，後樓賣烟（鴉片烟，那時候吸鴉片烟是公開的），一張張的紅木烟榻，並列在那裏。還有女堂倌（現在稱之爲女侍應生）；還有專給人家裝鴉片烟館夥計：還有川流不息的賣小吃和零食的；熱鬧非凡。此外，廣東茶館也去吃過茶，女書場也去聽過書。

那時候，上海的電燈還不大發達，許多店家都點的「自來火」，即是煤氣燈，上海人叫他自來火。與現在所用的火柴同名，火柴，蘇州人也叫它自來火。講究的在煤氣燈管子頭上加一紗罩，還是新發明的。至於家庭裏，所點的都是火油燈（火油是叫做洋油的。至於在蘇州，那還是用蠟燭與油盞，

作爲照明之用。

不久，父親也就起床了，我們便要急急的回去，家裏只有一位年青的顧氏表姊，和一位老媽子看家。也仍舊雇了一條船，回到蘇州去。顧文卿姑丈陪我們到了上海後，他還有生意上的關係，原來尤家也有一家同仁和綢緞店開在上海，是他們的分號。還有一家同仁和參店，也開在上海，這參店是他們祖傳的。所以顧文卿姑丈來了後，住在同仁和，現在也和我們一同回去了。

延師課讀

自從遷移到桃花塢後，我的讀書發生問題了。因爲同居人家以及鄰近，並沒有一個私塾，而且因爲我年紀太小，祖母及母親不肯放我走出大門去，我那時不過七歲多吧，而生性懦弱，易被同學所欺，於是決定請一位先生在家課讀。

請的那位先生姓何，名叫希鏗，這兩個字是名是號，現在已記不清了。他年紀很輕，不過二十多歲，還沒有娶過親，是一個長長的身體，瘦瘦的臉兒，說起話來，低聲下氣的。

何先生是沒有進過學的，從前的文人，以進過學爲本位，稱爲生員（卽是秀才），沒有進過學尙

在考試中的，稱之爲童生。有五六十歲而尚未考取秀才者，稱之爲老童生（更有年高者，稱之爲「壽童」，其名甚可怪也）。從前蘇州請先生，也有等級，這等級是根據於科舉的。大概未進學的，等級最低，館穀最少；已進學的高一級；補過廩，文才好的，再高一級；中過舉人的，再高一級。至於中過進士的，也不會當一個處館先生了。除非是那窮京官，在北京的王公大臣家裏，教他們的子弟。

何先生的館穀，我記得只有三塊錢一節。原來蘇州致送教師的修金，不以月計，而以節計的。一年分爲六節，便是清明、端午、七夕、重陽、冬至、年底了。三塊錢一節，質言之，就是只有一塊半錢一月，十八塊錢一年了。後來父親又送了他三節的節敬，每節兩元。這個三節，又是什麼日子呢？便是端節、中秋、年底，那末每年又多了六元，總共是二十四塊錢一年。

中國幣制一向沒有本位，在官家以銀兩計算，即所謂生銀制度，在民間則都以制錢計算。許多有錢人家，如僱用工人、傭僕們，也都只講定每月薪金幾千幾百文。但自從墨西哥銀圓流行到中國來後，江南大都是用銀圓計算了（俗呼之爲「洋錢」）。當初每一銀圓（銀圓亦作銀元），可以兌制錢一千有零，那時以何先生的資格，每年二十四元，待遇不算得太低，因爲當時的物價太便宜了。

並且江南當時的風氣，出外處館，也是一種清高的職務，待遇不靠這一點館薪，而膳供似更重要。吳中向稱文物禮教之邦，對於敬師之禮，非常尊重。家堂裏還有一塊「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以爲人生所最當敬重的五個字，師也佔了一位。這正是「論語」上所說的「有酒食，先生饌」，所以人家對於先生的膳食問題，是相當注意而不敢輕忽的。

有些大戶人家，家裏請了許多賬房先生（大概是管理田地房屋事宜），稱之爲東席，而所請的教

書先生則稱之爲西席。而東席不能與西席分庭抗禮，西席先生吃飯，往往另開一桌，比較優厚。學生年紀大的，就陪了先生吃飯，若是小學生，往往先生獨自一人吃飯。更有人家於吃飯後，命廚子來請問：「師爺明天喜歡吃些什麼菜」的（我曾經受過此種待遇，但要我點菜，那是大窘事，只好謝絕他道：「隨便什麼都好」，真是「孟子」上所說的「待先生如此其恭且敬也。」）

我們供給何先生，不豐不吝，大概是兩葷、一素、一湯。夜飯，蘇州人家有飯也有粥，我們就加兩小碟粥菜。那是何先生一人獨吃，我不陪先生吃。我小時頗嬌養，吃東西很麻煩，肥肉不要吃，多骨的魚不敢吃，愛吃的只有蛋和蝦，人也瘦弱，吃得很少，每飯不過一碗，祖母和母親很以爲憂，吃飯似須加以監督。

我們學堂裏，共有三人，一是我，一是姊姊，一是四姑母的兒子，我的姚氏表兄。姊姊比我大三歲，名蓉，祖母說：「給她讀一二年書，能識得幾個字罷了。」所讀的什麼「閨門女訓」之類，也有好幾種吧，她還在習女紅，不是天天到書房的。我的姚氏表兄，年紀比我大兩歲，但是他的資質太不聰明，我在前章已說過。所以在三個人中，我算是一位主角。

論何先生的教法，遠不及陳先生的認真，我是個小孩子，也自覺得。父親雖是商業中人，覺得教小孩子只是死讀書死背，頗不以爲然。他以爲小孩子要開他的知識，須從講解入手，他意思要請何先生給我講書。但這些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近乎哲理的書，小孩子如何聽得懂？不但是我們聽不懂，連何先生也有些講不明白呢？

於是父親又去搜購了那種易於講解的書，如「孝弟圖說」（木刻本、有圖畫、刻得很精緻），「兒童故事」之類，使小孩子易於明白的書。何先生講是講了，只是呆呆板板，使我們不感興趣。而且

有幾段，何先生不講，我亦懂得。何先生是住在我家的，每隔三、四天，回家住一次，到明天，往往告假一天。到了半年以後，我家方才曉得何先生是患着嚴重的肺病，照現在說來，只怕他的病曆，已到第三期了。

何先生家境不好，他又捨不得我家這個館地。在我們家裏，他曾咯過一次血，他却對我們的女傭說：「這是鼻衄。」祖母已經起疑心他有病了。及至有一次，他有三天不會到館，祖母派了一個女傭人到他家裏去問候他，方知他病得很厲害，他的母親（我的太師母），向女傭人垂淚。女傭人回來一說，祖母連忙命人送錢去，送東西去，並且安慰他，不必急急到館，多休養幾天。祖母又常常送藕汁，什麼仙鶴草熬的膏子，說是專門治吐血病的，多方去慰問他。

後來他的病有些起色了，頗想力疾到館，我們家裏，連忙去勸止他。那是有些私心的，當時也早知道肺癆病是要傳染的，如何再能到館與孩子們日夕相親近呢？但過了一個月，何先生又病倒了，這一次，病很沉重，蘇州人稱之爲「癆病上牀」，意思就是說就是不能再起床了。何先生也自知不起，但他在病中，還懷念他的館務，懷念我們讀書的荒廢，他請他老兄大何先生來代館。這位大何先生其貌不揚，學問也不好，我們的顧氏表姊，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何仙姑」。何仙姑本爲八仙中的一位，所以稱爲何仙姑者，因爲他是何先生的哥哥，「仙」與「先」同音，「哥」與「姑」同音也。

何先生之兄來代館以後，未及年終，何先生已辭世了。可憐他的年齡，不過二十多歲。那個時期，蘇州青年，患肺病者甚多，往往一家兄弟數人，互相傳染，全患肺病。大概因爲是慢性傳染，不知趨避，其次則體力柔弱，失於運動，尤其那些富家子弟，更容易患此病了。

記姚和卿先生

三六

自何先生故世後，父親正預備爲我別延一師，恰值我們的房東姚和卿先生，決計於明年之春，在家裏開門授徒了。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於是祖母和父親，就命我拜姚和卿先生爲師，而向他受業了。

姚和卿是我姑丈寶森，姻伯鳳生的堂姪，論親誼我和他是平輩，在平時，我叫他爲和卿阿哥。而且朝夕相見，因爲我家與他只隔一層板壁。但既已拜他家爲師，父親就命令我改口呼他爲先生了（按蘇俗對於受業師稱先生，以示尊敬，在書柬上，則稱「夫子大人」下署「受業門生」。在他省則呼「老師」，不喚先生的）。他的夫人，本叫她爲嫂嫂的，現在也改呼爲師母了，但她很謙抑，仍要我呼她爲嫂，不要呼她爲師母。

其時，姊姊已不上學了，讀過什麼「閨門訓」、「女四書」，又讀過半部「幼學瓊林」，祖母說：「既不在家裏請先生，女孩子出門附讀不方便。」於是家學習女紅了。吾母親的刺繡頗精，教她學習刺繡，祖母有時給她溫理舊書。姚氏表兄，本來也可以向和卿先生就讀，但他的父母不贊成這位堂姪，而鳳生先生家裏，也另請了先生，他就在那邊附讀了。

正月開學，學塾就設在第二進的大廳上。這大廳已是很古舊了，窗櫺都朽壞，地磚也裂了縫，但從前造的房子，身骨都極堅實，故家巨宅，要給子孫數百年住下的計劃。大廳是三開間，和卿先生只用西面的一間，他教木匠去做了四隻大書櫥，把這西面的一間夾開來。

留出一扇門的空隙，掛了一個門簾，這便把大廳分開來了。但書櫥沒有加漆，只是白木的，倒也

清潔。這等號稱書櫥，其實等於書架，也不過堆砌一些學生們的書籍而已。其時都是大本綫裝書，沒有洋裝的，所以每一學生，都是破破爛爛的一大堆。

裏面一張方桌，一把圈椅，是先生坐的。桌子上一方墨硯，一方硃硯，以及墨筆、硃筆，爲圈點批評之用。此外還有一把戒尺，就是古名「夏楚」者，倘然有頑劣不率教的學生，那是要打手心的（從前有些鄉村學堂，還有要打屁股的）。學生們則散坐在周圍，有的是方桌，一張方桌可坐三人，半方桌則坐一人，較爲舒適。椅子是方型，或長方型，如果先生家裏沒有這許多椅子，可能教學生們自己帶椅子來上學。

這一回，姚先生招收學生（名曰：「設帳授徒」，俗語說來，就是開了一爿子曰店），學生倒來了不少，連我在內，共有十二三人，也算桃李盈門了。但是程度不齊，最大的一位是十八歲（黃築巖君，這位同學，他在五十歲時，我還見到他，是一位老畫師），年紀小的僅七八歲，過於小的開蒙學生，姚先生聲明不收，像我們八九歲至十二三歲，却是最多。

姚先生是一位名諸生（即是進過學的高材生），他的筆下很好，爲人極勤懇而開通，好像去年也館在人家，今年才回來開門授徒，當時貼了紅紙條在大門外，上寫「內設經書學塾」，這便是開學店的招牌了，於是附近人家都來從學。不過姚先生也要選擇一番，有些太下流的孩子們，他也不收。爲了他的學生整齊起見，也要問問那些學生的家庭關係，一個學塾裏有了壞學生，便足以驅逐好學生。

我在姚先生學塾裏讀書，似乎比關在自己家裏延師教讀時候，要開展的多了。雖然從最後一進的屋子裏，走到大廳上，未出大門一步。一則，我年紀漸大，知識也漸開；二則，有了十一二位同學，知道了小孩子許多不知道的事；三則，姚先生每晚有講書一課（在將近晚間放學時）。那是對大學生

們所設的，我們小學生聽了，也有一些一知半解哩。

我最懼怕先生不在塾中，這十一二位同學鬧起來，真有天翻地覆之勢。但我也喜歡先生不在塾中，往往有新奇的事出現。有一天下午，先生出門去了，學生大起活動。那個大廳的庭院，倒也很寬闊的，只不過亂草叢生，蕪穢不治，蓬蒿生得過了膝蓋。有一個學生，在庭角小便，看見一條蛇，在草叢蜿蜒而行，便向同學驚呼起來。

一個大學生，便衝出庭院，說道：「打死它。」又一個同學說道：「捉住它。」但大家說：「蛇是有毒的，不如打死它。」於是即有一人，拿了一根門門來打它。他們記得一句成語：「打蛇打在七寸裏」，因此真個用力在七寸裏亂打。蛇負了傷，還是拼命的逃，有一句俗語，叫做「蛇鑽的窟窿蛇知道」，這種舊房子，多的是牆頭縫，蛇便拼命的向牆頭縫鑽去。有一位同學呼道：「不好了！給它逃走了！」有一位同學奔上去，蛇的身子，一半鑽進牆頭縫，它的尾巴，還拖在外面。他便雙手把蛇尾拖住。但蛇尾很滑，他抓不住，便大呼「幫幫忙」，於是另外一位學生，也來幫着他，就是所謂「倒拔蛇」者，把那條蛇，拉出牆頭縫裏來了。

那位年長的學生，可稱是捉蛇能手，他倒提了蛇尾，只管把它向下抖，蛇也無力掙扎了。又是一頓門門，蛇也已經半死了，打死了這條蛇，怎麼辦呢？一個學生出主意，說是「把它丟在河裏。」（桃花塢是沿河的，但沿河多造了房子）年長的學生，提了蛇尾，將要掙出門口，可是門口開了一家裁縫店，他們的開店娘娘不答應，不許掙了死蛇，在他們的店堂裏經過。他說：「打死了蛇，它是要來討命的」。說了許多迷信的話。

這可怎麼辦呢？有人主張，不如把它火化了吧？大家也以爲然。因此到鄰家，討了稻草茅柴，把

它燒起來。不想驚動了住在隔壁松下清齋的大書家姚鳳生先生，他聽的外面一片喧鬧聲，又見庭中轟然的火光，問起什麼事？學生以實告，鳳生先生大罵，「你們這班頑徒！」及至和卿先生回來，他又喚他去訓斥一頓（和卿先生是他的姪子）。先生回到學塾裏，除了我們幾個小學生，對於此事無份外，打了一個「滿堂紅」。

這班同學中，除了一位黃築巖兄，是一位畫家，又是一位醫家，前章曾述過。還有一位姓王的，已忘其名，本來是一個水木作頭的兒子，後來自己便做了大包作頭，並且在上海包造大洋房，很發了一點財，偶然在上海一次宴會上遇到，談起來，方才知道是同學。他有兩只招風耳朵，當時我們叫它「大耳朵」，他是蘇州的香山鎮人（蘇州的水木工匠，都是香山人），直到我們叙舊時，他的香山口音，還不會改變過。

和卿先生的開門授徒，大概不過兩年多光景呢？他便出外作幕去了。原來他和吳清卿（名大澂）爲至戚。吳放了湖南巡撫，便招了去，在撫院中，他當了「硃墨筆」（即代批公事，此職，惟督撫衙門始有之）。說起吳清卿，蘇州有兩個吳清卿，一爲做湖南巡撫的，蘇人稱爲貴的吳清卿；一個便是我的舅祖，我祖母的弟弟，號稱蘇州首富，蘇人稱爲富的吳清卿。後來這兩個吳清卿的孫子，都成了畫家，一個吳湖帆，一個吳子深。

和卿先生初名元豹，後因元豹兩字，音同元寶，改名爲元揆，他是一位廩生，文學很優，字也寫得很好，爲人忠厚誠篤，但他的同族中，說他是書獃子，呼他爲「瓦老爺」（蘇州人嘲笑忠厚老實人，有此名稱），他自從作幕以後，便拋棄了教書的生涯，以保舉及捐資，得知縣職，到江西去候補，做過了幾任知縣。他的兒子號學洲，學洲的兒子名賡夔，筆名蘇鳳，是一位名記者，以親誼的關係，

我比他長兩輩，所以蘇鳳呼我爲公公。

我的近視眼

近視眼有遺傳性嗎？在我的直系上，是一個問題。說它有遺傳性嗎？我的父母，都不是近視眼，我的祖父、祖母，也不是近視眼，何以我是近視眼呢？說它是沒有遺傳性嗎？何以我的兒女中，很多近視眼呢？雖然他們深淺不一。而且我是近視眼，他們的母親也不是近視眼呀！

我在八九歲的時候，近視眼就顯露了，遠的東西看不出，近的東西，雖極纖細的也能明察秋毫。祖母那時便抱怨我開蒙的陳先生，她說：在我初學寫字的時候，每到下午四五點鐘放學時候，便寫字了（起初描紅，先生還把筆，後來寫書法，以薄紙印寫）。書房中牆高庭小，垂暮時光，光綫不足，所以出了毛病。但其實不然，私塾中習字，都是在這個時候的。

那末說近視眼是先天關係，既不盡然，後天關係，那是有的。當我在八九歲的時候，文理已經畧通，便喜歡看小說書，而這些小說書，又都是那種木刻小字的書，有的是那種模糊不清的麻沙版，看起來是很費目力的。我記得我的外祖家中，有一間屋子，他叫做東書房的，這裏有一口書櫥。有一天

，我在這書櫥中，翻出幾本書來一看，全都是小說，有「封神榜」、「列國志」、「說唐」、「隋唐」、「岳傳」之類，發見了這個奇秘，大爲喜悅，好似後來人家發見了敦煌石室一般。因此不到外祖家則已，去了，總是躲在東書房裏看書，而這個東書房甚爲黑暗，夏天蚊虫成市，我總是不聲不响，在裏面看書，這定然與我的眼睛有關係。

談起看小說，我的正當看小說，還在九歲時候吧？家中有一部殘缺的「三國演義」，也是從一只舊書箱裏翻出來的，我見了如獲至寶。起初是偷偷摸摸的看，因爲從前小孩子不許看小說的，除了看正史以外，不許看野史。後來被父親發見了，說是看「三國演義」無妨，非但不禁止我看，而且教我每天要圈點幾頁。（從前有許多書，都沒有圈點的，自己加以圈點，也分句讀；人名、地名，也在旁邊加上一豎，與現在新符號也差不多。）

不過看章回小說，看了前一回，便要知道後一回怎麼樣？每天晚上圈幾頁，怎能過癮呢？於是仍舊想法子偷看了，最好的時間，是在大便時，大便已經完了，可以起來了，但是依舊坐在馬桶上（這一個名稱，蘇人稱爲「解馬桶」），偷看「三國演義」。不久，被祖母知道了，大罵一頓，說道：「你在馬桶上看關聖帝君的事，真是罪過，將來要瞎了眼睛。」實在說，在馬桶上看書，總是光綫不足，有損眼睛。不想後來成了習慣，在大便時，不論什麼書，終要取一本在手中閱看。

既而上海出了那種縮小的石印書，最是損人眼睛，而且那些出版商，還印出了許多「大題文府」、「小題文府」、「試帖詩集腋」等等書籍，那是搜集了前人所作的八股文、八韻詩，以供人抄襲獮祭之用，這是他們一種投機事業。印出來的字，小得比蠅頭蚊脚，還要纖細，有的必須用了顯微鏡，方可以看得出。這些書都是爲了考試時，便於夾帶用的，所以銷場奇好。

但是看這些小字書，很傷目力，當時一大半的近視眼，都是由此養成。尤異甫姑丈，最痛恨這些石印的八股八韻書籍。他的批評，說這種書，不但傷害青年的目力，而且看了這等書，足以汨沒性靈。譬如一個先生，出了一個題目，要教他的學生，做一篇文章。這須要自出心裁，把思路展開，然後才能做成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因為自己做不出，不肯去想，於是去翻前人所做的文字，這個思想就把它關住了。那時不但剿襲他的意思，還剿襲他的成文，自己就一輩子沒有思想了。所以異甫姑丈說：「這些刻出來的石印書，傷害眼睛還小，傷害性靈更大呢。」

不過我對於那些石印書，受害還輕，因為我沒有錢去買什麼石印書呢。但石印書有許多很適用的，譬如像「詩韻合璧」之類，我曾有一部，覺得很為便利，有些工具書，都靠了石印本而利用。如其它的許多木版書，卷帙浩繁，攜帶不便，却經過了縮小石印，便成了袖珍本了。譬如說吧：像「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人家稱為四史，若是木版的，要裝好幾隻書箱，現在可以縮成幾部書，那是多麼便利呢。

我在十歲那一年上，就有一副眼鏡了。那件事，是我牢牢記着的。因為我是近視眼，看見人家戴眼鏡，頗為羨慕。親友中也有近視眼的，把他們卸下來的眼鏡張望着，頗覺明亮。我久有此意，要想有一副眼鏡。但小孩子怎能戴眼鏡，在當時是不許的，要被大人所呵斥。

就在那年的秋天，父親爲了獎勵我讀書，他允許帶我去看一次戲。不過有兩個條件，第一件，要那天是先生放學，不能因爲娛樂而曠課。第二件，也要他自己有空工夫。於是我只等待，等待到那一天，先生果然放學了。至於父親有空工夫，那是不成問題的，他近來本來不太忙，即使有事，他也會帶我去的。

父親對於兒童不能失信，因此催着早早吃午飯，便到城隍廟前那家戲館來了（那時蘇州城內，只有一家戲館，唱文班戲，文班戲即是崑劇）。誰知到了戲館門前，冷落無人，鐵閘也關起來了。這是什麼緣故呀？一問鄰近，方知今日是忌辰。所謂忌辰者，便是那一天是清朝歷代皇帝皇后的死忌，這一天，照例不許演戲的。可是我却覺得很是失望了，好容易一直盼望，得到今天，才有這個機會，結果是爲了忌辰而停鑼，我的懊喪，真是要眼淚掛出來了。

父親却安慰我道：「這一次遇到了忌辰，還有下一次呢。」又道：「你不是想有一副眼鏡嗎？」於是我們父子兩人，便到穿珠巷來（穿珠巷在蘇州閶門內，蘇人又呼它爲專諸巷，那裏都是眼鏡店，蘇州人有句謎語道：「穿珠巷配眼鏡，各人的眼光不同」）。我那天就配了一副玳瑁邊的眼鏡，這時，外國貨的眼鏡，還未流行到中國來，我的這副眼鏡，全是國貨，而且全用手工製成的，不是玻璃，而是水晶，價值墨西哥洋銀一圓。回到家裏，我非常高興，把看戲逢着忌辰的失望，全忘懷了。戴着眼鏡去見祖母，祖母說：「小孩子不能戴眼鏡，只怕愈戴愈深，藏起來，到要看遠處的地方才戴罷。」

不但小孩子不能戴眼鏡，蘇州那些所謂書香人家的子弟，雖然近視眼很多，年輕時也不大許戴眼鏡。說也可笑！他們希望在科舉上發達，預備將來見皇帝，什麼引見，召見之類，都是不許戴眼鏡的。我有一位朋友，他祖上是做過大官的，却是個高度近視眼。有一天，皇帝在便殿召見，那皇帝東向而坐，對面却安一面大穿衣鏡面的屏風，他糊裏糊塗，只向那面大穿衣鏡面前跪了。太監看見了，掩口而笑，把他拉過來，說道：「皇上在這裏。」因爲他是大臣，不加譴責，但是皇帝心裏終覺得不高興，臣子不免就吃虧了。

兒童時代的娛樂

四四

在我十歲以前，蘇州有什麼娛樂呢？就記憶所得，畧爲述之。

第一、我就要說戲劇了。當時蘇州的戲館，城內只有一家，在郡廟前，就是上文說過，父親帶我去而適逢忌辰的那一家，專唱崑劇的。城外也有一家，在閶門外的普安橋，那是唱京戲的。這兩家戲館，都不是常年唱戲的，有時唱戲，或兩三個月，便即停止，或另一個戲班來上演了。

當時蘇州有一個禁令，城裏只許唱崑劇，不許唱京戲，所以京戲到蘇州來，只許在城外普安橋那個戲館裏唱。蘇州當時的戲劇，以崑劇爲正宗，其餘所謂京班、徽班等等，都好像野狐禪、雜牌軍一般。而且當時城內城外，好像分了兩個疆界，城裏是要整肅的，不能五方雜處，城外就可以馬馬虎虎一點了。

唱崑戲的都是蘇州本地人，縉紳子弟，喜歡拍曲子的很多，有時也來一個「爺台會串」（又叫做清客串），闐動城廂內外，真是萬人空巷。京戲在蘇州，却沒有那種盛況。京戲大概是從上海來的，也有從各方來的，他們所謂外江班，到蘇州來打野鷄的。崑劇爲士大夫所欣賞，從不加以禁止，京戲則有時要加以取締了。京戲中有許多如賣胭脂、賣絨花、打櫻桃、打齋飯、小上坟、蕩湖船等，官廳目爲淫戲，便禁止不許唱了。（按：從前無警察，所謂官廳者，指縣衙門而言）。

除戲劇而外，蘇州最流行的是說書。說書分兩派，一派說大書的，稱之爲平話，只用醒木一方，所說的書，如三國、水滸、岳傳、英烈、金台傳之類；一派說小書的，稱之爲彈詞，因爲它是要唱的，所以有三絃、琵琶等和之，所說的書，如描金鳳、珍珠塔、玉蜻蜓、白蛇傳、三笑姻緣之類。這些

大書小書，我都聽過，但是一個十歲左右的兒童，都是喜歡大書，不喜歡小書；因為大書是描寫英雄氣概，小書只是扭扭捏捏，一味女人腔調而已。

書場都是附設在茶館裏，但也有獨立的。我們去聽書，每人花十餘文，而且他們還給你茶吃。書場有班老聽客，他們是天天光臨的，聽得有了癮了。像我的小時節，不過零零碎碎，斷斷續續，東鱗西爪，跟着大人們去聽一回兩回罷了。但是在新年裏，不讀書，也有跟着大人們連聽十幾回的。那種的書場，或大書、或小書，每次只說一檔書，沒有像後來上海那般書場，每一場有四五檔書的。只是到了年底說會書，也常有四五檔，這正是盛況空前。

說書名家，我所聽到的，有馬如飛的「珠塔」（那時我年紀很小，不大記得），顧雅廷的「三笑」，王效松的「水滸」，王石泉的「倭袍」，金耀祥的「金台」等等，不過都是零零落落，或只聽到兩三回。有的是在人家有喜慶事，在堂會上聽到。從前上等婦女，不上書場，但也並不禁止，偶有一二，大都年老婦女，男女座位，也是要分開的。婦女們聽書，大戶人家，往往有長堂會，每天到她們家裏來說書的。

戲劇說書之外，還有什麼「曲局」與「清唱」。「曲局」者，也是人家有喜慶事，聚幾位平時喜歡唱曲的人，同時會唱，以示慶祝之意，主人則備盛筵以餉客。「清唱」者，雇一班專門清唱的人，唱唱說說，語多發噱，名之曰「攤簧」。兩者有所不同，就是一雅一俗而已。

雜耍中有一種蘇人稱之為「戲法」，即今之所謂魔術。戲法有兩種，一種是文的，一種是武的。文的藏物於身，說說笑笑，忽然一件，一件的從身上搬運出來，有玻璃十八件，各種各樣物件。我會見從身上搬出一大罇酒的，足足有五十斤。又會從身上變出一個十四五歲童子，真不知他如何藏法。

武的有飛水、飛碗、吞劍、吐火之類的種種技術。人家有喜慶事，以娛來賓。則取文的，以求雅馴。至於武的，不免劍拔弩張，大概在廟會場上，可以時時見之。

更有一種號爲女說書者，他處未見過，惟蘇州有之。每於冷街僻巷處，門前貼一字條，上寫「某某女先生，彈唱南北小調，古今名曲」的字樣。起初只是一二盲女，賣唱度日，隨後即有非盲目之青年女子，亦作此生涯。既而更有秀麗出衆的人物，亦出現其中。人家有小喜慶事，往往招之使來，唱各種小曲，婦女們喜聽之。若是盲女，從吃夜飯來，到半夜回去，不過八百文，或至一元；倘非盲女，則須三元左右；如爲出衆人物，或令之侑酒，以至天明方散，則須加倍還不止。惟此種女說書，紳士人家，概不請教，以其不登大雅之堂呀。

我的對於戲劇、說書、歌唱、雜耍等等，每在親戚喜慶人家，所見爲多。因爲我家雖寒，親戚中頗多富豪。他們每逢有喜慶事，常接連數日，有些娛樂，戲劇則有堂會，以崑戲爲主，亦有唱「髦兒戲」者，乃是女班子也。那些富貴人家，都可以臨時搭起戲台來，婦女亦可垂簾看戲。說書名爲堂唱，往往連說幾天。其它歌唱、雜耍，每遇宴慶，亦必招致。

再及低級之娛樂，則在城中心之玄妙觀內，各種都有。如露天書、獨脚戲、說因果、小熱昏、西洋鏡，那些都是屬於文的。其它如賣拳頭、走繩索、使刀槍、弄缸弄壺，那些都是屬於武的了，因此蘇州的玄妙觀，可稱爲兒童的樂園。

其次便是街頭娛樂了，也爲兒童所歡迎。街頭娛樂最普通者有兩種：一爲木人頭戲，演者挑一担，擇街頭畧空曠處，敲起小鑼，兒童羣集。他就用扁担等支起一個小戲台來。一爲猴子戲，由猴子演出種種把戲，召集街童觀看。

坐花船的故事

有一件事，使我雖老不能忘懷，這是我在八歲的那年，父親帶了我會去坐過一次花船。怎麼叫做花船呢？就是載有妓女而可以到處去遊玩的船。蘇州自昔就是繁華之區，又是一個水鄉，而名勝又很多，商業甚發達，往來客商、每於船上宴客。這些船上，明燈繡幕，在一班文人筆下，則稱之爲畫舫。裏面的陳設，也是極考究的。在太平天國戰役以前，船上還密密層層裝了不少的燈，稱之爲燈船。自遭兵燹以後，以爲燈船太張揚，太繁糜了，但畫舫笙歌，還能夠盛極一時。

當時蘇州的妓女，可稱爲水陸兩棲動物。她們都住在閶門大街的下塘倉橋浜，爲數不多，一共不過八九家。這裏的妓院，陌生人是走不進的，只有熟識的人，方可進去。在門前也看不出是妓院，既沒有一塊牌子，也沒有一點暗示。裏面的房子，至少也有十多間，雖不是公館排場，和中等人家的住宅也差不多。

不過她們的房子，大概都是沿河，而且後面有一個水閣的。她們自己都有船，平時那些小姐們是住在岸上的，如果今天有生意，要開船出去游玩時，便到船上來，侍奉客人。平時衣服樸素，不事妝飾，在家裏理曲子，做做女紅，今天有生意來了，便搓脂滴粉的打扮起來了。

那一天是農曆七月十五日，中國人稱之爲中元節。蘇州從前有三節，如清明節、中元節、下元節（十月初一日），要迎神賽會，到虎丘山致祭，而城裏人都到虎丘山塘去看會，名之曰：「看三節會」。而載酒看花，爭奇鬥勝，無非是蘇州人說的「軋鬧忙」——「人看人」而已。

七月十五那一天，他們妓船生意最好，因爲這些花船幫的規矩，在六月初開始，這些船都要到船

廠去修理，加以油漆整補等等，到六月下旬，船都要出廠了。出廠以後，似新船一樣，要懸燈結綵，所有繡花帷幕，都要掛起來了。而且從六月二十四日，游玩荷花蕩起（那個地方，亦叫黃天蕩，都種着荷花。是日爲荷花生生日），船上生意要連接不斷。如果中斷了，便覺失面子。假使七月半看會那一天，也沒有生意，真是奇恥大辱了。

父親那時，一來請請他的幾位到蘇州來的商家朋友，在生意場中，交際是少不得的。二則他也認識幾條船，都是老主顧，每一次出廠，也要應酬她們一下子的。因此在半個月以前，早已約定，答應他們了。坐一天船，吃一頓船菜，要花多少錢呢？從前的生活程度，物價低廉，不過四五十元罷了。此外蘇州的規矩，吃花酒的每位客人，要出賞錢兩元，請十位客，也不過二十元，總共也不過六七十元，在當時要算潤客了。

父親預先和我說：「你認真讀書，七月半，我帶你坐船看會。」我聽了自然高興，也不知道何處坐船？那裏看會？只跟隨父親就是了。一清早，母親便給我穿起新衣服來，母親也不知道父親帶我到那裏去。這時我恰新做了一件兩接長衫，這兩接長衫，上身是白夏布的，下身是湖色雲紗的。（按：當時成人們也穿兩接長衫，一時盛行。原來這兩接長衫，還是從官場中流行起來的。從前的官服是外套、箭衣，裏面還有襯長衫，便是兩接的長衫了。）裏面是雪青官紗對襟小衫，下面玄色香雲紗褲子。脚上淡紅色紡綢單襪，藍緞子繡花的鞋子，鞋子與襪，都是母親手製的。頭上梳了辮子，辮梢拖了一條大紅純絲的辮鬚。

由父親領了，到一家人家，我也不知道什麼人家來了。但見房樞曲折，有許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有的拉拉我，有的攙攙我，使我覺得很不好意思。後來又來了幾位客，大家說：「去了！去了！」

「我以爲出門去了，誰知不是出前門，却向後面走去。後面是一條河，停了一條船，早有船家模樣的人，把我一抱，便抱了進船裏去了。」

但是那條船很小，便是蘇州叫做「小快船」的，裏面却來了男男女女不少人，便覺得很擠。我心中想：父親所說的坐船看會，那就是這樣的小船嗎？我寧可在岸上看會了。後來那小船漸漸撐出閶門城河，到一處寬濶的河面，叫做方磯上，停有幾條大船，把我們小船上，移運到大船上去。方知道因大船進城不便，所以把小船駁運出來，小船大船，都是仗家所有。

到了大船上，寬暢的多了，又加以河面廣濶，便覺得風涼得多。於是一面吩咐開船，一面便大家解衣磅礴，我的兩接長衫也脫去了，只穿官紗短衫。有許多客人，竟自赤膊，有一個大塊頭，露出個大肚皮。便有些娘姨大姐，給客人擦背心上的汗；有的給一個老公公只是打扇。她們也勸我脫去短衫，赤着膊兒，我却不肯。父親說：「身上都是汗，擦擦吧！」一個大姐，給我脫去短衫擦身，但我來不及把衫穿上了。她笑對父親道：「你看你的這位小少爺，倒像一位小姑娘。」

船開到野芳浜（原名冶坊浜），愈加覺的風涼了，他們移開桌子打牌，這中艙可以打兩桌牌，但是他們打牌，我更無聊了。我一想看會，會是在岸上過的，我便到頭艙裏去。他們特派了一個年約十二三歲的小姑娘名喚三寶的，專門來招呼我。指點岸上的野景，講故事給我聽，剝西瓜子給我吃。當吃飯的時候，她揀了我喜歡吃的菜，陪我在另一矮桌子上吃。吃西瓜的時候，她也幫助我在另一矮桌子吃，她好像做了一個臨時小褓母。

臨回去的時候，父親叮囑我道：「到了家裏，祖母面前，不要提起。」父親有點懼怕祖母，祖母曉得了，一定罵他，怎麼帶了小孩子去。我說：「母親可以告訴她嗎？」父親笑笑，他說：「告訴母

親不要緊。」因為我什麼都要告訴母親的，無從瞞起。後來母親知道了，也埋怨父親，「爲什麼把孩子帶到那裏去。」父親笑而不語。我父親不是那種自命道學中人，說什麼「目中有妓，心中無妓」的人，但他却是一個終身不二色的人。

非但此也，父親什麼地方都帶我去看過。有一天，帶了我到一家鴉片烟館裏去。那時候，鴉片烟館是公開的，並不禁止。他自己並不吸烟，而有許多朋友都是吸烟的。甚而至於有許多生意經，都在烟館裏並枕而臥，方才訂定了的。我還記得我們所去的地方，在蘇州觀前街太監街現在吳苑茶肆的前身，房子既舊且大，生意很爲興隆。那個時候，好像在夏天吧，烟客們就燈吸食，都不怕熱。我對於鴉片烟，並不覺得新奇，因爲我早已見過，我的母舅，我的姑丈，他們都是癮君子呀！

賭場中，父親從未帶我去過，蘇州也有很高級賭窟的，他們稱之爲「公館賭」。因爲父親生性不愛賭，這件事，我有遺傳性質，我對賭也是不感興趣的。至於當時流行的一種打牌，名爲「同棋」的，父親却打得甚好，但輸贏是極小的（麻雀牌流行的時候，父親已故世了），東中市有一個錢業公所，父親帶我去過幾回，據說裏面可做輸贏。只要是熟識的人，但憑一言，即可成交，可見從前商人信實，勝於現在。這種交易，大概以生銀、銀洋、制錢三種作比價，人家亦稱之爲「賣空買空」（這便是後來交易所的發軔始基）。當時蘇州的術語，名之曰：「做露水」，父親偶爾小試其技，只不過估自己的眼光而已。

在新年裏

父親對於我的教育，主張開放，不主張拘束。他常和母親說：「孩子拘束過甚，一旦解放，便如野馬奔馳，不可羈勒。」但父親又批評我道：「他太懦弱，少開展之才。」從來「知子莫若父」，信哉斯言。不過我母親又迴護我，說：「我寧有一個忠厚的兒子。」我又服膺此言。

在新年裏，是兒童們最高興的一個時期。我們從前在學塾裏讀書，並沒有什麼星期日放假之例。除了每逢節日，放學一天之外，便是每日一天到晚，關在書房裏，即使到了夏天，也沒像現在那樣，要放暑假。不過到了年底年初，這一個假期，却比較很長。大概是每年到十二月二十日，便要放年學了，到了明年正月十六日，或遲至二十日，方才開學。

因此那個新年裏，便是兒童活躍之期。不但是兒童，就是他的家長們，在新年裏，也是吃喝娛樂之日。那班工商界的人，早的也要過了年初五，遲的竟要到正月二十日方才開工上市。連做官的人，也是十二月二十日封印，到正月二十日開印，在此期內，不理政務。

衣食住行四者之中，衣字當先。小孩子們到了新年，都要穿新衣服。高等人家的孩子，身上都是穿得花團錦簇，即使是窮苦人家的孩子，那天也要穿的乾乾淨淨的一件花布衫兒。在除夕的夜裏，母親已經把我們明天元旦應穿的新衣服取出來了。雖然在新年裏，天氣很冷，我們的家規，小孩子是不穿皮衣服的，也只是棉衣而已。

母親和祖母，在新年裏，有一種特別裝飾，因為現在年青人是不知道了，我至今還有一些印象，記之如下：母親戴一隻珠兜，齊額有一排珍珠，這個名詞，叫做「珠勒口」。珠勒口的上面，有一條

紫貂的皮，這個帽子，她們叫做「昭君兜」，我覺得母親戴了，非常之美。祖母呢？戴了一種黑緞子的頭巾，垂在後面，這頭巾上，綴滿了無數珠寶。巾尾是尖的，直垂到背後腰下，巾尾上綴了一粒寶石，中間有一條綫痕，他們告訴我：這叫做「貓兒眼」。而且祖母所戴的巾，却叫做「浩然巾」。浩然巾是唐朝踏雷尋梅的孟浩然戴的，如何戴在老太太頭上？後來偶然看到了乾嘉時代某君的筆記，中有一「名不符實」一節，中有句云：「浩然巾戴美人頭上。」可見那時候，不但老太太戴浩然巾，連年輕的女人，也戴浩然巾呢。

其次便談到食了。新年中，是一個吃喝時代，在年底下，即預備了許多食物，以供新年之需，有些人家，甚而至於吃到正月十五，他們稱之為「年凍」。不但自己吃，而且還請親友來吃。因此在新年裏，你到我家來吃，我到你家來吃，忙個不了。雖然，從年底下的年夜飯已經吃起，不過從前的蘇俗，吃年夜飯只是家人團聚，不大邀家庭以外的人。

除飯菜以外，新年裏還有種種的點心。有規定的是年初一、年初三，要吃圓子（一種小的湯圓）；年初五要吃年糕湯；元宵節要吃油堆之類。不規定的，則有年糕、春卷、粽子、棗餅、雞蛋糕、豬油糕之類，名目繁多。不過在我小時節，吃東西不大告奮勇，加以胃也大不強健，多吃就要腹痛，不得不宣告戒嚴了。祖母和母親，常是吃素的，一個新年中（自元旦至元宵）倒有一大半日子是他們吃素的日子。

其次說到住，新年裏，房子也收拾到整整齊齊。在臘月底邊，就有一次大掃除了，這個名稱，叫做「揮埃塵」。新年裏，不但將房子掃除，而且還要把它裝飾一番。廳堂裏有的掛起了繡金的堂彩，地上鋪了紅色地氈，花瓶中供了天竹、蠟梅，有的還擺上幾盆梅椿。中等人家，至少也供一盆水仙花

。有些人家，大門上換了新的春聯，可見得人要裝飾，房子也要裝飾的了。

中國人是尊敬祖先的，逢時逢節，都要祭祀，這便是儒教中慎終追遠之意。因此新年中，每家都要把祖先的遺容，掛在內廳，有許多親戚來拜年，他們要來拜祖先的。假如一個大族，宗支多的，更要互相來拜謁的。這喜容一直要懸掛到正月十六日，方才收去。喜容之前，也要供些香燭果品之類。講到行字，我便要想起新年裏的拜年了。在新年裏，蘇州是盛行拜年的，自從改曆以後，這風氣漸革了。當初儘管你在平日不相往來的親戚朋友，到了新年裏，非互相拜一次年不可。據說：這也有一個道理，因為有許多親友，終年不相往來，便要從此斷絕，賴着新年互相拜一次年，從此又可以聯絡下去了。

拜年最出風頭的，就是在年初二、年初三兩天。在年初五以前也還好，過此以後，便落伍了。親戚朋友多的，在城內外有百餘家之多的，一天工夫來不及，就要兩天，那得坐轎子。因此這兩天的轎子，飛馳在街頭，連人家走路，也要當心，轎夫是一路在喊口號的。這時候，蘇州代步的工具，沒有車子，只有轎子，婦女們裹了小脚，出門也只有坐轎子。有許多人，家裏自己有轎子，多的有好幾頂轎子，安放在轎廳上。轎夫臨時可以召喚，有的且養在家裏，如醫生之類，名之曰：「長班。」新年的游觀，在前面已說過，兒童最喜歡的是玄妙觀。偶然看一回戲，也要預先定座。聽書是要個耐心的兒童，方才坐得住。其次，城外有個留園，城內有個怡園，兩個私家花園，也開放了讓人游玩（都是收游資的），倒可以消磨半天光陰，裏面也可以啜茗，兒童們都是家長帶了去的。

新年的賭博，在蘇州的巨室中也有之，我們却不知道。我們兒童中的賭具，一為狀元籌，二為升官圖，別的都不許賭。我家裏有一副象牙的狀元籌，刻得很工細，但一過新年，將近開學，祖母便命

令收起來了。我們一家都不喜賭，只有祖母，她會「同棋」一種，也是四個人坐着打的，規律極嚴。蘇州上等人家，往往玩此。至於後來流行的又麻雀，當時蘇州看也沒有看見。「挖花」，却是老早就有的，但那些都是橋頭巷口的轎夫們玩的，上等人不屑玩此。

元宵古稱燈節，在古時必有燈市，就是稱之爲上元燈的，在我兒童時代，覺得也沒有什麼了不得。兒童們不過是放花炮，買花燈，以應景而已。況且在那個時期，已經將要開學，兒童們是想心事，收骨頭的時候了。倒是正月十三日起，宋仙洲巷猛將堂裏的大蠟燭，足以興動一時。這一對大蠟燭，足有一百餘斤，是城廂內外的蠟燭店家共同供獻的。

我的拜年

關於我在兒童時代，新年裏拜年的事，我得畧說一說：

向來新年裏拜年，是父親去的。我們的親戚很多，加上父親的朋友，每次拜年，也近百來家。蘇州人向來是工於應酬，人家既然來拜了，你怎可以不去回拜呢？坐轎子，具衣冠，要兩天工夫。商業中，這幾天裏還要理賬，而他又素性疏放，視拜年爲畏途。在我九歲的一年，父親主張明年新春，

他自己不出去拜年，要教我去了。他說借此也可以學學禮貌上的一切。

於是把向來拜年的人家，改編了一下。有幾家，不來回拜的，就不必去了。有幾家，是父親的朋友，比較疏遠的，可以不必去了。有幾家，本是老親，幾乎相見不相識了。有幾家，已遷居了，也不知道他們的新地址。就剩幾家至親好友，是非去不可的，於是刪繁就簡，僅存五十家左右，那末坐一天轎子，也可以趕完了。

對於出去拜年，我倒並不畏懼，我從小就不怕生，平日親戚人家有慶弔事，我居然也去應酬，並不怯場。並且新年裏有人到家中拜年，父親老不在家，便是我去陪客。不過我有一個要求，出去拜年，要像大人一樣，穿了衣冠，不能再作小孩子的打扮。因為我看見也有幾個小孩子，到我家拜年，是穿了似大人一般的衣冠的，我很有點羨慕他們。

家中人曲徇我意，取出了父親一件灰鼠馬褂來，這件馬褂又長又大，父親本不愛穿，改縫了一件小的灰鼠外套，那正合式。外套裏面的袍子，我本來有的，不必穿箭衣了。特爲定製了一頂小頭寸的暖帽，上面還裝了一個水晶頂珠（本來水晶頂珠是五品官職，但小孩子是隨便的）。腳上鞋子也可以了，但是我堅持了穿一雙靴，我覺得穿了靴，氣派得多，並且靴底厚，人也可以見得高一點。父親不得已，便給我去定了一雙靴。

轎班在隔年就定下來了，大除夕，轎班來取年賞，祖母就關照他了：「明年是我們小少爺出去拜年了，只要年初二一天。一肩藍呢轎，三名轎夫，一天裏五十餘家都要拜完。」我們的轎班頭，名叫阿松，聽了很高興。第一，因爲小少爺身體輕，抬了毫不費力。第二，一路上抬了轎子，先到那家，後到那家，全由他們支配作主。

但是有兩處，却得預先規定，不得更改的，乃是到史家巷吳宅吃午飯，到桃花塢吳宅吃晚點。史家巷吳宅，便是我的外祖家，父親每年出去拜年，也是如此的。這種常年老規矩，轎班們早已記得的，而且史家巷吳老太爺那裏吃飯，他們最願意，因為外祖父待下人極寬厚，轎班們不但給了他們轎飯錢，而且還款待他們酒飯，他們又何樂而不爲呢？

那天我吃了早餐，八點鐘就出門了，把那一張拜年單子，給轎班頭看了，他們會排定了路由。在那個城圈子裏，分定了東南西北，使他不跑冤枉路。城外的親戚，我們極少，即有一二，也不擠在這一日去拜年。轎班的意思，要儘一個上午，拜去三十多家，然後到史家巷吳宅吃飯。吃過飯後，再拜一二十家，然後到桃花塢吳宅吃點心，吃了點心，便可以回去了。

因此出門時，先到胥門、盤門，後到封門、裏門，盤、裏兩門較冷落，我們親友也少，再由城中心到史家巷，差不多也有三十家人家了。吃過飯後，再由城中心到齊門、閶門，約摸二十家人家，到桃花塢吃點心，也就正好，因為轎子輕，他們抬得飛快，在下午從吾外祖家出來，他們喝飽了一點老酒，腳裏更有了一點勁，轎子正像飛的一般。

有幾家疏遠的親友，轎子到了門口，他們擋了駕，說主人不在家。既然擋駕，就不必下轎了。可是那些轎夫，不管三七廿一，却把轎子抬進門去停下。轎子停下，我只好出轎了，原來我不出轎，他們拿不到轎封，那些人家的擋駕，也是不願出轎封。總之這一天，我不能自主，完全聽命於這幾個轎夫了。直到如今，社會上流行一句俗語，叫做「被人抬了轎子」，只怕就是這種情景了。

到了一家人家，有的獻了茶，說主人不在家。有的主人明明在家，也說不在家，他們看見拜年的是個小孩子，誰高興和你周旋呢？這就使轎夫們很願意，可以馬上就走。但到幾家親戚人家，可以直

入內室的，有些太太奶奶喜歡小孩子的，便要裝出果盤來，問長問短，十分親熱。這一來，可要耽擱許多工夫，那時驕夫就要着急，傳進話來催請，吵着：「來不及了，還有好多人家呢。」

這個拜年，蟬聯了幾年，直到父親故世以後，我在居喪時期，不出去拜年。到後來更覺拜年毫無意義，對此頗生厭倦。不過有幾家至親，奉了祖母和母親之命，新年裏還是要去拜年的。還有的他們既然先來拜了，禮尚往來，也是不能不去回拜的，那就不坐轎子，安步當車了。

自桃花塢至文衙弄

在桃花塢住了約有三年多光景，我們又遷居到了文衙弄。這個地方是有一個古跡，乃是明代的文徵明，曾住在這條巷裏。文徵明的故宅，就是我們所住的那座房子的貼鄰，現在已改成為七裏公所了。因為文家住在那裏，這條巷便稱爲文衙弄。我起初以爲凡是官署，方可以當得一個衙字，因此那種官廳，都稱之爲衙門。誰知從前却不然，凡是一個大宅子，都可以稱之爲衙。蘇州有許多巷名，都有衙字，像「申衙前」「包衙前」「謝衙前」「嚴衙前」等都是。想當初必定是姓申、姓包、姓謝、姓嚴的，在這裏建築了一所巨邸，因此就成了這個巷名了。

這個七裏公所是什麼機構呢？原來是蘇州綢緞業的一個公所。從前沒有什麼同業公會那種團體，可是每一業也有一業的公所，是他們集資建築，組織也很完密。即使是極小一個行業，他們也有公所，何況綢緞業，在蘇州是一個大行業呢？從前中國絲織物的出品，以蘇、杭爲巨擘，行銷全國，機匠成千家，有綢緞莊，有紗緞莊，分門別類。這個七裏公所，就是綢緞業的公所，七裏這個古典名詞，就由此而來的。

文徵明的故宅，怎麼變成了七裏公所，這一段歷史，我未考據。大概是在太平之戰以後的事，因爲裏面的房子，都是新修葺的。裏面却有一座小花園，有亭台花木，有一個不小的荷花池，還有一座華麗的四面廳。因爲我們住在貼鄰，又和七裏公所的看門人認識，他放我們小孩子進去游玩。除了四面廳平時鎖起來，怕弄壞了裏面的古董陳設，其餘花園各處，儘我們亂跑。

七裏公所有兩個時期是開放的，便是六月裏的打醮，與七月裏的七夕那一天，致祭織女。打醮是大規模的，幾十個道士，三個法師，四個法官，一切的法器、法樂，都要陳列出來，這個道場，至少要三天，有時甚至五天、七天。裏面還有一座關帝殿、威靈顯赫。七夕那天致祭織女，在初六夜裏就舉行了，拼合了幾張大方桌，供了許多時花鮮果，並有許多古玩之類，甚爲雅緻。織女並沒有塑像，我記得好像有一個畫軸，畫了個織女在雲路之中，衣袂飄揚，那天便掛出來了。這一天，常有文人墨客，邀集幾位曲友，在那裏開了曲會的。

七裏公所荷花池裏的荷花，是一色白荷花，據說：是最好的種，不知是那個時候留下的，每年常常開幾朵並頭蓮，惹得蘇州的一班風雅之士，又要做詩填詞，來歌詠它了。所以夏天常常有些官紳們，借了它那個四面廳來請客，以便飲酒賞荷的。

這時候，我家有個小小神話；有一天早晨，祖母向母親說道：「昨夜裏做了一個夢，有人請我吃湯包，不知是何意思？」母親笑道：「這有什麼意思呢？前幾天，不是臬橋塢下新開一家湯包店嗎？我們明天去買兩客來吃。」婆媳兩人，也一笑而罷。誰知那天下午，七裏公所的看門人，把我送還家裏，好像一隻落湯鷄。原來我到他們花園裏去玩，見荷花池裏有一隻大蓮蓬，足有飯碗口大。我想探這隻大蓮蓬，跌入荷花池裏去了。幸虧看門人拉起來，雖不會受傷，但全身衣服，都濕透了。當母親給我換衣服的時候，祖母說道：「哎呀！對了！湯包！湯包！不是姓包的落了湯嗎？準是觀世音菩薩來託夢了。」

我家遷居文衙弄時，房東張氏，爲一位年過半百的老太太，她已孀居了，有子女各一。我們住居在樓上三大間，甚爲寬暢，兼有兩個廂房，張家住下樓下，而樓下一間客堂，作爲公用。此外他們還有傍屋，也是出租給人家住的，但留下一座大廳，是不出租的。門前租一裁縫店，那就不需要看門人了。大概這位老太，除了一些儲蓄之外，便靠收房租也足度日了。

她的那位女兒，年已二十三了，小名喜小姐，讀過書，人家說她是才女。不過當時蘇州一個女孩子，到了這個年紀，還未出閣，人家便要說她是老小姐了。但這位小姐，却還未許配與人，當然姿色是差一點，但也不十分難看。終日躲在房裏，不大出來，有一部木板的「紅樓夢」，據說顛來倒去，看過幾十遍了。我那時還沒有看過「紅樓夢」，很想借來一看，但是父親不許，他說：「你這年紀，看不得紅樓夢。」我這時，却也莫名其妙。

她的那位兒子，比我大三四歲，後來我附讀在他們所請的先生那裏，我就和他同學了。（從前又叫做「同窗」。）他的名字叫禹錫，與唐代詩人同名，爲人倒也懇摯，就是不大勤學。這位我的同學

而又是房東，在我五十多歲的時候，忽然又遇到了他，四十多年未見面，他這時是上海德國人所開的西門子洋行的職員。

在這個時期，我的那位顧氏表姊出閣了。這位表姊，從三歲起，一直就在我祖母身邊，因為我的顧氏三姑母，在她三歲時，便故世了。因此那位表姊，是在我家長大，而我們對她，也像胞姊一樣。現在她出嫁了，從祖母起，我們全家，對她都有依依惜別之情。

她的夫家姓朱，我那位表姊丈朱靜瀾先生（名鍾濤）後來是我的受業師，以後常要提起，這裏暫且不說。但我那位表姊出閣時，她繼母也已故世，家裏僅有父親一人，他究竟是男人，而且住在店裏，不常歸家。所以表姊歸寧，也常常回到外祖母家，即是我家來，而這位朱姑爺也隨之而來，好像是我家女婿一般。

那時我已十歲了，父親因為自己幼年失學，頗擔心於我的讀書問題。可是他在我們遷移到文衙弄的時候，早已探聽得房東張家是請了一位先生的，這位先生是很好的，於是就預備遷移過去後，就在那裏附讀了。

紀顧九臬師

顧九臬先生，是我的第四位受業師。當我們遷居的時候，恰巧姚和卿先生又出外就幕去了。如果遷移了新居，於我讀書不便，可不是焦心的事嗎？後來父親探聽得張家本請了一位教師，而且知道這位先生的教書，很爲認真。有了這樣一個機會，不可錯過。因爲我們這個時候的家境，已不能獨立請一位教書的先生了。

先給張老太太說好，然後父親去拜訪顧先生，談得很好。父親的意思：「現在那些塾師教學生，只是要教他們死讀，讀得爛熟，背誦而流，而不肯講解，似乎不能開他們的知識。最好是讀一首書，便要把書中的道理，給他講一遍，方能有益。而且懂得了書中的意義，便也可以記得牢了。」

顧先生的意思：「講解是要緊的，熟讀也是必須的。那些聖經賢傳，非從小讀不可，年紀一大，就讀不熟了。」他說：「將來你令郎要應科舉考試嗎？主試的出一個題目，你却不知道在那一部書上？上下文是什麼？你怎能做文章呢？如果讀熟了的，一看題目，就知這題目的出處，上下文是什麼，才思敏捷的，便可以一揮而就了。講解自然是要緊的，但要選擇容易明白的，由淺而深方可。假使是一個知識初開的幼稚學生，要給他們講性理之學，道德之經，這是很煩難的了。上學以後，我先試試令郎的資質如何？再定教導的方法吧。」

本來這學堂裏，已有了兩個學生，一個便是張禹錫兄，還有一位錢世兄（已忘其名），年已十六七歲了。我去了，多添了一人，共有三人，而我還是三人中年紀最小的。先生是願意的，多添一位學生，每年也可以收多得十餘元的束脩，不無小補，而我的加入，也可以算例外的。

顧先生的家裏，住得很遠，是在葑門內的織造府場。（前清時代，有三個織造衙門，一在南京，一在蘇州，一在杭州。）從織造府場到文衙弄，真是從城內的東南到西北。所以顧先生要在館裏住四五天，方才回家一次。那位錢世兄呢，也住在葑門平橋，是顧先生到館及回家必經之路，因此帶出帶歸。原來錢世兄的父親，和顧先生是老朋友，年齡既大，又無妻室，把錢世兄重託了顧先生，但是錢世兄桃健性成，顧先生監督甚嚴。

爲了錢世兄年紀大了，已經開筆作文，張禹錫也十三四歲了，所以顧先生每天就要講書，我年紀最小，但在講書時候，令我旁聽。講過以後，他們都要回講，可是回講不出，尤其那位錢世兄，結結巴巴的不知說些什麼，先生常常罵他。實在當先生講書時，他並未入耳，因此心不在焉。我在旁邊，心中想道：這幾句書的意思，我倒明白，可惜先生不來問我，不教我回講。

有一天，也是講書以後，要他們回講，他們都講得不對。先生見我在旁邊，便問我道：「你講得出嗎？你來講講看！」我便把幾句書的意義解釋了，先生大爲誇獎我。誇獎我便是斥責他們，先生說：「你們年紀如許大了，反不及一個年紀小的。」其實先生講時，他們指東話西，不在子細聽，我却靜聽，所以回講得出。

從此顧先生便特別注意我了，常常講書給我聽，但淺近的我可以明白，深奧的我可是不懂。這時候，我四書已經讀完了，就在讀五經。照尋常規例，是詩、書、易、禮、春秋，依着那個順序讀下去，但是在姚和卿先生案頭時，他就說：詩經、尚書、周易，更加使小孩子難懂，不如先讀禮記吧？禮記有幾篇較爲容易明白一點，所以我那時，禮記已讀了半部了。

父親的意思，要教我開筆作文了，因爲我「三國志演義」也看得懂。而且見那兩位大世兄讀「唐

詩三百首」，先生講時，我也旁聽。先生教他們讀時，我覺得音調很好聽，於是唧唧唔唔也哼起來了。先生也教我買了一部「唐詩三百首」來教我讀，先讀了五律：「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高興得了不得，從睡夢中也高吟此詩，好似唱歌一般。

當時中國兒童的文藝教育初步，最爲奇特，第一步就是對對子。最先是兩字對，以後便是三字對、四字對、五字對以至七字對。這其間便要辨四聲，每一個字，都要知道它的平仄聲。如果不知道，不是問先生，便要去翻字書，須要弄清楚那個字是平聲還是仄聲。對對也得辨明平仄，譬如「紅泥」對「白石」，那是平仄協調，假使「紅泥」對「黃沙」，因爲「紅泥」與「黃沙」四字，同爲平聲，便不協調了。

對對子到了五個字，便要成一句子，而且「仄仄平平仄」，就要調起平仄來了。這時候，也可以開始做詩了，五字一句，先做二十字，不管你通不通，謔成一首，先生便給你改正。爲什麼要做五言詩呢？原來每逢考試，總有一首試帖詩，五言六韻，或是五言八韻，因此從小就要練習起來。這八股八韻的考試制度，先把兒童的腦筋，凍結起來了。

大概開筆作文，總是先做詩，後作文，這個傳統，不知從何來的。不過我在這四句詩約畧可以調成的時候，顧先生便教我作文了。作文爲了預備考試起見，便要學作制藝。（名曰「時文」，又曰「八股文」）最先做「破承題」，其次做「起講」，隨後做「起股」「中股」「後股」，才得完篇。但顧先生却不如此，他教我先做一百字以內的小論，題目也是出在四書上的，第一篇是「學而時習之論」。

我在顧先生案頭，很有進步，顧先生對我，也循循善誘。當時的作文，不是像現代那樣用語體文

的，我至少對於文言文的虛字，算是已弄通了。大概有兩年多光景吧，這其間有個波折了。原來這位先生是張氏延請的，我不過是附讀而已。張氏老太太因為她的兒子進境很遲，說先生偏愛了我，這位老太太心窄嘴碎，時時冷言冷語，我祖母聽了，便不服氣，以為她們自己溺愛，學業不進，却遷怒人家。於是在我十三歲的春初，就拜了我的表姊丈朱靜瀾先生為師了。

顧九臬先生是一位道學家，平日規行矩步，目不邪視。他每日要寫幾行「功過格」，把每日自己的行為，為功為過，寫在一本簿子上。這本寫「功過格」的簿子，鎖在書桌的抽屜裏，不給人家看見，我們却千方百計想去偷看他的「功過格」。有一天，他的抽屜忘記鎖了，被我們偷看了，中有一條寫着道：「今日與年輕女子作戲謔語，記大過一。」我們看了都大笑，以為顧先生是一位「迂夫子」。

自從我出了他的書房門，又過一年，他也辭館了。好像他曾經出了一次門。一直到我進學那一年，照例，要鈔考試的文章給教我作文的師長看，到他家裏，他非常客氣，將文字加圈，加上讚譽的評語，還送我到大門外。後來我為飢寒所驅，奔走在外，一向不會去謁見先生。直到一九三一年的時候，我在南京，有一位同鄉談起說，蘇州有兩位共產黨，都是顧九臬先生之子，現在已被捕入獄了。我想顧先生是一位道學家，怎樣他的世兄是共產黨呢？如果嫌疑輕，或者可以想營救之法。因為那個時候，嘉興沈家，有一位學生（沈鈞儒先生的姪輩），也是以共產嫌疑被拘，我是受了沈定九之託（定九為鈞儒之兄），向陳公洽（儀）說項，託他在憲兵司令部保出來的。到了從南京回上海時，我特地在蘇州下車，訪問此事，他們告訴我；這還是前年的事，那兩位世兄，一位已瘐斃獄中，一位釋放出來，現在不知何往了。至於顧先生則已逝世多年了。

桃塢吳家

十歲以前，我隨母親，到外祖家去的時候多。十歲以後，我隨祖母，到舅祖家去的時候多。那時我的最小姨母已嫁，外祖故世，母舅無業，日漸彫零了。舅祖家即是桃花塢吳家，簡稱之曰：「桃塢吳氏」，其時則正欣欣向榮呢。

我的舅祖吳清卿公生有二子，長子號硯農，次子號伊耕，這是我的兩位表叔。他們兄弟兩人，相差有九歲，那時候，硯農表叔已娶妻，生有二女，伊耕表叔則年方十八九歲，尙未娶妻，他們兄弟兩人，都是在十五六歲，便進了學。清卿公家裏請了名師栽培二子，我記得第一位請的名師是葉昌熾，就是寫「緣督廬日記」、「語石」、「藏書記事詩」的那位名翰林。第二位管先生（我已忘其名），他是吳中的經學大家。兩人的資質都很好，但是清卿公的意思，以硯農不再追求科舉，教他管理一切家業，伊耕使他學問上進，將來在考試上博取功名。這個在蘇州的紳富門第，都是如此打算的，大概以一二人保守家產，其餘的進取功名，這樣則「富」「貴」兩字，都可保得。

殊不知我那位伊耕表叔，學問雖好，身體孱弱，從小時候，就是一個「藥罐頭」，（從前中國，有病總是吃湯藥，故稱多病之人曰「藥罐頭」）。每年總要大病一場，小病就是家常便飯。他廿一歲就補了廩，第一次鄉試，得了個「堂備」（堂備者，房官把這本卷子薦上去，名曰「薦卷」，主試閱卷後，在卷子上，批上「堂備」兩字，就是預備的意思），第二次鄉試，可以穩穩的一名舉人抓到手裏。蘇州鄉試是要到南京去的，臨行之前，又是一場大病，懊喪得了不得。

當時的讀書人，除了爲博取功名，應付考試，專心於所謂八股八韻的制藝以外，還有兩大流。一

種是詞章，一種是經學。詞章除詩詞歌賦之外，什麼駢體文、韻文、仿古、擬體等等，都在其內。經學則盛行一種經解，摘取各經中一名一物，一詞一句，而加以考據解釋，這算是考據之學。譬如說：詩經上第一句是「關關雎鳩」，就要考證出雎鳩是何物，古時鄭康成怎樣說？顏師古怎樣說？作者的意思又是怎樣，引經據典的寫出一篇文章，其它羣經中也是如此。實在此種學問，破碎支離，鑽入牛角尖裏去了。

我們這位伊耕表叔，他便是一位做經解的好手，大概他所師傳，不是葉鞠裳，便是那位管先生了。蘇州從前有三個書院，一個正誼書院，一個紫陽書院，一個平江書院。這三個書院每月都有月考，正誼書院中就是考詞賦（當時稱古學）、經解兩門，而他的經解，往往冠羣。家裏有一部「皇清經解」，卷帙繁多，我翻了一翻，一點也不知道它裏面講些什麼。

我嘗戲問伊耕叔道：「做經解有什麼用處？」他笑說：「一點也沒有用處。」我說：「既沒有用處，去做它什麼呢？」他說：「人家既然歡喜這一套，我們就弄弄也無妨。」雖然這不過是騙騙小孩子的話，後來想想，也有道理。凡百學問，總是一窩風，都有一個流行的時代，這個經解、詞章之類，也不過是變相的八股八韻罷了。伊耕叔除了經解之外，還熟讀「漢書」，寫了一部「兩漢韻珠」，木版精刻的十本，這部書，現在他家裏沒有了，我本有一部，流離轉徙，也已遺失了。總之他因多病而不出門，只有讀書，讀書愈多，身體也愈弱。

我隨祖母到吳家，有時一住就是一個多月，但讀書倒不荒廢。因為兩位表叔都喜歡教我，他們從來沒有教過學生，以為教學生是有趣的事。他們有一間很大的書房，就是伊耕叔日夕在其中的。這時我已經在讀五經了，他是一位經學先生，常常給我講書，可惜我對於經學不大有興趣，尤其是書經與

易經，我讀也讀不熟。硯農表叔除了家務之外，他也研究醫道，偷忙功夫，跑到書房來，出題目教我做「起講」(八股文的開首一段)，講究作文的「起承轉合」(當時的文法)，一定要說一個透澈。

這時伊耕叔還未結婚，但早已訂婚了，所訂的是住在閩門西街的曹氏小姐。她有三位哥哥，大哥曹志韓，又號滄洲，是蘇州最紅的名醫(曾看過慈禧太后的病，因有御醫頭銜)。二哥曹再韓，是一位翰林，外放河南開歸陳許道。三哥曹叔彥，是一位經學大家，也是兩榜，是一個大近視眼(在我寫此稿時，他已八十八歲了，聽說去年還結了一次婚)。我這位表嬸，出自名門，也讀過好幾年書，不過她的老太爺，不許女子多讀書的，他說：「讀書求功名，是男子之職，不是女子之職。」

可惜我們這位伊耕表叔，娶了這位夫人，伉儷很篤的，不到三年，他就謝世了。也會生下一個兒子，不幸那個兒子，也早殤了，世間慘事，無逾於此。後來把硯農叔的次子，嗣在他的名下(就是國醫而兼國畫的吳子深，他的醫，就是向他母舅曹滄洲學的)。伊耕叔的病，也是肺病，有人說：那些青年患肺病的，在年齡上，要過兩重關，第一重是二十歲，第二重是三十歲，逃過這兩重關，畧可放心，而在二十與三十之間，斷送大好青春者，却是最多。

扶乩之術

六八

談起桃塢吳家，我不能不想起一件事來，便是他們家裏的乩壇了。他們家裏有幾個密室，任何人都不能進去，除了舅祖清卿公及硯農、伊耕兩表叔之外，尤其是女人。他們家裏的女人，從未入內，我的祖母也從未進去過。他們都呼這幾間密室爲「祖宗堂」（這時他家還沒有造祠堂），說是供奉他們列代祖先的神位之處。實在裏面房子有兩進，前面的一進，是供奉列代祖先的神位，安放古物之類，後面的一進，却設立了一個乩壇。

扶乩在中國源流甚古，我且不去考據它。不過在我幼年時代，扶乩之風，很爲盛行，尤其是在江南一帶。即以蘇州而言，城廂內外，就有十餘處。有的是公開的，有的是私設的。公開的人人皆知，大都是設立在善堂裏，很有許多人去問病，求事，甚而有去燒香的。私設的帶點秘密性質，不爲人家所知，即使親戚朋友知道了，要去問病求方，也只能託他們主人，代爲叩問的。

像吳家這個乩壇，當然是私設的了，可是私設的不獨是吳家，我們無從知道罷了。我曾問我的祖母道：「公公（指清卿公）和兩位表叔（指硯農與伊耕）常在裏面做什麼？」祖母說：「他們是在求仙方。」這個我很相信，因爲他們家裏，無大無小，凡是吃藥，那個藥方，都是從乩壇上來的。除非是有大病，方才請醫生呢。

我常見清卿公早晨起來後，便到他們所說的祖宗堂去了。就在他所住居的那個屋子天井內，靠西面開兩扇小門進去。那門平常是鎖的，要他進去的時候才開，及至他進去了，裏面又把門門起來了。而且到祖宗堂去，僅有這一個門，除此之外，別無門可進的了。我幾次爲了好奇心，總想進去看看，

但恐被他們呵責，終於不敢造次。他們外面有個帳房間，管理收租米、收房金的有幾位先生，我問他們：「裏面那個祖宗堂，有些什麼？」他們騙我道：「你們的公公，裏面藏有好幾十萬的元寶與洋錢，你不知道嗎？」實在他們都沒有進去過。

但是有一天，這個秘密之門忽然對我開了。那時我不過十二歲吧，也隨着祖母住在他家，伊耕叔是病着。我正在他們書房裏讀書，清卿公忽然到書房裏來，向我說道：「你高興看看我們的乩壇嗎？我聽了非常高興，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我就說：『我願意去看看。』清卿公道：『但是有兩件事，要先和你約定。第一，這裏面是一個神聖所在，非同兒戲，必須恪恭將事，不可意存戲謔。第二，這個乩壇是秘密的，我們爲了怕人來纏繞不清，不能公開，你在外面，不可向人談起。』我說：『我一定都可以答應。』」

這教他們家人都驚異了，因爲除他們父子三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進去的，現在却讓一個小孩子進去了，顯得十分奇特。我也是從那深鎖的小門進去，却見裏面的房子很大，有三開間的兩進。前一進確是他們的祖宗堂，祖宗的神位很不少，還有許多祭器等等，都陳列在那裏，後一進便是那乩壇所在了。

那個地方，張着黃色的帳幕，供着極大的香案，連所點的蠟燭也是黃色的，案上又陳列着許多黃紙。中間並沒有什麼塑的神像，只有在正中掛着一頂畫軸，那畫軸也是由一個黃色帷幕遮蔽了，畫的是什麼神佛，黑洞洞瞧不清楚，況且我從小就是近視眼，進去時，大家都是屏息靜氣的，我也不敢動問。

江南的這些乩壇，必定有一位主壇的祖師，那時最吃香而爲人所崇奉的，就有兩位，一位是濟顛

僧，一位是呂洞賓。大概信奉佛教的是濟顛僧，信奉道教的是呂洞賓。不過濟顛主壇的，洞賓亦可降壇；洞賓主壇，濟顛亦可降壇，他們是釋道合一，是友不是敵，吳氏這個乩壇，我知道是濟顛主壇的。

扶乩的技術，也分爲兩種，有兩人扶的，有一人扶的。中間設有一個四方的木盤，盤中盛以細沙，上置一形似丁字的架子，懸成一個錐子在其端，名爲乩筆。「神」降時，就憑此乩筆。在沙盤裏劃出字來。如果是兩人扶的，便左右各立一人，扶住丁字架的兩端；假使是一人扶的，一人扶一端，另有一端却是垂着一條線，懸在空中。吳氏的乩壇，却是兩人扶的。

假如是兩人扶的，每一次開乩，就得有三人。因爲兩人扶乩之外，還必須有一人，將沙盤中所劃出來的字錄下來，這個名稱，他們稱之爲「錄諭」。這吳家父子三人，他們都可以扶乩，每次總是兩人扶乩，一人錄諭，三個人是缺一不可的。但如果有一人病了，或者有事外出，這乩盤便只可以停開了。可是我們這位伊耕叔，却是常常鬧病的，而他們又不願意招致外人入此秘密室，因此這乩盤也便常常停開了。

可是這回清卿公便看中了我了。因爲我雖不會扶乩，却可錄諭。試想：他們有兩人在扶乩，有一人在錄諭，不是仍可以開乩了嗎？但清卿公却顧慮着，我究竟是個孩子，沙盤裏寫出來的文字，一時只怕錄不出，硯農表叔却力保可以担任，他說：「這是淺近的文字，即使錯了，也隨時可以改正。」他們爲了要收這個新學徒，所以教我先到這個秘密室去瞻仰一下。

這錄諭不似速寫，可以慢慢地，聽不明白，可以再說一遍。爲了這事，硯農表叔說：「不妨先行試驗一下。」於是說了一篇濟佛祖（他們稱濟顛爲濟佛祖）降壇文，三四百字中，只差了四五個字

，他把它改正了，便說：「可以了！」明天早晨，就可以實行。他教我：「明天早晨，不要吃葷腥，到了吃中飯吃葷，便沒有關係了。」

第二天早晨，我就實行我的新工作了。所謂錄諭者，擺一几在他們的乩盤之傍，備有筆硯和一本諭簿。諭簿之上，每次降乩沙盤上所寫的文字，都錄在上面。錄諭是要跪在那裏寫的，他們爲我安放了一個高的蒲團，矮矮的茶几，却很合式，也不覺費力，好得不過半個鐘頭，就完事了。這一天的成績，却覺得非常之好，他們把我所寫的來校正一下，只不過差了兩三個字。

不過在求「仙方」中，我較爲困難，因爲有些藥名，我不熟悉，寫了別字。但硯農表叔是知醫的人，他一向研究醫理，乩壇上開仙方，也是他主持的。於是他開了一張通常所用的藥物名稱單子，我常常看看，到乩壇上臨開方子，他更詳細指示，謹慎檢點，也就順利進行了。

及至後來，我隨祖母回到家裏，他們的「三缺一」（這是說三人之中缺了一人），常來請我去做錄諭工作，我的父親很不以爲然。母親說：「不過上午一兩點鐘的事，下午仍可以進學堂讀書。不許他去，是不好的。」我起初爲了好奇心的關係，很爲高興，後來也不感到興趣了。但是我的錄諭工作，也有報酬的。什麼是報酬呢？便是看戲。清卿公是蘇州的大富翁，但非常省儉，一無嗜好，連水烟也不吸的（就是喜歡聞一些鼻烟，也非高品），所好的，看看文班戲（崑劇），他以前總是一個人去的，現在帶了我同去，那崑戲是中午十二點鐘就開鑼的，有時飯也來不及吃，帶點什麼雞蛋糕乾點心之類，塞飽了肚子。所以對於崑劇的知識，我從小就有這一點。

我總疑心這扶乩是人爲的，假造的，不過借神道設教罷了。但是許多高知識階級的人，都會相信這個玩意兒，我真解釋不出這個道理。最近幾年前，上海有一處有一個乩壇，主壇者叫做木道人，我

的許多朋友都相信它，而這些朋友，也還都是研究新學的開明人物呢。

後來伊耕叔故世了，清卿公也故世了，只存硯農表叔一人，「獨木不成林」，他們的乩壇也就撤除了。在二三十年以後，有一次，我問硯農表叔道：「你們的扶乩，現在坦白地說一說，到底是真的呢？假的呢？」他說：「可以說真的，可以說假的。」我道：「願聞其詳。」他說：「譬如在乩壇上求仙方，假使教一個一點兒沒有醫學知識的人去扶乩，那就一樣藥也開不出來。若是有醫學知識的人去扶乩，自然而然心領神會，開出一張好的方子來，使病家一吃就愈。再說：假使一個向不識字的人去扶乩，沙盤裏也寫不出來。但我們踏上乩壇，預先也並沒有什麼腹稿，並沒有謔成一首詩，那隻手扶上乩筆後，自然洋灑成文，忽然來一首詩，有時還有神妙的句子寫出來。所以我敢認定一句成語，「若有神助」，這便是我說的可真可假。」硯農表叔之言，有些玄妙，我還是疑團莫釋呢。

出就外傳

我自從脫離了顧九臬先生以後，便拜朱靜瀾先生爲師了，這是我離家就傅之始，這在我童年是一個變換時期。

前文不是說朱靜瀾先生是我的表姊丈嗎？自從我顧氏表姊嫁到朱家去後，因為表姊是祖母撫育長大的，她視我家為母家，歸寧也到我家來，靜瀾先生也視我家為岳家，時常往來。表姊聽得我附讀在顧九臬先生處，張氏太太嘖有煩言，她極力主張要我到她家去讀書。

原來靜瀾先生也在家中設帳授徒，他是一位名諸生。從前所謂讀書人者，除了幾家縉紳子弟外，其餘都是作教師生涯。因為從前沒有學校，而子弟總要讀書，社會上需要教書先生，教書先生也就多起來了。教書先生有兩種：一種是人家請了去，當西席老夫子的；一種是自己在家里開門授徒的。人家請了去的，比較待遇優，然而受束縛，不自由；開門授徒是一種退步，然而以逸待勞，却比較自由得多。這兩種以後我都嘗過，却也深知甘苦。

但顧氏表姊的要我到他家去讀書，大有一種報德主義，因為她是在我家撫育成人的，她心中常懷報答之心。近來我父親無固定職業，家境漸窘，她想擔任我的教育一部份，使母舅（我的父親）稍輕負擔。所以她聲明倘我到她家裏去讀書，所有學費膳費，概不收受。可是父親說：「不能如此，學費膳費照例致送，因你丈夫還有母親弟妹，你不能擅自作主，而我對於兒輩讀書之費，無論如何，是應當勉力負擔的。」

從前學生們住在先生家裏，而先生家裏，供他飯食的，其名謂之「貼膳」。貼膳與束脩，總共計算，普通是每年三十六元，可見從前生活程度的低廉。以每年三十六計，每月僅合三元，以一元作束脩，二元便可以對付一月飯食，住宿就不收你費用了。那時我就以三十六元一年貼膳於朱靜瀾先生處，便住在他家了。

朱先生的家，住在胥門內盛家浜，他們的房子，有些不大規正，大概是量地造屋，一面通盛家浜

，一面通廟堂巷，也不能說誰是前門，誰是後門，因為兩面都有一座廳，不過廟堂巷一面是朝南，盛家浜一面是朝北的，朱先生的一家，都住在盛家浜的那方面。

我們兒童也喜歡盛家浜，那邊開出門來，便是一條板橋，下面是一條河浜，雖不通船，可是一水盈盈，還不十分污濁。從板橋通到街上，一排有十餘棵大樹，這些大樹，都是百餘年前物了。尤其是在夏天，這十餘棵大樹，濃蔭遮蔽，可以使酷烈的陽光，不致下射。晚涼天氣，坐在板橋上納涼頗爲舒適。板橋很濶，都有欄干，沿浜一帶，有八家人家，都有板橋，東鄰西舍，喚姊呼姨，因此盛家浜一面，比廟堂巷一面，較爲熱鬧。

我們的書房，在大廳的後面，一面很大的後軒。庭中也有一棵極大的樺樹，樹葉樹枝，遮蔽了幾間屋子，此外也有些假山石，還種了些雜花之類，我記得在四月中，有一架薔薇，開了滿牆的花，似錦屏一般，任人摘取。總之蘇州人家，有一個庭院，便不讓它空閒，終要使它滿院花木的。這座大廳是朝東的，後軒到了夏天，有西晒太陽，書房便搬到大廳上來。大廳旁邊有一間耳房，便給我們的貼膳學生做了宿舍。

朱先生家裏人很多，父親早已故世，他有一位母親，還有兩位弟弟，一號軼萬，小名多；一號念碩，小名滿；還有一位妹妹，閨名圓珠。其他，朱先生還有一位出嗣的異母兄，號筱泉，是個廩生，也是就館在人家，他有夫人兒女等，也同居在一處。筱泉的嗣母，是頭沉在水缸裏死的，也是異聞。

在朱先生那裏，同學甚多，每年多時有十餘人，少時有七八人。當然走讀的居多，而住讀的（即是貼膳）也每年必有三四人。胥門這一帶，衙門很多，如藩台衙門、臬台衙門、知府衙門等等，都在那裏。住居的人家，有許多候補官們公館以外，便是各衙門的書吏家屬居多。（以藩台衙門書吏最多

，俗稱「書辦」，又號「房科」）他們在衙門裏，有額有缺，世代相傳，只有他們是熟習地方上一切公事的。因此我的同學，此中人也很多。

第一年的同學，我不大記得了，第二年的同學，我記得有貝氏三兄弟。（說起貝氏，據他們說，凡是蘇州人姓貝的，都是同宗，如我前章所說的我的寄父貝鹿巖，以及後來在金融界上有名的貝淞蓀都是一家。除了蘇州有一家筆店貝文元之外，因為貝文元是湖州人。）這貝氏兄弟，是仲眉、叔眉、季眉。也是貼膳，因此很為熱鬧。後來仲眉習醫，叔眉游幕，他和我家有一些親戚關係。季眉曾一度出洋，習建築學，做過司法部的技正，設計建造監獄等事宜。

後來有一位戚和卿，也膳宿在朱師家，此君比我年小，而比我聰明，十三四歲時，字就寫得很好，那是從蘇州另一位書家楊懶芋學習的。和他同學不到兩年，他便離去。三十年後，在上海遇到，他已更名為戚飯牛，在電台中講書，頗為潦倒，大概有烟霞癖之故。在朱師處同學最知己者，為李叔良，曾與結金蘭之契（俗名換帖兄弟），李君留學日本，回國後為學校教師，蘇州草橋中學這班學生，都受過他的教導。

我小時為祖母及母親所鍾愛，年已十三四歲，還不准獨自一人在街道上行走，必有女傭陪伴着。到朱家讀書後，不能時常回家，回家時必有人伴送，大約每月歸家不過一二次，歸家住一兩天，便即到館。但回家後，反見寂寞，不及在朱家的熱鬧。從家裏到朱宅這條路，已經很熟，屢次請於祖母，不必派人伴送，可是她總不放心。

實在，我住在朱家，正和家中一樣。我表姊待我，正似長姊之待其弱弟。不但是表姊，朱家的人，都和我很好，都呼我為弟弟。從前背後還要拖一條辮子，早晨起來，表姊便為我梳辮；晚上預備熱

水，供我洗脚。此無足爲異，因爲她未出閣時，本住在我家，也常幫助我的母親調理我的呀。

在朱家讀書這幾年，我自我檢討，實在不用功。這其間有幾個原因：第一、這位朱先生交游很廣，交際頻繁，常常不在家中，如果不是開門授徒，便沒有這樣自由。先生既不在家中，學生更可以自由了。第二、同學既多，品流複雜，雖然都是上中等家庭的子弟，却有各種性質的不同。尤其是那種年齡較大的學生，更足以引壞年齡較小的同學。第三、我的表姊太迴護我、放縱我了。假使我說今天身上不舒服，休息一天，那就休息一天了。實在這個年齡，正是求學的年齡，最是蹉跎不得的。

這個時期內，我看了兒童們不應看的書，如「西廂記」、「牡丹亭」，以及滿紙粗話的「笑林廣記」之類，都是在朱家一口壁櫥裏尋出來的，蟲蝕鼠嚙，殘缺不全本。那些曲本，我頗愛它的詞藻，雖然還有許多是不大明瞭的，那時候正是情竇初開，便發動了我的性知識。此外也偶然看到了別的雜書，什麼「莊子」「墨子」等等，我也抓來看，多半是不明白的，不管懂不懂，我也亂看一陣子。

記朱靜瀾師

朱靜瀾先生，是我第五位受業師。我在他案頭，差不多有五年之多，這不可以不紀了。

先說朱先生的家况，他們是一個小康之家，便是不作教書生涯，也可以過度。但是從前吳中的風氣，既然進了學，教書好像是一種本業。並且中國的傳統，我有知識學問，當然要傳給下一代，而我也是從上一代傳來的，如此方可以繼續的傳下去，從孔子一直到現代，都是這樣一個傳統。

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從前古訓相傳的「教學相長」，一面教學生，一面自己也可以求學問。憑藉着教學生的緣故，也可以把從前所學的不至於荒廢。再說：即使你並不靠教學生所得的一點束脩爲衣食之資，但也可以檢束你的身體。如果太空閒了，一點事也不做，那末，不但是學問荒疏，連身體也因此放蕩了。

但是朱先生實在不適宜於教學生，可是他的教書生涯，頗爲發達。有許多先生，我覺得都不適宜於教書的，然而在當時的社會風氣及其環境，所謂讀書人者，除了坐冷板櫬之外，別無事可作，我是坐過冷板櫬的，所以深知其中的甘苦。從前的教書先生，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在科舉上，忽然飛黃騰達，平步青雲，扶搖直上；一條是屢試不中，顛躓科場，終其身做一個老學究，了却一生罷了。

朱先生爲什麼不適宜於教書呢？我可以約舉數點：

第一、他的教書不嚴也不勤。我們從小讀「三字經」，有幾句道：「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不要以爲開蒙的三字經，却是很有道理的。試舉一個例：譬如他出了一個題目，教我們學生做一篇文章，限定當日要交卷的，但是當日不交卷，他也馬馬虎虎了。假使他出了題目，監視學生，非教他立刻做出來不可，學生們被迫，無論通不通，好歹也寫出一篇文章來了。但他出了一個題目，並不監視他們，自己却出去了。學生們不做的不必說，做的只是潦草塞責，釘釘滿紙，有時還亂鈔刻文。他如果勤於改筆還好，而他又懶於修改，如此學生的進步更慢了。

第二、便是我上文所說的他的交友很廣，他今天去看那一位朋友，明天又去看那一位朋友，自然這都是讀書朋友。而且他的朋友時時變換，每年常有新朋友。又譬如你去訪了那個朋友，那個朋友明天就來回訪你了。家裏並沒有像現代的什麼會客室，來訪的朋友，便直闖進書房來了。好了！書房裏來了一位客，學生們都停書不讀，昂起頭來聽講話了。那位不識相的朋友，甚而高談濶論，久坐不去。還有拉着先生一同去吃茶、吃酒，先生推辭不脫，於是只得宣告放學。這時學生們，好像久坐議場裏的議員，聽得一聲散會，大家都收拾書包走了。

第三、他自己很少讀書時間，因此他的思想不甚開展，也影響到所教的學生。在清代一般士子，爲了科舉，在未入學以前，只許讀四書五經，最多讀一部「古文觀止」，除非是特異而聰穎的子弟，閱讀些史漢通鑑之類。那就全靠進學以後，多讀一點書，以備後日之用。但有許多士子，進了一個學，好像讀書歸了本，不再進取了。我們這位朱先生，入泮以後，南京鄉試，也曾去過兩回，都未中式，第三次又因病未去，對此好像有點失意，而分心於別種事業。那些已開筆作文的學生，作了文字，必待先生改正，這改文章的確是一種苛政，有些學生文字做得不通，簡直要先生給他重做一篇，而朱先生却是怕改，拖延壓積，因此學生家長，嘖有繁言了。

一個人，交友是有極大關係的，我在朱先生那裏，從學有五年之久，後來出了他的學堂門，因親戚關係，也還是常常到他家裏去的。我見朱先生所交的朋友，常常變換，但也並非是什麼毫無知識的酒肉朋友，却是一班蘇州人所謂慈善界的人。慈善界的人，受人尊重，律己也是最嚴。可惜這一班慈善界，總是涉於迷信，後來朱先生也相信扶乩等一套把戲，對於教書生涯，更不相宜了。

這一班慈善界中人，我稱之爲職業慈善家。大概有一班富人，捐出一部份錢來，經營慈善事業。

他們的出發點，也有種種不同，有的是爲求福計，根據於爲善的人，必有善報。有的是爲了求名，某大善士，到底也是光榮的銜頭。也有的資產有餘，且已年老，好像辦點善事，有所寄託。這便是古人所謂「爲善最樂」了。但是出錢的人，未必自己去辦，那就仰仗於這班職業慈善家了。因爲他們有經驗，有閱歷，而這種慈善事業，也是地方上、社會上加以獎勵崇奉的。

朱先生後來奔走於慈善事業以後，也就放棄了教書生涯了。蘇州那個地方，有很多善堂之類，有的是公家辦的，有的是私人辦的，從育嬰堂以至養老院，應有盡有。此外便是施衣、施米、施藥、施棺等等。有一個積善局，也是地方上的紳士辦的，朱先生曾爲該局的董事，而兼營了「急救誤吞生鴉片烟」的醫生。

這個「急救誤吞生鴉片烟」，也是慈善事業之一種。因爲吞食生鴉片烟，便是仰藥自殺，吃了生鴉片，在若干小時之內，便要一命嗚呼。那時候吸鴉片烟還是公開的，蘇州吸烟的人很多，而吞食生烟自尋短見的更是不少。夫婦反目，姑婦勃谿，母女衝突，尤其是婦女佔多數。這些人一有怨憤，便到烟榻上擦了一手指的生鴉片，向自己口中直送。這都是一時之氣，及至追悔，毒已中腑，却已來不及施救了。因此每年死去的人，統計下來，便是不少。

於是慈善家就辦了這個急救誤吞生鴉片烟的機構，好像我舅祖吳清卿公以及開雷允上藥材店的東家雷先生等數人，出了錢，朱先生便做了急救的醫生。朱先生不是醫生，却是臨時學起來的。本來像急救誤吞生烟的事，那是要請教西醫的，中醫是全不會弄的，但那時候，蘇州的西醫極少。有兩處美國教會到蘇州來辦的醫院，地方極遠，一在葑門內天賜莊，一在齊門外洋涇塘，要請外國醫生，他們雖是信教之士，但都是搭足架子，而且醫費很貴，普通人家是請不起的。現在有了這個處所，是慈善

家辦的，一個錢不要，連藥費也不要，一報信即飛轎而至，什麼時候來請，什麼時候便到，即使是在嚴冬深夜，也無例外。

學習這急救誤吞生鴉片是很簡單的，只有幾種藥，教他們吃下去，以後便是儘量的教他喝水，使其嘔吐，把胃腸洗清罷了。所難者，就是凡要自盡的人，都不願意要人來救，都不肯吃藥喝水，那就要帶哄帶嚇，軟功硬功，且要耐足性子去求他了。這一點，我真佩服朱先生，他的耐性真好。

有一天，我跟着朱先生去看急救生鴉片烟。那個吞生鴉片的女人，年約三十多歲，是南京信回教的人，身體很強壯，而且潑悍非常，是不是夫妻反目，這個救烟的人，照例不去問她。朱先生勸她喝水，橫勸也不喝，豎勸也不喝，一定要死。但朱先生總是耐着性子勸她。她不但要罵人，而且還要伸手打人。可是這不能耽擱的呀！耽擱一久，毒發就無救了。那時朱先生手擎一碗水，正在勸她，她用手一推，那一碗水完全潑翻在朱先生身上。一件舊藍綢袍子上，潑得淋漓盡致。

爲着她要打人，教她的家裏人，握住了她的雙手，及至水碗湊近她的嘴唇時，她用力一咬，咬下一塊碗片來。但救總要救治的，不能因她拒絕而坐視不救，最後要用硬功了。硬功是什麼呢？名之曰「上皮帶」，便是將她的兩手用皮帶紮住，用一條皮管子，上面有塞頭，塞進她的嘴裏，就是用手揪着，一面灌水進去，一面吸水出來，藉此洗清腸胃，這個婦人，便這樣救活了。過不了幾久，我走過她的門前，她們是小戶人家，我見她抱了一個孩子，笑嘻嘻和鄰家婦女正有說有笑呢。

讀書與習業

在舊日的社會制度中，一個孩子到了十三四歲時，便要選擇他前途的職業了。選擇職業，大概分兩大部，一曰讀書，一曰習業。就普通一般人的常識，當然要看那孩子的資質如何？以爲聰穎者讀書，魯鈍者習業。其實也不盡然，也要看他的環境怎麼樣？說到環境，便非常複雜了，因此對於兒童前途的取徑，也非常複雜。

假定一家人家，有幾個孩子（女孩子不在其例），那就容易支配。或者由兒童的旨趣，誰可以讀書，誰可以習業，誰有志讀書，誰願意習業，決定了他們的前途。也有的人家，對於兒童，既不讀書，也不習業，富家成爲纨绔子弟，窮的變成流浪兒童，這樣失於教養，要算是家長的過失了。

我在十三四歲的時候，關於讀書或習業問題，曾有過一番討論。因爲我是一個獨子，既無兄弟，又無叔伯，似乎覺得鄭重一點。但是我家人，都願意我讀書，而不願意我習業。第一個先說父親，父親是商業中人，他却偏偏痛恨商界。他在憤激的時候，常常痛罵那些做生意的，都是昧着良心，沒一個好人。他寧可我做一個窮讀書人，而不願我做一個富商。母親的意思很簡單，她說我生性忠厚，不能與貪很的商人爭勝。祖母却以爲我嬌養慣了，不能吃苦，習業在從前是的确很吃苦的。

但祖母關於我們的家事，常和幾家親戚商量，那一年的新年，請飲春酒，祖母便提出我的讀書與習業的問題來，加以諮詢。第一個是我的舅祖吳清卿公，我們家庭間有什麼重要的事，祖母必定問他。可是他主張我還是習業，不要讀書。他說出他的理由來，他說：「第一、讀書要有本錢，要請名師教授，而且家中要有書可讀（自然，在他那個富室家裏都做到了）。爲什麼那些紳士家中科甲蟬聯，

他們有了這種優點，再加以有了好子弟，當然事半功倍了。第二、讀書要耐守，現他的父親無固定職業，而又栽培不起，倒不如習一職業，三五年後，就可以獲得薪水，足以贍家，父子二人，勤懇就業，也不愁這個家不興了。我不相信商業場中，沒有出勝的人。』他列舉了某某人，某某人等等，的確，他所舉出的人，都是蘇州商界鉅子，捐了一個功名，藍頂花翎，常與官場往來，那些錢莊擋手，却都是我父親瞧不起的人。

可是我的尤異甫姑丈，却不贊成此說，他說：『現在讀書要有本錢，這是經驗之談，我不反對，若是紳富人家，科甲蟬聯，而一個寒士，永無發跡之日，這也不對。試看吳中每一次鄉會試，中式的大半都是寒士出身。再有一說，惟有寒素人家的子弟，倒肯刻苦用功，富貴人家的子弟，頗多習於驕奢淫佚，難於成器，也是有的。』姑丈也和我母親的見解一樣，說我爲人忠厚，不合爲商業中人。他又讚我：氣度很好，沉默寡言，應是一個讀書種子，至於能否自己刻苦用功，另是一個問題了。異甫姑丈的話，大意如此，可是我聽了，很有些慚愧，因爲我自己知道，這幾年並沒有刻苦用功，我在朱先生那裏，荒廢的時間太多了。

那時父親便決定主意，不給我習業，而要我讀書了。還有幾件可笑的事，不無有點影響，我自從出生以後，家裏常常和我算命，在蘇州是流行的，連我父親也相信此道。朋友中有許多研究星相之學的，也並非江湖術士之流，他們常抄了我的八字去推算。及至我七八歲以至十二歲時，又常常帶我去相面，相金有很貴的他也不惜。但這些算命先生、相面先生，無不說得我天花亂墜，將來如何的飛黃騰達，必然是科名中人，榮宗耀祖，光大門楣，是不必說了。

我是公曆一八七六年（清光緒二年）丙子二月初二日（舊曆）辰時生的。據星命學家說：這個八

字很好。在我三十多歲的時候，還藏着一張自己的命書，是一位名家批的，其中還用紅筆加了不少的圈。除了他們的術語，我看了不懂之外其餘的話，都是說我將來如何發達的話，大概是說我金馬玉堂，將來是翰苑中人物，出任外省大員，一枝筆可以操生殺之權，儘管他信口開河，亂說三千，却不知道他能算個人的窮通，却不能算國家的命運，科舉也就廢了，還說什麼翰苑中人物，這無非當面奉承，博取命金而已。

所遇的相面先生，也是如此說。那些江湖派的不必說了，有幾位知識階級，平時研究各種相書的先生們，也說我氣息凝重，眉宇秀朗，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不是我自吹法螺，現在雖然老醜了，在兒童時代，我的相貌，却夠得說是富麗堂皇的。我那時身體畧瘦，而面部却不見得瘦，五官也算得端正的。還有一雙手，沒有一個相家不稱讚的，爲的是手背豐腴，手心紅潤。到了我四十多歲的時候，在北京遇到了鹽務署裏一位陳梅生先生（這位陳先生以相術著名的，他曾相過邵飄萍與徐樹錚，背後向人說，這兩位將來都要「過鐵」的，後來皆驗。有人問他何故，他說，邵眉太濃，有煞氣；徐眉倒掛，作豬形。皆非善相），他也說我手可以發財。我問：「發多少呢？」他說：「可以得百萬。」我那時正在窮困，也從不作發財之夢，只有付之一笑。誰知後來竟應驗了，到了民國三十七八年（一九四八——四九），通貨膨脹，什麼法幣咧，金圓券咧，我偶然寫寫小說、雜文，一搖筆稿費就是百萬圓，或不止百萬圓呢。

至於筆下可操生死之權，原是算命先生的盲目瞎說。然而當我最初身入新聞界的時候，我的岳丈便極力反對，他說：「當報館主筆（從前不稱記者），就是暗中操人生死之權的，最傷陰陽。」他老先生是以善士著名的，主張一切隱惡揚善。我想：算命先生說我「筆下操生死之權」的這句也應驗了

吧。但是到了民國八九年的時候，有位看相的朋友說道：「不對了！現在風氣改變了，須要臉黑氣粗，心雄胆大，方是貴人，像你這個相貌，只配做一個文人而已。」

我的話說野了，現在言歸正傳，總之我不再作習業之想了。父親的聽信算命、相面先生的話，雖屬迷信，亦係從俗，而也是對於我的期望殷切。而且他還有譽兒之癖，可惜我的碌碌一生，了無建樹，深負吾父的期望呀！

小考的預備

考試爲士子進身之階，既然讀書，就要考試，像我祖父那樣，既讀書而又不考試，只可算得高人畸士而已。我在十三歲的冬天，文章已完篇了。所謂文章，便是考試用的一種制藝，後來人籠統稱之爲八股文的。所謂完篇，就是完全寫成一篇文章，而首尾完備的意思。

這種學作制藝，是由漸而進的。最初叫「破承題」，破題只有兩句，承題可以有三四句，也有一個規範。破承題的意思，便是把一個題目的大意先立了，然後再做「起講」（有的地方叫「開講」），起講便把那題目再申說一下，有時還要用一點詞藻，也有一定的範圍。起講做好了，然後做起股、中股、後股，有的還有束股，那就叫做八股。爲什麼叫它爲股呢？就是兩股對比的意思。自從明朝把

這種制藝取士以後，直到清朝，這幾百年來，一直把這個東西，作爲敲門之磚。自然講述此道的著作，也已不少，我不過畧舉大概，到後來科舉既廢，制藝也不值一顧，不必再詞費了。

我在顧九臬先生案頭，做過小論，到了朱靜瀾先生處，便做起講。但小論覺得很通順，起講便覺呆滯了，因爲小論不受拘束，起講却有種種規範，要講起、承、轉、合的文法，還有對比的句子，還要調平仄，我覺得很麻煩。並且當時中國文字，沒有固定的文法，一切都要你自己去體會。後來文章雖說完篇了，自己知道，勉強得很。做制藝是代聖賢立言，意義是大得了不得，但人家譬喻說，一個題目，好像是幾滴牛肉汁，一篇文字，就是把它沖成一碗牛肉湯。那末這碗牛肉湯，要不鹹不淡，非但適口而且要有鮮味，但是我這碗牛肉湯，自己就覺得沒有滋味。

雖然是制藝，也要有點敷佐，有點詞藻，而我那時枯窘得很。其所以枯窘的緣故，自然是讀書甚少，所讀的只是四書、五經，其它的書，一概未讀。就是在五經中，易經我一點也不懂，詩經也不求甚解，禮記是選讀的，關於什麼喪禮等等，全行避去不讀，書經也覺深奧，春秋向來是只讀左傳，我還剛剛讀起頭呢。人家說起來，到底是個十三歲的孩子呀，怎麼能板起臉來，代替古聖賢立言，做起那種大文章來呢。

從十三歲冬天文章完篇起，到十四歲開春，本來規定每逢三六九（即每旬的逢三逢六逢九），作文一篇，每一個月，要有九篇文字。一篇文字，也要四五百字，限半天交卷，聰明的也可一揮而就，但我的遲鈍，常常以半天延長至一天。若在嚴厲的師長，決不許其如此，但是我的這位朱先生，那就馬馬虎虎了。

我那時對於作這種制藝文字，很爲懼怕，百計躲避，而對於弄筆寫小品文，或遊戲文，仗着一點

小聰明，却很有興趣。還有我們的朱先生，對於改文章，也非常之怕，不改則已，改起來倒極爲認真，有時改改幾乎是重做一篇。假如三天作一文，一連幾次不改，便積壓起來了。況且他所教的學生多，大家的窗課作文，都積壓不改，這使他是傷腦筋的事呀！

我在十四歲上半年，實在沒有什麼進境。可是十四歲下半年，便要開始小考了。所謂小考者，以別於鄉試、會試等的考試。鄉、會試取中的是舉人、進士，而小考取中的只是一個秀才。論秀才那是普通得很的，但是有句大家所知道的成語，叫做「秀才乃宰相之根苗」，那是踏上求助功名的第一階級。

不要瞧不起一個秀才，說容易似乎容易得很，艱難起來却非常艱難，竟有六七十歲，白髮蕭蕭，考不上一個秀才的。還有他的兒子已經點翰林，放學差，而老父還在考取秀才的。他無論如何年老，至死不休的，情願與十四五歲的學童爭取功名，當時科舉之迷，有如此者。主試官也往往憫其老，而破格錄取的。

小考是先從縣試起的，所謂縣試，便是先從縣裏考試，主試的便是縣官。縣試畢後，便是府試，主試的便是知府。縣試、府試考過以後，便是學台來考試了，名曰院試（俗稱道考）。這一次考取了，方算是一名秀才，然後才可以去鄉試，鄉試中式了，成了一名舉人後，又可以去會試，一直到殿試。從前舉世所艷稱的狀元，就是以秀才爲始基。

爲了下半年小考問題，家庭中又討論了。祖母以爲我太小（我當時身體甚瘦弱），考試是相當辛苦的。一個在街上走路還要老媽子陪着的，如何能去考試呢？母親不敢做主，但問：「有把握嗎？如果考試能取進，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秀才，誰不歡喜？如無把握，白吃辛苦一場，不如等待下一科，就

算十六七歲進學，年紀也不能算太大啊。」

但是父親期望我甚切，很想我去試一試。他說：「這事須先問一問靜瀾（就是朱先生），他說可以去考，自然讓他去考。」父親的意思不差，以我日在朱先生的案頭，我的程度如何，朱先生當然知道，問他是最適當的。朱先生說：「文章既已完篇，不妨且去一試。」在朱先生自然以他的學生能出考爲然，考取與否，乃是另一問題。而且朱先生也窺知吾父之意，要我去試一試呢。

巽甫姑丈來省視我祖母，祖母便向他說了。巽甫姑丈道：「不知他所作的文字如何？抄一兩篇給我看看，但要他自己做的，不要先生的改筆。要是先生的改筆，我也看得出來。」我聽了捏着一把汗，因爲父親是外行，而巽甫姑丈是內行，什麼也瞞不過他的。於是選了兩篇比較畧爲光鮮的文字，好似醜媳婦見公婆一般，送給巽甫姑丈去看。

巽甫姑丈看了，只是搖頭。他說：「就文字而言，恐怕難於獲售，但是科名一事，很是難言，竟有很老練的文章，難入主試之目，以致名落孫山，而極幼稚的文字，反而取中的。」他恐掃了我父之興，便說：「可以教他去觀觀場，不必望他一定進學。縣、府試，我們壽官（壽官乃姑丈之子，即我子青表哥小名），也要進場，坐在一處，可以幫幫忙。道考反正要明年春天，再用用功，也許要進步點。」

這樣，我就決定去應小考了。縣考是在十月中間，府考是十一月中間。那個時候，我也「急來抱佛脚」的用了一點功，但於平日間的荒嬉，根基薄弱，也不能有什麼進境呀！

考 市

八八

先談縣考，我就去報了蘇州府吳縣籍。在那個時候，省之下有府，府之下有縣，而蘇州一府之下，却有九個縣。怎樣的九個縣呢？長洲、元和、吳縣，謂之上三縣；常熟、昭文、吳江、震澤、崑山、新陽，謂之下六縣。上三縣的長、元、吳，就在蘇州城廂內外以及各鄉各鎮，其餘六縣，即今日已歸併爲常熟、吳江、崑山爲三縣。

我們住在蘇州城內的人，原是長、元、吳三縣都可以報考的，何以却報考了吳縣呢？這有三個原因：一則，我祖籍是吳縣，而不是長、元。二則，我現在所住居的地方，在閶門一帶，也是吳縣境界。三則，吳縣是三縣中的大縣，轄地既廣，學額也較多。但吳縣是大縣，却不是首縣，首縣乃是長洲，所以稱爲長、元、吳。可是長洲雖首縣，吳縣以大縣資格，亦以首縣自居。蘇州有句俗語，叫做「長洲弗讓吳縣。」出三節會的時候，長洲城隍與吳縣城隍往往爲了爭道而儀仗隊相打起來。如果一家小兄弟爭吵，他們的母親往往罵道：「你們又長洲弗讓吳縣哉。」及至辛亥革命，三縣歸併成一縣，統稱之爲吳縣，而吳縣的區域愈大了。

蘇州有一個考場，稱之爲貢院，在葑門內雙塔寺前（一名定慧寺巷），雙塔細而高，正像兩枝筆，這是吳下文風稱盛的象徵。據老輩說：蘇州從前本沒有貢院，那個考場，是在崑山的，士子考試，要到崑山去。到後來蘇州才有考場。現在這個考場很寬大，裏面可以坐數千人。有頭門、二門，進去中間一條甬道，兩邊都是考棚，一直到大堂，大堂後面，還有二堂以及其它廳事、房舍等等，預備學政來考試住的。

每當考試時，那裏就熱鬧起來，一班考生，都要到貢院周圍，去租考寓。爲的在開考那一天，五更天未明時，就要點名給卷，點名携卷入場後，就要封門，封門以後，任何人不能進去了。如果住得遠一點的考生，便要趕不及，又如果遇着了風雨落雪，更加覺得不便。因此大家都要在鄰近考場的地方，租定一個考寓。

住在貢院附近人家，到考試時出租考寓，視爲當然的事。房子多餘的人家，不必說了，把家中空閒的房屋，臨時出租，那大廳、門房，凡是可以住人，都可以派用場。即使是小戶人家，自己只住兩三間屋的，也可以讓出一間與考生，或者將自己所住房間，以及床鋪、家具，都讓給他們，而自己另想法子，暫住到別處去的。

蘇州一向是尊重讀書人的，對於考生，以爲斯文種子，呼之爲考相公，便是租考寓與他們，也不事苛求。這一場考試下來，他們的考寓中，考取了多少新秀才，他們引爲榮耀，而且誇爲吉利。住在他們那裏，有如家人婦子一般。我有一位同學，住在考寓裏，被女主人看中了，就把女兒許配了他。這不僅是我國的留學生中，有此艷遇，那舊日的考試中的考寓裏，也有此佳話呢。

租考寓是訂明三次考試的，即縣考、府考、道考。租金比尋常租屋畧貴一些，但這是臨時租借性質，而且把牀榻、家具、爐灶等等，都臨時借給你的。這屋子裏，也同學校宿舍一般，一間房子可以住多少人，有多少舖位。三考完畢，大家回去，也有的得第以後另外送一些謝儀，這是例外的。

除了考寓以外，便是臨時設立的許多書舖子、文具店。因爲這個地方是住宅區，他們都租借人家的牆門間，設立一個簡單的舖位。幾口白木的書架，裝滿了書，櫃台也沒有，用幾塊檯板，套上個藍布套子。招牌用木板糊上白紙，寫上幾個大字，却是名人手筆。這時觀前街的幾家書店，也都到這裏

來，設立臨時書店了。若到了府考、道考的時候，更爲熱鬧，因爲常熟、吳江、崑山的考生都要來。也有上海的書店，他們是專做趕考生意的。

文具店不像現在那樣都成了歐美化，從前的文具店，完全是國粹。紙、墨、筆、硯是大宗，還有卷袋、卷夾、墨匣、筆匣等，更帶賣些詩牋信封、白摺子、殿試策，沒有一樣不是國貨。可是却有一樣，非外國貨不可，那就是洋蠟燭是也，這洋蠟燭，在文具店裏也有買，原來這考試有時到深夜，須要接燭，而中國蠟燭太不適宜：一則，有烟煤，要結燈花；二則，如果跌倒，燭油便要污卷；三則，沒有插處，又常常要易燭。洋蠟燭均無此弊，當時德國的白禮氏船牌洋燭，已傾銷於中國，而考生則非此不可（即鄉會試亦用得着），正給它推行不少呢。

在此時期，臨近一帶的菜館、飯店、點心舖，也很熱鬧。從臨頓路至濂溪坊巷，以及甫橋西街，平時食店不多，也沒有大規模的，到此時全靠考場了。假如身邊有三百文錢（那時用制錢，有錢籌而無銀角）三四人可飽餐一頓，芹菜每碟只售七文（此爲入泮佳兆，且有古典），蘿蔔絲漬以蔥花，每碟亦七文，天寒微有冰屑，我名之曰冰雪蘿蔔絲。我們兒童不飲酒，那些送考的家長們，親友們，半斤紹興酒，亦足以禦寒，惟倘欲稍爲吃的講究一點，那些小飯店是不行的，就非到觀前街不可了。

縣府考

縣、府考都要隔夜就派人去佔坐的，因此夜間貢院前就很是熱鬧，而攤販也極多，他們都是來趕考市的。在平時，那些讀書人家的子弟，不肯在街頭沿路吃東西，以爲失去了斯文的體統。到了考場前，就無所謂了。餛飩担上吃餛飩，綫粉攤上吃綫粉，大家如此，不足爲異，此外測字攤卜以決疑，詩謎攤對準古本，也都到考場前來湊熱鬧了。

到了府考時候，還要熱鬧一點，因爲在縣考時，只有長、元、吳三縣，而到了府考，其餘的六縣都要來了。因爲蘇州當時是省城，而且是首府，便有觀光上國之意，在下縣中，常熟文風最盛，而吳江、崑山，也不退班，他們都是府考之前，先來租好考寓，以便赴考從容。還有雇好一條船，直開到蘇州城河裏來，考寓就在船上，竟有以船爲家的。有些久居鄉下，沒有到過蘇州的，借着送考爲名，藉此暢游一番，因此在考市中，連蘇州別的商业也帶好了。這個小小考市，雖沒有南京、北京之大，但以吳中人文之區，在那時倒有一番盛況呀。

我在十四歲初應縣府試的時候，租的考寓，卽是和尤家在一起。那時異甫姑丈說：「因我年小，要大人招呼，而他們家裏應考的人多，送考的人也不少，不如附在一起吧。」我父親很高興，因爲我還是初次應試，而他們家中却年年有人應試，况且我的表哥子青（名志選，比我大兩歲），他這次也要出考呢。

我記得那個寓所在甫橋西街陸宅，正對着定慧寺巷的巷口。他們家裏房子很多，每次考試，尤家總借着他家做考寓，也是老主顧了。一切招待很爲周到。那陸家也是書香人家，好在他們的宅子，鄰

近考場，他們雖不靠着出租考寓，然而一個考市裏，也可以得到不少收入，不僅是尤家，還有其他人來租的考寓。

事先，母親給我預備了一隻考籃，這考籃是考試時一種工具。提到了考籃，記得有一部小說「兒女英雄傳」上的安老爺，鄭重其事的取出一隻考籃給他的兒子安龍媒，作為傳家之寶，迂腐可笑。還有京戲的「御碑亭」中王有道爲了赴京趕考，手中所提的考籃型式，曾引起了戲劇家的爭論。其實考籃是沒有一定型式，各地方的情形不同，何須爭執？

我的一隻考籃是中型的，共計兩層，上面還有一個匣子。母親在下一層，給我裝了許多食物，水果之類，上一層，讓我裝筆墨文具，以及考試時必需之物，或必需所帶的書籍。有許多人，帶了不少書的，因爲縣、府考向不搜檢，你可以儘多帶書，但我却一些也沒有，因爲我當時也買不起那種石印的可以攜帶的書，不過像那種「高頭講章」、「詩韵集成」之類，這是一定要帶的。

在尤氏的考寓中，將近進場的時候，吃一頓進場飯，很爲實惠。但我却一起身，吃不下飯，好在他們也備有粥，我就吃一頓進場粥，也覺得很爲暖和。這時考場前要放三次炮，所謂頭炮、二炮、三炮是也。頭炮，赴考的人便要起身了；二炮，是吃飯的吃飯，吃粥的吃粥，不租考寓住的稍遠的，就要出發了；三炮，必定要到考場前，聽候點名了。點名完畢，就要封門，封門又要放炮，謂之封門炮。此外開門也要放炮，放榜也要放炮，每在放炮之前，門外兩傍的吹鼓亭內，必定要吹吹打打的一陣子，這也是前清時代對於考試場的老例，恐怕也是歷代相傳下來的。

蘇州長、元、吳三縣中，以吳縣童生報考的最多，大概每次有七八百人；其次是長洲；其次是元和，總共有二千多人。三縣分三處點名，三縣知縣官親自臨場。因爲那時天未大明，爲了使考生們知

道點名的次序，所以做了好幾架燈牌，燈牌上糊以紙，考生姓名都寫在上面，預先自己可以認清自己的姓名在第幾牌，第幾行，到了聽點的時候，可就覺得便利多了。

點名是知縣官坐在當中，旁邊一個書吏唱名的，府試是九縣分場考試，也是知府親臨點名的，點到那一個人姓名時，其人答應了一聲「到」，便上前接取試卷。主試人看了看那人的年貌，便名冊上點上一點，也有臨點遲到的，點完後尚可補點一次。照例是要本人應點接卷的，但縣、考竟有託人代為應點接卷的，不像道考那般嚴正。

記得我那一次縣考時，吳縣知縣是馬海曙，他是江蘇一位老州縣，連任吳縣知縣有好幾年。是一個捐班出身，據說：他從前是一位米店老板。他對於做文章是外行，但於做官是十分老練。在一般考生的目中，因為他是捐班出身，便有些瞧不起他，常常的戲弄他。在點名的時候，都擠在他案桌左右，七張八嘴，胡說白道，甚至於用一根稻草，做了圈兒，套在他的頂珠上，以為笑話，也是有過的。

然而這位馬大老爺，依舊是和顏悅色，笑嘻嘻的對他們說：「放規矩點，不要胡鬧。」為什麼呢？一則，有許多全是未成年的孩子，不能給他們認真。二則，蘇州地方，紳士太多，紳權極重，這些考生們，有許多都是宦家子弟，未便得罪他們。三則，自己是個捐班出身，須得謙和知趣一點，萬一鬧出事來，上司只說他到底不是正途出身，不知道國家進賢取士，與夫科舉之慎重尊貴。

那時元和縣知縣是李紫璠，是個兩榜出身，俗呼老虎班知縣，這些考生們，就不敢戲弄他了。但是有些頑劣的童生，還是喚他「驢子咬」，「驢子咬」（吳語，驢讀如李，咬讀璠），他也只得假作不聞。原來蘇州小考，童生們的吵鬧是有名，人們呼之為「童天王」，那些書吏們辦公事的，見了他

們都頭痛。後來各省設立了學校，蘇州各學校的學生，也常常鬧風潮，其實也不是新玩意兒，在我們舊式考試時代，已經很流行了。凡是少年們，都喜歡生出一點事來，那也是一種自然的趨勢，古代如此，今代亦然，中國如此，外國亦然。

童天王最鬧得厲害，却在府考的時候，因為那時候，不但只有上三縣，下六縣的考生也都來了。在考場裏，尤其是蘇州人和常熟人常常相罵，甚而至於相打。各方有各方的土語，蘇州人以為常熟人的說話怪難聽，常常學着常熟人的說話，嘲笑他們，可是常熟人要學蘇州人的說話，却是學不來。加着蘇州人的說話，又是刁鑽促狹，常熟人說不過他們，於是要用武力解決了。

常熟那個地方，爲了瀕臨江海，在吳中文弱之邦中，民風畧帶一點强悍性質。所以說不過你，就預備打局了，然而十之七八打不成功的。因為相打是要有對手的，蘇州人嘴是兇的，真正動手是不來的，這有些像近代國際間的冷戰，只可相罵，不可相打，至於真要相打，蘇州人都溜光了。但到了常熟人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蘇州人又一個一個地出來冷嘲熱罵了。

縣、府考每次都要考三場，這次縣考，在吳縣七百多人，第一場取出約一半人數，我的文字，自己知道做得一場糊塗，試帖詩上還失了一個黏（即是不協韻），滿以為在不取的一半人數裏了，誰知發案（同於放榜）出來，倒也取在第一百十餘名。共取了三百多名，我心中想，難道所取的名次中，還有二百多人的文字還做得比我壞嗎？於是那個失敗心便降抑下去，提高了一些興趣起來。第二場，便跳起到九十五名。但我的表哥尤子青，他一開頭就是前三名。

府考時，我名次也差不多，總在百內百外之間，其實已可以決定院試的不能獲售。但父親說：這一次原不望我進學，只是所謂觀場而已。以文字而論，如果取進，那真可以算得微幸了。縣府考既畢

，到明年二三月裏，便是道考。這道考兩字，還是依着從前名稱，從前放的是學道，所以稱之爲道考，現在却已改爲學政，三年一任，人家又稱之爲院試。其所以稱爲院試者，因爲學台衙門，名稱爲提督學院。這個學政，不但來考童生，而且還要來考生員，三年兩試，一名科考，一名歲考。

院 試

江蘇學政，是要巡行江蘇全省，替皇帝選拔多士，在清朝這個官制，算是欽派在一省的欽差大臣。所以他在這一省內，考過一府，又考一府，匆匆忙忙，幾乎席不暇暖。學台衙門是在江陰的，然而他在衙門裏的時候很少。這一任的學政是誰，我已記不起來了，好像是個滿洲人，姓名上有一個「溥」字的。

院試不比縣府考那樣的寬鬆，那是要嚴格得多了。院試考取了，便是一名生員，稱之爲秀才。一個讀書人，在那時算有了基礎了。一名生員，有什麼好處呢？你不要小看他，却有許多利益。第一，任何一個老百姓，如無功名，見了地方官，要叩頭下跪，稱呼縣官爲大老爺，要是一生員，便長揖不拜，口稱公祖而已。第二，在前清，老百姓犯了罪，要枷頭頸，打屁股，生員只可打手心，而且要老

師（學官）才能打，不能衙門裏役吏打，除非革去功名，然後方可受普通刑罰。第三，老百姓是沒有頂戴的，生員就可以戴一銅頂珠。其它利益還很多，在一個小縣份，或是鄉鎮之間，一個秀才，便等於一個紳士，所以在俗語中，往往「紳衿」兩字並稱，據友人齊如山談：在北方，凡有人家子弟進了學，可以免出幾畝地官租，若在南方，則未之前聞。

學台一到了那個考試地方，便住到貢院裏去，他照例什麼客也不拜，人家也不能去拜他。這是爲了關防嚴密，恐怕通了關節之故，一直要到考試完畢以後，方才可以拜客，而接連就是辭行，要到別一府去考試了。所以一位學政到了那裏，一直關閉在貢院裏，連那許多看文章的師爺，以及帶來的長隨、承差等，也都是如此的。

學台到了以後，所有吃的、用的，都是縣衙門裏辦差。像蘇州那樣，自然是長、元、吳三縣攤派的，反正知縣官也不挖腰包，總是公家的錢。學政來了以後，縣裏便設了一個機構在貢院前，遇到學台要什麼東西時，便由那個機構去辦。學台帶來的人，不能出貢院門，需要何物，便在大堂上大呼「買辦」（官役中買東西的人，非洋行買辦也）。據說：從前學政臨試，要抬進一箱銀子，外面寫着供應所需，考試既畢，這箱子仍復抬出，其實這箱子內空空如也，不過有此規制，總之學政臨試，地方上對此供應，可以作爲正開支，並且還要送一筆錢的。

對於供應，遇到了不容易伺候的學政，要這樣，要那樣，百端挑剔，地方官也很受他的累。臨走時，所有辦差來的東西，通統帶了去。也有那位學政清廉自守，而所帶來的人不肯放鬆，也是有的，除了木器等笨重之物，不能帶走，其餘一切供張，均席捲而去，連看文章師爺，也得分潤，他們以爲此項供張，縣裏已作正開支，不拿也太歎。他們這些窮翰林、窮京官，在京苦守了多年，深望放一次

考差，可以稍爲撩一點兒，這已是公開的秘密，連皇帝也是知道的。

前清時代，每府每縣都有一個學官，在所謂學宮傍邊有幾間房子，選一二位學官住在裏面，這是一種最冷的官，最簡陋的衙門，然而却是最清高的職務。別的大小職官，不許本省的人來做本省的官，惟有那種學官，大都是本省人做的。他們終年不必上督撫衙門，毫無官場競爭習氣。他的官名叫訓導；有的叫做教諭，而大家都呼之爲老師。他長年清閑無事，就是兩個時期最忙，一是春秋兩次的丁祭，一是學台來考試的時候了。

春秋兩次丁祭，是他的職司，也是最忙的時期，平常與省內的長官，難得見面，只有這次是可以見面了。而且這些大員，很客氣的都喚他一聲老師，昔人有詠教官的詩句云：「督撫同聲喚老師」，便是這個典故。至於學台來的時候，也是他們最忙時候，因爲學台是他們的親臨上司，可以管理這學官，考驗這學官的。關於童生及生員的事，惟學官是問，要責罰他們，也由學官去執行，好像是代理家長似的。

在前清封建專制時代，凡是童生應試，必須備有保人，具有保結。這保人有兩個階級，一是本縣的廩生，一是本縣的學官。爲什麼要保人呢？原來有許多人是不許考試的。譬如說吧：所謂娼、優、隸、卒的四種人的子弟，便是不許考試的，這院試是士子進身之階的始基，所以特別嚴厲。還有本省人須應本省的考試，本府縣人須應本府縣的考試，如果別省府縣人來考試，這個名稱，謂之「冒籍」，那就要受本省府縣人的反對而攻訐的。

關於娼、優、隸、卒四類人的子弟，不能考試，我且述其大畧。

先言娼：娼是指身爲娼妓，及會開妓館而言，譬如說：他的母親從前是個妓女，嫁了他的父親，

而父親是一個紳士，這怎麼辦呢？但這是無關宏旨的，因為當時是所謂宗親社會，重父而不重母的，況且他母親已經從良。不然，有許多姨太太所生的兒子，他的母親都會當過妓女的，便不能考試了嗎？除非他的母親是老鴇，而他的父親是龜奴，又當別論，但這樣人家的子弟，也不會來考試的。

次言優：優是指唱戲的，即使你是一個名伶，譽滿全國，兒子也不許考試，不論唱京戲、崑戲、地方戲，都是一樣。當時是戲子與婊子同等的，後來才解放。以次推及雜技，如北方的說大鼓的，南方的說書先生（此輩均由地方上的甲頭監管），以及俗語所說：「吃開口飯」者，他們的兒子，都不許考試。

次言隸：隸就是奴隸了。貴族人家的家奴，賣身投靠的，不必說了，便是雇傭性質的老僕、書童，以及官長的長隨、青衣、長班等一切服役人等，總之屬於奴隸之類的，都不許應試。不過女傭却是例外的，即使母親在人家當老媽子，而兒子刻苦讀書，照常可以考試的。

次言卒：卒是就官中人役而言，譬如像差役、捕快、地保、甲頭、更夫、親丁之類，都不許考試。但是一個官署中，便有許多辦公的人，也有許多分科的人，這種人俗稱之為「書辦」，書辦的兒子，却准許考試。因為有官必有吏，此種人是屬於「吏」的階級，且既名書辦，亦是文人階級也。

此外，在其它各省中，有所謂墮民、賤民、流民等等，其子弟有永遠不許考試的。但到了辛亥革命以後，所有不許考試的規定，一律解放了。

觀場

我這次院試，已是十五歲的春天了，而在縣府考報名時，還給我報小了兩歲，名冊上只有十三歲，這是蘇州的風氣，有許多初考試的，都是如此。我的十五歲，本是虛歲，加以身體瘦弱，發育未充，騙人十三歲，也騙得過，從縣府考到道考，相隔也有幾個月，假使如我巽甫姑丈所說：在這幾個月裏用用功，再有點進步，本來在縣府考是百上百下的名次，再能跳高幾十名，可以徼倖取中，也論不定。

原來全國各縣考取生員的名額是不同的，我們吳縣是個江蘇大縣，每次報考的常有七八百人，所以考取的學額，是有四十多名。（據放過學差的老前輩談，有些荒僻縣份，每屆考試，報考的只有二三十名，而學額倒也有二十名，只好「一榜盡賜及第」了）原在縣府考百名以內，跳上數十名到學額中，也不算難事呀。

但是我在這幾個月內，一點沒有用功。又加着正在歲尾年頭，和同學們開春聯店，到處奔走聽「說會書」，在新年裏又是到處游玩，真是「春天不是讀書天」，荒嬉到正月裏半個多月，及至到朱先生處開學，雖然急來抱佛脚，也無濟於事。大家也以爲我這次考試，也不過觀場而已，並不加以嚴厲的督促。

院試的前夜，也同去冬的縣、府考一樣，住在尤家所借的陸氏考寓。可是縣、府試是寬容的，院試是要莊嚴得多了。所謂童天王的威勢，到此也消滅了，學台的尊稱是大宗師，他是專管你們的，遇到年老長厚的學使還好，若遇到年輕風厲的學使，你要犯規不率教，不客氣的便要予以刑責。在吾鄉

有一位青年，在院試時，不知爲了什麼事，吵鬧起來，學台便命令學官（老師），在案頭敲打手心二十下，老師命他討饒，他不肯，後來打到第十八下，忽然討了一聲饒，學台便命止打。這位先生，我們題他一個綽號，叫做「胡笳十八拍」。責罰以後，學台仍舊教他去做文章，而且這科就考取入學了。

在縣、府考的當兒，考生只是穿便衣，院試却不能了，至少也要戴一頂紅纓帽子，却是沒有頂珠，只有一個圈兒。學台點名，就在貢院的大門內，這時天還沒有大明，燈燭輝煌，衣冠羅列，學台坐在正中，在兩傍站班的有各縣知縣，有各縣學的老師，有各廩保，以及各吏役、承差等，這氣象顯得威嚴而隆重。

這貢院大門的門限，足有半個成人的高，在縣、府考時，去了這門限的，院試不去除，我那時身小力弱，跨不進這個高門限，幸而巽甫姑丈家有個送考的僕人，把我一抱，便送進去了。聽到點上我的名時，便應一聲「到」，而站立在傍邊的廩生，便高呼曰：「某某人保。」談到這個廩保的事，我還得說一說：原來這個童生應試，也須備有保人，具有保結。當保人的是誰呢？就是本縣的廩生，而且廩保還須有兩位，一名認保，一名派保。何爲認保？在認識的人中覓取的；何爲派保？是由學官指派。那時我的認保，是馬子晉先生；也是朱靖瀾師的老友，預先約好的。派保是誰，現已忘却了。爲什麼考試要保人呢？在封建時代，對於士子，不許他們流品太雜，如前所述，有許多種人是不許考試的。

點名即發卷，我們胸前都懸有一個卷袋，領卷後即安置卷袋中，手提考籃，魚貫入場。這個考籃，又與縣、府考時的考籃不同，雖亦爲竹製，而有網眼，在外面可以觀察裏面所貯之物，因爲便於搜

檢也。說起搜檢，這也是可笑可惱的事，縣、府考是不搜檢的，即使到鄉試、會試，也是不搜檢的，有多少書，帶多少書，不來管你，惟有這個學政來院試時，片紙隻字，不准攜帶入場，一經點名接卷以後，進入考場，便要搜檢，恐怕你有文字夾帶。有時還要解開衣服，遍體捫索，鞋子也要脫去檢視，頗像後來上海的「抄靶子」，及現在各海關的搜檢旅客一般。

雖然嚴於檢查，但是懷有夾帶的人，還是很多。以前沒有洋紙，也有一種極薄的紙，叫做什麼「桃花紙」，用極纖細的字，把成文抄在上面。其實懷挾夾帶的人，却是最愚笨的人，那裏有所出的題目，恰是可以供你抄襲的呢？而且看文章的人，對於你所抄襲得來的，也就一望而知呢。但是在進場時，搜檢出來後，有什麼罪名呢？也沒有什麼，把夾帶搜出來後，仍舊讓你進場去做文章，不來滋擾你了。

院試出題目，總是出兩個，一爲已冠題，一爲未冠題。未冠題比較容易一點，年紀報小，可以避難就易吧。可是這位學政，大概喜歡年小的兒童吧？所以把報考十三、四歲的童子，一概「提堂」。所謂提堂者，就是提到堂上去做文章，那我也是其中的一位。這一屆我們吳縣的題目，是「宜其家人」一句，我倒是選取的已冠題（這不強制你的年齡而選取題目的）。詩題是什麼，早已忘懷了（鄉、會試以及大考等，總是五言八韻，小考只要五言六韻）。但是有兩件事，最爲麻煩：一件是卷後補草稿，一件是必須默寫「聖諭廣訓」。

在考卷的後面，附有一二頁白紙，那是備你作草稿用的，因爲院試是不許帶片紙隻字入場的。但是有些人的草稿，塗寫得模糊不清，非用另紙起草不可；有些人到了時間急促時，就下筆直書，不起草稿（我便是這樣的一個人）。而考卷上既備有稿紙，非要你起稿不可。那也是防弊之一法，生怕你

的文字，有人代做，或抄襲得來，有了草稿，可以核對。實在看文章的人，有如許的卷子，真似走馬看花，那裏還有工夫來細看你的草稿呢？所以這個補草稿，在前面幾行，還有些清楚，後面便看不清楚，隨便塗些什麼。有人說：在急的時候，用一根穿制錢的草繩，在墨盒裏塗了墨，在草稿紙上一彈，就算數了。

默寫「聖諭廣訓」，也是令人頭痛的事。這種「聖諭廣訓」，也不知是前清那一代的皇帝，發下來誥誡士子的訓話。反正每一個專制皇朝，總有皇帝的綸音，對於士子的訓誡，不但「作之君」，還要「作之師」。但是這個「聖諭廣訓」，我們平日既沒有讀過，私塾裏的先生，只教我們讀四書、五經，沒有教我們讀「聖諭廣訓」，既然沒有讀過，如何能默寫出來呢？可是每逢院試，必須要默寫一段，由主試摘出，從某一章某一句起，至某一章某一句止。結果，各考生都發給一本「聖諭廣訓」（在交卷時繳回），照抄一段完事，誰也沒有去研究它，只不過虛應故事罷了。

這一次，我雖然以幼童提堂，到底沒有入彀。吳縣學額最廣，可以取進四十餘人，大約二十人，取進一人，照我的縣、府考成績而言，除非要加兩倍學額，方可以取進。家中人恐我失意，很安慰我，但我自知文字不濟，決不怨人。異甫姑丈原說：「這一回，不過觀場而已。」我也只好以此自掩其醜。可是我的表兄尤子青哥，却是就在這次以第二名進學了。

我這回不能進學，大家都原諒我，因為我年紀究竟還小，號稱十五歲，實際上不過十四歲而已，雖父親很希望我得青一衿，但即使僥倖得售，實在也沒有什麼益處，反使兒童輩啓其驕傲之心。吾吳童子試時，頗也有十二、三歲便進學的，曾有一位戴姓，九歲便進學，大家稱之爲神童，但後來却是潦倒科場，不會有所發達，豈所謂「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嗎？

但下一科則大家對於我期望甚切。不僅我家中人，親戚中如巽甫姑丈、伊耕表叔，以及我的受業師朱靖瀾先生等，他們都說以我的資質，倘能用用功，學業當可大進。他們都說我「有悟性」。怎麼叫有悟性？好似佛家語，我實在不明白，大概說我思想開展而已。下一科考試，也不過距離一年半，或二年，在我不過十六七歲，也並不算遲呀。

讀書與看報

考過以後，我仍附讀於朱先生處，果能努力用功嗎？實在是未必。這時朱先生的事也太忙了，也東奔西走於別種事業，家裏的學生也漸少了。其間我又患了一場病，拋荒了幾及兩三個月。所讀的書，四書還好，常能背誦，五經大都背不出，我最怕的是書經與易經，講解也講解不來。習練作文（八股文），一個月不過做兩三篇，而且因為不常做，也怕做，真是「三日不彈，手生荊棘」了。

幸虧還有一件事，足以稍為補救的，便是喜歡看書。從小就看小說，幾部中國舊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東周列國」之類，却翻來翻去，看過幾遍。後來還看「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這些專談鬼狐的作品。這些小說書，蘇州人都稱之為「閒書」，不是正當的書，只供有閑階級，

作爲消遣而已。凡是青年子弟，嚴肅的家長是不許看的，而我却偏喜歡看此等書。

不過當時所謂正當的書，我也沒有秩序的讀過不少，「史記」是在「古文觀止」上讀過幾篇；漢書偶亦涉獵；看過「綱鑑易知錄」，與零零落落的「通鑑」；看過「三國演義」以後，很想看看正史的陳壽「三國志」，却沒有看到。偶亦看子書，「莊子」「墨子」，旨讀一陣，正所謂「抓到籃裏就是菜」，不管它懂不懂，讀下去再說。有時硬讀下去，讀到後面，居然前面也有些明白了。古人所云：「讀書不求甚解」，難道便是這種境界，或者就是他們所說的悟性嗎？

但是我家裏沒有書，要購買那些書來讀，那裏來這許多錢呢？這就感到從前舅祖吳清卿公所說的一句話：「讀書是要有資本的」了。那末上面所能讀到的書，不用說，都是借來的，或是在親戚人家偶然的機會中看到的。不過借來的書，人家要素還的；偶然在人家看到的書，即使你有一目十行的本領，也是很匆促的；這兩項總歸不是自由的，怎能可以供你細細的研究呢？

所以我所讀的書，是沒有系統的，不成整個的，甚而至於只是斷簡殘編，我就視在枕中秘笈了。但是當時習於制藝文的時代，有些老先生們，不許學生們看雜書的，因爲功令文中，譬如你的題目出在四書上，四書是周朝的書，就不許用周朝以後的典故，用了就有犯功令的。並且對於思想統制，大有關係，當時的士子，必須要崇奉儒教的，那所謂孔孟之道，倘然你相信了莊墨的學說，就是你「攻乎異端」，有違儒教了。

實在所謂莊、墨學說，當時我還不能明晰了解，我還喜歡看小說、筆記之類，容易懂得的雜書。這時國內很少圖書館，家庭間則多有藏書者，然也不肯輕易借給人看。我那時要看書，惟有向人情商借閱，至於廉價的書，只有自己購買一二了。親戚中，吾姑丈尤家，他們是個大家族，有許多書是公

共的，不好借出，只有吾表兄子青哥的書，可以借閱，而且他們很少我所愛看的雜書，因為我姑丈即不大許看雜書，舅祖吳家，藏書甚多，却有許多雜書，記得有一次，我發見他們一書櫥，都是那些筆記小說之類，這些都是鉛字印的，上海申報館一個附屬出版所，名曰「申昌書畫室」所印行的（如沈三白的「浮生六記」等，也是此時代刊物），我大為歡迎。所以我每跟祖母歸寧，不大肯回來（當時有伊耕表叔還指點我作文），就是捨不得他們這些雜書呀。

我對於報紙的知識，為時極早，八九歲的時候，已經對它有興趣。其時我們家裏，已經定了一份上海的「申報」，「申報」在蘇州，也沒有什麼分館、代派處之類，可是我們怎樣看到申報呢？乃是向信局裏定的，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開辦郵政，要寄信只有向信局裏寄。信局也不是全國都有的，只有幾個大都市可以通信。江浙兩省，因為商業繁盛之故，信局很密。蘇州和上海，更是交通頻繁，除書信以外，還有貨物。我記得一封，自蘇至滬，或自滬至蘇，信資是五十文，這個信資，例須收信人付的，如果寄信人已付了，信封背後寫上「信資付訖」四個字。

寄信多的商號和住宅，信寫好了，不必親自送信局，他們每天下午，自有信差來收取。這些信差，都是每天走熟了的，比後來郵局的信差還熟練（蘇州開信局的，大都是紹興人）。他們並沒有什麼掛號信、保險信，却是萬無一失。我們看上海出版的申報，就是向這班信差手中定的，不獨我們一家，在蘇州無論何人，要看「申報」，就非向信局信差定閱不可。

而且蘇州看到上海的「申報」，並不遲慢，昨天上午所出的報，今天下午三四點鐘，蘇州已可看到了，當時蘇滬之間，還沒有通行小火輪，火車更不必說了，如果是民船，就要三天工夫，怎麼能隔一天就可以寄到呢？原來這些信局裏，有特別快的法子，就是他們每天用一種「脚划船」飛送，所有

信件以及輕便的貨物，在十餘個鐘頭之間，蘇滬兩處，便可以送達呢。

「脚划船」是一種極小的船，船中只能容一人，至多也只能容兩人，在一個人的時候，不但手能划船，脚也能划船，所以稱之爲脚划船。它那種船，既輕且小，划槳又多，在內河中往來如飛。他們蘇州在夜間十點，或十一點鐘開船，明天下午一、兩點鐘，便可到達上海，上海也是夜間開船，明天到蘇州，則在中午以後。當時蘇州風氣未開，全城看上海「申報」的，恐怕還不到一百家，這一百份報，都是由信局從「脚划船」上帶來的，因此隔日便可以看報了。

我們所定的「申報」，就在每日下午三四點鐘，送到我們家裏。我當時還幼小，不知道「申報」兩字命名之所在，問我們家裏人道：「爲什麼叫申報呢？那個「申」字，作什麼解釋呢？」我們的顧氏表姊，那時也有十四五歲了，她自作聰明的答道：「申報是每天申時送來的，每天下午的三四點鐘，不正是申時嗎？」我那時還不大能讀報，但知道上海的「申報」來了，便有新聞可聽。

那時候，正在癸未、甲申年（即光緒九、十年）間，法蘭西和中國開戰，我們兒童的心理，也愛聽我國打勝仗。那個黑旗兵劉永福將軍，真是我們大大的愛國英雄，我們非常崇拜他。還聽到那些無稽不經之談，說劉永福把火藥裝在夜壺裏，大破法軍，那都是那些無知識的人，瞎造謠言。後來又聽得法國大將孤拔陣亡了，我們奪回了台灣的鷄籠山（按：即今之基隆），以及種種捷報的戰爭吃緊時，一見「申報」來了，我們總要請父親給我們講許多戰爭新聞與故事。

到了十四五歲時，我畧諳時事，愈加喜歡看報了。這時上海除「申報」以外，「新聞報」也出版了。蘇州看報的人，也漸漸多起來了，他們在蘇州都設了代理處，不必由信局派了。我家那時雖沒有定報，我就時零零散散買來看。跟着祖母到了桃塢吳家時，他們是定着長年的上海報紙的，始而看「

申報」，繼而看「新聞報」。而且我們這位清卿公，看過了報以後，不許丟掉，一個月訂成一冊，以便隨時翻閱，那時候的報紙，是用薄紙一面印的，不像現在的報紙，都是兩面印的（按：兩面印的報紙，由上海「中外日報」開始），所以仍可以作成綫裝。

這於我是大為歡迎，我每日下午垂暮時候，便到他們的帳房間裏去看報，竟成爲日常功課。那時的報紙，也像現代報紙一般，每天必有一篇論說，是文言的，這些論說，我簡直不大喜歡看，一般的論調，一般的篇幅，說來說去，就是這幾句話。從前的報紙，無論是新聞，無論是論說，都是不加圈點的，清卿公想出主意來了，教我每天把論說加以圈點，因爲這樣，一定對於文字上有進境。於是圈點論說，變成爲我每天一種功課。可是伊耕表叔却不贊成，他說：「這些報館八股，成爲一種陳腔濫調，學了它，使你一輩子跳不出它的圈子。」

自文衙弄至曹家巷

在我十五歲的下半年，家裏又遷居了，這回是從文衙弄遷居到曹家巷，仍在閭門內的一隅。

我們遷居的地址，是在曹家巷的東口，三條橋的埗。所謂三條橋者，是曲尺式的接連三條橋，一

條下面有河，可通船隻，兩條都在平地。蘇州城廂內外不知有多少橋，數也數不清。本來人稱蘇州爲東方的威尼斯，多了水，就多了橋咧。往往平地也有橋者，一定是這個地方是河浜，後來漸次填平了，而橋的舊址與其名稱，却依然存在：

我們所租住的房子，却也是一家故舊的大宅。房主人李姓，他們是大族，現在是子孫式微，便把這座大宅子分析，於是你佔內廳，我佔花廳，好似一個國家，成爲割據局面，爲了自己靠了那些租傳的房屋，以之出租，可以不勞而獲，於經濟上有所進益，於是各將分得的一部份房屋，紛紛出租。因此我們所住居的這座大宅子，同居的人家，總共有二十餘家，比了以前，在桃花塢姚宅所住的房子，更見複雜。

我們所住的是東首一個樓廳，這個樓廳，他們也稱之爲花廳，實在庭前只有一堆亂石砌的假山，幾叢雜蒔的花木而已。房東告訴我：「這裏文徵明也住過。」還指給我看，這個廳上，有一塊匾額，寫着「蘅蕪小築」，也是文衡山的手筆，我笑說：「我們剛從文衙弄遷居來，此間又說文徵明住過，何與文氏有緣若此耶？」其實考諸里乘，文待詔從未住過，大約有此一塊匾額所題的字，便附會上去，似乎是有光門楣了。

我的房東李先生，年已六十餘，老夫婦兩人，膝下僅有一女，年可十八九，並無兒子，我們租住他們的房子，只是樓下一間，樓上三間，廚房公用，自我出生以來，從花橋巷，而劉家浜，而桃花塢，而文衙弄，而曹家巷，至此凡五遷了。但每遷必住居樓房，因爲祖母喜歡樓房，爲的是樓房高爽，平屋則未免潮濕陰暗，尤其對於江南那些故宅老房子爲甚。

在這房子裏，最使我愴痛的，便是我的父親，在這屋子裏逝世了。其它還有兩件事，一是我的胞

姊，在這屋子裏出嫁；一是我在這屋子裏進了學，成爲一個窮秀才。還有附帶的是我在這屋子裏生了兩場病。

我的身體素來很弱，年幼時就有了胃病，不能多吃，多吃了胃裏便要脹痛，這個病一直到了壯年，在北方住了幾年，却好起來了。在十歲以前，我每次吃飯，只吃一小碗。蘇州人家，前從還不吃白米，只吃一種黃米，更容易消化。我又不喜歡吃肉（此言豬肉），偶吃一點，非極精不可。最愛吃的是蝦與蛋，但蛋又不能溏黃的，假使清晨吃兩個「水鋪雞蛋」（此北京稱爲臥果兒），胃裏就要一天不舒服。此外麵條也不能吃，看人家吃大肉麵，爆魚麵，以及各種各樣的麵，深訝人家怎麼有這樣的好胃口，不過到了後來，我就什麼都可以吃了。

因此我是消瘦的，不是壯健的，親戚中有人說：因我的祖母和母親太鍾愛之故，吃東西非常謹慎，不敢給我多吃，以致慣成如此。也有人說，是母體所關，我母親是多病的、瘦弱的，所以先天不足。其實都無關，一個兒童，總有他的特性，不過我到十四五歲，就沒有什麼大病，偶或受點感冒，傷風咳嗽，過一兩天就好了。就說是胃病吧，不吃夜飯，安睡一夜，到明天也會好了的。所奇者，我的胃病却與天氣有關，風日晴和的時候還好，假使在淒風陰雨的天氣，我便要戒嚴了。硯農表叔是懂得醫道的，他傳來一方，用「小青皮」（中藥名，即橘之未成熟者）磨汁沖服，就可愈了，試之果驗。

但在十六歲的初春，這一場病却不小，先是出痧子（這個病，別的地方稱爲出疹子，蘇州人却稱爲痧子），後來腮下却生了一個癰。本來這個痧疹，每人都要出一回的，尤其在兒童時代。但這個病是有免疫性的，出過了一回，便無妨碍，沒有出過的，便容易傳染。我在年幼時，每遇家中人或鄰居有出痧子的，祖母或是母親，帶了我，避居到舅祖家或是外祖家去，所以直到現在十六歲，還不會傳

染過。可是到底不能避免，此刻却傳染來了。

起初不會知道，後來方知住在我們後進的李家，有一位十三歲的女孩子，先我在出痧子，我這次的病，來勢很兇，家中人急得不得了。至此，方知論語上孔老夫子所說的「父母惟其疾之憂」的這句話的真切。那時父親失業，家中已貧困不堪，然而他們典質所有，爲我療病。這一年在蘇州，兒童們因痧疹而死亡者很不少，他們心中更焦急，幸而痧子愈了，在腮下近顎處，生下一個癰，腫痛非常，有人說：這叫做「穿腮癰」，說不定把右腮潰爛到洞穿了。實在是痧毒未清，須要開刀，天天到外科醫生吳召棠那裏去醫治，這一病，足足病了近三個月。

病愈了，也沒有到朱先生處上課，一病以後，學業也就荒疏了。但是在家裏，也很感到寂寞，不比在朱老師處，他們家裏人多，而且還有同學。家裏和我同伴的僅有姊姊一人，但她正習女紅，幫母親理家事，她已訂婚許氏，不久也就要出嫁了。同居的這位李小姐，她是婉妙而活潑的，長日間，惟有伴母親刺繡。我無聊之極，常到她們那裏去聊天，在她們飯罷繡餘，有時講講故事，有時弄弄骨牌，倒成了一個伴侶。那時她已十九歲，早已訂婚了，我僅十六歲，她常呼我爲弟，我在這時候，對於異性，不免漸萌愛意。

就在同個宅子裏，我們的隔鄰，開了一家紗緞莊，莊名叫做恆興。這些紗緞莊，在蘇州城內是很多的，大概有百餘家，因爲蘇州是絲織物出產區呀，紗與緞是兩種織物，行銷於本地、全國以及國外。（有一種織成的紗，都銷行於朝鮮，因爲當時朝鮮的官僚貴族，都以白色紗服爲外帔，恆興莊所織之紗，都外銷於此）這種紗緞莊，只做批發，不銷門市，大小隨資本而異，亦有數家，在蘇州是牌子，海內著名，但像我們鄰家的恆興莊，只不過此業的中型者而已。

舊日的蘇州對於職業問題，有幾句口號：「一讀書、二學醫、三去種田、四織機。」關於種田與織機，是屬於農工的，但屬於住居城內的大戶人家，却變為「收租」與開「絲帳房」。（絲帳房即是營絲織物機構之統稱）所以織機亦是蘇州最正當的一業。那時中國還沒有大規模的織綢廠，而所有織綢的機器，都是木機，都屬於私人所有的。這些私家個人的機器，而他們有技術可以織成紗、綢、緞各種絲織物的人家，蘇人稱之為「機戶」。這些機戶，在蘇州城廂內外，共有一千數百家。

實在，紗緞莊是資本家，而機戶則是勞動者。更說明一點，紗緞莊是商，而機戶是工。一切材料，都由紗緞莊預備好了，然後發給機戶去織，機戶則限定日期，織成紗緞，交還紗緞莊，才由紗緞莊銷行到各行莊去。有的是各莊預備了的存貨，推銷各埠；有的是各處客幫訂下來的定貨，規定了顏色、花樣的。這個行業，從前在蘇州可不小呀！

那些織機的機工，都住在東鄉一帶，像蠡市、蠡口等鄉鎮也很多，近的也在齊門、裏門內外。所以那些紗緞莊，也都開設在東城，像曹家巷我們鄰居的一家，已在城裏偏西的了。織機的雖是男女都有，但還是男人佔多數，因為那是要從小就學習的，織出來的綢緞，燦爛閃亮，五色紛披，誰知道都是出於那班面目黧黑的鄉下人之手呢？

這家紗緞莊，因為是鄰居，我常去游玩，結交了兩個小朋友。他們都在十七八歲，是個練習生之類。一位姓石，還是蘇州從前一位狀元石韞玉的後代。他曾經送過我石殿撰親筆書寫的試帖詩兩本，那是白摺子式的小楷，可惜我已經遺失了。他的家裏我也去過，住在清嘉坊，踏進大門，茶廳上還有「狀元及第」三字的一塊匾，雖然紅底金字，已經黯然無光了。還有一位張潤生，是個徽州人，家裏開了一爿漆店（按：蘇州徽幫極多，除了典當朝奉以外，有各種商業，都屬於徽，漆業其一也），他

長我兩歲，識字有限，而爲人幹練，但常向我執卷問字。這位朋友，相隔了三十年，不通音問，忽有一天，探尋到我家來（時我已住居上海），他說：他的兒子結婚了，請我去吃喜酒。詢其行藏，却在上海某一鉅商家裏，當一舊式的西席老夫子，奇哉！

面 試

十六歲的春天，病了一場，這上半年的學業，全荒廢了。其實這個年紀，是一生求學最嚴重的時代，在學校制度上，當進入高中了。父母因爲我病已告痊，實爲大幸，也不來督責我。並且我也在家不大出門，朱先生那裏也不去，也沒有什麼同學朋友往來。不過我的學業雖不進，我的知識當然隨年齡而自然增長了。我仍舊喜歡看雜書和小說，這時候，中國的雜誌也尚未流行，我於小說，不論什麼都看，甚至至於彈詞與唱本。母親不甚識字，而喜聽那些悲歌離合的故事，在她深夜作女紅的時候，我常常在燈下唱給她聽。

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上海出有一種石印的「點石齋畫報」，我最喜歡看了。本來兒童最喜歡看畫，而這個畫報，即是成人也喜歡看的。每逢出版，寄到蘇州來時，我寧可省下了點心錢，必須去購

買一冊，這是每十天出一冊，積十冊便可以綫裝成一本，我當時就有裝訂成好幾本，雖然那些畫師也沒有什麼博識，可是在畫上也可以得着一點常識。因為上海那個地方是開風氣之先的，外國的什麼新發明，新事物，都是先傳到上海。譬如像輪船、火車，內地人當時都沒有見過的，有它一編在手，可以領畧了。風土、習俗，各處有什麼不同的，也有了一個印象。其時，外國已經有了汽球了，畫報上也畫了出來。有一次，畫報上說：外國已有了飛艇，可是畫出來的是有帆、有槳、有舵，還裝上了兩翅膀，人家以為飛艇就是如此，而不知這是畫師的意匠。（飛機初時傳至中國，譯者譯之為飛艇，畫者未見過飛機，以為既名為艇，當然有帆有舵了。）後來在上海辦雜誌，忽發思古之幽情，也想仿效「點石齋畫報」那樣辦一種，搞來搞去搞不好，無他，時代不同，頗難勉強也。

我以為無錢買新書，只能常跑舊書店。那時舊書店裏舊書，還沒有像後來奇貨可居，但是大部的舊書，我還是買不起的，只是那些小部的，普通的，刻印得不精的。每一舊書店，往往在門前擺一個舊書攤，一條護龍街上，有幾十家舊書店（有的還帶賣小品舊貨），我則常常巡禮於那些舊書攤，而獵取我所欲得的書。

我在舊書攤上，購的書倒也不少。較古的什麼「世說新語」、「唐代叢書」等等，較新的什麼「隨園詩話」、「兩般秋雨庵隨筆」部等，還有許多殘缺不全，破碎不完整的，我也兼蓄並收，以價較便宜，不過制錢數十文，或僅十餘文，本來人家已是字紙笠中的物，我却抱人棄我取的心。偶然出門帶一根「錢籌」（按，當時墨西哥銀圓已流行於蘇州，而並無輔幣，却有所謂錢籌，削竹為之，每根為二百文，由各錢莊所發行，雖製作甚簡陋，而信用甚著），回來可以購得一大捆。

但我不大量的買，只是今日買一兩冊，明日又買一兩冊，護龍街幾家舊書店，都認得我的，因為

我不是買大部的書，精印的書，而只在冷攤上，拾取殘編斷簡，這並不是什麼好主顧。但是那些擺在攤上的書，幾經風吹日晒，久已置之度外，而看我只是一個書房裏的學生，也就馬馬虎虎了，可是雖然日購一兩冊，積之已久，成了幾大堆。又沒有好好地一個書房，好好地一個書櫥，於是弄得桌上、椅上、榻上、床上，都是那些長長短短，厚厚薄薄，破破爛爛，殘缺不全的書了。

有一次，我在一個舊書攤上，見有「李笠翁十種曲」，但殘缺不全的，只有半部。我想半部也好，十種曲不是就有了五種嗎？因為殘缺，自然取價甚廉。携回家去翻翻，連「風箏誤」也在其內，甚為高興。乃過了一月，在另一家舊書攤上，又發見了半部，這正是我所缺少的，遂即購之而歸，當然價甚便宜，正不知道一部書爲什麼分了兩個舊書攤呢。

即如沈三白（復）的「浮生六記」（在「獨悟庵叢鈔」中），我也是在冷攤上購得的，這時上海的「申昌書畫室」用鉛字版（當時名爲「聚珍版」）印了不少的書，我所購的有「西青散記」、「三異筆談」、「解頤錄」、「快心編」，……亦爲數不少。「浮生六記」缺二記，久覓不得，東吳大學教授黃摩西（常熟人）出一小雜誌名「雁來紅」轉載之，而上海書賈又翻印之。世界書局的王均卿（文濡）僞造二記，人不知覺，連林語堂亦爲所蔽。五十年後，沈三白忽走紅，家喻戶曉，而且大攝其電影呢。

十六歲的下半年，博覽羣書，把當時視爲正當的作舉業文的功課都拋荒了。可是巽甫姑丈很注意我，不過他自己常常病倒在床。即使不病的時候，也是一燈相對，懶得出門，從前一年還到我家來幾回，看望我的祖母，現在他自己不來，却派子青表哥來看望外祖母，常常的小有獻贈，以娛老人。

有一次，子青哥來看望外祖母，我正借着一部大版石印繡像的「紅樓夢」，在大研究其紅學，被

他瞥見了。又見我家頭許許多多破破爛爛的筆記小說，他覺得全都不是正當的書。子青哥比我大兩歲，今年十八歲，却擺出個道學先生的架子，他當時即向我說：「父親的意思，勸吾弟少看那些小說與雜書，恐因此拋荒了正業。」我不禁爲之面赤。什麼父親的意思？全是他的意思，姑丈又沒跟他來，怎麼知道我在看「紅樓夢」呢？但他對於我這忠告良言，我怎能埋怨他呢？

過不了幾天，巽甫姑丈寫信來了，他請我到他那裏去談談。我想：這是東窗事發了，必定這子青哥回去告訴了他，我在看「紅樓夢」和雜書。「醜媳婦總要見公婆」，我只得硬着頭皮去了。他倒並不譴責我看「紅樓夢」和雜書，他只查問我近來做了幾篇制藝文。可憐我這幾個月內，實在沒有動過筆。

他諄諄告誡：「你的家境不好，而你的祖母與雙親，企望你甚殷。你既然不習業做生意，讀書人至少先進一個學，方算是基本。上次考試，你的年紀太小，原是觀觀場的意思，下一次，可就要認真了。那種八股文，我也知道是無甚意義的，而且是束縛人的才智的，但是敲門之磚，國家要憑藉這個東西取士，就教你不得走這條路了。而且許多寒士，也都以此爲出路，作爲進身之階，你不能不知這一點。」

我被他說得眼淚也要掛下來了，我說：「姑丈的話，是藥石之言，我今後當加倍用功。現在請姑丈出兩個題目，我去做來，兩三天交卷，請姑丈批閱。」他想一想，說道：「這樣吧！你後天上午到我這裏來，在這裏吃飯，吃飯以後，我出一個題目，你就在這裏做，我看看你的程度究竟如何。」

我想：他是面試我了。出了題目拿回去做，還可以挨延時刻，翻閱書本，到他這裏來做，真是使我「白戰不許持寸鐵」了。沒有法子。到了後天，只得去了。吃過飯後，他出了一個題目，教我去做

，他說：不必全篇，只做一個起講。題目本不難，但我在此一暴十寒之後，思想遲滯，又在他監視之下，頗爲枯窘。不得已，寫好一個起講，送給姑丈去看。他看了以後，便不客氣的指出：這個地方不對，那個地方不對。他却不動筆給我改正，要我把他所說不對的地方，自己去改正。

他說：「你以後每五天來一次，也像今天一樣，在我這裏吃飯，飯後，我出題給你做，不必要全篇，半篇也可，一個起講也可。」臨走時，他又給了我幾本明朝文的制藝，和清初文的制藝，教我去揣摩細讀。我覺得這種文章，都是清淡無味，如何算得名文。原來當時的制藝八股文，也分兩派，一派是做清文章的，一派是做濃文章的，做得好，清的濃的都好。譬如名厨做菜，做得好，清湯也好，紅燒也好。異甫姑丈是做清文章的，尤其是小題文（題目一句、兩句），人稱名手，不過大題文（題目一章、兩章），便不是他的拿手了。我在他那裏作文數次，出了一個題目，先把題目的正文，以及上下文講解一次，然後讓我去下筆。他說：「先要明白題旨，然後方能理路清楚，理路清楚以後，文機自然來了。」

那時考試的制藝，流行一種惡習，往往出了那種「搭題」。所謂「搭題」者，把四書上的上面半句，搭到了下面半句，或是上節的末一句，搭到了下節的首一句。有絕不相關者，名之曰「無情搭」。相傳俞曲園（樾）放學政時，曾出過這類題目，如「王速出令，反，」與「君夫人、陽貨欲」等等怪題目，以此壞了官。又有某主試曾出一搭題爲「以杖叩其脛，闕黨童子。」那個考試的童生寫道：「一叩而原壤驚矣，再叩而原壤昏矣，三叩而原壤死矣，三魂渺渺，六魄悠悠，一陣清風，化而爲闕黨童子矣。」四五百年來，此種關於八股取士的笑話極多。現在此制既廢，不必爲死人算命，徒多詞費了。

可是異甫姑丈所出的題目，却不會出過搭題，這是我所高興的，但也有我所厭煩的，就是做的不

對，要我重做。我對於重做怕極了，我情願另出一題目，別做一篇，而不願以原題目重做。但他却要逼我非重做不可，寧可少做一點也好。這三個月以來，我的確有些進境，一題在手，不像以前的枯窘了。從前因為想不出如何做，所以也頗怕作文，現在也不怕，就要想出一個題旨來了。姑丈又嫌我做得慢，要練習得加快一點，不要過於矜持，想到便信筆直書，但寫出以後，又必須自行檢點一過，有不對的地方，必須改過。但三個月以後，姑丈的舊病又發，我的面試，也因此中止。

父親逝世之年

十七歲，是我慘痛的歷史，乃是我父親逝世之年了。

我父親平日身體也很好，不過精神是不大舒適，憂傷壓迫着他過日子。自從在湖北應城縣回來後，並無固定的職業，即使有所貿易，亦往往失利。更不肯仰面求人，也曾有人舉薦他到某一商業機構中去服務，但他又不肯小就。人越窮，志氣越傲，而且又好評論人、指摘人，在這樣一種腐惡的社會上，他是失敗了。

我們是一點產業也沒有，說一句現在流行話，真可以稱之爲「無產階級」。雖然在我們會祖時代

，經營米業，亦爲鉅商，但經過太平天國之戰，已經掃蕩得精光大吉了，我父即使在有餘資的時候，也不想置產。卽居屋而言，在當時蘇州買屋極廉宜，建屋亦不貴，但他寧可租屋居住，而不願自置產業。他以爲自置一屋，是固定的，反不如租屋居住，是流動性的，如果嫌此屋不好，立刻可以遷居。並且他既不事生產，而又不善居積，在從前讀書人中，往往稱之爲名士派，而他是商業中人，也似沾染了名士派的習氣，便這樣的窮下來了。

那時候，蘇州也有一種投機事業。什麼投機事業呢？原來那時銀行制度還沒有流行到中國來，所有金融事業，都握在幾家大錢莊手裏，這時幣制有三種，一曰制錢，二曰銀兩，三曰洋圓。制錢卽銅錢，外圓內方，古人稱之爲孔方兄，現已不經見了。銀兩卽當時所行用生銀制度，以兩爲單位，亦有鑄成爲元寶者。洋圓（每寫作元）便是已盛行於中國東南各省的墨西哥銀圓。

但此三種幣值的比例，時生差異。譬如當時每一洋錢，兌換制錢一千文，而有時爲九百八十文，亦有時爲一千〇二十文，甚至有時長至一千一百文。銀兩與洋錢有比率，制錢與銀兩亦有比率，此中升降，商人卽因之做交易。於是出錢入洋，出洋入銀，而以之投機生利，但憑口頭一語，不必有實物者，謂之「買空賣空」。當時買空賣空，頗爲盛行，顯然是公開的，其實則近於賭博，蘇滬一帶，名之爲「做露水」。

做露水的地方，蘇州則在閶門內東中市的錢業公所。我曾隨父親往觀，上下午兩市，其熱鬧不亞於上海後來之交易所。父親向他們說：「買進洋錢三千元。」但憑一句話，並無片紙隻字作爲憑證。我初不解，父親何以有力買進洋錢三千元呢？何以一句話就可以算數呢？不到半個鐘頭，父親對我說：「已賺錢了。」我的兒童心理，覺得這樣賺錢真太容易，又覺得但憑一句話，父親的信用未免太好

了。當然父親是錢業出身，是個內行，他有遠識，對此可以稱爲「億則屢中」。然而這到底近於賭博，有許多朋友做露水，弄到跌倒爬弗起，甚而至於亡家破產者，比比皆是。所以祖母知道了禁止他，母親也勸阻他。但父親也不過小試其技，不敢作此投機呢。

又有一次，舅祖清卿公，以父親無固定職業，邀他到他的家中，佐理他們的田業事務。此種田業事務，是管理收租、催租，一切也很爲紛繁的。那時蘇州紳富人家，家家都有田地，以爲這是保產最好方法，不勞而穫，家中設立賬房，開倉收租，經營其事者，名曰「吃知數飯」。但父親沒有耐心於此業，而又是外行，意欲不往，然迫於甥舅之誼，重以祖母之命，又不得不往。可是未及三閱月即歸，託言有病，因爲父親生性梗直，不值其舅之所爲，謂其既富且吝，壓迫農民。且常欲以其理論，教訓我父，父親實不能忍受也。

父親的憂傷憔悴，固然是他早死的原因，而在他病後的醫藥雜投，當有絕大關係。他害的是一種痢疾，時間是在初秋，在現代說來，痢疾並非不治之症，只要醫治得法，立可痊愈。何況現在中外醫藥界，有種種的新發明，痢疾也有專治的藥品。但那時却談不到此。起初父親不要請醫生診視，自然也爲了省錢，且以爲不久就可以痊愈的。及至後來病勢厲害，大家都發急了，家中人又都沒有醫學常識的，「病急亂投醫」，請了這個醫生，未能見效，又請另一個醫生，這與病人是太不相宜了。

難然蘇州那時已有了外國教會所辦的醫院，用西法治病，但大家都不相信它。害了病，還是要中國醫生診視，而我所最恨者，要是換了一個醫生，必定把前一個醫生所開的藥方推翻，只有他所開的方子是對的，別人所開的方子都是不對的，再換一個醫生，也是如此。醫生越換越多，各人的見解，越是不同，弄的病家無所適從，到底聽了那個醫生對呢？而一個病人睡在牀上，做了他們互相爭競的

目的物了。

當時我父親病了十餘天，身體已虛弱不堪了。一個醫生道：「不能再打下他的食滯了，須要用補藥，補他的虧損了。」另一個醫生道：「我父親的病體，是虛不受補，現在吃的補藥，把病邪補住了，須將所吃的補藥剝去，再行施治。」試想：這樣不是教病人太苦了嗎？但我父親已自知不起，堅不肯吃藥，母親苦勸不聽。及至祖母臨牀，他回念自己是一個遺腹子，幸賴寡母撫育長大，未曾有所報答，不禁淚泫泫下，祖母要他吃藥，他就吃了。

上半年，姊姊出嫁，父親以向平之願，了去一半，姊丈許嘉淦（號杏生），也是一位讀書人（父親不相信商業中人），頗爲溫文爾雅，比我長兩歲，筆下比我好。雖然我們家道很拮据，勉強湊付，也得一副不太簡陋的奩具。姊丈早孤，有兩兄，不事生產，所以常來我家，和我討論文字，吾父願而樂之，以爲郎舅至戚，在文字相切磋，不是更爲相得嗎？

不想下半年父親就病了，病而至不起，寧非意外的慘傷，那種悲痛的事，到現在已近六十年了，想起來，真是非常摧心。我當時還有一種感想：祖父在三十多歲已故世了，父親在四十多歲亦故世了（故世時四十五歲，我今日寫此稿時，正是一百歲），遺傳下來，我的壽命，也不會長吧。但我今日忽忽年華，已是七十多歲了，人家還恭維我得天獨厚，老而彌健，但我了無建樹，只是虛度一生而已。

寫到此，想起一件事，在我四十多歲時，在上海有一位老友管君，招攬我人壽保險，我那時筆耕所入，每歲收穫，尙有餘資，而子女衆多，念此亦等於儲蓄之一途，乃欣然應命，擬以五千元投保二十年。這是上海一家著名之英國保險公司。保壽險先得要檢驗身體，這是我所知道的，於是管君陪我該到公司所指定的外國醫生處檢驗。這個外國醫生，我也不知道是英國人、美國人，聽心臟，驗小

便，又用小榔頭，敲我膝蓋，令其反應，問我：「曾患過性病否？」對他說：「沒有。」鬧了一陣子，管君說：「三四天後，保證書就可出來了。」乃遲至兩星期，未有回音，我以電話問管君，管君支吾其詞，我情知不妙。管君說：即來訪我。我說：「生死有命，孔子所云，大概我是不及格了，兄亦無須諱言。」管君說：「不！我知道該公司檢驗身體者，不止一醫生，我現已知道有另一醫生，我們明日再往檢驗可也。」我此時甚為心灰，由管君強而後可。則此醫生，年齡已老，白鬚垂胸，云是法國人，檢驗也未如前醫生之苛細。驗後，管君私問之，醫言：「大致可及格。」果然，三日以後，保證書即到了。這保險到了我六十六歲滿期，連息得七千餘元，足為長兒留學德國之需，亦云幸矣。

父親逝世之日，尤其使我痛心的，他要我讀書，至少也得青一衿。假使父親今秋不死，本年我可以徼倖進學，也未可知。因為吳甫姑丈會說以常理而論，可以獲售，但要觀看文章的人目光如何。因為考場中看文章，有如走馬看花，而這一叢花，不是特別惹人注目的花，也許是欣賞了，也許是錯過了，這要看你運氣如何了，因為照文字而言，也在可中式與不可中式之間呀，如果父親遲一年故世，而我於今年進學，不是稍慰了他在天之靈嗎？

父親逝世以後

家中本已困窘，在父親病中，母親所有剩餘的一點衣飾，也典質淨盡了。父親身後的料理，亦極爲簡約，但我們還是一個中等人家，而且都是高貴的親戚，那些普通的場面，還是要的。必須開一個弔，出一個殯，從前沒有什麼殯儀館，停柩在家三十五天，這些封建時代的排場，必須應有盡有。「禮記」上說：「喪禮，稱家之有無。」但我們受孔子戒的人，都服膺於「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我想父親最後一件事了，也未可過於落薄。

父親喪事，正可以算的羅雀掘鼠，我也不忍言了。本來還就讀於朱先生處，到此便踏出學堂門，不再是一個學生了。如果我在十三、四歲時，學了生意，到了這時，三年滿師，也可以當小夥計，每月掙到一兩塊錢，但我讀了死書，一無所獲，真是「百無一用是書生」，以後將如何度日呢？父親在世之日，雖然也是日處窮鄉，却是父親挑了這家庭的担子去，現在這副担子，是落在我肩膀上了。

蘇州有很多慈善濟貧事業，有所謂「儒寡會」者，一個窮讀書人故世了，無以爲生，他的孤寡可以領一筆卹金。各業中也都有救濟會，以錢業中爲最優。親戚中頗有爲我們籌劃領取此種卹金者，我抵死拒絕。父親是個商人，不能冒充讀書人，入什麼「儒寡會」。至於錢業中的卹金，父親在世，深恨錢業，況且脫離已久，假如我們要用錢業中一個小錢，使我父親死不瞑目，我實在是個不孝罪孽之子了。

舅祖清卿公，他當時是號稱蘇州首富的，他答應每月資助我們數元，我也婉謝了。我說：「你與我的祖母爲同胞姊弟關係，每月送祖母幾塊錢，我們不能拒絕，祖母實在太苦了，此外我們將自行設

法。」雖然說是自行設法，但我一個十七歲讀死書的人，將怎樣的自行設法呢？後來清卿公每月送祖母兩元，在他也算厚惠了。

於是我家開門授徒，做起教師先生來了，一個十七歲的小先生，有誰來請教呢？第一節，收到了一個學生，那個學生，却是一位女學生。原來住在我們一宅的，裏面一家姓潘的，也是書香人家。這位潘先生，有位女公子，今年九歲了，父母鍾愛，想要她讀一點書，而又不願送她到宅子外面的私塾裏去。本來想明年請一位先生，所以一說就成功，而我做了牡丹亭裏的陳最良了。

寫到這裏，我有一個插話了，我自從教過這位潘小姐後，一直沒有教過女學生。却自從山東青州府（今益都縣）辦了學校，回到上海以後，却在各女學校裏教書，女學生不計其數，現在所記得的，如黃任之夫人、楊千里夫人、顧樹森夫人、宋春舫夫人等等，都是我的女學生。那末最先的這位潘小姐，比例這些武俠小說所說的，當是我的「開山門」女弟子吧？

其時潘小姐的束脩，是每月一元。那時候，地方上周郵寒士者，還有一種書院膏火。蘇州有三個書院，其它兩個，童生不能考，只有一個平江書院，專為童生所考，考一超等，得銀七錢（約合制錢一千文），特等減半。但也不大容易考取，有已進學的高材生，也冒充童生來考取呀。

後來我認得一個舊同學，他是糧道衙門一書吏之子，他們有一種糧冊，要發給人抄寫。字不必寫得工整，但是要寫楷書，大約是三分錢一千字，我若認真寫，自早至晚，每天可寫五千字，不是每天有一角五分的進款嗎？這比考平江書院的卷子還可靠得多了。可惜那不是常有的，難然每千字僅有三分，還是搶寫者紛紛的，只費點筆墨而已。

其實，自從父親故世以後，不是我挑了一副家庭生活担子，而是母親挑了一副家庭生活担子。她

在親戚中，一向有針神之譽，她的女紅，是精細而優美的，就在父親沒有故世之前，我們在窘鄉中，她就她的女紅所得，取出來儘量補助家用，父親故世後，幾乎全靠她的女紅收入了。

蘇州的繡品是出名的，有些顧繡莊，放出來給人家去刺繡，但工資却微薄。繡一雙衣袖（都是行銷到內地各省、各區，為婦女官服披風上用的）不過制錢二百八十文，而工夫非三天不可。但母親則日以繼夜，只兩天就完工了。蘇州人家，嫁女必備繡品，尤以新牀上的裝飾為多。如在牀的中間，掛有「發祿袋」（其典未考），兩傍則有如意、花籃、插瓶等等，都是繡品，都須描龍繡鳳，極為花團錦簇。或誇示新嫁娘的針線精妙，其實都是牀頭捉刀人所為。親戚家知我母親擅於製此，轉輾相託，如此忙了一個多月，也可以獲得十餘元。我正讀唐詩，讀到了「苦恨年年壓針線，為他人作嫁衣裳」之句，因想這正為吾母詠的了。

不過這都是臨時性質的，不能固定有那種收入，但我母親的女紅是不斷的。我們的同居，不是有一家紗緞莊嗎？這紗緞莊把所練成的「紗經」或「緞經」放出去，給女工們絡在軸轆上，厥名謂之「調經」，一束經，謂之一和（這是絲織品家的術語），調紗經一和，可得五文，緞經一和，可得十文，不過此種工作，限時限刻，今日取了，明日必須交去，有時須整夜工作（凡絲織物直線為經、橫線為緯，這裏所謂經，即是直線）。

祖母年已六十餘了，她也要工作，她也要調經，勸之不聽。於是母親取得淺色的經，如雪白、湖色、蜜黃的經，都與祖母。深色的經，如黑色、墨綠、深藍的經，都歸自己，因祖母年老，目力不濟呀。又母親和我商定，即清卿公每月給與祖母的二元，歸祖母零用，我們家用中，不能再用它。但此兩元中，仍有大一半祖母供給我用，如吃點心呢，買糕餅呢，添小菜呢，都是為她們所鍾愛的這個孫

兒而花費的。

這幾年來，我們總算得是茹苦含辛了，但我並不算苦，苦的只是母親。她一天到晚，不過睡四五個鐘頭，其他時間，都是工作。可是生活倒也安定，那時生活程度，已比我六七歲的時候高得多了。我們一家，每月五六塊錢的開支，再也不能少了，房租近兩元，飯菜約三元（這是祖母、母親和我三人的食用），其它還有雜用，我們在衣、食、住、行四者之中，只有食與住兩個字，衣服不能添做，走路只靠兩腳了。

我家有一個規範，無論如何貧窮，不得借債。所以父親在日，雖常處窘鄉，也不肯向人告貸，我也遵守父訓，一生從未舉債。實在到不得已時，甚而幾及斷炊，則惟有典質度日。因此那些高牆頭，石庫門的當舖，我常常光顧呢。我們這時已家無女傭，祖母和母親都是纏過腳的，不能上街，「舉鼎觀畫」（此本為戲劇名，時人喻之為上當舖），我常演此劇，凡衣袖中可藏之小品（如首飾等），則可坦然直入，但衣服之類（父親衣服極多，皮衣服大毛，小毛俱全），則挾一大包袱，如遇熟人頗露窘態。既而思之，「我還搭少爺架子嗎？」便也夷然自若了。

那時的家庭生計，起初很覺得困難，後來有一個安排，倒也不覺得什麼了。有時每一個月中，反而有盈餘，於是把典質去的衣物，贖些出來。「贖當頭」是高興的事，從前有個寒士，改了古人詩句道：「萬事不如錢在手，一年幾見贖當頭」，可發一噱。不過在這家庭預算，也常常有突出來的事，譬如送禮，蘇州人家是講究交際的，所謂「禮尚往來」。父親開弔時，收了人家的禮，現在人家有喜慶喪的事，我們可以不送禮嗎？普通也得二百八十文送一張禮票。我家現在雖處困境，還是要面子，不願在這個封建社會上被扔下來。

這個家庭的担負，大概我担任了十分之三，母親担任了十分之七，第二節，我又收了兩個學生，連潘小姐共有每月兩元的收入，考書院、鈔寫糧冊，那是例外的。我覺得母親這樣的勞苦，心中實在不忍，然而又無可如何。可是有一個奇蹟，母親是有肺病的，在我年幼時，肺病常發，並且咯血，可是現在如此勞苦，身體反而堅強，其實即有小病，她也忍耐過去了。我們親戚中，沒有一個不稱讚母親賢德的，他們說：「我母親的不病，真是天佑善人。」

適館授餐

我十八歲的春天，便到人家去當西席老夫子了。這個館地，是吳偉成表叔所介紹的（偉成叔是上海現在名西醫吳旭丹的父親）。祖母的母家，不僅是桃花塢吳宅一家，還有史家巷吳宅一家，他們都是所謂縉紳門第，貴族家庭，我記得那時張仲仁先生（一塵）尚館在他家。其實，我們在桃花塢與史家巷親戚關係是一樣的，不過其間畧有親疏之分罷了。

在新年裏，偉成叔來向我祖母拜年，便談起了這事，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張檢香，他家裏要請一位教讀先生，曾經請他物色。他們有三個男孩子，大的不到十歲，小的只有五六歲，剛纔上學。他想介

紹這個館地給我。雖然他們束脩出得少，但他們是個縉紳人家，一切供應，都是很優待的。祖母聽了很願意，不過說：「年紀輕，交新年不過十八歲，要是他父親不故世，自己還在學堂裏呢。」偉成叔說：「不妨事！表姪年紀雖輕，我覺得他很老成持重，況且那邊的學生，年紀都小，正在開蒙時候呀。」謝謝偉成叔的兩面說合，我這個館地便成功了。談定每年束脩二十四元，三節加節敬，每節二元。

如果我在家開門授徒，所入可不止此數，因為已有幾個學生，在去年說定，要來就學，至少每月也有三四元。但是祖母和母親的意思，寧可讓我到外面去處館，第一是爲了吃的問題，因爲到人家去處館，就吃了別人家的了，所謂適館授餐，蘇州人家請先生，對於先生的膳食，特別優待，以示崇敬，正合乎論語上所說：「有酒食，先生饌」了。我家也請過先生，知道這個規矩的。

我的館主人張檢香，他們住居於因果巷（蘇州人念爲鸚哥巷），在城的中心點。這個宅子很大，而他的父親也是兩榜，做過京官的，現在已經故世了而只生下檢香一子。檢香也是讀書人，也會進過學，所謂書香門第。但現在不求上進，做一個保產之子，人極規矩，一點嗜好也沒有。蘇州的有產階級中，像他這樣的人很多。這種人，大家說他真能享福的。

選定了正月二十日爲開學日期，屆時他們用轎子來接，舉行拜師之禮，儀式頗爲隆重。還端正了一席菜，請了幾位陪客，偉成表叔當然列席，而先生則坐了首席（蘇俗敬師，家有宴會，老師總是坐首席的）。那個書房，也很寬敞，是一個三開間的廳堂，用書畫窗隔開了一間，作爲先生的臥房，其餘兩間，都是書房，倒也窗明几淨。臥房預備先生住宿，臥具非常精潔，那可以住宿在館裏，不必天天回去了。

膳食的確是很好，每天三葷一素，飯是開到書房裏來，我一人獨食，學生們都裏面去吃，不陪伴先生。最初幾天，在吃飯以後，他們的厨子，到書房裏來問道：「師爺明天想吃些什麼菜呀？」這可使我窘極了，我在家裏，從來不會點菜，給我吃什麼，我就吃什麼。那時母親知道我的口味，向來不問我的，我只得說道：「隨便，我什麼都吃。」那個厨子還不肯走，報出許多名目來，說道：「炒腰蝦好嗎？鴨雜湯好嗎？韭芽炒肉絲好嗎？」我說：「好！好！隨便！隨便！」那個厨子走出書房門，還開了我的玩笑道：「師爺說隨便，這個隨便，教我到那裏去買呀？」這是他們講給偉成叔聽，偉成叔告訴我的。

後來又常常來問：吃什麼菜？我只得向年長的一位學生說：「我想不出什麼菜，但是什麼菜都吃，請不必來問了。」他進去向他的母親說了，以後厨子也不再來請點菜了。我想：他們三葷一素，即使有一樣我不吃的，也有其餘我吃的呀。有一次，他們燒了一樣鱔糊，我當時還不吃鱔，沒有下箸，他們知道我不吃鱔，以後就不進此品了。

住在館裏的時候，除了午飯、夜飯兩餐之外，還有兩頓點心，即是早點晚點。有時也來問吃什麼點心，但我知道他們早上也是吃粥的（蘇州人家早上總是吃粥的，一粥二飯，稱爲三餐），便對他們說：「我在家裏，早晨是吃粥的。」以後他們便送粥進來了，常有很好的粥菜，如火腿、燻魚、醬鴨、糟鷄之類。晚點不能吃粥，那就無非饅頭糕餅等等，不再問我，隨便打發了。

最初住在館中，白天教書，夜來便覺寂寞了，因爲學生不讀夜書，吃過夜飯後，只有在油燈之下（當時蘇州既沒有電燈，而有些人家，爲了防火燭，也不點火油燈）看看書而已。因此我也規定，住在館中兩天，便回家中住一天，沒有特別事故，我是概不放假的。因爲館址在因果巷，離觀前街很近

，放夜學時候早，偶然也到觀前街散步（蘇人稱爲「蕩觀前」）或到護龍街舊書店巡禮一回，不過要早些回來吃夜飯，不教人家等候。

蘇州人的吃茶風氣，頗爲別處的人所詬病，有吃早茶的，有吃晚茶的，因此城廂內外，茶館林立。但當時的茶館，是一種自然的趨勢，約朋友往往在茶館中，談交易也往往在茶館中，談判曲直亦在茶館中，名之曰：「吃講茶。」假使去看朋友，約他出去吃一碗茶，那末談心的地方，就在茶館裏。好在那地方點心也有，零食也有，說高興了以後，便從茶館而轉移到酒館，到老義和喝三杯去。

飲茶喝酒，一個人就乏趣了，一定要兩三朋友，我那時朋友很少，除非從前在朱靜瀾師處時有幾位同窗，否則便到我姊丈許杏生處，他們住在史家巷西口，和因果巷很近，一同到觀前街吃茶，有些人是他的朋友，而我也漸漸地熟識了。記得有一位顧子虬君，是他的朋友，我也與之相熟，後來知道他就是顧頡剛的父親，那個時候，蘇州學校風氣未開，顧君也在家裏開門授徒，教幾個學生呢。

夜飯以後，我的館東張檢香，偶然也到書房中來談談。那位張先生，真是保家之子，爲人端謹，他的年齒，差不多比我長一倍，而與偉成叔是好朋友，我所以呼之爲叔，而他則恭敬地仍呼我爲先生。他非常節儉，常穿布衣，一無嗜好，連水烟也不吸（其時中國香烟尚未流行）。他見我也布衣，不吸水烟，似引爲同志。實則我常穿布衣，是爲在孝服中，不吸水烟是年輕，亦不喜此。這位張先生得青一衿，即在家納福，人頗羨之。

實在我這位女居停張太太，操持家政，極爲能幹。張先生娶於永昌鎮的徐家，永昌徐氏是蘇州著名的一家「鄉下大人家」，擁有田產甚多，在近代說來是個大地主。張太太上無翁姑，持家井井有條，待人接物，處理得宜，兒童輩畏母而不畏父，婢僕輩亦都請命於夫人。偉成叔私語我道：「不要笑

他！張檢香是陳季常一流人也。」我笑道：「我叔會做過蘇學士嗎？」

我在張家處館有兩年，但我覺得我的性情，實不宜於教書。我和朱先生犯了一個毛病，我對於學生太寬縱，不能繩之以嚴格，學生見我如此，也就疏懶起來了。張家的三個孩子，其中間一個，資質較鈍，也有些頑劣，他的母親很不喜歡他。那天，送進一塊戒尺來，要教我施以夏楚，但我覺得責打學生這件事，我有些弄不來。因為我自從上學以來，一直到出學堂門，從來未被先生打過一下手心，便是祖母、父親、母親，也從未打過我，我不相信打了人，就會使這個人變好。所以他們雖送進了戒尺，我也不肯使用，他們實在頑劣，我只有用「關夜學」的一法，在別人放學，他不放學，至多我犧牲自己，也不出去，陪他坐在書房裏罷了。

我在張家兩年，賓主也還相得，然而我總覺得這種教書生涯，好像當了一個保母。學生在書房外面闖了禍，也要抱怨先生；偶然遲到早退，更要責備先生，我覺得担這種責任，很是沒趣。而他們也有些嫌我對於學生太寬容，先生脚頭散，他們對人總說：「我們這位先生，到底年紀太輕了。」因此我覺得第三年不能蟬聯下去了。我只得託偉成叔轉達，只說：「學生們年歲漸大了，我的學力，不夠教他們了。」

訂婚

我的訂婚的年齡，也是在十八歲。在那個時代，婚姻制度是牢不可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結合呀。我雖然已經讀過了不少描寫婚姻不自由的著作與小說，覺得婚姻是要自由的，但我對於戀愛，一無對象。在親戚中，我幼年時期的表姊妹極多，可是到現在，有出嫁的，有遠離的，已都星散了，並且那時的男女之防極嚴，那所謂有禮教的家庭，一到了十七八歲，青年男女，然不大能見面了。

我自從在七八歲時，在外祖母家，他們以我與表妹兩小無猜，給我開了玩笑以後直到如今，就沒有正式提過訂婚的事。從前中國民俗，訂婚都是極早的，尤其是江南各處富庶之鄉，兒女們在五六歲時已訂婚。甚至於父母說得投機，指腹為婚的，鬧出了種種傳奇故事。我祖母及母親，都不贊成早日訂婚，因為無論男女，小時節都看不出什麼來，及至長大了，有了缺點，也因為已經訂定了，不能解除，不是便成了一個人的終身憾事嗎？

當我十三四歲時，在朱先生處讀書，盛家浜一帶，古木參天，沿着一條河浜，所有人家，門前都有一條板橋，以通出入，最好是在夏天，晚風微拂，大家都移了椅子，在板橋上納涼。東鄰西舍。喚姊呼姨，夕陽影裏，笑語喧嘩。其時貼鄰沈家，有一位女娃，小名好小姐，年亦與我相若，殊為婉妙。常常從她們的板橋，到我們的板橋來，我也到她們的板橋去，共相遊玩。顧氏表姊（亦即我之師母），見我們兩人，似相親暱，戲謂將與我兩人作媒。問我：「好不好？」我羞不能答，然心竊好之。於是顧氏表姊就和她的母親說了，因為我們是朝夕相見的，她母親頗有允意。顧氏表姊又和祖母說

了，祖母却不大以爲然。那沈家是藩台房庫書吏，家裏很有錢，我們貧士家風，恐仰攀不上。但自從有了說媒一件事後，好小姐便不到我們板橋上來，我也不再到她們板橋去了。十年以後，重經盛家浜，曾口占一絕，上二句已忘却，下二句云：「童心猶憶韶華好，流水斜陽舊板橋。」不免自作多情，而好小姐已「綠葉成陰子滿枝」矣。

又有一次，大約十五六歲吧，舅祖清卿公說起，要將硯農叔的一位小姨九小姐（她們姓郁，前爲富族，今已凌夷），許配與我。祖母亦不願意，因爲一則輩份不同，以親戚論，九小姐要比我長一輩，雖則年紀僅比我長兩歲。二則身弱多病，是林黛玉式的（後來果然未到三十歲即故世了）。我父在世時，曾經說過：「最好是要讀書人家的女兒，其丈人峯也是一個宿儒之類，必於學問請教上，有點益處。」

這一次，又是朱靜瀾先生做媒，我的婦翁陳挹之先生，原籍是江蘇溧陽人，而遷居於蘇州的洞庭東山。他們的先世是武職，而他倒是一位生員，不過捐了一個什麼官銜，已棄了舉子業了。他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兒子却還年小，朱先生說媒的是他的大女兒，這回是他直接和吾祖母及母親說了。

然而我當時實在不注意於自己的婚姻問題。第一、我家裏現在太窮了，一家三口，祖母、母親和我，靠了母親和我兩人的收入，僅足以勉強糊口，而我且就食於人，怎能再添一口呢？況且一個年青婦女，到底也要添些服飾之類，我又如何吃得消呢？第二、我也有一點自私的心，我被那種不自由的婚姻所刺激，耳聞目見，以及刊物上的故事，新聞所紀載，加以警惕，我希望我年紀大一點，可以由擇配呀。

但是母親却極力勸我，她說：「祖母自你父親故世以後，心中鬱鬱不樂，身體更加不好了。她總

希望你成一個家，得見孫婦一面。她昨天說：「即使不見孫婦一面，定了親以後，也可以稍爲安心了。」又據朱先生說：那位陳小姐非常之好，在家裏粗細工作，都非她不可的，而且也讀過幾年書，身體又非常健全。我是帶病延年的人了，她來了，是我一個好幫手。況且現在即使下了定，也不能就結婚，也須你進了一個學，得到一個好點的職業，方可以預備結婚呀。」

母親的話，真是仁至義盡，祖母自父親故世以後，傷逝嗟貧，漸漸的步履維艱，形成半身不遂之病，舉動需人扶掖，有一次，半夜起來解手，跌在牀側。從此以後，母親便即睡在祖母房裏了，只要聽到牀上轉側的聲音，便起來扶持她。在冬天，連自己睡眠時衣服也不敢脫，真是「衣不解帶」。老年人的心情，見孫子漸漸大了，也希望有個孫子媳婦在眼前，這也是人情之常。

況且這不過是訂婚，並非結婚，訂婚以後，也足以使老人安心。陳小姐是書香人家的女兒，我婦翁也是一個讀書人，這與我逝世的父親所祈望的條件相合。不過我的意思，要懇求朱先生說明，我們是窮人家，在我家裏做媳婦是吃苦的，現在是窮，將來也未必是富，這話須要聲明在先，非請朱先生傳話不可。朱先生說：「他都明白，陳挹翁不是嫁女要選擇財富人家的，他是個明理的長者，並且他自己境況，也是寒素的。」

陳挹翁相婿倒也精嚴，先要與我見面，作一次談話；又要把我所作的文字（從前稱之爲窗課），送他去觀看。我奉了母親之命，一一如他們所願。我初見他時，好像是在一個慈善會裏，由朱先生作介紹，他那時已留了鬍子了，我覺得他有點道貌岸然，實在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文字是朱先生取了給他去看的，自然選了幾篇比較看得過的文字。這兩件事，他都覺得滿意了，這一件婚事，總算可以訂定了，但訂婚的儀式，要在明年我滿了孝服以後，方才舉行。

從前中國的婚禮中，照例是要兩個媒人，我的訂婚中，一位當然是朱靜瀾先生，另有一位是江凌九先生，那是女家提出來的。他是我婦翁陳挹翁的妹婿，在我將來要呼之爲內姑丈的。他是吾鄉江建霞（標）先生的族弟，此刻建霞正放了湖南學政，他跟了建霞到湖南代他看文章去了。這個媒人的名字，是暫時虛懸的，好在到了我們結婚時，他又要回來了。（江凌九丈，自建霞湖南學政卸任後，又隨着吳蔚若郁生放學差，看卷子，回京後，遇到義和團，幸免於難，此是後話。）

我自十八歲訂婚至廿五歲，方始結婚，中間相隔七年之久，在這個時間中，所遇見的女性不少，然而我的心中，好像我的身體已經屬於人家了。雖然我與我的未婚妻，未曾見過一面，未曾通過一信（在舊式婚姻是不許的），但是我常常深自警惕，已有配偶，勿作妄想。因爲在這七年中，我會單獨到過上海好多次，也會思追求過女性，也會被女性所眷戀，幾乎使我不能解脫。然而我終懸崖勒馬，至結婚還能守身如玉者，我的情慾，終爲理性所遏制了。

進學

十九歲那一年，在父親的喪服滿後，我便一戰而捷的進了學了。從前對於父母是三年之喪，實在

只有兩年零三個月，就算是滿服了。在臨考試前，巽甫姑丈又招我去面試了一下，他說：「大概是可了。」說了「大概」二字，言外之意，也有所不能決定，這就覺得那幾年功夫，不會有十分進步。但要取一名秀才，或者可以得到。

他也原諒我，因為我自己在教書，不能埋頭用功，不比我子青表哥，他幾年功夫，大有進境，考紫陽書院卷子，總在前三名，與張一塵、章鈺等互相角逐。上次鄉試得「薦卷」而未中式，氣得飯也不吃，我笑他功名心太重了。巽甫姑丈又企望我，他說：「這回無論進學不進學，我介紹你一位老師，你還得好好用功。不要進了一個學，就荒廢了。」巽甫姑丈本來自己可以教導我，無奈長年在疾病中，過他的吞雲吐霧生涯呀。

可是我對於八股文，沒有十分進步，爲了自己坐館教書，固然是個原因。但我還是老毛病，不肯多練習，當時已出學堂門，亦無人指導，還是喜看雜書，心無一定。那一年是甲午年吧，我國與日本爲了朝鮮事件打仗，上海報紙上連日登載此事。向來中國的年青讀書人是不問時事的，現在也在那裏震動了。我常常去購買上海報來閱讀，雖然只是零零碎碎，因此也畧識時事，發爲議論，自命新派。也知道外國有許多科學，如什麼聲、光、化、電之學，在中國書上叫做「格物」，一知半解，咫聞尺見，於是也說：「中國要自強，必須研究科學。」種種皮毛之論，已深入我的胸中，而這些老先生們則都加以反對。

我這一次的考試，不會在貢院前租借考寓。即在姊丈的許家出發，因爲他們住的史家巷，比我們住的曹家巷，離貢院要近得多。開考時的炮聲也聽得見，從他那裏出發，也可以從容不迫。我們睡到半夜起身，便即飽餐一頓，爲的是進場以後，不能吃飯，只能進一些乾糧，直要午後放炮開門，方能

出來進食。這次考試，我與我的姊丈在一起，他比我大兩歲，我考吳縣籍，他也考吳縣籍，郎舅在一起，我祖母和母親，也足以放心呀。

這一次我考試進學，人家以爲我很有把握，其實我却覺得是傲倖的。那時江蘇的學政是瞿鴻禨（字子玖），他是湖南人，年紀也不大，出的題目也不難，是論語上的「入於海」一句（每縣一個題目如長洲則爲「入於河」，元和則爲「入於漢」，這種題目，有點詞藻，文章可以做得好的。不過題目，太容易，反而容易流入浮泛。我起初是刻意求工，做好了一個起講，自己覺得不好，塗抹了重新再做，我的出筆本來是慢的，那時却費了不少時刻，及至我第二個起講做好，人家已是大半篇文字騰清了。

這時我心中有些急了，但越是急，越是做不出，一切思想，好像都塞滯了。我本來是有胃病的，胃間又隱隱作痛起來，那是許氏這一頓早起進場飯，在那裏作祟了。而且文思正滯時，雜念紛起，這一個患得患失之心，橫亘在胸中。那八股文是有起股、中股、後股，一股一股的對比的，很費功夫，而我又素不擅此。

看看人家，已將完篇，不久就要放頭排了，筆下迅速的人，便可以交卷出場了（第一個交卷的，名曰「紅卷」，特別優待）。我要用那種細磨的功夫，句斟字酌的做下去，弄到了「搶卷子」，可不是玩意兒呀。（搶卷子者，到了放末牌，大家都走了，你還沒有交卷，承差就來搶去你的卷子，趕你走了）。於是把心一橫，拆拆濫污，聽天由命，不取就不取了吧。便把起講又改了一改，改做了一篇散文，分爲三段，洋洋灑灑的一口氣寫成了四、五百字，把海上的詞句，都拖了上去，什麼「天風浪浪，海山蒼蒼」；什麼「海上神山仙島，可望而不可接」咧；以及關於海的成語古典，運用起來，堆

砌上去，氣勢倒也還順，不管它了。補好了草稿，抄好了「聖諭廣訓」，還要做一首試帖詩，便交卷出場，已經放第三牌了。

出場以後，人是疲倦了，但胃也不痛了，心頭似覺穩定了。可是祖母的關心，因出案（即放榜）尚有幾天，要我把文字默出來，送給朱先生及巽甫姑丈去看，請他決決可以取進，還是不可以取進？但是我這篇野馬似的文字，簡直不像是八股文，如何拿得出來？而且當時未起草稿，只是在卷後胡亂補了草稿，現在要我默出來，大致不差，到底是有些走了樣呢。

因此我便和我的姊丈許君商量了，因為他和我是同一題目，而他的這篇文字，做得非常工整，循規蹈矩，不像我的那一篇似野馬奔馳一般，把他的一篇借給我，讓我塞責一下，這是我的不老實處，說來有些慚愧的。姊丈是個敦厚的人，他答應了，因為他不必把文字抄給人看，而留有草稿，也還齊整。我先給朱靜瀾先生看，他力保一定可以取中。我又給巽甫姑丈去看；子青哥先看，他向我道喜，他說：「一定取了！一定取了！」巽甫姑丈也說可以取中，但他到底是個老法眼，他說：「這篇文字，頗不像你的作風。」意思似說：你恐怕還做不出那篇文字呢。

及至放榜時，我取了第二十七名，而姊丈則名落孫山。他自然十分懊喪，而我也心中覺得非常難過。我於是立刻披露，送給朱先生及巽甫姑丈看的，是姊丈的文字，不是我的文字。他們一面也為之嗟歎不平，一面又索觀我自己的文字。巽甫姑丈說：「你這篇文字，雖然野頭野腦，氣勢倒是有的。場中看文章的人，每天要看幾百本卷子，看得頭昏腦脹，總覺千篇一律，忽然有一篇是散文而別出風格的，讀下去倒還順利而有氣勢，倒覺得眼目一清，所以提出來了。」巽甫姑丈的話是對的，後來考畢以後，領出原卷來看，却見卷子上批了四個大字道：「文有逸氣。」

考了第一場，不能算數，還要覆試呢。第一場，依照應取名額，多取若干名，到第二場覆試時，又除去若干名後，方算正式的取中入學了。蘇州人的諧語，稱第一場即不取者，名之曰「總督」，第一場取了，第二場試後不取，被黜落者，名之曰「提督」。這是什麼意思呢？原來蘇人讀「丟」字的音如「督」，第一場即不取，謂一總丟棄了；第二場覆試不取，謂提督後丟棄了，因此有總督、提督之稱。我這時第一場總算僥倖了，惴惴然深恐第二場覆試不取，那便要做提督了。

覆試甚為簡單，只要上午半天功夫，但是要到堂上去面試，一點沒有假借。又爲了人數很少，顯得十分嚴肅。我們吳縣的題目，是論語上，「不有祝鮀之佞」一句，做這一個題目，要用一點技術。因爲做那些小題文，最忌是「犯下文」。論語上的原文是「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所以在文中不能提到一個「有」字，只能說「不有」兩字，如果單說一個「有」字，便是「犯下文」了。

出題目的人，便有這種故弄狡獪處，但也是八股文的法律，制定是如此的。這要謝謝我異甫姑丈了，以前異甫姑丈命我到他家裏去面試時，也往往出的這一類題目，他是人稱爲小題聖手的，和我講得很清楚，所以我曉得這種訣竅。這次覆試，只要做一個起講，我於破題的第二句，寫道：「若不吝其不有矣。」異甫姑丈見了道：「好！扣題很緊，必不會做提督了。」後來將考卷領出來看，果然在破題第二句上，圈了一個雙圈，以下的文章，便不看了。

覆試後，我又跳上了幾個名次，從二十七名跳到了十九名，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取中總歸是取中了，即使是考取在末尾，一名秀才，總歸是到手了。姊丈這一回未曾進學，下一屆院試，以第一名入泮，蘇人稱爲「案首」，亦頗榮譽，所謂「龍頭屬老成」也。

入泮

讀書人進了學，算是一個基本學位，又是科舉制度的發軔之始，因此社會上也較為重視。進了一個學，有些人家還要請酒、開賀呢。請酒、開賀不希奇，新秀才還要排了儀仗，好似中了狀元一般，跨馬游街，鳴金喝道的出來拜客呢。但這在江南，尤其在蘇州，那些縉紳富豪人家的子弟，方能如此，清寒人家的子弟，即使許你如此，也沒有這個力量。

但這要年輕的小秀才，方能有此興會。當在十六歲以內，越小越好，如果在二三十歲之間，雖然進了一個學，那也應該自傷老大，連賀也不高興開了。我們親戚中，我所見的如伊耕表叔、子青表哥，開賀那一天，都排導到我家拜謁祖母，他們進學，都在十六歲以內呀！此外如蘇州的彭家、潘家等，科名聯翩不斷的，也都有此盛舉。更有一件令人家艷羨的，那個新秀才，倘然已訂婚而未結婚者，這天也要到未來岳家拜謁一過，那必定轟動親戚鄰舍，來看新相公。

那一天，這位新秀才的服裝也特別了，身上穿的是藍衫（原名襴衫，本為明朝所製定的秀才服裝，今則以絲織物特製），披了紅綢。頭上戴的是雀頂，兩邊插上金花。腰間又排滿了什麼荷包、風帶、各種佩物，腳踏烏靴，有些年紀極輕的小秀才，在十四、五歲以下的，他家裏人給他面上敷粉，真是一位白面小書生。

出門時的儀仗，也頗為別緻，頭導先是有許多彩旗，那種彩旗五色紛披，稱之為「竹筱旗」，拔取竹園中新生的長竹，張以狹長的彩綢，上面有金字的聯語，一對一對的，當然都是吉祥的句子，什麼「五子登科」「三元及第」之類。竹枝上的竹葉，亦不芟除，蓬鬆的披著。這種彩旗，都是由親友

們送下來的，前導往往十餘對以至數十對，這種古典，不知始於何時。此外便是銜牌，在清代做過什麼官，便有若干對銜牌，官做得越大，銜牌便越多，新秀才自己沒有銜牌，但是他上代做過官的，把祖宗三代的銜牌，一齊捐出來了。其餘便是鑼呢、傘呢，什麼儀仗都可以加進去，最後一頂四人大轎，那個新秀才，似小傀儡般坐在其中。據說這一天，即是蘇州最高長官撫台大人出門也須讓道，爲的是尊重讀書人呀！好在撫台也難得出門的，此故事未能徵實。

這是所有新秀才，在一個日子上舉行的。出門後，大家都到學宮裏謁聖（拜孔夫子），拜學老師，然後散出來，向各處去拜謁親友。那些事，蘇州的所謂「六局」者，都很明瞭（六局者，專辦理人家婚喪喜慶事的），他們是有相當經驗者的。最可笑的，還有一架彩綢所紮的龍門，新秀才到那家人家，先把龍門擺在人家大門口，讓這位新秀才在龍門底下進去，一邊還要鼓樂放炮，以迎接這位新貴人。

我是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沒有這一套的，不要說出門拜客，連聖也不謁，賀也不開，只是躲在家裏。那天恰值是我父親冥誕之辰，每年到這一天，家祭一番，我這一次跪拜，磕下頭去，淚如泉湧，竟仰不起來。我母親極力加以勸慰，而她自己也嗚咽得不能成語了。這幾天，祖母又值有病。未能起身，母親道：「快快揩乾眼淚，不要被祖母看見了，又起悲哀呢。」

進了一個學，就要那些大排場，這惟有紳富人家的子弟，方能辦此。因爲他們經濟寬裕，可以花錢，但即使是清寒人家，大錢不花，也須花些小錢。吳縣有兩個學官，一個名教諭。一個名訓導。這兩位老師，平日實在清苦得很，雖名爲官，還不及我們的教書先生，全靠三年的歲、科兩試，取中幾個生員，他們方才有一筆進款，那便是取進後送進去的保結，要他簽字蓋印，而新進秀才人家送他的

一筆贖金。要是像我們那些孤寒子弟，他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他所希望的，是本縣裏新進幾位富貴人家的子弟，最好是暴發戶，而上代沒有什麼讀書人的，他可以敲一筆小小的竹槓，贖金可以加到數十元或至百元。遇到富而且吝的人家還不肯出，於是要「講斤頭」了。講斤頭的人，總是廩保做中間人，而水漲船高，廩保也可以得到較豐的報酬。

不是說一個童生考試要兩個廩生作保嗎？一爲認保，一爲派保，我當時的一位認保，是馬子晉先生。朱師的老友，爲人非常和藹。派保沈先生。已忘其名（後來到了上海，方知是沈恩孚先生的令兄）當時我的孤貧，是大家所知道的。兩位老師，各送了贖金兩元。老師也晒納了，知道「石子裏榨不出油的」。派保沈先生，也送了兩元。馬子晉先生並且辭謝不受。母親說：「這是不好的。」馬先生處送了一些別樣禮物。

還有一件可笑的事。進學以後，要向親友人家送報單。那種報單，是用紅紙全幅書寫的。另有一種人。專門書寫那種扁體的宋字，上面寫着：「捷報貴府□□（以上是尊卑稱呼）少爺□□□（以上是新秀才姓名）蒙江蘇督學部院□（學台的姓）高中蘇州府吳縣第□名……」到那一天，兩個報房裏的人，一個背了許多捲成一束束的報單，用了一面鑼。噔噔的敲到人家去；一個提了一桶漿糊，在人家牆門間，或是茶廳上，高高的貼起來。人家也以爲某親友人家的子弟進了學了，算也是榮耀的事，未便不讓他們貼。而且還要發一筆賞封，這項賞封，不過數十文而已，然積少成多，亦可以百計，報房之樂於爲此，正爲此賞封也。鄉試中了舉人以後。也有報單送與親友，不過顏色是黃的了。

我此次進學，也花費了數十元，都是母親在籌劃。雖沒有開賀，但幾家至親密友，都送了禮。舅祖清卿公，送了八元，那是最濶氣的了。異甫姑丈送四元，館東張檢香，也送四元，此外送二元、一

元的也不少。從前送禮，不比現在。凡遇慶弔，送一元已算豐厚，若送四元，比一担米有餘裕了。因此也勉強敷衍過去。最高興的是我的館東張檢香，連忙把每月束脩兩元的加到了每月三元，那也是蘇州處館先生的升級條例呢。

自以為榮譽的出去應酬，穿上衣冠，紅纓帽上，正正式式的戴上一個金頂珠（其實是銅的）。以前我在未進學以前，出去應酬，也戴一個金頂珠，那是非正式的、僭越的（清制：一品為紅珊瑚、二品為縷金珊瑚、三品為藍寶石「俗稱明藍」，四品為青金寶石「俗稱暗藍」，五品為水晶，六品為硨磲「俗稱白石」，七品至九品，皆為金頂珠），所以不要看輕這一個金頂珠，自秀才、舉人，以至新翰林，都戴這一個金頂珠。

我這一次同案中，有許多中舉人，中進士的，我已經記不起他們了。只有一位單東笙（鎮）先生，他中了進士後，即放部曹，民國時代，曾經做過審計處處長，直到大家老年時候，方纔認識，同住上海時，時相訪問。還有一位歐陽鉅元，也與我同案，此君早慧，十五歲就進學，他不是蘇州人，曾為蘇人攻其冒籍，後有人憐其才，為之調停，旋至上海，成一小說家，筆名茂苑惜秋生，李伯元延之入「繁華報」。有人謂：「官場現形記」後半部全出其手。聞罹惡疾，不幸早夭，年未及三十歲也。

記徐子丹師

我進學以後，未到半年，巽甫姑丈又約我去。他從前不是說過的嗎？無論取進不取進，要給我介紹一位老師，不要以為進了一個學，就此荒廢了。他說：「一個寒士，不能與富家相比。有錢人家不能上進，是沒有關係，反正家裏有產業，守守產業，管管家務，一樣的很舒服。而且現在即使考不上進，還可以捐官，捐官直可以捐到道台。貧家可不能了，用真本事換來。你父親早故，祖母年老，母親勤苦，企望你甚殷。倘然在科舉上能再進一步，豈非慰了堂上的心。因此我覺得這敲門的磚頭，還不能丟棄。」

我聽了姑丈的話，頗為感動。我想：現在真弄得不稔不秀了。再去學生意，年紀已大，學生意大概是十三四歲，最為適宜。給人家當夥計，誰要請一位秀才相公來做夥計，而且誰敢請一位秀才相公來做夥計呢？我的前途，注定了兩件事，便是教書與考試，考試與教書。在平日是教書，到考試之期便考試，考試不中，仍舊教書。即使是考試中了，除非是青雲直上，得以連捷，否則還是教書，人家中了舉人以後，還是教書的很多呢。讀書人除此之外，難道再沒有一條出路嗎？

巽甫姑丈給我介紹的這位師長，便是徐子丹（鑒）先生，他也是一位廩生，博學多才，大家以為像徐師那樣的學問，早應該高發了，但他却是久困場屋。他年紀也差不多四十五六歲了，也是在家裏開門教徒。不過他的學生都是高級的，除了在他案頭有幾位以外，「走從」的很多。所謂「走從」者，就是每月到他那裏去幾回，請他出了題目，做好文字，再請他改正了。

我也是在走從之列，言明每月去六次，逢三逢八，便到他那裏去。但是徐先生聲明：不要我的脩

金。我說：「孔夫子也取束脩，所以說：『自行束脩以上，我未嘗無誨焉』，怎樣可以不要脩金呢？」

？巽甫姑丈說：「你不要管！我和我的交情夠得上，你自己所得微薄，不能再出脩金，而徐先生也曉得你的情況。他是一位有道德有學問的人，並且最肯培植後進，你見到他就知道了。」

徐先生不是一個儀容漂亮的人，而是一個樸素無華的人。他頭頸裏又生了一串瘰癧（蘇人稱爲瘰子頸）。因此頭有些微側，蘇州的一班老友中，背後呼他爲「徐歪頭」，可是當時徐歪頭之名字，也爲人所傳述。第一天拜師，徐先生很爲客氣，加以慰勉之詞，大概巽甫姑丈把我的近時境況，都和他談過了。當天他出了兩個題目，我記得一個是孟子上的「非無萌蘖之生焉」一句，一個是論語上的「使民以時」一句。上一個題目，在行文上有些技術性的；下一個題目，可以發揮一篇富瞻的政論。

教我做這兩篇文字，原是測驗我的程度的，兩篇文字交卷了，徐先生說：對於「非無萌蘖之生焉」一文，做得不差，有兩股他還加以密圈。對於「使民以時」一文，他覺得頗爲平疲，很少發揮。原來前一題，看似枯窘，但那是虛冒題，着重在「非無」兩字上繞筆頭，前經巽甫姑丈出題，已做過了好幾回，頗能學得一點訣竅。那「使民以時」這個題目，極容易寫文章的，而且可以使你大大地發揮的，但題目太容易，反而使你寫不好出色的文章。若能敷佐詞華，包孕史實，也可以成爲一篇佳文。

實在我書倒看得不少，却是毫無理緒，又不能運用自如。在徐先生那裏不到一年功夫，確是頗有進境。考平江書院卷子，常考超等，至少也考一個特等。考紫陽書院卷子，也可以考一個特等，一個月，這一筆書院膏火，也有兩三塊錢，不無小補呀。另有一個正誼書院，它的月考是「經解」與「古學」，所謂古學，即是詞章之學。在這兩門中，經解我不喜歡，嫌其破碎支離，詞章我是性之所近，很願意學習的。原來徐先生的詞章功夫是很好的，我便請教於他，請他出了兩個賦題，我便學做起賦

來。

但是那個時候，中國和日本打起仗來，而中國却打敗了，這便是中日甲午之戰了。割去了台灣之後，還要求各口通商，蘇州也開了日本租界。這時候，潛藏在中國人心底裏的民族思想，便發動起來，一班讀書人，向來莫談國事的，也要與聞時事，爲什麼人家比我強，而我們比人弱？爲什麼被挫於一個小小日本國呢？讀書人除了八股八韻之外，還有它應該研究的學問呢！

我那時雖然仍在徐先生處學習詞章之學，覺得駢四驪六之文，頗多束縛，倒不如做一篇時事論文，來得爽快，也會私擬了一二篇，却不敢拿出來給人家看，自然是幼稚得很的。但是當時許多老先生是很反對的，他們不許青年妄談國事，尤其是去看那洋鬼子們的種種邪說，這都是害人心術的，這都是孔門所說的異端。他們說：這些學說，都是無父無君，等於洪水猛獸。當時的父老們，禁止我們看新學書，頗似很嚴厲的，但我是一個沒有父兄管束的，便把各種新出的書，亂七八糟的胡看一陣。徐先生雖然知道了，也不加深責，因爲那時的風氣，已漸在轉移了。

過了一年，徐子丹先生就館到費圯懷（念慈）家裏去了。原來費圯懷本是常州人，却在蘇州桃花塢新造了住宅，預備長住在蘇州，於是延請了徐先生，教他的兩位公子。我那時仍舊走從他，本來常到王洗馬巷徐先生家裏去的，現在改到桃花塢費公館去了。這兩位公子，一號子怡，一號叔遷，他們當時年紀還小。這兩位老同學，到後來在上海方才叙舊。叔遷忙於做官，不大晤面，子怡往來蘇滬，且在上海亦有住宅，因此時相過從，有許多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有一次，我從上海回蘇州，在火車上與子怡相遇，他問我：「到蘇州住在那裏？」我說：「住在表弟吳子深家，也在桃花塢，與府上是街坊。」他唯唯。但到了明日，他到吳家來，說：「明日中午

，家母請老世兄便飯，務請惠臨。」原來費圯懷先生的夫人，乃是清代狀元宰相，徐頌閣（郝）的女兒，據說費圯懷頗懼內。曾孟樸的「孽海花」小說中，曾經調侃過她，說有一次，江建霞太史去訪費，他夫人疑江爲北京唱戲的相公，操杖逐之，以江年輕漂亮，雅好修飾故。實在孟樸的「孽海花」，以小說家言，不無渲染故甚其詞也。

我頗錯愕，以費老夫人從未見面，何以請吃飯呢？如期而往，亦有三五客在座，費太夫人出見，雖老，而體頗豐腴（她有二子二女，都是胖子），我執世姪禮甚恭，子怡說：「家母欣賞吾兄之小說，故極欲一見」云云。我急慚謝。既而我想：「我那時正預備寫「留芳記」小說，而費家的軼事亦正多，她怕我再如「孽海花」一般，把她們牽涉進去吧。」

我又說到後來的事了，如今且說我向徐子丹師受業的第三年，他在本年的鄉試，中式了舉人了。先是，翼甫姑丈會談及：「徐先生今年秋闈，是背城借一之舉了，他年已近五十了，大概此次是志在必得吧。」我因說：「以徐先生的文才，早可發科，何以踴躍場屋？」姑丈說：「他的學生，已有兩個中舉了。」我覺得姑丈之言，似乎所問非所答，後來有人告訴我，這兩個學生，是徐先生代筆給他們中式的。人言如此，我也未敢信以爲真。

明年會試，徐先生連捷中了進士，殿試三甲，外放在山東做了三任知縣，也沒有得到了好缺，就此故世在某縣任上。宦囊不豐，清風兩袖而已。一位讀書明理，而藹然仁者，那裏會多得錢？但徐先生是我的恩師，我受了他的教誨，方有寸進，而從學了他兩年多以來，他不肯取我一點脩金，他對於別一位學生，從未有此，此種恩義，真使我沒齒不忘的。

求友時代

我從二十一歲起，可稱爲我思想改變的開始。那正是甲午中日開戰，我國戰敗以後，有些士子，都很憤激，而變法自強之說，一時遽起。這些主張變法的知識份子，人家稱之爲維新黨，我當時也很醉心於維新黨，以爲除非是這樣，方足以救中國。

但是那時候，科舉還沒有廢，一個士子的出路，還是要靠考試，而考試還是要做八股文。我在徐子丹先生教導之下，本年歲試，居然考取了一個一等（那次題目是「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兩句，那倒是規規矩矩的八股，不是瞎扯的散文了）。但我這個一等，只可稱之爲「矮一等」，吳縣共取一等十六名，而我的名次則爲第十一名（按：秀才歲科考，例分一等、二等、三等，科考可以不到，而歲考必須到的）。照例，考了一等，可以挨次補廩，而在我們吳縣補廩，非常煩難，往往考了前三名，也一時補不着廩。因爲它是有名額的，要遇缺即補，甚至有用賄賂之法，買缺出貢的。至於矮一等，想也休想了。

然而雖是矮一等，親友間却予我以厚望。其時即使是做八股文的，也風氣一變了，不能規規矩矩的依照先正典型，往往野頭野腦，有如野戰軍。並且那些當考官主試的人，眼光也改換了，專取才氣開展的那一路文章，不大墨守以前的準繩。

就是徐子丹先生中舉後，刻出來的硃卷，第一場四書題，還是循規蹈矩的做了，第二場五經題，有一篇文中，運用了許多子書。而且包孕時事，如列子御風而行，便象徵空中飛行等等（那時飛機初發軔，已有傳說到中國來了），在以前八股文中，那是不許引用的，倘被磨礪出來，是連試官也有處

分的。

到後來，那種書坊店的奇詭的書都出現了，有一部叫做「天下才子書」，好大的口氣，真嚇壞人。我以好奇心，去買了一部，薄薄的兩本，翻開來一看，盡是八股文。其中有康有為的應試文，還有許多名人的應試文，我可不記得了。好像有一篇署名林獬的，後來知道林獬就是林白水，又號萬里，在北京開報館，一九二六年在北京爲張宗昌所殺。

此外，清代的許多禁書，也漸漸地出現了，那些都是明末清初的書，關於種族仇恨，鼓起了人民排滿思想。可是蘇州那個地方，到底還是範圍狹小，要買新書，非到上海去不可。因爲上海有印刷所，有鉛印，有石印，那些開書坊店的老板（以紹興人居多數），雖然文學知識有限，而長袖善舞，看風使帆，每有他們的特識（那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都未開張）。他們的大宗生意，就是出了書，銷行內地到各處去。不僅是新書，即使那種木版書，不是上海出版的，也能集攏到上海來。或者有些別地方出版者，請他們搜求，也可以搜求得到。

我還是脫不了那個教書生涯，在廿一歲的時候，又館在城南侍其巷的程宅去了，我的館東是巡撫衙門裏一個書吏，家道小康，這位先生難得見面，所以他的大號，我也不記得了。教三個學生，他們脩金較豐，而待遇却不及因果巷張家。最大的一個學生，也已十四五歲了，名爲開筆作文，出了題目，難得交卷，強迫着他，東鈔西襲，不知塗些什麼，而且虛字不通，改筆也無從改起。三天兩天，不到學堂，家裏也放縱他。這種撫台衙門的書吏，也是世襲的，大概他們也不想任科舉上求取進，這個館地，只處了一年，我實在敬謝不敏了。

我從家裏城北到侍其巷城南，是多麼遠啊！而盛家浜的朱師處適在中心點，因此常到朱師處打尖

歇脚。顧氏表姊，視我如胞弟，有時不住在館裏，便住在朱家，明晨一早到館。朱先生依然在家開門授徒（聞曾有一度館在嚴孟繁「家熾」家，旋即離去）。其時我有一位同窗李叔良（志仁），最爲知己，曾訂金蘭之譜（當時所流行的，俗名換帖弟兄），他比我小三歲，溫文爾雅，詞筆優秀，又寫得一手好字。而且我因爲與這位盟弟的關係，又認識了許多朋友。

這些朋友，都是住在胥門一帶的，最遠的是住在盤門。朋友都是牽連交結，漸漸的志同道合而親密起來的，當時所認識的便有祝伯蔭、楊紫麟、汪棟卿、戴夢鶴、馬仰禹、包叔勤諸君，年齡都與我相伯仲，加上李叔良與我，共爲八人。那時還拍了一張照，此八人中，伯蔭、棟卿、夢鶴、叔良及我皆入了學，其他三人，則未入此途。我今寫此稿時，七人均已逝世（夢鶴最先，棟卿最後），而我則孑然尙存也。

我不菲薄蘇州從前吃茶的風氣，我也頗得力於此種茶會。當時我們就有一個茶會，在胥門養育巷的一家茶館裏，每月約定日子，至少聚會兩次。在聚會的時候，便無天無地的討論一切，有什麼新問題、新見解，便互相研究，互相辯難，居然是一個學術座談會了。那個茶館裏，往往有一種圓桌，我們便開了圓桌會議，笑語喧譁，莊諧雜出。後來我們又組織了一個文會，輪流當值，出了一個論文題目。或是屬於文史的，或是屬於時事的，大家回去寫了一篇，特地送給當地名人去指點批評。

其中除李叔良外，我又與通譜者二人，一爲戴夢鶴（昌熙），一爲楊紫麟（學斌）。紫麟與我同庚，却比我小幾個月，叔良、夢鶴都比我小幾歲，所以在四人中，我是大哥了。夢鶴最聰明，十五歲就進學，文章斐然，兼擅詩詞，年十八九歲，所寫的字嫵媚絕倫，雖老書家亦歎弗如，惜其患有肺病甚深。紫麟爲李叔良的姊丈，其兄綬卿，爲一孝廉公，現在盛杏蓀（宣懷）處當文案，也算是一個通

曉洋務的人材。家居上海，故紫麟亦時遷居滬上，往依其兄，並時預備進上海洋學堂，不作科舉之想了。

當時爲了國家變法，國內要開學堂之說，也盛唱一時。外國人在中國來開學堂的，也漸漸多起來了，大概都是外國的教會辦的，這些學堂，國人都稱之爲洋學堂。我當時也怦然心動，想我也可以進那種學堂，從新做起學生來吧。但是我的環境不許可。第一、我現在是要贍家的了，雖然現在所得館穀不多，但如果連這一點也去掉了，家用更難支持，而我的母親要更苦了。第二、進學堂要學費、膳費（蘇州無洋學堂，非到上海不可），既無進款，反加出款，這筆錢從那裏來呢？三則，祖母年老，孫承子職，我不能離開蘇州，出外就學呀！

這時候，關於文學上，有一事頗足以震動全中國青年學子的，是梁啓超的「時務報」在上海出版了。這好像是開了一個大炮，驚醒了許多人的迷夢。那時中國還沒有所謂定期刊物的雜誌，「時務報」可算是開了破天荒，尤其像我們那樣的青年，會喜歡讀梁啓超那樣通暢的文章。當時最先是楊紫麟的老兄，寄到了一冊，他宣佈了這件事，大家都向他借閱，爭以先覩爲快。不但是梁啓超的文章寫得好，還好像是他所說的話，就是我們蘊藏在心中所欲說的一般。

我把這信息告訴了子青哥，他也馬上託人在上海定了全年一份。它是一種旬刊，每十天出一冊，還是綫裝的，用中國連史紙宋體字石印的。每期中梁啓超必定自寫一篇，其餘也有許多別人所寫的，以及歐美的政論，並且還有短篇小說，如「福爾摩斯偵探案」，中國的翻譯國外偵探小說，也是從時務報首先開始的。（後來梁啓超又辦了「新小說」雜誌，寫了「新中國未來記」，他提倡中國人寫小說，也是開風氣之先的。）

我不會定「時務報」，只是向人家借看，自然向子青哥借得最多。「時務報」不但是議論政治、經濟，對於社會風俗，亦多所討論，主張變法要從民間起。於是興女學咧、勸人不纏足咧、研究科學咧、籌辦實業咧、設立醫院咧、大為鼓吹提倡。一班青年學子，對於「時務報」上一言一詞，都奉爲圭臬。除了有幾位老先生，對於新學，不敢盲從，說他們用夏變夷，但究爲少數，其餘的青年人，全不免都喜新厭故了。

自從這個風氣一開，上海那時風起雲湧，便有不少雜誌出現。關於各種學業的，也有「農學報」、「工商學報」，吾鄉的汪甘卿先生（是個舉人），在上海辦有「蒙學報」，以爲啓蒙之用。不獨是上海，漸漸的有各省開通的人士，也出版了許多雜誌，如湖南的「湘學報」、四川的「蜀學報」之類，但歸結起來，總沒有梁啓超的「時務報」普遍而深入人心。直到戊戌政變，汪康年改辦了「昌言報」，「時務報」也關了門。後來國事愈演變，思想愈前進，辛亥革命以後，以康、梁主張君主立憲，國民黨託之爲保皇黨。可是平心而論，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梁啓超的「時務報」，對於開風氣一方面說來，不能說沒有大功勞。

西堂度曲

我在廿三歲的時候，又館在劉家浜尤氏了。那年正是前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有名的戊戌政變時期。我所教的是巽甫姑丈的兩位孫子，即子青哥之子；以及詠之表姑丈的一個孫子，即聽彝兄之子（我們與尤氏有兩重親戚，前已說過）。其時我對於處館生涯已極厭倦，最好跳出這個圈子。但是巽甫姑丈是有恩於我的，他對於我的教育、對於我的提携，後來又介紹我到徐子丹先生處，盡義務的教導我，使我有進益。現在他請我教他的兩個孫子，我好意思拒絕嗎？而且我和子青哥，在表兄弟中是素所敬愛的，他的學問又好，我正好藉此向他請益呢。

還有我祖母、我母親，都願意我館到尤家去。一來是親戚，到底是自己的姑丈家，有了招呼。二來他們那些紳士人家，對於先生待遇甚佳，即在膳食方面，我那時身體瘦弱，母親總顧慮我營養不好。他們的束脩，是每年六十元，似乎比一個新進學的教書先生優厚了。那時的生活程度，也已比十年前提高多了。我爲了重闢的督促，也不能不去了。

但是我的教書，實在不高明，這是我所自知的。我不知如何，野心勃勃，總覺得有點坐不住。譬如在做學生時代，放了幾天學，關到他學堂裏來，也要收收他的放心，而我却收不住自己的放心。正如「孟子」所說的「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不能聚精會神的對付學生。而學生都是幼穉的，又是嬌養慣的，不大說得明白的，我對此殊少興趣。幸虧他們是個大家庭，我鼎孚、詠之兩位表姑丈的公子不少（鼎孚有七子，詠之有二子，連子青哥在內，共有十位），在我都是表弟兄，他們常到我書房裏，大家說笑玩樂，破除了一時寂寞。

這書房很不小，也是三間一廳，書房的前進，是一座小花園，有亭有池，比我從前居住文衙弄七裏公所的小花園差不多大。不過那園門不大開，有什麼請客宴會之事，都在那裏。鼎孚表姑丈是個北闈舉人，授職內閣中書，與吳中官紳常有交往也。這一班小兄弟中，都與我年相若，只有兩位，年紀不過十二三歲。另請一位先生姓盛的，在另一書房裏，這位盛先生已屆中年，他們嫌他道貌岸然，都不去他那裏，而擠在我這裏來。

他們總是在下午放學的時候來，因為我放學很早，下午四點鐘就放學了。他們有的着圍棋，有的猜詩謎，這些我都不大喜歡，我便溜出去，寧可蕩觀前、野茶館、逛舊書店了。但是有一時期，他們幾位小弟兄，在我書房裏，設了一個曲會，請了一位笛師教曲，我倒不免有些見獵心喜了。因為我從小就常看崑劇，又亂七八糟的看過那些曲本，畧有一點門徑，他們一定要拉我入會，可是我從未唱過，一上口便知道這很不容易了。

那個時候，蘇州的拍曲子，非常盛行，這些世家子弟，差不多都能哼幾句。因為覺得這是風雅的事，甚至知書識字的閨閣中人，也有度曲的，像徐花農他們一家，人人都能唱曲的。這時吳癩庵我還未曾認識，俞粟廬（俞振飛的父親）吳中曲家所推重，有許多人向之習曲（他是唱旦的，年已六、七十，從隔牆聽之，宛如十六、七女郎）。因為習曲要體驗你的嗓子如何，嗓子便是本錢，本錢不足，那是無可奈何的事。

凡是青年學曲，都是喜唱小生，因為那些曲本，都是描寫才子佳人，難得有脫其窠臼者。尤氏兄弟，人人都唱小生，我亦學唱小生。惟有子青哥，他偏要唱淨（即俗稱大面），唱了「訪普」一齣（即趙匡胤雪夜訪趙普故事），大聲磅礴，我們以為很好，但曲師說：「橫裏是夠了，豎裏却不夠。」

原來江南一帶，都沒有大喉嚨的，即說話也是輕聲細氣。只有一人，在女冠子橋一家糕糰店的司務（我已忘其姓名），橫豎都夠，人家呼之爲「糕糰大面」，凡曲家都知之。如有高尚的曲局，邀之惠臨，他便脫去油膩的作裙，穿上藍布長衫，傲然而來。縉紳先生敬之如上賓，當筵一曲，响遏行雲，羣皆歎服。他常常唱「刀會」、「訓子」，都是關公戲。但他從未客串過。因他身材太短，頗有自知之明也。

初學曲子唱小生的，都先唱「西樓記」中的一齣「樓會」，第一句是「慢整衣冠步平康」，用俗話解釋，就是到妓院裏去訪一個妓女的意思。這個曲牌名，叫做「懶畫眉」，何以學小生必定要先唱此曲，大概在音韻上的關係，傳統如此，教曲者便盲從了。我也是如此，這「懶畫眉」共有五句，只是前三句，我唱了一月多，也未能純熟，而且是日日夜夜在唱。俗語說得好：叫做「拳不離手，曲不離口」，但是要我說起來，還可以改爲「曲不離口，也不離手」。爲什麼呢，因爲口中在唱，手裏還要拍，所以叫做「拍曲子」，有所謂「三眼一板」，錯一個音，就教你唱不下去呢！

我們一羣拍友中，以尤賓秋爲最好，他也是我表弟兄，與我同庚。他也唱小生的，天賦既好，學力尤勤，朝也唱，夜也唱，坐也唱，立也唱，走路也唱，在書房裏唱，在臥室裏唱。但是我可不能，我是他家一位西席先生，雖然是親戚，到底有些客氣，怎能一個人在書房裏，提高嗓子，唱那不入調的歌曲，未免有失尊嚴吧。

於是回到家裏時，有時深更半夜的哼起來，母親寵我，一任所爲，因爲她的母家，常有「同期」曲會，我的母舅唱正旦（即京戲中的青衫）出名的。但是祖母却說：「人家那些紈袴子弟，吃飽了飯，無所事事，消閑玩樂，自命風雅，你去勞神費力，學它做什麼呢？」祖母的話頗爲嚴正，我那時以

爲祖母頗煞風景，還是擠在他們一起學習。可是我總是遲鈍得很，沒有什麼大進境。

有一天，我問我的曲師道：「爲什麼大家都唱小生？難道我們的嗓子，都配唱小生嗎？」他說：「不！各人的嗓子不同，不過你們都喜歡唱生，隨便唱唱，也無不可。」我問：「我的嗓子，應唱那種腳色？」他說：「你的嗓子，帶雌而又能拔高，最好是唱老旦。」我聽了很不高興，誰去做一個老太婆呢？那曲師知道我不高興，便笑說：「老旦不容易呢，許多崑曲班裏，沒有一個好老旦，即如京戲裏，老旦也是鳳毛麟角呢。」

我知道這位曲師是在敷衍我，而尤氏這一班老表，則又聳動我，老旦既然難能，何妨試試，反正這是玩意兒，又不是登台教你扮一個老婆子。於是我便改唱一齣叫做「姑阻」，是一個女尼陳妙常的故事兒，所謂「姑阻」者，是潘必正的姑母，也是一個老尼姑，阻止他不要去戀愛陳妙常。我還記得開頭兩句是「書當勤讀，奮志青雲上」，比唱「樓會」容易得多，而毫無興趣。實在我這時對於拍曲子也是厭倦了，就此也半途而廢。

這一班我的表兄弟中，就是賓秋成功了，他翩翩佳公子，寫得一筆好字，常能吟詩，寫了「西堂度曲」的詩句。他們本是尤西堂（侗）的後裔。賓秋之弟號翼如，那時方結婚，我送一幅新房對聯給他，由子青哥寫了，上聯是「南國喜聞鳥比翼」，下聯是「西堂今見女相如」，嵌了「翼如」兩字，作爲「並蒂格」，而西堂兩字，則即寓其姓。我那時就是常好弄筆頭，做對聯，蘇州人家，每逢婚喪，都有送對聯的，他們常來請我捉刀。

外國文的放棄

上海的新空氣，吹到蘇州來了，蘇州也算開風氣之先的。大家傳述，西方人的一切學術，都根據於算學。但是舊中國人的思想，只有商業中人要用算術，讀書人是不着算術的。從前我們的算術，也有三種，一曰心算，二曰珠算（就是算盤），三曰筆算。心算就是在心裏計算，不要看輕它，儘有好本領的。我最佩服那些菜館飯店的夥計（蘇州稱「堂倌」），即使有客七八人，吃得滿枱子的碗碟，及至算賬起來，他一望而知，該是多少。而且當時蘇州用錢碼，這些菜館用錢碼又不是十進制度，以七十文爲一錢，如果一樣菜，開價是一錢二分，就是八十四文，這樣加起來，積少成多，他們稍爲點一點碗碟，便立刻報出總數來了。算盤是商業上通用的了，不必細說。筆算有時也用得着，但屬於少數，鉛筆也未流行，誰帶了毛筆來算賬呢？

但西方的算學，明末傳到中國來了。在清代也會以算術取士過的了。不過大家都鑽研於八股八韻，把這一門學術，視爲異途，早棄之不顧。現在趨於維新，要效法西人，學習算術了。可是西法的算學教科書還沒有，只好搜求到中國舊法的算學教科書。我當時借得了一部（書名已忘却），綫裝木刻的，共有四本。裏面的數目字，還是中文，並不用阿拉伯數字，也只到加減乘除吧，我埋頭學習，學到加減乘，除法便不甚了了。其方式與現今的教科書不同，我記得那個乘法，是用「鋪地錦」法，說與現代名算學家，恐怕他們還瞠目不知呢。

我這無師自通的算術，也就淺嘗即止，後來又讀起日文來了。自從中日戰事以後，我們覺得日本國雖小而比我們強，於是許多新學家，及政府裏有些自命開通的人，都願意派子弟到日本去留學。留

學自然最好到歐美去，但是到歐美去，一則路途遠，二則費用大，三則至少外國語有了根柢。到日本去，就是路近，費省，即使不懂日本話，也不要緊，因日本與中國爲同文之國，有文字可通，便省力得多了。

那時中國政府派出去留學日本的很不少，而自資留學者也很多。我們所認識的有楊廷棟、周祖培諸君，他們都是學法政的。先一排，到日本去學法政？後一排便是到日本去學師範。至於其它各種科學，問津的很少，老實說，日本那時也不大高明。而當時中國人的思想，以爲學了法政以後，回國後就可以做官；學了師範以後，國內正預備大興學校，將來教書的冬烘先生是太不時髦了，他們可以在洋學堂裏，當一位教師。

我們這一羣朋友中，便與這班留日學生聯絡起來，常常通信。他們在書信中，告訴我們種種事情的書不容易，讀日本文的書，以漢文爲主，較爲容易，我們因此間接的讀到了許多歐美名著，這不是他們給我們做了一半功夫嗎？因此大家便發動了讀日本文的心了。一半是爲了留學日本的基礎，一半是爲了可以看日本的書籍。

但是到那裏去讀日文呢？尤其是在蘇州那地方。可是自從中國甲午之戰後，中國割地賠款，又許開了五口通商，蘇州也是五口之一，在蘇州的葑門、盤門之間，有一塊地方，喚做青陽地，特許他們作爲租借地。也有一個日本領事館，可是其它一無建設。原來日本到底是個小小島國，那裏有西洋人肆意侵佔，開闢殖民地那種氣魄，而青陽地却是蘇州一塊荒僻地方，蘇州人，誰也不和日本人有什麼交易，這地方冷冷清清的鬼也不到那裏去。雖然日本人到蘇州來的不少，却只在城裏做一點小生意。

其時有一個日本和尚，好像姓是藤田，名字是忘記了。日本是崇信佛教的，他們國內也到處有寺院，有僧衆。有一個本願寺，也像西洋人的基督教會一般，向各處傳教，不過他們的力量是很小的。那個日本和尚，就是本願寺和尚（在上海虹口就有一個本願寺），他在蘇州城內，開了一個日文學堂，於是我們怦然心動了，我和李叔良、馬仰禹等幾個人，便去讀日文。好在學費並不大，每日只上一點鐘的課，時間在下午五時，還不至妨礙我的教書工作。

雖說是日本和尚，並不像我們中國和尚一樣，仍舊穿了他們的和服，不過腳上不穿木屐，已是皮鞋一雙了。他便把我們似教日本小孩子一般的教起來，先教五十一個字母，什麼平假名、片假名，我們也就這樣阿、衣、烏、哀、屋的念起來，思之可笑。這些日文教科書，在中國是沒有的，也由他去辦，好在日本路近，不久，便由郵局寄來。這些書，正是日本初等小學教兒童的教課書。

那時李叔良最用功，書也讀得最熟，我就不成功。我的意思，要知道他們的文法，便可以看得懂日本書。我覺得不懂日本話，那倒沒有大關係，反正我也無力可以到日本去留學。但是他還要教我們日語，像教他們的兒童一般，我有些受不住了。好容易有三個多月的光景，我於他們的文法，有些弄得明白了，日本書上的漢文比較多的，我也看得懂了，我輟了學，進行自修，比這日本和尚所教，還容易進步。李叔良却還是勤懇的讀下去，後來留學日本，得益頗多。至於馬仰禹，未到三個月，即已不來了。

我讀過英文，也是處館在尤家的時候，我們這幾位老表，對於拍曲子到了厭倦的當兒，又想讀英文了。歐風東漸，由上海吹到蘇州，有許多青年，對於外國文躍躍欲試。但是蘇州沒有洋學堂，要進洋學堂讀西文，除非要到上海去。但當時蘇州的父老們都不願意放子弟到上海去，因為上海是個壞地

方，青年人一到上海去，就學壞了。不如請一位西文教師到家裏來教教吧。

可是蘇州要請西文教師，也不容易，後來請得一人，我記得是姓顧，他是蘇州電報局的電報生領班，也是在某一家紳士人家教英文。舉薦的人說道：「他的英文很好，可以與外國人直接通話。」可是我們也莫名其妙。

那時候，英文教科書，中國還沒有哩，也由這位教英文的顧先生去辦理。第一本「拍拉瑪」，這是啓蒙的，以後漸序而進，共有五本。你道這些英文課本是那裏來的，乃是英國教印度小孩子讀的，現在由印度而到中國，據說上海甚流行，初讀是「一隻貓」、「一隻小山羊」，我們相顧而笑。蘇州鄉下也不養羊，不知小山羊是怎麼樣的。這一套英文課本，在商務印書館初開張，未編教科書時，把它譯註翻印了，名之曰「英文初階」、「英文進階」，銷數以萬計，實爲商務印書館發祥的刊物呢。

這一次讀英文，也有半年多，但是我終不能讀得熟流，終覺得非常艱澀，生字終歸拼錯，這是因爲我不能專心。試想我那時以教書爲本業，雖然只有幾個小學生，也很爲勞神。有時爲了博取膏火，補助生活之故，還要做些書院卷子。而且爲了交際，常常的到茶館裏，或是朋友家裏，高談文藝，議論時政，我的野心一放不可收拾，那裏還能專心致知的讀英文呢？

當尤氏弟兄與高采烈的請先生教英文的時候，子青哥却不與其列。他說：「讀外國文最好是要在年幼時候，那時記性好，人事少，到了我們這樣的年紀，就難於專心了。」不過後來有許多「半路出家」而成就的，也是很多，但譯書容易，而說話較難。子青哥確也有先見之明，三個多月後，尤氏弟兄也漸闌珊了，我也讀了後面，忘了前面，狼狽不堪了。現在我的家庭中，只有我們一對老夫婦，不懂英語，下一代，再下一代，無男無女，無老無少，都是滿口英語，還有通數國語言文字的，如果給

我的前輩聽到了，真要呵爲用夏變夷呢。

除了日文、英文之外，我還讀過法文，教我法文的這位先生姓江（名已忘記），他是從前畢業於廣方言館的學生，也是蘇州人，這位江先生性頗孤傲，不諳時俗，不然，他一個法文很好的人，何至於投閒置散，回到家鄉來，當一個教法文的先生呢？他所收的學生，共爲二十人，成爲一班，都沒有讀過法文的，也都是年過十六歲的學生。我又怦然心動，想讀法文了，可見我的不知自量，心無一定了。因聽得人家說：法文在歐美極爲重要，所有外交公文，都以法文爲正則。而我還自恃讀過英文，或者比較容易一些，那知越讀越難，不到八個月，我又退下來了。

法蘭西文字，使人最困惑的，是每一名詞，有它的公性，母性，誰知道這個字是屬於公性、母性呢？我對於讀法文，似乎比讀英文還勤一點，但究竟是徒勞。那便是子青哥所說的年齡已大，記憶力不足，加以人事繁雜，終難於專心一志了。我們這一班讀法文的同學中，只有兩人是成功的，一位楊蘊玉，他是世家子，但可惜很早就逝世了。一位陸雲伯，他是吳江人，是名畫家陸廉夫（恢）的公子，後來進了上海徐匯法文學堂吧？在我寫此稿時，年紀也近七十了，但他也不會有過什麼得意的職業。在我後來辦小說雜誌的時候，他給我譯了不少法國小說，還有許多關於書畫的筆記。（廉夫先生還贈了我一幅「秋星閣讀書圖」。）

自此以後，我對於讀外國文一事，只得放棄了。古人詩句云：「讀書原是福」，我就沒有這個福份，我當然是自己未能專心勤學，實在也是我的環境使然。但後來我在我的朋友中，見到許多半路出家的人，到二十多歲方始學習外國文者，居然也能譯書。還有些在外國人所開設的洋行中就職的，於外國文雖然不大精通，而外國話却說得滾瓜爛熟，不覺自歎是個笨伯而已。

東來書莊

那時有幾位朋友，留學日本，我們常與他們通訊。並且蘇州設立了日本郵便局，我們常託他們郵寄書報，在文化交通上，較爲便利。尤其那時候，日本於印刷術很爲進步，推進文化的力量很大。吾國在日本的留學生，也逐漸多起來了，有許多留學生，都是國文已經很好的了。日本政府，爲了吸引中國青年去留學，特設了法政專科，師範速成科那種投機學校。爲了中國去的留學生不諳日語，在教師講解的時候，還僱用了翻譯，極盡招徠的能事。因此當時官費、自費的留學生，在日本的竟有數千人之多。

爲了日本的印刷發達，刊物容易出版，於是那些留學生，便紛紛的辦起雜誌來。爲了中國各省都派有留學生到日本，他們的雜誌，也分了省籍。如浙江學生所出的，名曰「浙江潮」；湖南學生所出的，名曰「新湖南」；直隸學生所出的，名曰「直言」（即今之河北，在前清則爲直隸）。在我們江蘇學生所出的，即名曰「江蘇」，大概對於這個「蘇」字，另有一義，作蘇醒解（按：金松岑的「孽海花」，即首先在「江蘇」上發表的）。諸如此類，各省留學生，出一種雜誌，都有合於他們省的名稱。此外也有約了幾個同學同志，另有組織的。

就是我們幾位認識的留學生，他們別出了一種雜誌，叫做「勵志彙編」，因爲他們已有一個小組織，叫做勵志會呢。這「勵志彙編」也是月刊性質，寫稿人都是法政學生爲多，當時中國學生到日本去習法政的，以早稻田大學最爲吃香，此輩亦都是早稻田學生呢。雜誌有譯自日文的，也有自己創作的，我還記得有盧騷的「民約論」，也是日文從西文中轉譯得來的，這個「勵志彙編」，執筆者有不

少人，他們很有志把種種知識學問，輸入到中國來。

有許多日本留學生的雜誌，寄到蘇州來，託我們推銷，我們是要有一個推銷機關的。在蘇州，那時城裏也有三四家書店，觀前街一家叫做文瑞樓比較最大，我們亦最熟，可以走進他們的櫃台書架傍隨意翻書的。但是他們都是舊書，木版綫裝，滿架是經史子集，新書不大歡迎。最近也點綴其間，除非是暢銷的書，至於什麼雜誌之類，一概不售的。其它有什麼綠蔭書屋、掃葉山房，連石印書也不問訊，有一家瑪瑙經房，專售佛經、善書的（蘇州當時刻善書書很盛行，可以消災避難）。那末要託書店代為推銷，頗為窒礙難行了。

我不是前章說過我們當時共有八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嗎？我們也組織一個學會，叫做勵學會。我們當時有兩個志願：一是由勵學會出一種月刊；一是開一家小書店。出月刊這一件事，在蘇州可不容易，我在下文再當詳述；開小書店的事，却不禁躍躍欲試了。不久，書店事居然成議，皇然是股份公司，每一股是十元，總共是多少資本呢，說來真令人可笑，共為一百大元。這很像我們從前放了年學開春聯店一般，不過春聯店在年底至多開十餘天，到除夕就要關門大吉，這個書店，却是長期性的。

書店雖小，首先要一個店名，大家擬了幾個名字，最後擇定了一個，叫做東來書莊。這東來兩字，還可以引用「紫氣東來」的一句成語，實在的意思，便是說：都是從東洋來的罷了。開辦費可以簡直說沒有的，雖然號稱書莊，只借了人家一個牆門間，那是女冠子橋包叔勤家的一個門口，從前也是開過春聯店，房租不出，還借他們家裏兩只舊書架。安放幾只半桌，攤上一方藍布，就算是櫃台了。並且勵學會的社友，省下了在茶館裏聚會，大家無事時，便到東來書莊來談天了。

我們不用店員，僅有一個學徒，社員們（也是股東大老板）輪流當值，這於來購買書籍雜誌的人

，大有裨益，因為我們能指導你購買何種書籍，對於知識階級的人，請坐送茶，周旋一番。雜誌都是寄售性質，賣出還錢，銷不完的還可以退還，以八折歸賬，因此我們可以無須要多少資本。後來我們又附帶出售了日本的圖書文具之類，必須要用現款去批發了。

說起了出售日本圖書的事，真足以令人發一浩歎。中國在那個時候，已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戊戌政變之前，還沒有一張自己印刷的本國地圖，但日本已經印了有詳細的「支那疆域地圖」了。我們在他們書店的廣告目錄上，看見有許多地圖的名目，便託朋友寄幾張來，及至一看，全圖都是漢文，難得有幾處注着和文的，而且印刷鮮明，紙張潔白。我們批購了十張，不到一星期，都售光了，連忙添購二十張、三十張，……雖然上面寫的支那，大家都也不管，真是可憐。後來我們也批了世界地圖、東亞地圖，雖不及中國地圖的銷場好，但生涯也自不惡。

原來那時蘇州已在發動開學堂了（學校的名稱是後來改的，最初是喚作學堂），便不能無歷史、地理等課目。教地理連地圖也沒有一張，豈非憾事，那些專習八股文的先生們，四川是否通海？長江纏到黃河裏去，也得先開開眼界。這個地圖的風氣既開，竟有許多紳士人家，向我們買了大幅的世界地圖，懸在書房裏，代替掛屏用的。除地圖以外，還有動物、植物的掛圖，也是五彩精印，日本的小學校裏的，他們也歡迎作爲壁上的裝飾品。

日本文的書籍，當然無法推銷（後來我到了上海，到虹口幾家日本書店去看看，全漢文的書就不少，連「杜工部詩集」也有的）。但對於數學書籍、英漢文詞典等等，也有人來定購的。除了圖書以外，我們還帶賣一點文具，也都是從日本寄來。日本那時已經有不少儀器，都是從西方仿造來的，但是價錢既貴，我們小資本店就不敢問津，而且在蘇州也難覓銷路，只是批發一些細巧的文具，都是蘇

州所未見的。那個時候，墨水筆也沒有，僅有鉛筆，也是舶來品。關於許多紙品，如信封、信箋之類，我們銷得很多。信封是一種雙層紙的，裏面一張畫着各種畫，外面一張薄紙，映出裏面的畫來；信箋是一種捲筒紙，紙張潔白，你高興寫多麼長，就寫多麼長。比了中國固有的信封信箋，自覺耳目一新，雅有美術趣味，也是蘇州人所樂用的。

東來書店的生意發達，不到三個月，已是對本對利，不到一年，我們的資本，自一百元變成了五百元，好在我們即有盈餘，從不分紅。但是既然賺錢，便思進展，不是在人家牆門口，以一種開春聯店的姿態可以濟事了。因此在玄妙觀前街西首、施相公衙口，覓得一市房，是一開間上下樓房，每月租金十元，以一家小書店，出這麼大的房屋租金，也不容易。又添了一個店員，因為那些股東，大家有事，不能常來輪值，我們勵學會的同人，便公舉我做了東來書莊經理，那是盡義務不支薪水的。

我雖然還有教書工作，每天下午放學以後，總要到東來書莊去一次。那時不全是販賣日本圖書文具了，因為中國的風氣漸開，上海也出了許多新書、雜誌，我們每天看上海來的報紙（這時蘇州還不能看上海當天報紙，一直要到蘇滬火車通後），見有什麼新出的書籍、雜誌，連忙寫信去接洽，要求在蘇州推銷，但是所用的那個店員是外行，所以寫信接洽等等，非我親自出馬不可。還有店中的帳目，從前只有一本大型粗紙帳簿，記出每日所售之貨，名曰「流水」，我去了以後，造了幾冊分類的帳簿，但我也只是外行，以意為之而已。

但東來書莊有一件事，使我覺得非常得意，就是我們對於各鄉各鎮的顧客，很有信譽。蘇州有許多鄉鎮，文化的發展，並不輸於城市。尤其蘇州當時是個省城，而交通也甚發達，人文尤為薈萃。即以蘇州府的幾個縣份而言，如常熟、吳江、崑山等縣，都是文風極盛的，他們知道蘇州有個東來書莊

，便都來買書、定雜誌，不必到上海去了。

因爲在太湖流域一帶，到處都是水鄉，各地都有航船，而蘇州也是聚會之地。每日都有航船上人，送上一張單子，開列着一排新書和雜誌的名目來配書，於是有的立刻配給他，沒有的便給去搜羅。上海有幾家出新書的，我們也畧有聯絡了。生意愈推愈廣，不僅是蘇府各縣、各鄉鎮、連常州、無錫、嘉興等處，也都有寫信到蘇州東來書莊來問訊配書了。

我這個小書店經理，雖然是盡義務，不支薪水，然而有一難得的好處，不論什麼新書、新雜誌，我得以先覩爲快，因此有許多顧客上門購書的，問到我時，我可以畧說一點大意。雜誌上我也可以指出那幾篇文章可讀，他們就說我是一個不尋常的書賈了。不僅此也，而且我在東來書莊，認識了許多朋友，如住在常熟的曾孟樸，初見面時，便是吳訥士（湖帆的父親）陪他到東來書莊訪我的。住居吳江同里鎮的金松岑、楊千里，本來也是老主顧，每到蘇州，必來訪我。還有崑山的方惟一（他當時姓張，叫張方中，後來歸宗，叫方還，辛亥以來，一度任北京女子師範校長），那時他在角直鎮沈家教書的，也常來光顧。此外城區裏的許多文人，都是最初在東來書莊買書時認識，後來成爲友好的。

最可笑的是那位周梅泉（他初名美權，後又號今覺，是周馥的孫子，藏郵票甚富，人稱他爲中國郵票大王），他是安徽人而住居在揚州。向我們定了一批日本書，許多都是算學書，一時我們未能配齊，他大發其少爺脾氣，稱我們爲書僮，寫了一封長信罵我們，那時我也不服氣，寫信回罵他，稱他爲紈袴子，發臭脾氣，大打其筆墨官司。辛亥以後，他從揚州遷居到上海來了，我們認識了，時相酬酢，到了老年，還提起那件事，互爲軒渠，正如江湖上有句話：「不打不成相識。」

木刻雜誌

上文說過：我們的勵學會同志有兩個志願，一是由勵學會出一種月刊，一是開一家小書店。現在東來書莊成立，開小書店的志願已遂了，便想到出月刊的事了。但是出月刊第一件就發生麻煩的事，因為蘇州沒有鉛字的印刷所，除非編好了拿到上海去排印，這有多麼不便呀！這時候，杭州倒已經有印刷所了，而蘇州還是沒有，向來蘇杭是看齊的，不免對此抱愧呀。

後來我們異想天開，提倡用木刻的方法，來出版一種雜誌。用最笨拙的木刻方法來出雜誌，只怕是世界各國所未有，而我們這次在蘇州，可稱是破天荒了。可是蘇州的刻字店，却是在國內有名的。有許多所謂綫裝書，都是在蘇州刻的。在前清，每一位蘇籍的名公鉅卿，告老還鄉後，有所著作，總要刻一部文集，或是詩集，遺傳後世，所以那些刻字店的生涯頗為不惡，而且很有幾位名手。

於是我們和蘇州一家最大的刻字店毛上珍接洽了。毛上珍老板覺得這是一筆很大的長生意，也願意接受。我們所出的那種雜誌，名為「勵學譯編」，大半是譯自日本文的。因為同社中有幾位對日文也看得懂，對於國文素有根柢的，尤其容易瞭解。此外還徵求留學日本的朋友，給我們譯幾篇，是一種幫忙性質，我記得楊廷棟（翼之）、楊蔭杭（號補堂，又號老圃，無錫人）都幫過忙，他們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生，那些譯文，都是屬於政治、法律的。至於稿費一層是談不到，大家都是義務性質，而青年時代，發表慾也頗為強盛。

「勵學譯編」是月刊性質，每期約三十頁，在當時的中國，無論是日報，無論時是雜誌，都沒有兩面可印字的紙（日報的兩面印，是上海「中外日報」創始的）。所以我說三十頁，若以今日洋裝書

的說法，那要算六十一「配其」了。那時洋裝書在上海還少得很，何況是蘇州呢。當時，稿子是要一個月前交給他們的，可以讓他們馬上刻起來。好在那些稿子，並沒有什麼時間性，都是討論傳述的文章，每期三十頁，不過兩萬多字而已。

我們和毛上珍訂了一個合同，他們也很努力，刻字和排字一樣的迅速，這三十頁木板書，儘一個月內刻成。書是用綫裝的，紙是用中國出產的毛邊紙印的，字是木刻，可稱純粹是國貨，只是裏面的文字，却是從外國轉譯得來的。刻版是毛上珍經手，印刷當然也是毛上珍包辦了。可是木刻比了鉛印、石印，有一樣便利，便是你要印多少就印多少，反正木版是現成的哪。

這個勵學譯編，也是集資辦的，最初幾期，居然能銷到七八百份，除了蘇州本地以及附近各縣外，也有內地寫信來購取的。我們也寄到上海各雜誌社與他們交換，最奇者是日本有一兩家圖書館向我索取，我們慷慨的送給它了。我想：這是他們出於好奇心吧，想看看中國人出版的木刻雜誌，也算一種軼聞。當時雖然也會轟動吳門文學界，至今思之，實在覺得幼稚而可笑呢。

「勵學譯編」的總發行所，便是東來書莊，出版了這一種雜誌，東來書莊也忙起來了。有批發的，有定全年的，有零購的，還有贈送的。批發是照定價打七折，各縣各鎮，頗多每期五本、十本來批發的。本來定價是每冊二角，全年十二冊的定戶，只收二元，寄費酌加。但有許多外縣鄉鎮，他們都是由航船上來取的。零購都是本城人，隨意購取，看過了送與別人。我們贈送却不少，蘇州的大善士敬送善書，寫明有「隨願樂助，不取分文」八字，我們大有此風。這個木刻雜誌，大概也出了一年吧？銷數也逐漸減縮了，大家興致也闌珊了，就此休刊完事。

但是這個翻譯日文的風氣，已是大開，上海已經有幾家譯書處，有的兼譯日文書，有的專譯日文

書，因為譯日文書報較爲容易，而留日學生導其先河，如洪流的氾濫到中國來了。最普及者莫如日本名詞，自我們初譯日文開始，以迄於今，五十年來，寫一篇文章，那種日本名詞，搖筆即來。而且它的力量，還能改變其固有之名詞。譬如「經濟」兩字，中國亦有此名詞，現在由日文中引來，已作別解；「社會」兩字，中國亦有此名詞，現在這個釋義，也是從日文而來，諸如此類甚多。還有一個笑話，張之洞有個屬員，也是什麼日本留學生，教他擬一個稿，滿紙都日本名詞。張之洞罵他道：「我最討厭那種日本名詞，你們都是胡亂引用。」那個屬員倒是強項令，他說：「回大帥！名詞兩字，也是日本名詞呀。」張之洞竟無詞以答。

這個木刻雜誌，不僅是「勵學譯編」呢，過了一二年，我又辦起了「蘇州白話報」來了。這個動機，乃由於杭州有人出一種「杭州白話報」而觸發的。蘇杭一向是並稱的，俗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是應與杭州看齊的。其時創辦杭州白話報者，有陳叔通、林琴南等諸君。寫至此，我有一插話：後來林在北大，爲了他的反對白話文而與人爭論，實在成爲意氣之爭，有人詬他頑固派，這位老先生大爲憤激，遂起而反唇也。至於反對白話文，章太炎比他，却還激烈。再說：提倡白話文，在清季光緒年間，頗已盛行，比了胡適之等那時還早數十年呢。

這個蘇州白話報，並不是蘇州的土話，只是一種普通話而已。其實卽就古代而言，如許多小說、語錄，也都是用語體文的，民間歌謠等，更是通俗。當時我們蘇州，有一位陳頌文先生，他在清末時代的學部（革命以後，改爲教育部），就是極力提倡白話文的，可是當時的朝野，誰也不關心這些事。那時已在戊戌政變以後吧，新機阻遏，有許多雜誌，由政府禁止，不許再出了，勵學譯編本是蝕本生涯，蝕光大吉，再辦「蘇州白話報」，大家也沒有這個興致了。

但我却躍躍欲試，還想過一過這個白話報之癮。只是還不能與杭州白話報比，因為杭州已有印刷所，而蘇州實到如今還沒有呢。偶與毛上珍刻字店老板談一談，他極力贊成，自然，他爲了生意之道，怎麼不贊成呢？我又與我的表兄尤子青哥一說，他滿口答應說：「你去辦好了，資金無多，我可幫助你。」而且他還答應，幫助我編輯上的事。我有了他這個後台老板，便放大胆與毛上珍老板訂約了。

蘇州白話報是旬刊性質，每十天出一冊，每冊只有八頁。內容是首先一篇短短的白話論說，由子青哥與我輪流擔任；此外是世界新聞、中國新聞、本地新聞都演成白話。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關於社會的事，特別注重，如戒烟、放脚、破除迷信、講求衛生等等，有時還編一點有趣而使人猛省的故事，或編幾只山歌，令婦女孩童們都喜歡看。

我們這個白話報，要做到深入淺出，簡要明白，我和子青哥是一樣的意思。我們不願意銷到大都市裏去，我們向鄉村城鎮間進攻。曾派人到鄉村間去貼了招紙。第一期出版，居然也銷到七、八百份，都是各鄉鎮的小航船上帶去的，定價每冊制錢二十文（其時每一銀圓兌制錢一千文），批銷打七折，有許多市鎮的小雜貨店裏，也可以寄售，爲了成績很好，我們更高興起來了。

子青哥創議：「我們辦這個白話報，本來不想賺錢，我們只是想開開風氣而已。我們可以像人家送善書一般，送給人家看，也所費無多呀。」蘇州有些大戶人家，常常送善書給人家的，或爲道德家的格言，或以神道說教，他們算是「做好事」。有些耶穌教堂在蘇傳教，也是如此的。而且他們印書的成本，比我們的白話報也貴得多呢。但我則期期以爲不可，我說：「送給人家看，人家也像善書一般，擱在那裏不看。出錢買來看，他們到底是存心要看看的呀。況且我們的資本有限，藉此周轉，也

不夠一送呢。」子青哥被我說服了，我還自詡子青哥學問比我高，經驗却不及我呢。

但是我可忙透了，編輯也是我，校對也是我，發行也是我，子青哥是難得出門的，稍遠就得坐轎子，偶然步行到觀前街，一個月也難得一二次，他也幫不了我什麼忙。不過這種木刻雜誌，只能暫濟一時，豈能行諸久遠。文化工具，日漸進化，蘇州的所以沒有新式印刷所者，却是爲的離上海太近，人家印書印報，都到上海去了，因此也無人來開印刷所。我們也不能儘量開倒車，最慘者，不及三年，所有「勵學譯編」和「蘇州白話報」的木版，堆滿了東來書莊樓上一個房間了。及至東來書莊關店，這些木版又無送處，有人說：「劈了當柴燒。」有人還覺得可惜，結果，暫時寄存在毛上珍那裏，後來不知所終。

譯小說的開始

外國小說的輸入中國，以我所見，則在前清同治年間，其時上海的申報上，時常見一二有譯載似小說的紀事。如「巴沙官故事」等，乃紀載一艘帆船失事，有一船員匿在酒桶中，飄流海面，卒乃遇救事。其它亦常有數短篇，不復能記憶了。我幼時，在朱靜瀾先生家中，曾見有最初出版之申報，訂

成兩冊，中乃有此。後來梁啓超的時務報，遂有「福爾摩斯偵探案」的附載，這可以算得中國翻譯外國偵探小說的鼻祖了。

自從林琴南的「茶花女遺事」問世以後，輿動一時。有人謂外國人亦有用情之專如此的嗎？以爲外國人都是薄情的，於是乃有人稱之爲「外國紅樓夢」。也有人評之爲茶花女只不過一妓女耳，也值得如此用情，究竟小說家言，不登大雅之堂。說雖如此說，但以琴南翁文筆之佳，仍傳誦於士林中。這個時候，號稱所謂新學界的人，都提倡新小說。梁啓超發行的一種小說雜誌，名字就叫「新小說」。那個雜誌，不但有許多創作小說、翻譯小說，而且還有許多關於小說的理論。梁啓超自己就寫了一個長篇的理想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這時把文學上的小說地位便突然地提高了。

我的寫小說，可稱爲偶然的事。其時我的一位譜兄弟楊紫麟，他在上海虹口中西書院讀書，爲的要學習英文。我到上海去，常常去訪他。因爲他住在乍浦路，那邊有一個中國公家花園（簡稱中國公園），我們常常到那裏去坐地。說起這個公園，很令人生氣。原來上海租界中，當時有好幾個公園，都不許中國人入內遊玩。黃浦灘一個公園，門前掛出一個牌子來，寫着：「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個牌子，不是直到如今，還傳爲侮辱我華人一個史實嗎？當時我們住居租界中人吵起來了，爲什麼華人不得入公園呢？造公園的錢，也是華人納稅所出的。工部局不得已，便在沿蘇州河一帶、圓明園路口，另造了一個較小的公園，專供華人遊玩。可憐的住居租界的華人，算得了一些小面子，就此不響了。

紫麟爲了讀英文以供研究起見，常常到北京路那些舊書店，買那些舊的外文書看。因爲那時候，上海可以購買外國書的地方很少，僅有浦灘的別發洋行一家，書既不多，價又很貴。他在舊貨店買到

一冊外國小說，讀了很有興味，他說：「這有點像『茶花女遺事』，不過茶花女是法國小說，這是英國小說，並且只有下半部，要搜集上半部，却無處搜集，也會到別發洋行去問過。」

在這個中國公園中（因為這個公園，專為中國人造的，習慣稱為中國公園），紫麟常帶着這本殘舊的英文小說，隨讀隨講給我聽。我說：「你不如把它譯出來呢。雖然缺少上半部，有這下半部，也思過半矣。」他說：「我的國文不行，除非我們兩人合譯，我把英文翻出來，你把中文記下去，如何？」我說：「那倒可以，我們且來試試看。」於是兩人就在公園中，一枝鉛筆，一張紙，他講我寫，我們當時便譯了一千多字。兩人覺得很有興趣，因此約定了明天再來。

明天是星期六，下午，我們再到公園裏，就譯有二千字光景。再下一天星期日，又在公園譯有二千多字，這三天工夫，便有五千多字了。雖然這不過是極草率的稿子，還須加以修飾，但是我們覺得很滿意。可是我不能常往上海，至多來四五天便即回蘇州了，但我們却立意要把這小說譯完。後來紫麟說：「你先回去，以後我隨便寫出來，寄給你，不管通不通，請你從新做過就是了。」

因此他在課餘時間，常把他譯出來的寄給我，我便加以潤飾。回到蘇州後，給勵學社同人看過，他們都很稱讚，而「勵學譯編」正籌辦出版，他們便要求加入勵學譯編去了。這一篇小說即取名為「迦因小傳」，這是我從事於小說的第一部書。因為那時候，譯外國小說的人很少，倒也頗為人所愛讀。後來林琴南覓得了這書的全部，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取名為「迦茵小傳」，只於我們所譯的書名上的「迦因」二字，改為「迦茵」，並特地寫信給我們致意，好像是來打一招呼，為的是我們的迦因小傳，已在上海文明書局，出了單行本了。當時我們還不知原書著者是誰，承林先生告知：原著者為英人哈葛得，曾印有全集行世。

除了「迦因小傳」外，我又從日本文中，譯了兩部小說。這兩部小說，一名「三千里尋親記」一名「鐵世界」。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後，文化發達，出版的書籍中，對於歐美的文學書，譯得不少。他們國內的新舊書店很多，讀書的人，把已讀過的一部八分新的書，看過以後，往往即送到舊書店。爲的他們的讀書界，抱推陳出新主義，賣去了舊書，立刻便掉換讀新的了。一到舊書店，價錢便減了不少，而又可以嘉惠後學。我所譯的兩部日文書，都是我的留學日本的朋友，從舊書攤拾來，他們回國時送我的。

我知道日本當時翻譯西文書籍，差不多以漢文爲主的，以之再譯中文，較爲容易。我就託了他們，搜求舊小說，但有兩個條件：一是要譯自歐美的；一是要書中漢文多而和文少的。我譯的兩種日文小說，就是合乎這兩個條件的。那一種「三千里尋親記」，是教育兒童的倫理小說，總共不過一萬字左右，譯自意大利文的，在原文還有插圖，以引動兒童興趣，就是一個兒童，冒着艱危，在三千里外去尋他母親的。另一種「鐵世界」，可以說是科學小說，是法國文的，那大概有三、四萬字。雖說是科學小說，也淺顯而不大深奧的，那時法德世仇，便是寫小說也互相謾詆，那裏面德國人如何酷烈，法國人如何和平，德人欲害法人，而法人如何逃避的情形，都寫在書中。

這兩部小說，後來我都售給於上海文明書局，由他們出版。因我自己無力出版，而收取版稅之法，那時也不通行。文明書局是一班無錫人所開設的，如廉南湖、丁福保等都有份，而裏面職員的俞仲還（前清舉人）、丁芸軒等，我都是認識的。大概這兩部小說的版權是一百元（當時雖也按字數計，約畧估量，不似後來的頂真），我也隨便他們打發，因想這不過一時高興，譯着玩的，誰知竟可以換錢。而且我還有一種發表慾，任何青年文人都是有的，即使不給我稿費，但能出版，我也就高興呀！

後來迦因小傳的單行本，也由文明書局出版，所得版權費，我與楊紫麟分潤之。從此以後，我便提起了譯小說的興趣來，而且這是自由而不受束縛的工作，我於是把考書院博取膏火的觀念，改爲投稿譯書的觀念了。譬如說：文明書局所得的一百餘元，我當時的生活程度，除了到上海的旅費以外，我可以供幾個月家用，我又何樂而不爲呢？

但是我的英文程度是不能譯書的，我的日文程度還可以勉強，可是那種和文及土語太多的，我也不能了解。所以不喜歡日本人自著的小說，而專選取他們譯自西洋的書。他們有一位老作家森田思軒，漢文極好，譯筆通暢，我最愛讀他的書，都是從法文中譯出來的。還有一位黑岩淚香，所譯的西文小說也不少。可是很少由美國出版的書，實在美國那時沒有什麼文學家，寒愴得很，日本文人，也不向那裏去搜求了。

到了民國初年，上海的虹口，已經開了不少日本書店，我每次到虹口去，總要光顧那些日本書店，選取他們翻譯西文的小說。不過那時候，日本的翻譯小說，不像以前的容易翻譯，因爲他們的漢文都差了。最可厭的，有一種翻譯小說，他把裏面的人名、地名、制度、風俗等等，都改了日本式的，當然，連他們的對話、道白，也成爲日本風了。所以往往購買五六本的日文翻譯小說，也只有二三種可以重譯，甚至全盤不可着筆的。

至於像上文所說森田思軒、黑岩淚香所譯的書，早已絕版多年，於是託留學日本的朋友，到舊書店裏去搜求，倒還可以搜求到不少。他們有時並且給我向圖書館去搜求，那些絕版的書，圖書館裏倒還存留着，覓到以後，他們就做了一個「久假而不歸」。我說：「這怎麼可以呢？」他們說：「無大關係，至多罰去保證金而已，況且這種破爛的舊書，他們已視同廢紙了。」

所以我之對於小說，說不上什麼文才，也不成其爲作家，因爲那時候，寫小說的人還少，而時代需求則甚殷。到了上海以後，應各方的要求，最初只是翻譯，後來也有創作了。創作先之以短篇，後來便也學寫長篇。但那時候的風氣，白話小說，不甚爲讀者所歡迎，還是以文言爲貴，這不免受了林譯小說薰染。我起初原不過見獵心喜，便率爾操觚，誰知後來竟成了一種副業，以之補助生活，比了在人家做一教書先生，自由而寫意得多了。

蘇滬往來

自從東來書莊開設，他們舉我爲經理以後，我常常到上海去，因爲許多日本的圖書，不必從蘇州向日本郵寄，上海虹口，已有日本書店，我們可以自去選擇。我認識了兩家，要什麼圖書，可以託他們到東京去定，郵寄也很方便。還有日本出品的文具、紙品，虹口也有批發出售。再有的，上海近來新出的書籍雜誌也不少，出版、發行的地方，各各不同，他們也有的委託東來書莊爲蘇州代銷處，大概以七折或八折歸帳，都是賣出還錢，不須墊本的，那種生意，大可做得，所以也須到上海招攬與接洽。

那時蘇州與上海，火車還未通，但小輪已經有了。小輪船蘇滬往來，也不過十五六個小時，每天下午三四點鐘開船，到明天早晨七八點鐘，便可到了。小輪後面有拖船，小輪不載客，後面的拖船載客，有散艙，有烟篷，還有叫做「大菜間」的，房艙比散艙寬舒，一個房艙，可睡四人，所謂大菜間者，並無大菜可吃，只不過比較更寬敞一點而已。烟篷只是在拖船的頂上，頭也抬不起來的，得一席之地。當然，價錢也分等級，你要舒服，便不能不多出一些錢。不過在船上只有一夜天，吃完夜飯，即行睡覺，一到天明，便到碼頭，比了從前蘇滬往來，坐船要三天兩夜，那就便利得多了。

可是從前旅行，比了現在，還是麻煩得多。第一、就是行李的累贅，像我們出門旅行，至少要有四件行李：一是舖蓋；二是皮箱；三是網籃；四是便桶。現代的青年人，恐怕都不知道了，不嫌詞費我且瑣述如下：

先說舖蓋：舖蓋就是臥具，從前的所謂客棧、旅館，都是不備臥具的，客人要自帶舖蓋。不要說住客店了，在一家商店做店員，也要自帶舖蓋，所以停歇生意，名之曰「捲舖蓋」，南方人稱之曰「炒魷魚」，即由此而來。此風由來已古，文詞中所云「襪被而行」亦即此意。這個舖蓋可大可小，要是在嚴冬，或是年老怕冷的人，還非有重衾厚褥不可呢。

次言皮箱：皮箱即衣箱，以前沒有人穿西服，這長袍馬褂，皮的棉的，就是一大箱。你如果不帶了，天氣忽寒忽暖，怎麼辦呢？而且這衣箱，都是笨重非凡，不似近來的新式的皮箱，可以舉重若輕的。直到如今，凡是旅行者，無論到什麼文明的地方，一隻旅行的皮箱，總不可少的呀。

再講網籃：這是一種竹製的籃，籃面上張了一個網，旅行家稱之為「百寶箱」。所有面盆、手巾、雨鞋、紙傘，一切雜用之物，都安置其中。有些先生們，凡家常用慣的東西，一切都要帶了走，茶

壺、飯碗，亦在其列。至於讀書人，則書籍、文具，也是不可須臾離的。到上海來，總要買些東西，沒有網籃，就不可能安放。

最後談到那個便桶了，便桶就是馬桶。莊子所云：「道在屎溺」，蘇州人不能似北方人那樣上廁所、登野坑，而必須要一個馬桶。但旅館裏不備此物，務須貴客自理（那時抽水馬桶，尚未出世），於是行李中不能不有此一物了。不但有馬桶，有些常常出門旅行的老先生，還要帶夜壺箱。蘇州出品的夜壺箱，做得很爲考究，方方的像一只小書箱，中置青花瓷的夜壺，上有一抽斗，可放筆墨信箋之類。箱門上還刻了字，有一位老先生的夜壺箱上，刻了一句古人詩曰：「詩清都爲飲茶多。」我問：「何解？」老先生笑道：「詩字不與『尿』字同音嗎？」

這四件行李，剛成一担。蘇州那時沒有人力車，只有雇一個脚夫挑出去。那時蘇州的小火輪，還是日本人創辦的，喚作「大東公司」，輪船碼頭，在盤門外的青陽地日本租界，從城裏出去多麼遠啊。後來中國人自己也辦了一家小輪公司了，喚作「戴生昌」，旋在閶門外分設了一個碼頭，那就便利得多了。至於上海的小輪碼頭，全在蘇州河一帶，這些小輪船，都開往蘇州、杭州各處。

到了上海，便住旅館，那時還沒有旅館的名稱，只喚做客棧。船抵碼頭，便有客棧裏派出招攬的人，此種人名曰「接客」。對於接客，有一種好處，便是可以把行李交給他，自己雇了人力車，到住所旅館裏去，不然，你與這些碼頭小工，搞不清楚，正添不少麻煩呢。我到上海，常常住在寶善街（即五馬路）一家客棧，叫做鼎陞棧，這家客棧，也未必有什麼特別，只不過比較熟一點，茶房與接客熟了，那就方便得多了。

那時的上海，還沒有新式旅館，普通的客棧，每天每人只要二百八十文，食宿在內（二百八十文

：等於銀圓二角八分）。不過那是以榻位計的，大的房間有四五榻，最少的房間亦有二榻，儘管不認識的人，可以住在一房。否則你除非包房間，以榻位計值也是可以的。每日晝夜兩餐，也是照榻位開的，房間若干人，取共食制度，不能分餐。另有一種客寓，專招待官員來住居的，氣魄大一點，價錢不免也貴一點。

上海有一種家庭旅館，那是最舒服的最安適的了。我本來也不認識這家旅館，那一天，我要到上海去，有一位祝心淵先生也要到上海去（祝亦曾隨着江建霞到湖南做學幕看文章，現在蘇州開一個私家小學校，是最早的，有名的「唐家巷小學」）。旅行有伴，那是最好的事了。在船中對榻而眠，他家中有不少書，尤其有許多明末清初的禁書，收藏不少，現在漸漸出籠了，此番到上海，大概與書買有所接洽。

我問他到了上海，住在那一家旅館裏？他說：「住在雅仙居」。我覺得雅仙居這個名字很別緻，上海客寓，總是什麼平安、高陞等名字，因問：「雅仙居是何型式，有何特別之處？」他笑道：「一個小客寓耳，不過是蘇州人開的，於我們蘇州人很相宜，店主還是一個女老板，我到上海，住在那裏，貪其可以吃蘇州菜，價錢也和別的旅館一樣，不過小賬我們多給一些。你倘然沒有一定的旅館，也住到雅仙居來，我們可以談談。」我聞言欣然，因為心淵先生比我年長一倍，也是個才識開明之士，可以隨時請教。並且雅仙居是蘇州人開的，也可以一嘗家鄉風味。

原來這個雅仙居的女主人，是一位年近四十的蘇州女人，她嫁了一位湖州絲商（從前經營生絲出口的，很多湖州人）。他們本來住居在上海的（有人說是黑市太太，那也不去管它了），後來那位絲商故世了，遺下了她，還有一個女兒，這女兒名字喚作「金鈴」，現在也十八九歲了，生得很為美麗

，也在私塾裏讀過幾年書。絲商故世後，無以為生，母女二人，便開設了這家雅仙居。

雅仙居開在近福州路的市區，是上海所謂弄堂房子、石庫門三樓三底，他們把這房子隔成不少間數，便做成一家客寓。這是一家小客寓，但特別是家庭式的，不用什麼男茶房，男的只有一個打雜的，女傭人倒有兩人。關於客人的飯食，女主人親自下廚房；女兒畧知文墨，便做了簡單的賬房。最使人賞識的，就是開飯開在客堂裏，店主東的母女和客人共同進食，而蘇州菜的合乎旅客口味，尤其是女主人的拿手。

住在雅仙居的都是熟客，陌生的難於問津。它那裏有兩幫客人，一幫就是做絲生意的，也許是與女店主已逝世的丈夫是同業，他們住很久，常是包月的。一幫便是蘇州客人，也是老客人，深知底細，愛吃蘇州菜的。那不過到上海來有點業務上的關係，或者遊玩一次，至多不過一星期，那是短期的客人。

生長在上海的女孩兒，當然比在內地的要活潑伶俐一點，何況她是一位俏麗的女郎。吃了蘇州菜，還想一餐秀色，但她的母親管束甚嚴。我友吳和士，從日本留學回來，和我同住在雅仙居，他是一位翩翩佳公子，對於金鈴頗為傾慕，捉空兒便與金鈴作絮語。可是其母從不許金鈴踏進客人的房間。和士乃與金鈴隔着窗子談話，一在窗外，一在窗內，但一聞母喚，如驚鴻之一瞥去矣。我調以詩曰：「茜窗玉立自亭亭，絮果蘭因話不停。安得護花年少客，敢將十萬繫金鈴。」和士歎曰：「在日本，房東家女兒，雖共相調笑，了不足怪，中國婦女，總是那樣閉關自守呀。」

但我難得住雅仙居，因為它碼頭上沒有接客，許多不便，除非在蘇州有伴，同來上海，他們是住慣雅仙居的。我最初來上海，好像是爲了到南洋公學（到現今交通大學的前身）來考師範生的，雖然

在七八歲的時候，爲了父親的病，來過上海一次，以後一直沒有來過，隔離了十餘年，當然大不相同了。這個時期很早，似還在戊戌政變之前，中國正提倡興學。興學應當是小學、中學、大學，層層向上，但中國興學，却自上而下，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爲開學校必先有師資，而中國師資沒有，教那班從事八股八韻先生們去當教師是不行的，只有這一班高材生，到國外去學習師範，然後可以回來當教師呢。

我到南洋公學去考師範，是和馬仰禹一同去的，那時主持南洋公學的是胡二梅，也是一位兩榜先生。他出了一個題目，總之是經史上的，很古奧的，現在我已完全不記得了，我胡亂做了一篇，自己也不滿意，明知是不能取中的。及至揭曉，我與馬仰禹俱名落孫山。因爲這個師範生，考取以後，但不要學費，而且還有津貼，並且有資送出洋希望，因此大家趨之若鶩。但在未考之前，便有一種謠言，說所取的名額少，而報考的人數多，非有關節囑託不可，這也是一個無從證實的謠言。這次錄取的記得有劉厚生（垣）諸君，後在上海，亦爲老友。

我最初到上海去，住旅館是「滿天飛」，總想找一家潔淨些，安靜些的，可是住來住去，都是一樣。而且我又不慣與那些陌生人同房，倘然自己包一個房間，又未免費用太大。那時我在上海朋友很少，只有楊紫麟，我到上海，必定去訪他，他還在中西書院讀書，難得同他吃一次番菜。這時上海戲館已經很多（都是老式的），我一個人也沒有這個興致去看戲。至於什麼女書場、夜茶館，更不敢踏進去了。那個時候，蘇州人家，不讓青年子弟到上海去的，他們說、上海不是一個地方，好似一只黑色大染缸，墮落進去便洗不清了。

烟篷的故事

公元一九〇〇年（光緒廿六年）歲次庚子，那一次我也到了上海。前章所述，我到上海，不是常住在寶善街鼎陞棧嗎？到了那裏，恰巧樓上有個小亭子間，是佔兩榻地位的，我便把它包了。所謂包者，就是一個人出兩個人的錢，本來每客二百八十文一天的，現在出到五百六十文一天。如此則不容有個陌生人來同居，而飯菜也可以豐富些。有一盞電燈，夜裏不出門，也可以看書寫字，沒有人來打擾，好在住居的時候不多，所費也還有限。

本來預備住四五天，至多一星期，因為那時候，北方正在鬧義和團，風聲鶴唳，時常有種種謠言。正想把所辦的事，料理清楚了，即行回去，有一位老友龐棟材（別號病紅，常熟人）來訪我，他辦一個詩鐘社，出了題目，教人做兩句對聯，然後評定甲乙，予以贈獎，這也是文人無聊之事，而當時洋場才子所樂為。可是其中有廣告性質的，有似後來的填字遊戲一般。龐棟材所辦的詩鐘社，便是那種性質，而詩鐘的評定與發表，每日却附錄於「蘇報」的後尾，當時的報紙，亦沒有副刊之類。

龐君的意思，要我為他代理一星期，因為他急欲回常熟一次，當然不是白當差，也自有報酬的。我那時也喜歡弄筆，什麼做詩鐘、撰對聯。很有興趣，正是投我所好。尤其每天必要到蘇報館一次，我還不知道報館是如何排場，說如何權威，正要瞻仰，趁此我且把蘇報館說一說。

「蘇報館」最初是由胡鐵梅創辦的，其時為一八九六年（清光緒廿二年），用他的日本籍老婆駒悅名義，向上海的日本領事館登記（上海那時的報館，掛外商牌子的很多，以此為護符也）。但這個報館不發達，便移轉給陳夢坡（號蛻庵）接辦。陳夢坡是湖南人，曾做過知縣的，因案呈誤革職，便

撈眷住到上海來，大概宦囊有幾個錢，便出資盤受了這家蘇報。

那時的蘇報是怎樣的呢？說來真是寒儉得很，開設在英租界棋盤街一家樓下，統共只有一大間，用玻璃窗分隔成前後兩間。前半間有兩張大寫字枱，陳夢坡與他的公子對面而坐，他自己寫寫論說，他的公子則發新聞，有時他的女公子也來報館，在這寫字枱打橫而坐。她是一位女詩家，在報上編些詩詞小品之類，所以他們是合家歡，不另請什麼編輯記者的，

再說那後半間呢，一邊是排字房，排列幾架烏黑的字架；一邊是一部手搖的平板印報機（什麼捲筒輪轉機，上海最大的申、新兩報也沒有呢）。這排字房與機器房，同在一房，真有點擠了。前半間沿街是兩扇玻璃門，玻璃門每扇上有蘇報館三個紅字。推門進去，有一小櫃，櫃上有一塊小牌，寫着「廣告處」，這位專管廣告的先生，和氣極了，見了人總是含笑拱手，惜我已忘其名，後數年蘇報案發，這位先生也陪着吃官司呢。

我每晚到蘇報館一次，便在這個廣告櫃上一具紙製的信箱內，收取詩鐘投稿。對於陳夢坡，我見他老氣橫秋的那裏，不敢與他招呼。那個地方，也沒有一隻可以安坐寫字的桌子，只得回到棧房裏去了。可是這個鼎陞棧的小亭子間，白天倒還清靜，一到夜裏，便喧鬧起來。原來推出窗去，有一個小月台，月台對面，正是一家妓院（上海稱爲長三堂子），因爲樓下恰是一條堂子弄堂，每到了上燈時候，酒綠燈紅，哀絲豪竹，全是他們的世界。

那條弄堂很狹，我房間外面的月台，和對面那家妓院裏的月台，不但可以互相講話，伸出手去，竟可以授受東西。我爲了避囂，時常把窗門關了，但是房間既小，開了窗很悶，開了窗的時候，對面房間裏的人，時來窺探，年輕的少女，從十四五歲到十七八歲有三四人之多。我這時雖然已經二十歲

出頭的人了，還是非常面嫩，見了年輕的女人，便要臉紅。她們見我如此，便故作擲揄，尤其那班十四五歲的女孩子，吵得厲害，有時呼我「書獃頭」（吳語，即書獃子之意）有時裝出我近視眼看書的狀態，這種頑皮的女孩子怎麼辦呢？我只好不去理睬她們。

有一天，龐棟材到鼎陞棧來訪我，他走到我窗外的月台上，向對面一望，他說：「噯呀！這是金湘娥的房間，我曾經到那裏吃過花酒的呀。」他又指着對面一位年紀較長，約有十八九歲，斜倚在月台欄干上的說道：「這個喚作阿金的，也算上海北里中的名葉（當時上海妓院中，稱姑娘們爲花，稱侍女們爲葉），你住在這裏，真可以稱得『流鶯比鄰』了，我來給你們介紹一下。」那時我想阻止他，却已經來不及了。

「阿金姐！」龐棟材踏出月台，便喚着她。又給我介紹道：「這位你們朝夕相見的二少，也是蘇州人，是你們的同鄉呀。」又向我道：「這位是鼎鼎大名的金湘娥家的阿金姐。」那個阿金也打着蘇白道：「龐大少，僚同子二少，一淘過來白相噯！」我怪棟材，鬧什麼玩意兒，又是硬派我做二少。棟材道：「不是你有一位令姊嗎，你在上海，不要做一個迂夫子呀。」原來龐棟材算是一個「老上海」了，他和小報館裏的李伯元等，長在一起，於花叢中人，頗多馴熟，所以認識了她們。李伯元便是別號南亭亭長，寫「官場現形記」的這個人。

從此以後，那班女孩子們，不再對我擲揄了。有時在對面月台上見到阿金，也對我點點頭，報以微笑，我覺得阿金很美而且很大方，但我那時從未涉足青樓，也覺得十分矜持。這時候，正是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城的當兒，而上海酣嬉如舊，爲了有三督聯保東南之約（三督者，粵督李鴻章，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也），不過北方鬧得厲害，難免不擾及南方。有一天，不知從那裏來了一個謠言，說

是洋兵要佔領上海，軍艦已開進吳淞口了。中國人那時是最容易相信謠言的，這個謠言不翼而飛，便到處宣傳，人心紛亂了。

不但是上海，這個謠言便立刻飛到蘇州，還加添了許多枝葉，說上海如何如何。我祖母因我在上海，老不放心，竟打了一個電報來，教我即日回蘇。那時候，蘇滬間還沒有鐵路，只有小輪船可通。我接到了電報，立刻到蘇州河一帶內河輪船碼頭去一問，各小輪船公司的船票，盡已賣光了。那種往來於蘇滬之間的小輪船，本來拖了好幾條船的，這次拖得更多，竟拖了六七條之多。

每一條拖船上，都是擁擠非凡，而且船價沒有一定，隨便討價。多帶行李，還要加價，一只箱子，就要加兩塊錢，以前是沒有這個規矩的。我想：今天不走了吧？但祖母急想我回去，母親亦在懸盼，說不定明天還要擁擠，還要漲價。有一家戴生昌小輪公司，我有一個熟人，和他情商，他說：「除非在烟篷上，或者可以想法，但是你先生怎可以趁烟篷呢？」我說：「不管了！只要能搭上去，就可以了。」

一張烟篷票，賣了我四塊錢，在平時只要兩角五分，那也不去管它了。不過他還關照我，買了票就到船上去，烟篷上也是擠得很的。我回到客棧裏，拿了舖蓋便到船上去，果然，烟篷上已經擠滿了不少人了。所謂烟篷者，在拖船頂上布篷之下，身體也不能站直，只好蛇行而入，向來所謂上等人，從沒有趁烟篷的。

我鑽進了烟篷後，便打開了舖蓋，因為打開舖蓋，就可以佔據了一個地盤。當我正在滿頭大汗攤開舖蓋的當兒，忽聽人堆裏有人喚道：「二少！你怎麼也來了呀？」我回頭看時，却正是我廝樓對面金湘娥家的阿金。我那時也顧不得羞慚了，便道：「買不到票子，沒有辦法，只好趁烟篷了」。她笑

道：「人家說：『大少爺拉東洋車』（按，此爲上海一句俗語，指少年落魄之意），現在時世，大少爺趁起烟篷來了。」她便爬過來，幫我攤被頭。又低低的說道：「和你掉一個位置好嗎？」原來她的貼鄰，是一個不三不四，像馬車夫一樣的人，她有些怕他。我明白她的意思，便給她掉下一個擋，做了他們之間一個緩衝。

船一開行，就吃夜飯了。飯是船上供給的，但只有白飯，沒有菜肴，僅有一碗公共的鹹菜湯。我臨行匆促，沒有買得路菜，誰知阿金倒帶得不少，她說都是小姊妹送的，醬鴨、燻魚，硬把頂好的塞在我飯碗裏，說道：「吃噓！吃噓！吃噓！吃完數算！」我很覺難爲情，但又不能不吃。吃完夜飯，船就漸漸開得快了，天也漸漸黑了，烟篷上只掛着一盞矇矓峇有微光的煤油燈，漸漸的鼾聲四起了。我是睡不着，但睡在我隔鄰的阿金，微闔雙目，我不知道她是睡着了沒有。

到了十二點鐘以後，我還是睡不着，而且還有些刺促不寧，原來我的小便急了。和阿金調換位置以後，我睡在裏擋，而阿金睡在外擋，如果我要到船邊，拉開布篷去小解，必然要爬過阿金身上，我只得且忍耐住了。但越是忍耐，越是忍耐不住，更是睡不着，已經忍耐過一個鐘頭多了。阿金也已有所覺察，張開眼睛來，微笑道：「二少！阿是睡不着？」我沒有法子，只得告訴她要小解，她道：「怎麼不早說呢？好！我讓你爬過去。」

於是她就蜷縮了身體，讓我從她的被頭面上爬過去，可是一揭開布篷，外面的一陣寒風吹進來，令人發抖。原來那時候，已是舊曆九月的天氣了，我連忙退縮進來。這時江深月黑，船因開得快，重載以後，顛蕩傾側，站在船舷上，又無欄干，危險殊甚。阿金見我縮進來了，便問：「怎麼樣？」我說：「站立不住，危險得很。」她說：「那末不小便，這是要熬出『尿梗病』來的呀！」

那時她便想出一個辦法來，解下了她的一條白湖縐紗的褲帶來，把我攔腰一縛，教我站在船舷上去，她在後面緊緊拉住。果然，這方法很靈，而我也胆大了不少。小解過後，我也就此舒服了，得以安眠。她嘲笑我說：「吃這樣的苦頭，真正作孽。」她這時又問：「討了少奶奶沒有？」我搖搖頭，表示沒有。她笑說：「快點討少奶奶吧！可以服侍你。」她又問我道：「爲什麼急急要回去，眞怕洋鬼子打到上海來嗎？」我告訴她：「祖老太太打電報來，一定要教我回去。」我回問她道：「你呢？你爲什麼急急要回去呢？」她說：「鄉下有信來，要教我回去。」我問：「爲什麼要回去呢？」她有點含糊其詞了。

天微明的時候，大家都起身了，因爲那船很快，七點鐘就可以到蘇州。起來時，一陣忙亂，大家都是打鋪蓋，把臥具捲去。這時，她幫我打鋪蓋，我亦帮她打鋪蓋，但我於此道是外行，有點尖手尖脚，一樣的帮忙，還是她帮我的忙帮得多。雖然我當時已經二十以外的人了，她還不過十八九歲，身軀比我小，氣力好像比我大。她這時便對鏡梳掠，我坐在她傍邊，她問我：「還要到上海吧？」我說：「是的。」「還住那客棧嗎？」我說：「是的。」我回問道：「你也仍在金湘娥那裏嗎？」她笑了一笑，也說：「是的。」

回家去了兩個月，時局平靜，北方雖是聯軍進城，兩宮出走，而上海酣嬉如舊。不知如何，我雖與那個青樓侍兒，僅有同舟一夕之緣，却是不能去懷，我覺她是一個又溫柔，又豪爽的女孩子。我這次到上海，竟然坐大菜間了，價值僅及上次烟篷的四分之一，船過金鷄湖，口占一絕曰：「短篷俯瞰碧波春，一夢溫馨豈是真？兩岸青山看不盡，眉痕一路想斯人。」癡態可掬如此。

到了上海，當然仍住在鼎陞棧，幸喜這個小亭子間仍空着。第一、要看看對面金湘娥家的阿金來

了沒有？可是推窗走到月台上一望，不免大失所望。原來金湘娥已經調到別處去，而換了一家陌生人家。問旅館裏的茶房，他們也不知道。當夜我到一家春番菜館進西餐，我知道番菜館的侍者（上海呼爲西崽），他們都熟悉各妓院的近狀，向他們查詢。他們說：「現有兩個名金湘娥的，不知先生要那一位？」我對此茫然，不得已，把三個金湘娥都叫了來，沒有一個家裏有阿金的。有位小姑娘說道：「上海堂子裏名叫阿金姐的，少說也有十幾位，你真是沙裏淘『金』了。」這有什麼辦法呢？悵然而已。

過了兩天，我又遇到龐棟材了，告訴他與阿金同船回蘇州的事，並且託他訪問阿金。他道：「嗚呼！我在中秋節前，好像聽得說阿金過了節，就要回到鄉下去嫁人了。因爲她從小就配了親，男家已經催過好幾次了。阿金雖在堂子裏，人極規矩，有許多客人要轉她的念頭，却轉不到，嫁了人，也不會再出來了。」說到那裏，他又笑道：「老兄還自命爲道學派，只同船了一次，已經把你風魔了，無怪崔護當年，有人面桃花之感了。」

我爲什麼瑣瑣寫此一節，這是我未成熟的初戀，也是可嗤笑的單戀，此種事往往到老未能忘懷的。後來我曾經寫過一個短篇，題名爲「烟篷」，在小說月報上刊出的，便是這個故事。

名與號

中國所謂上中階級的人，一向都是有名有號的，除了名號之外，還有許多別號以及小名等等，如果一個文人，更有許多的筆名。我的最初的名字，喚作清柱，這個名字，是姻伯姚鳳生先生給題的。原來我父親的名字是應壘，號韻竹；我祖父的名字是瑞瑛，號朗甫；而我曾祖的這一輩，是「大」字輩。大概是我父親請鳳生先生爲我題名時，說出了輩行，鳳生先生便擬定了二十個字，成了四句五言詩道：「大瑞應清時，嵩生獄有期，……」當我小時候，還能很清楚的背出這四句詩，現在却只記得上面十個字了。

爲了這個排行，在我一代，應得是用「清」字輩份了。至於那個「柱」字，大概我的八字裏缺木的緣故，因此在名字中要選一個木字偏傍字了。但是這個「清」字，是當時的國號（大清國），底下不可亂加什麼字，於是題了「清柱」兩字。我們這位姻伯，是不是祝頌我將來成爲皇家棟樑的意思，總之是出於他的好意是無可疑的。所以我自從上學起一直到進學止，一直用了這個名字，從來沒有更易。

到了二十二三歲的時候，我看看新書，漸漸有了一點新思想，又發生了一種民族意識，感覺得現在統治我們的一個異族，而種族革命的呼聲，又在呼喚我們的青年。我那時就感到我這「清柱」兩字的名字不妥當，朋友們問起這兩字有何意義，是否真要做皇家棟樑？令我慚愧，於是我便毅然決然的自己改名了。

在從前，已入學的人，要改換他的學名，也有點小麻煩，而在學署裏也要花些手續費，這是爲了

鄉試會試起見。我可不管這一套，便自行主張改了。我讀「論語」，有兩句道：「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我覺得這「毅」字可用。因為我自己覺得對於求學處事，都缺少毅力，用這個毅字爲自己警惕之意。起初我想改單名，大家說不好，因為我上有一姊，排行第二，而蘇州人的土音，二與毅聲相同，例同張三李四之類。於是又想改爲「君毅」兩字，但君字用於號者多，用於名者少，覺得君字不及公字大方，而且我們祖先有位包孝肅，是婦孺皆知，大家都稱之爲包公的，因此也就用了這個「公」字，定名爲公毅。

當時的名片，並不流行那種外國式的、雪白的、像雲片糕似的小名片，而是大紅紙的大名片。因爲那時，紅是吉祥的顏色，白色是忌諱的。那種名片上的字，常常請名人名書家寫的。我改名以後，就請我的譜弟戴夢鶴，寫了一個是魏碑的，到後來，也會經由幾位名人寫過，記得請張季直寫過一個，請章太炎寫過一個，木刻都精工。最後還請狄平子寫了一個，他做了鋅版送我，那時已經不大流行老式名片了。後來老式名片漸行廢棄，我這些名片木戳，都不知丟往那裏去了。

談起名片，頗有許多趣事可述：我在十三四歲的時候，曾有集藏名人名片之癖。先集狀元的名片，現代人如洪鈞、陸潤庠、翁同龢等，我都有了，先代的也覺得兩三張（張謇那時尚未中狀元），至於榜眼、探花，蘇州就可抓一把（我還有張之洞的名片），翰林更不必說了，總共也收集到近百張呢。這個東西，後來我遷居上海，一古腦兒送給一位朋友了。

再說：當時的風氣，凡是一位新進士、新翰林，初中式時，出來拜客的名片特別大，本來七寸的名片，放大至近尺。而名片上的名字，則亦頂天立地，費念慈這個「費」字，足有兩寸多。到後來，慢慢縮小，到授職編檢，已縮小許多，至出任疆吏，就和尋常一樣了。但有一可笑的事，蘇州的妓女

，也用大名片，竟與此輩太史公看齊。我們坐花船，吃花酒，召妓侑觴，她們照例送來名片一張，請爺們到她那裏坐地。這個風氣，最先也會傳到上海，我曾得到林黛玉的大名片一張，簡直與那班新翰林者無二。

最壞者藉名片爲招搖、需求、欺騙、威脅之用。就小事而言，蘇州有各處私家花園，雖然開放，亦收門票，但只要某紳士一張名片，可以通行無阻。或介紹一個傭僕，或爲親友說情等等，這名片亦有用。大之則所謂不肖子弟，仗其父兄勢力，用彼父兄的名片。招搖撞騙，向人欺詐。那些結交官場的惡地主，動不動說：「拿我片子，送官究辦。」以威嚇鄉下人，這名片的爲害烈矣。

我的話不免又支蔓了，我將叙入正文：有名必有號，自古以來，中國上、中階級的通例。至於下也者，不但無號，抑且無名，就以阿大阿二、阿三阿四叫下去了。我在十五歲以前，是並沒有號的，還有，一個人題他的號時，總與他的名有關聯，古今人都是如此。但我若題號時，必與原來的柱字上着想，又是什麼棟臣、樑臣之類。可是我的號，並未與名有關聯，這個號，倒是我祖母提出的。其時中國有一種風氣，往往在他號中，有他祖父號中的一字，而加以「孫」字。譬如他的祖父的號是雲伯、雲甫之類，他的孫子，便可以取號爲雲孫。爲了我的題號，祖母笑着說：「他的祖父號朗甫，就取號爲朗孫吧。」祖母不過因爲懷念祖父，隨便說說，並不是要決定如此。但後來沒有另取一個號，我就把祖母所說的朗孫二字，隨使用用，不知不覺，便成爲我固定的號了。

中國人的命名，於他們的宗族，是大有關係的，如用名字排輩行，不容紊亂。兄弟間則以伯仲叔季爲次序，古來就是如此，傳至於今，仍復如此。除以承繼其祖取號者，亦有承繼其父取號，譬如父號雲伯、雲甫者，其子號少雲、幼雲者，不計其數。這是宗法社會，不獨中國，外國亦有此風，不過他

們的姓名，很多魯蘇，不及我們的簡捷耳。

我的小名叫德寶，現在已經無人知道了，這也是祖母所題的名字。當時我祖母及父親、母親並其他尊長，都呼我以此名。平輩中長於我的呼德弟、寶弟，幼於我者呼德哥、寶哥，傭人們呼我為德寶官（蘇俗：對兒童的尊稱，不論男女，都呼曰官），稍長，即呼為德少爺、寶少爺，但寶少爺三字較順口，在我十二三歲時，凡我的女性的長輩，都以此寶少爺三字呼我。我記得讀「易經」時，有兩句道：「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我便寫下來，做了我小名的嵌字聯。

這個「天笑」兩字的成爲筆名，也是出於隨意的，到了後來，竟有許多朋友，不知我的原來名號，只知道是天笑了。最先用這個名字時，還是在譯「迦因小傳」時，用了這個筆名叫做「吳門天笑生」，在那時的觀念，以爲寫小說是不宜用正名的，以前中國人寫小說，也是用筆名的多，甚而大家不知道他的真姓名是誰，要探索好久，方才知道的（其時同譯的楊紫麟，他的筆名是蟠溪子）。

有人問我：這「天笑」兩字，有何意義？實在說：並沒有什麼意義，不過隨便取了這個字罷了。我當時還有許多筆名，不過這只是許多筆名中之一而已。只記得子書上有一句「電爲天笑」，那是好像一句非科學的哲人的話，而詩人又常常引用它。要是從前人的詩句上，我也可以找得出這兩字可以聯合的，最先如杜工部的詩中，有兩句道：「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近人如龔定庵詩句中，有「屋瓦自驚天自笑」的句子，譚嗣同也有「我自橫刀向天笑」的句子。我只是腹儉，倘真要檢尋，古人詩中，關於此兩字的，恐怕還多。但這也不過牽連附會而已，實在說來，都與我這筆名無何關係。我最初用的是「吳門天笑生」，共有五個字，後來簡筆一些了，只用「天笑生」署名，僅有三個字。再到了後來，便只署「天笑」二字，及至後來到了上海的時報館，常常與陳冷血兩人寫極短的時

評，他署一個「冷」字，我署一個「笑」字，這是從「吳門天笑生」的五個字，縮而成爲只署「笑」的一個字了。

當時我有不少的筆名，後來都放棄，這也是文人積習，自古已然。我還記得我有一個別號，喚做「包山」，我自己姓包，而又叫做包山，這不成爲包包山了嗎？但古人早有其例，如大家所知道的文章等，我也算是做古。以包山爲號的，古人中有位陸包山，他是著名的畫家，但不姓包。包山並不是沒有這個山的，屬於蘇州的太湖中洞庭東西兩山，那個西山，就是名爲包山的，因爲它是包於太湖中間的意思。我用包山兩字作別號，在結婚那年爲最多，因爲我這位新婚夫人，她雖然原籍是溧陽，但是生長的地址則在洞庭山。有一位畫家任君，還爲畫了一幅「包山雙隱圖」，而我的譜弟，爲我寫了一個木刻封面「包山書簡」，是北魏體的。

我的筆名之多，連自己也記不起來了；什麼軒館樓閣之名，恐怕也都用到。只有兩個，到老還是用着，一個叫做「秋星閣」，一個叫做「釧影樓」，有時寫點筆記之類，常是寫着「秋星閣筆記」，或是「釧影樓筆記」，有時我高興寫日記起來，也是寫着「釧影樓日記」的。

釧影樓

秋星閣與釧影樓，兩個筆名，我是常用的。秋星閣這個名兒，我曾經用了在上海開過小書店，現在且不必去說它。至於釧影樓這個名兒，我用得最多，有好幾方圖章，都是刻着釧影樓的。人家覺得這釧影樓三字，未免有點脂粉氣，好像是個應該屬於女性所使用的。又懷疑着這釧影樓三字，好像是個香艷的名詞，有沒有我的什麼羅曼史在裏面？其實這釧影樓的名詞，我不過紀念我母親的一段盛德的事實罷了。

在我五六歲的時候，那一天，是舊曆的大除夕了，那時我父親從事商業，境况比較地還好。我們是習慣地在大除夕夜裏吃年夜飯的。那時的吃年夜飯，並不像現時所流行的邀集親朋，來往酬酢，因為各人自己也要回到家裏吃年夜飯，只是家人團聚，成了一個合家歡。像蘇州那些大家庭、大家族，到那一天，婦女孩子聚在一起，常常有數十人、百餘人，不為奇。但我家吃年夜飯，只有六個人，便是祖母、父親、母親、我們姊弟二人，以及長住在我家裏的那位顧氏表姊。

吃年夜飯已經在夜裏十點多鐘了，為的是在吃年夜飯之前，先要祀先，這便是陸放翁所謂家祭。蘇州人家，對於家祭極隆重，一年有六次，如清明、端午、中元、下元、冬至、除夕，而除夕更為隆重。

而且也要必須等父親從店裏回來以後，然後設祭。大除夕這一天，無論那一家商號，都是最忙的一天。及至我父親結好了賬，從店裏回來，已經要九十點鐘了。吃年夜飯，照例要暖鍋，裝得滿滿的，還有許多冷盆，喝着一點兒酒，大家說說笑笑，吃完的時候，已經將近十二點鐘了。雖然大除夕的

夜裏，人家有通宵不睡的，但是我們小孩子是要瞌睡了。

母親在大除夕的夜裏，每年常是不睡的，到深夜以後，還有什麼封井（蘇州人家每個宅子裏都有井，除夕要封井，至初五方開）、接灶（送了灶君上天後，要於除夕夜裏接他回來）、掛喜神（祖先的遺容，新年裏要懸掛起來，有人來拜年，還要拜喜容）、裝果盤（自己房裏點守歲燭，供果盤，還用以待客）等等的事。除此以外，還要端正我們兩個小孩明天元旦穿新衣服。父親也還沒有睡，他在算算家庭和個人的私賬，一年到底用多少錢。

其時已經元旦的凌晨兩點鐘了，忽聽得叩門聲甚急，是什麼人來呀？本來大除夕的一夜，討賬的人在路上絡繹不絕，甚至於天已大明了，只要討賬的人手提一隻燈籠，依舊可以向你追討，一到認明是元旦，只可說恭喜了。但是我們家裏的賬，早數天都已清還，並不欠人家的賬呀！

開門看時，原來是我父親的一位舊友孫寶楚先生，形色倉黃，精神慘沮，好像很急的樣子。問其所以，他搖頭太息，說是活不下去了。因為他虧空了店裏一筆款子，大約四五百元。這四五百元，在從前是一筆不小的款子呢，這位孫先生，又不是一個高級職員，他一年的薪水，至多也不過百餘元而已。這種錢莊上的規矩，夥友們支空了款子，到了年底，都要清還，如果不能清還，明年就停歇生意了。

但是大除夕，是一年最後的一天，孫君還不能歸還這筆款子。即使借貸典質，也僅能籌到百餘元。假如明年停歇了生意，一家老小，靠什麼生活，況且還有八十多歲的老母，還有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呢。而且蘇州的錢莊是通幫的，你爲了用空了錢而停歇出來的，還有那一家再肯用你呢？那末到此地步，只有死路一條了。

他這一次來，當然是求助於我父親了。不過，他怎樣的會拉下這許多虧空的呢？全部是「做露水」（錢業中的賣空買空投機事業）蝕去了的。因為他是個中等職員，薪水微薄，不夠贍家，於是想弄點外快。不想這「做露水」的事，就像賭博一樣，贏了想再贏，輸了想翻本，就不免愈陷愈深了。

本來那種跡近賭博而輸去了錢的人，有人目爲那是自作自受，不大肯加以援助。但父親和他是老友，且一向知道他爲人誠實，可是到此也愛莫能助呢。父親當時向他說道：「你若早兩天來，還有法子可想，怎樣直到這個時候才來呢？」原來父親已經結束好了賬，也沒有寬裕，只不過留着幾十塊錢，以供新年之用。在新年裏，所有金融機關都停滯，一直要過元宵節（俗名燈節）方可調動款子呢。那末，即使我家中所留存的數十塊錢，都給了他，也無濟於事，而我們新年裏沒有錢用，倒也不去管它。如果立即拒絕了孫君吧？人家正在危難之中，不加援手，也覺得於心不忍。父親正在爲難之間，母親却招了父親到房裏來，說道：「我看這位孫先生的面容不對，如果今夜這個年關不能過去，恐有性命之憂，他不是說過只有死路一條嗎？」

「那又有什麼辦法呢？」父親皺着眉頭道：「我現在手頭沒有四五百元，可以接濟他呀！假如他早兩天來，甚至於在大除夕的白天來，我還可以給他在朋友中想辦法，現在已是年夜的半夜裏了，教我到那裏去給他借錢呢？」母親躊躇道：「你問問孫先生，如果不是現款，也可以的嗎？」父親道：「不是現款是什麼呢？難道半夜三更，還可以拿房契田單，尋人去抵押嗎？」母親道：「何必要房契田單呢？況且我們也沒有這種東西呢。」父親道：「那末你說是什麼呢？」母親道：「難道金飾也不可以嗎？」

父親熟視母親道：「你的意思，願意把你的金飾，救助孫某嗎？」母親道：「救人之急，我很願

意的，你快去問孫君吧！」父親道：「明天是個元旦呀，大家都要穿戴，而你卻沒有，這如何使得？」母親笑道：「這有什麼關係？即使我有了，不戴出來，也由得我呀！況且那副絞絲蠟頭沉甸甸的，我真懶的戴它呢。至於老太太問起來，我會告訴她，她也是慈善而明白的人，她決不會責備我的。」

父親很高興，擁着母親道：「你真是好人！你真是好人！」他便奔出去，告訴了孫寶楚，孫感激得眼淚只管流下。及至我母親走出去時，孫君便要向母親磕頭，母親急急避去。母親所有的金飾，份量最重者，便是那一對金絞絲手鐲，每隻差不多有二兩重，此外還有一隻名爲「一根葱」較小的，此外還有金戒指，此外還有我們孩子們金鎖片、小手鐲等。母親向父親道：「救人須救徹，請孫君盡量取去就是了。」

據估計當時的金價，除了最重的一對絞絲鐲之外，再加幾件零件，還有孫君自己借貸典質的錢，也可以張羅過去了。那時中國還沒有鈔票，要是拿三、四百塊現洋錢，却是非常笨重的。此刻雖是金飾，丟出去就是錢，這時黃金是非常吃香的，最硬的東西，總而言之，孫君明年的飯碗是保牢了。

孫君臨行時，向我母親說道：「大嫂！你是救了我一條性命。」他說時，在衣袋裏取出了一只圓型牛角盒子來。裏面是什麼呢？却是滿貯了生鴉片烟膏。他說：「我到此地來，是最後一個希望了，如果這裏沒有希望，我覺得無顏見人，借此三錢生鴉片烟畢命了。」因爲孫君平素是不吸鴉片烟的人，他藏了這生鴉片烟在身邊，真是企圖自殺的意思呀。

到了年初三，孫君到我們家裏來拜年，他神氣很高興，因爲生意到底連下去了。趁着拜年，他真的向我母親叩一個頭，母親便忙不迭的還禮。我們還請他吃飯，父親陪他喝一點酒，在席間，母親便勸他：「孫先生，這些近於賭博的露水做不得了。」孫君說：「吃了這一次苦頭，幾乎把性命丟掉，

幸而有丈人相救，假如再要做那種賣空買空的勾當，不要說對不起丈人，也對不起自己呀。」

關於這金釧的事，孫君後來漸漸把這筆款子拔還，也需要一年多光景。母親除了兌還孩子們的金飾外，從新去兌了一對比較輕的手鐲。到了後來，我們的家况日落，父親沒有職業的時候，她還是把它兌去了，以濟家用，以供我讀書之需。我想起了這個故事，我並不痛心，我只讚禮我母親慷慨好義，慈善救人，是一個尋常女人所不肯。她是不會讀過書的，識字也有限，而却有這仁厚博大的心腸，我們如何不紀念她。

這便是我題這釧影樓的典故。

結婚

我是二十五歲結婚的，我妻與我同庚，也是二十五歲。我是在二月初二日生的，她是四月初一日生的（俱屬舊曆），我比她長了兩個月。中國人每多早婚，尤其是在江南，二十五歲結婚，在當時已算是遲的了。就我們的親戚中說：大半是在二十歲以內，十八九歲為最多。若是女孩子，一過了十六歲，便可以出嫁了。至於鄉下地方的婚嫁，好多是畸形的，不必說它了。

主張我即行結婚的，第一是祖母。父親故世了，我的三位姑母全故世了，連她所喜愛而領在我家的顧氏表姊也已出嫁了，我姊也出閣了。老太太們喜歡小孩子，她的晚景，將寄託於抱曾孫了。至於母親，也未嘗不希望我結婚，因為我已成年，而她的身體日就衰弱，很望有一勤健的兒媳，來幫她的忙。就只家中貧苦，人家嬌養的女兒，不知能否食苦為慮。

我對於結婚的事，很有點猶疑。第一、我是爲了家計，我幸有母親的操勞支持，勉強可以過度。娶了親後，家中既添一個食口，而人家一位青年姑娘，到我家來做媳婦，似不能過於艱苦。並且結婚以後，不能不生育，小孩子一個一個添出來，這個負擔，也就不輕呀。還有一個意思，全出於自私之念，我覺得未結婚的人，自由得多，結了婚的人，便不免生出多少牽慮來了。

但是我的家庭，已使我不能不結婚了。原來我的祖母已成了癱瘓之症，不能步履行動了。她那時已是七十多歲了，而軀體豐肥，起床也須有人扶持。起床以後也只能坐在一張藤椅子裏，冥坐念佛而已。還有半夜起來溲溺，也須有人扶掖，這都是我母親的責任。如果是別人呢？譬如女傭之類，她們不能半夜驚醒，而且粗手粗腳，未能熨貼，這是使母親不能放心的。

所以自從祖母得了這半身不遂之病後，母親便不睡在自己房裏，一直睡在祖母房裏了。有一天，祖母半夜裏起來小解，她因爲知道我母親夜裏做女紅，睡得很遲，不想驚動她，便輕輕悄悄起來。誰知沒有站穩，一轉側間，跌倒在牀前地下。母親睡得異常警醒，聽得了聲響，急忙揭開帳子一看，吃了大驚，因爲老年人是不能傾跌的，何況祖母又是身軀肥重呢。

從此以後，母親在夜裏更爲警醒，祖母床上一有聲響，她便立刻起來。到了冬天，衣不解帶，只是和衣而睡。後來祖母病了，常常不能起床，有時連溲溺都在牀上，一切鋪墊、洗溺等事，都由母親

任之。祖母捧着母親的手涕泣道：「求求菩薩！但願你的兒媳婦，也這樣的孝順你。」我聽了，心中也很難過。因為我們一家只有三人，——祖母、母親和我——我是一個男子，飢驅奔走，我又不能代母親之勞。而且母親的身體也不健全，日就衰弱，每天吃得非常之少。她是有肺病的，帶病延年，現在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人家以為即此也不容易。希望我結婚以後，有個媳婦幫助她，總歸是好的。

我的結婚日子，是在那年四月二十五日（都是舊曆，以下做此），那個時候，所謂新式結婚（俗稱「文明結婚」）還沒有流行呢。新郎新娘，以前從未見過面，現在稱之為「盲婚」，這兩字甚為切當。一切儀式，都為老派，從辛亥革命以後出生的諸位先生們，恐怕有莫名其妙的。但中國歷代傳統以來，對於婚姻制度非常隆重，即使要寫一些近代婚姻風俗史，也非成一巨帙不為功，我今就我的結婚，畧述一二：

首先說迎娶，依照古禮，新郎親自到女宅去迎親的。直到如今，在中國別省猶有此風，但東南各省，已無此風了，只是用全副儀仗，敲鑼打傘去迎接她。其中最別者，新娘要坐一頂花轎，這頂花轎，不僅屬於虛榮，抑且恃於權勢，婦人對於嫡庶之爭，往往說：「我是從花轎抬進來的。」好比清朝的皇后，說：「我是從大清門進來的」一般。蘇州的花轎，却是特別考究，明燈繡幄，須以八人抬之。但我們沒有用花轎，僅有用一藍呢四人轎，以花轎多所糜費也。惟儀仗一切則如例。

次言拜堂，當新娘未出轎以前，新郎已迎候於堂前，新娘出轎後，即同行拜堂禮。先拜天，後拜地，然後新夫婦行交拜禮，這是中國舊婚禮中最隆重的一個節目。當拜堂時，新郎則下跪叩頭，新娘却只跪而不叩頭。問其所以，則云新娘鳳冠上附有神祇云云，其實她滿頭插戴珠翠，且罩以方巾，不能使其更一俯首也。所有禮節中之跪拜，都受命於一贊禮（蘇人呼之曰「掌禮」），此人穿方頭靴，

皂袍皂帽，插金花，披紅巾，全是明朝服飾，此古典當是滿清入關時始也。

拜堂既畢，把紅綠牽巾，繫在新郎新娘手上，這不知是何意義，或者是赤繩繫足的故事吧？這時新郎倒行，新娘順行，脚下則踏以麻袋（此種麻袋，都向米店中去借來），名之曰「傳代」，諧音也，此俗在明代已盛行。然後進入內廳，行合卺之禮，蘇人則俗稱爲「做花燭」，新郎新娘對向坐，中間點大紅巨燭四枝，作爲新婚夫婦對飲對食狀。旋即有青年四人（預先選定者），各持一燭，送入洞房。

入洞房後，新郎新娘並坐牀沿，此一節目，名之曰：「坐牀撒帳。」那時新娘頭上仍遮上大紅方巾。入洞房後，第二節目便是揭去她這個方巾，名曰「挑方巾」，挑方巾必延請親戚中的夫妻團圓（續絃不中選），兒女繞膝的太太爲之，這個時候，新娘方露出廬山真面，爲妍爲媼，可以立見。以後便是新娘至後房易服，卸去鳳冠霞珮的大禮服，而穿上紅襖繡裙的次禮服，出來謁見翁姑及各親戚尊長行見面禮，與新郎偕，此一節目，名曰「見禮」。吳中風俗，並無所謂翁姑端坐，新婦獻茶的儀式。以後有一節目，曰：「祭祖。」那是儒家規範，於禮甚古。祭祖時，翁姑在前，新夫婦居中，而合族中人都來行禮也。以後更有一節目曰：「待貴。」此是設盛筵以待新婦，而新郎不與其事，新娘居中坐，往往選未出嫁的小姑娘爲之陪席，亦有「定席」「謝宴」小節目，不贅述。

依照舊式婚姻喜慶事，我家於以上所述節目，一一遵行。最後我談到了「鬧新房」一事。鬧新房雖然不是善良的風俗，但亦是青年人意興之所趨。又因爲中國傳統，對於少女太不開放，男青年對於女青年，很少有見面的機會，而女人又養成羞怯的習慣。醉飽以後，闖入新房，欲見新娘子一面，說說笑話，打趣一番，原無所謂。如果是惡作劇，甚至演出無禮的舉動，這便是令人憎厭，而爲不受歡

迎的賓客了。

我此次結婚中，並沒有鬧新房的一個節目。原因我爲了簡省之故，未發請柬，僅僅幾位至親密友來吃喜酒。有幾位比我長一輩的，怎好意思鬧新房。至於我所交的新朋友，他們有些新時代氣息，不喜此種舊風習。還有一種趨勢，鬧新房具有報復性質，你如果喜歡鬧人家的，到了你結婚時，人家也來鬧你新房了，這便叫「我不犯人，人不犯我」，我就是不歡喜鬧新房的，所以也沒有人來鬧我新房了。

這一回，親友的賀客雖然不多，却也吃了八桌酒席。女賓倒也不少，還有許多兒童。蘇州人對於吃喜酒，那是最歡欣鼓舞的事。想起了從前的物價，使現代青年人真有所不信，那時普通的一席菜，只要兩元，有八只碟子，兩湯兩炒四小碗，雞、鴨、魚、肉、湯五大碗，其名謂之「吃全」。紹興酒每斤二角八分。八席酒菜，總計不過二十元而已。不過最高價的筵席，則要四元，那是有燕窩、鵝蛋等等，我們那天的「待賓」節目，即用此席，新娘例不沾唇，留待家人分餉。至於後來的什麼魚翅席、燒烤席，蘇人從未染指也。

我妻端莊而篤實，我祖母及母親，都極摯愛她。尤其是身體健全，不似人家所說的工愁多病的林黛玉型那樣人物，因爲她在家裏也是操作慣了的。雖然她是纏了小脚的人（那時蘇州風氣，凡上中等人家，如果討了一位大脚的新娘子，便將引以爲恥，而爲親朋所譁笑），可是行走極便利。在文字上，她會進過私塾，讀過兩三年書，論語上半部，她還能琅琅上口，只不過不求甚解而已。至於縫紉刺繡，却是從前吳中閨女的必修科。倘欲洗手作羹，則正可向我母學習耳。

在從前未出閣的小姐們，對於婚姻事，一聽父母支配，自己連提也羞於提起，怎敢有什麼主張。

嫁了過來，侍奉舅姑，是其本職，那裏有什麼自由行動，也沒有什麼組織小家庭的志願的。尤其像我是一獨生子，又沒有伯叔兄弟，祖母僅有這一個孫媳，母親僅有這一個兒媳，自然是格外的寵愛了。我見到祖母與母親都鍾愛她，我也爲之心慰。

不過我那時已呼吸了一些新空氣了，那時大家又在那裏提倡女學，解放纏足，有些外國教會裏也在開設女學堂了。我們寫文章也是動不動說婦女要解放了。而我所娶的女人，却是完全舊式，好像是事與願違。但是我們在六七年前已經訂婚了，雖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是經我同意。那個時候，也沒有所謂洋學堂裏女學生。就是到我結婚的時期，女學生也還是很少的，所有我們親戚朋友中，那一家不是娶的深閨中的小姐呢。

這時上海已有了女學校了，蘇州還是沒有。即使有了，在我們的環境上，也不許可，試想我要進學校，尚且不可能，何況她是個女人，怎能許可呢？直到後來我住居在上海，我在女學校教書，所住的地方是在上海老西門，那邊有好幾家女學校，她曾經在民立女中學的選科中，學習音樂與繪畫，這時年已三十，更有了兒女，也像我的學習外國文，一無成就，只得放棄了。

我妻姓陳，名震蘇，這個名字，很不像一個女人名字，那是我的岳丈陳挹之先生題的。陳挹翁有兩女，她是長女。次女名蘭儀，嫁王稚松君。

初到南京

在我結婚的那年，還館於尤氏，雖心厭教書生涯，但無別的出路。許多同學，有的到日本去了，如李叔良、汪棟卿諸君；有的出外就學，如楊紫麟、戴夢鶴諸君。只有株守故鄉，絕無發展之餘地。在新婚的一月間，通常稱之爲蜜月，蘇州有個俗例，叫做「月不空房」，意思就是這個月子裏，要夜夜雙宿。我向來是住在館裏的，三四天回家住一夜，現在要夜夜回家，違此俗例，新婚宴爾，早晨到館，不無遲了一些。有一天，我那兩位表姪的學生，見先生未來，頑劣惹禍，女傭們便抱怨師爺遲到，剛被我聽見。雖佯作不聞，而心殊不樂，從那一天起，我就打破了「月不空房」的俗例，依舊是三日回家一次，雖祖母不以爲然，我殊不顧也。

我這時野心勃勃，覺得株守故鄉，毫無興趣，倘能離開了這個教師生涯，闖到別一個地方去，換換空氣。但以重幃在堂，祖母是年老有篤疾的了，許多尊長們似不以我出門爲然。現在家裏既添了一個人，而這人也是一個健婦，足以幫助我的母親不少。那末我即使不能遠遊，在本省之間，或在太湖流域各處去遊學，或者也是可能的事吧？

自從戊戌政變以來，各處都鬧着開辦學堂，其時南京便設立了一個高等學堂。那時還無所謂大學、中學堂的等級，名之曰高等學堂，便是徵集國內一班高材生而使之學習，說一句簡要明白的話，便是把從前的書院體制，改組一下，不一定研究西學，而還是着重國學，不過國學中要帶有一點新氣，陳腐的制藝經文，當然不要它了，但也不過是新瓶舊酒而已。南京的高等學堂是官辦的，這些官辦學堂，不但不收學費，而且進入這個學堂後，學生還有若干膏火可拿。不過學生是都要考取的，它的

資格，至少是一個生員，而才識通明之士，自佔優勝。

這個南京高等學堂是江蘇省辦的，派了一位蘇省候補道員蒯光典（號禮卿）爲督辦。在前清開辦官立學校，無所謂校長之稱，最初爲督辦，後來便改爲監督。那位蒯光典是安徽合肥人，李鴻章的姪女婿，他是在光緒九年癸未科中進士，散館授翰林院檢討，後來外放爲江蘇候補道的。提起當年各省的候補道，以江蘇爲最多，齊集在南京的，少說有三四百人。其中分紅道與黑道兩種，因爲江蘇地區雖大，道員的實缺，只有幾個，那便靠各差使了。好在道員是萬能的，無論什麼差使，都可以派道員去當。但是紅道台可以優先得差缺，而黑道台不用說得缺了，得一差也難若登天。

怎樣是個紅道台呢？要出身好、家世盛、交際廣、才學富，方覺優異。蒯光典可說是佔全了，說他出身好吧，他是一位太史公，爲世所重，他的家世，父親曾任江蘇藩台，而他又與合肥李家爲親戚；他在南京，與幾位知名之士如繆小山、劉聚卿、張季直等，都爲好友，時相酬酢；他是在舊學上有根柢的人，不是那些捐班的道員可比了。但是他在南京，有崩瘋子之稱，大概他是一位高談時政，議論人物的人，故有此號。當他初辦高等學堂時，還有人譏誚他，說他鬧了一個笑話，因爲他向總督衙門去謝委，那時兩江總督是劉坤一。人們說：委辦學堂是聘任的，師道當尊，不宜謝委。但蒯說：「學堂不是書院，書院請山長是用關聘的，我沒有接到關聘，只有札委，應當是謝委的。」那時的官場，却有許多把戲。

我的譜弟戴夢鶴，他年紀雖輕，却是一個多才積學之士，他早就考取了南京高等學堂，這位蒯禮卿先生非常器重他，可憐夢鶴是個肺病甚深的人，在高等學堂裏的時候，已經有些勉强的了。可是這個高等學堂開辦還不到兩年，適在戊戌政變以後，新政受了阻遏，各處學堂，悉令停辦，這個高等學

堂也奉令停辦了。蒯光典另行得了一個十二圩鹽務督辦的差使，不過他愛才心切，把高等學堂幾位他所賞識器重的學生，都招致了他家裏去，栽培他們，供養他們，使之可以成材。

夢鶴肺病，時發時愈，他覺得病在蒯的公館裏，終覺不便，不如回家養息，候病愈後再去。回家後，病乃畧痊，又思再去南京，實在這種肺病，漸漸深入，大家勸他養好了身體再去，他說：「蒯師盛意，我必定有一個交代。」但到南京後，又復咯血。蒯公知其病根已深，派一親信家人，護送回蘇。臨別時，又委託了夢鶴：蘇州有沒有願意出來就事而就學的人，請你舉薦一人，我要給兩個孩子，請一位教讀先生。

夢鶴就舉薦了我，他說：「好！我相信了你，就相信了你的朋友，包君倘願意，就請他來吧。」夢鶴回蘇州，便和我說了，我久聞蒯公大名，頗為願意，因為常常聽得夢鶴稱道其師學問淵博，也可以有所進益。但是又要我做教書先生，我覺得我的命運注定如此，真是萬變而不離其宗，未免有些厭倦了。夢鶴道：「你不願意教書，也可以申明，蒯先生最能量才使用，在他那裏，別的事也就很多呢。我在給他的信上透露一點你的意思，你去後再說吧。終究是我們一條出路，恨我病深，不能與兄同行也。」

我回去，便與祖母、母親商量，她們說：「你不要以我們兩個老人為念，既然有此機緣，不可放過。況且南京就在本省，也不能算遠。」祖母說：「不過你還新婚呀，你也要問問震蘇呢。」其實震蘇早已通過了。那時我還館在尤氏，我立刻寫了一封信給巽甫姑丈，即行辭館，因他此刻正在病中。他當然不能阻止我，子青哥且力促我行。但我們的聘約，要至年終，於是我請了一位代館先生張湛甫以終其事。張為我之表姑丈，亦一名宿也。

那個時候滬寧鐵路尚未開通，從蘇州到南京，要先到了上海，然後趁長江輪船到北京。我既未到過南京，亦未趁過長江輪船，不免有些惘惘。可是夢鶴家裏有個老傭人，名字喚作金福的，曾經陪伴了夢鶴去過幾次南京，可算是識途老馬。因此向戴家借用了金福，陪伴我去，祖母與母親，又向彼丁寧寧，與以酬勞。不過在上海情況，我比金福還熟悉，一上長江輪船，便要聽金福的指揮了。我們在上海無多耽擱，便去定了江輪船票，這時長江輪船有三個公司，一是太古、二是怡和、三是招商局。這三個公司是班輪，此外還有日本的什麼日清公司等等，上海人稱之爲「野鷄輪船」，自由通行。

這三個公司中，只有招商局爲中國人自己辦的，太古、怡和兩公司，都是英國人辦的。無論那一個國家，海岸通商，外國輪船是可以來的，至於內江內河，從來不許有外國輪船可以侵入的。但中國乃是失去主權的國家，一任它長驅直入，不但侵襲我主權，抑且掠奪我利權，這且不必說了。當時我們就在這外國輪船公司（船名已忘却了），買了兩張船票，我的一張是房艙，金福一張是散艙。本來我也想买散艙，由金福的勸告，他道：「長江輪上著名的扒手極多，壞人充斥，還是房艙好些吧。」

船主是外國人，關於搭客裝貨等事，雇用中國人管理，這些中國人經理其事的，就喚做買辦，一條船上有大買辦、二買辦、三買辦的許多等級，這些買辦，大多數是寧波人。……我這裏也不必再絮煩了，且說我們到了船上，等候開船，但聞碼頭上邪許之聲，正在裝貨。未幾，貨裝完了，汽笛聲聲，便即開船。船一開了，許多怪現狀都顯形了，首先是鴉片烟盤，一隻隻都出現了，鬼火磷星，東起西滅，而且船上也有鴉片可買。其次，便是賭局，非但可以叉麻雀，牌九、搖攤也行。據金福說：有時還有隨船的妓女，一路可以接客，但這次却沒有。這些客艙中茶房，權力極大，向船客「敲竹槓」，小賬之多，比了票價還要多。一個大艙，往往有十幾個茶房，各人還可以沿路帶走私貨。

我是第一次趁長江輪船，幸有金福爲之照顧，他年紀已五十多歲，頗爲老成。那天風和日暖，波靜浪平，我在甲板上觀覽長江風景，過鎮江後，便到南京，船是一直要開到漢口爲止。本來預備船倘在下午到埠，不及進城，便在下關住一天旅館，現在上午已經到了，就可以即日進城了。這時南京的市內交通，有馬車，也有人力車，本來想坐馬車進城，但這些馬車（都是敝篷的），破爛不堪，亂討價錢，金福說：「還是坐人力車吧。」兩部人力車，坐了人，還裝上一些行李，直進儀鳳門而去。

南京我也是第一次來臨，這個「龍蟠虎踞帝王州」（李白詩句），倒時時在我心目中。本來江南鄉試，我們蘇人是要到南京來的，但我這時對於科舉，不甚有興趣，又自知學問淺薄，未必能中舉，徒然來做一個不第秀才，因此也懶得來了。現在一進儀鳳門，但見一片荒蕪，直到鼓樓，好像是一條馬路，此刻馬路上遍生青草。至於馬路兩傍，全無房舍，難得有幾處，有住居近處的，築幾間茅屋，種幾坵菜地，此外則一望無際的蔓草荒烟而已。金福說：「聽此間人講，本來從三牌樓到鼓樓一帶，原也是繁盛之區，打長毛（太平天國之戰）當兒，一把火燒乾淨了。」

過了鼓樓，分東西兩路，而我們則向西路行。那邊有兩個城門，一曰旱西門（往來封東，常寫「漢西門」，大約因「旱」字不佳）；一曰水西門，而蒯公館則在水西門安品街也，我覺得突如其來便到蒯公館，未免輕率，不如覓一旅館，暫爲駐足之地，然後進謁，較爲妥適。由於人力車夫的介紹，找到一旅館，門前有兩塊招牌，寫着「仕宦行台，客商安寓」八個大字，走進去先是一片場地，然後有幾處房屋，却是冷清清的不知裏面有無旅客。我們住了一個單房，紙窗木牀，倒也乾乾淨淨。時已過午，便在這旅館裏吃了一頓飯，便命金福到蒯公館投帖報到。

金福回來說：「蒯大人不在家，但他早已吩咐，請包老爺（老爺之稱，我也是第一回）立刻搬進

公館去住。」我託旅館雇了一輛老爺馬車，因有幾件行李等等，和金福便到蒯公館來。原來他住的地方，是南京安徽會館的隣宅，亦與安徽會館相通連，裏面一個大庭院，雅有花木之勝。出來迎迓的，是姓方的方漱六君，也是安徽人，後來知道是蒯先生的姪婿，年亦不過三十左右，人極幹練，蒯公不理事務，似乎一切由他經理。

我到了蒯公館，應當以晚輩之禮，先去拜謁這位蒯公，但是直到垂暮，他還沒有回家。方漱六道：「四先生（他行四，大家都呼他爲蒯四先生）今晚有飯局，回來必很遲，閣下長途辛苦，宜早安置，明晨可以相見呢。」但到了晚膳以後，我正想要安睡時，蒯先生一回來，便到我屋子裏來了。他是一位瘦瘦的五十多歲人，嘴唇上一撮小鬍子，頭髮畧有一些花白了，但是精神奕奕，非常健談，一口安徽廬江口音，起初我還聽不清楚他的話，後來漸漸馴熟了。他很謙和的說道：「我們這裏一切都不拘禮，今天閣下舟車勞頓，早些安息，我們明天晚上談談。」又問了問：「夢鶴的病况如何？」他極力稱讚夢鶴的品性與才華，深爲他的病體扼腕，教我寫信時，代爲問候。

記蒯禮卿先生

且說自南京高等學堂停辦後，由蒯禮卿先生留在他公館裏的，約共有五六人。現在我所見的，一

位是汪允中，他是安徽歙縣人；一位是陳宜甫，他是鎮江人；一位郭肖艇，他是安慶人。蘇州人本有兩人，一位是戴夢鶴，一位是余同伯，夢鶴有病不能來，而同伯則另有他就，已向別處去了。但另外有一位蘇州人，是王小徐，他並非是南京高等學堂學生，他是吾蘇王紱卿先生的次公子，他的哥哥王君九（季烈），也是我所熟識的人。大概蒯與王紱卿爲甲榜同年，所以小徐呼蒯禮卿先生爲年伯也。

我所下榻的地方，就在那大庭院的翻軒裏，這個翻軒，一排共有五間，我便佔了兩間，一間作爲臥房，一間作爲起居，壁間也懸有什麼書畫之類，沿窗安置了一張有抽斗的書桌，以供讀書寫字之需。在我所住的左首，有一個月洞門，走進去却是另一個小庭院，也有三間寬大的屋子，那便是汪允中、陳宜甫、郭肖艇三人所住的。我到蒯宅的時候，王小徐還沒有來，他在北京當小京官，蒯先生約他來，就是擬聘請他在十二圩鹽務督辦差上當一位文案，實在紱卿逝世後，他周卹故人之子也。

到了明天晚上，吃過夜飯以後，他果然到我的室中來了，一談就談到了深夜。他問我近來喜歡看點什麼書？主張那一種學說？這一問，可就把我問窘了。我雖然也看看書，然而我的看書，是毫無系統的，雜亂無章的，俗語所謂「抓到籃裏就是菜」。而且有許多書看了以後，老實說「不求甚解」，甚至於過目即忘，從未有深入堂奧，加以深切研究的。現在要問我學說不學說的話，我更茫無主張，無詞以對了。

我只得坦白地說：「實在孤陋淺薄得很，因爲家貧不能購書，只不過從親友處借來看看，所看的也都是蕪雜的一類，至於正當有系統的書，看得很少，以後要請先生指教。」他似乎頗喜我的坦白，便說：「你要看書，我這裏有個小小藏書室，書雖不多，但求學上應看的書，約畧均備。現在新學盛行，據夢鶴說：足下頗喜新學，我這裏上海近來新出的書，我覺得可觀的，也隨時託人添購一二，不

過有許多簡直是胡說白道。你愛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明天你自去選擇就行了。」

原來他所說的小小藏書室，就在我所住的房子的隔隣。不是我說的我的下榻地方，是一排五間的翻軒嗎？我所住的是東首的兩間，而最西首的一間，便是他的藏書室，裏面排列着七八具大書架與大書架，都裝滿了書，其餘的桌子上，櫃子上，也堆滿了書，那當然都是綫裝木版書，雖然也約畧分類，可是不大整齊。我進去展覽一過，真是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給。起初想隨意取數冊携歸房中閱讀，但是史類呢？集類呢？那是我性之所近而容易看得懂的。既而想從前無書可讀，偶有所獲，不加抉擇，今有如許可讀的書，不能再亂七八糟，要定有一個方針，且與蒯公談談，他是個有學問的人，或能開我茅塞也。

一日，偶與蒯公談及諸子，他說：「看看子書也好，可以開發思想。我們營逐於科舉，博取功名，死守儒教，只知四書五經，而不知尚有許多學說也。」於是在藏書室，選取一部莊子，一部墨子。莊子，我在以前也曾看過幾篇，浮光掠影似的也都忘了。墨子我不曾看過，但我讀論孟時，曾知「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現代作家，常引用墨子的學說，好像很時髦的一部書。我預備先讀莊子，後讀墨子。誰知這部莊子，還是明末版本，紙張既薄且脆，我一不小心，翻書時用力一點，便扯破了一頁，問他們有別的莊子嗎？一時也找不到。我覺得這是名貴的書呢，不要損壞了它，草草看過，還了藏書室。

蒯先生又要索觀我的詩文，以我的自卑心理，實在覺得拿不出去。而且我又不大留稿，在南京來的以前，夢鶴就關照我，「怕蒯公要看吾兄的大作。」我就怪他，必是你爲我捧場，夢鶴說：「蒯公很肯教導我們後進，給他看看何妨。」因此我就抄錄了幾篇，又默寫了幾首詩，送給他看。他第二天

晚上來談天的時候，就袖之而去。到了明天，他來還我的時候，說道：「你近來很在讀龔定庵的詩文集吧？所以寫出來的詩文，都有龔定庵的氣息了。」

提起了龔定庵，我又有插話了，約在四五年前，我在護龍街舊書店獲得「龔定庵補編」兩本，木刻大字本，但有文而沒有詩，心竊好之，以其文氣奇兀，不同凡俗也。因思有補編必有正編，向護龍街各舊書坊竭力搜尋，均無所獲。後聞祝心淵先生有全集，擬向借觀而尚未果。會戴夢鶴至南京，我託他向南京書坊問訊。後來夢鶴自南京歸，道經上海，寫信給我說「南京無龔集，而在上海覓得一部，是杭州版，其中有數頁已斷爛空缺，而索價須五元，計六冊。」我覆書謂無論如何，請弟購之歸。自此以後，我得讀了定庵「己亥雜詩」等諸詩。那個時候，上海書賈，向未有龔氏詩文集出售。及至我居住在上海時，在鄧秋枚（實）先生處，得到了「定庵集外未刊詩」一冊，我請人用精楷石印，在「秋星社」（小書店）出版，銷行了一千冊，此是後話。

蒯先生那時却說：「文字亦隨風氣為轉移，龔定庵近來頗為入時。早年大家提倡桐城派，此刻漸覺陳腐了，一讀龔定庵，似乎眼前一亮，尤其是他的詩詞等，顯出驚才絕艷，青年人更為喜歡它。不過究非詩的正宗，有人甚至說它為野狐禪，真要學詩，非從古詩入手不可，僅僅讀近代人的詩是不夠的。作文亦然，必須多看書，多研究，並非說古人的話全對，不過多閱覽以後，引起了你的思想，便有了一個抉擇。」

這時候，民主思想，漸入人心，雖沒有打倒孔家老店那種大炮轟擊，但孔子學說，已為新學家所疑問。爲了「論語」上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兩句，於是譁然說這是孔老夫子的愚民之術。據說這還是到中國來傳教一位教士，研究了中國書後，倡此說的。於是信奉孔子者，爲之辯護，說這

兩句書爲宋儒所誤解，這個句讀，應當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們偶與蒯先生談及此，他說：「這是孔子的明白國家的政治，世界各國，無論那一國號稱民主的國家，都是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不必用句讀給他辯護。說到傳教士倡此說以詆孔，尤爲可笑，他們的教會，就是一個「可由不可知」的大本營。」

蒯先生的談鋒真健，可說無所不談，從宗教到社會，由哲學至時政。他頗研究佛學，常和我們談佛學，他常讚歎：佛學是廣大圓融的。王小徐、汪允中，他們於佛學是有點研究的，但是我却一竅不通。可是他不管你懂不懂，總是娓娓不倦的講下去。我問：「如何於佛學有一點門徑，可以摸索進去呢？」他教我去看「大乘起信論」，於是我便去買了一部「大乘起信論」。這時南京有一家「金陵刻經處」，專刻佛經，流通各地，是楊仁山老居士所辦的。但是我看了仍不明白，難起信心，大概我是一個鈍根的人吧。

蒯先生既好健談，又能熬夜，我們都不敢早睡，他常常吃了夜飯，甚至在十一二點鐘，到我們屋子裏來了。一談常常談到半夜，當然都是他的說話，有時竟至鷄鳴。他自己往往不知道，直到他太太令僕人來催請。有時談至深夜，上房裏送出了些茶食糖果等類，與我們同食。我想送茶點出來的意思，也有警告他時已深夜，可以休息的意思。不過來談時，總是在我屋子裏的時候多，後院竟不大去，這是因爲我屋子離上房近。聽講的也是王小徐、汪允中與我三人爲多。

本來我到南京來，原是由戴夢鶴介紹，教蒯先生的最小兩個孩子的，但來此已多日，竟不提起教書的事了，每天只是教我看書。他既不提起，我也未便詢問，後來得到了夢鶴蘇州的來書，他說：教書的事，仍由陳宜甫蟬聯下去了，本來這兩個小孩子是宜甫教的，一時偶思易人，現在不調動了。陳

宜甫是研究小學的，爲人沉默寡言，但他一口鎮江話，也覺得很不易聽。據說：這兩位世兄，也很聰明，有一天，講日月兩字，先生說：「這兩個象形字，在篆文上，日字像個太陽，月字像個月亮。」學生道：「這個我們明白了，但在讀音上，爲什麼日字不讀月字音，月字不讀日字音呢？」這不知陳宜甫如何解釋，若是問到我，我可就無詞以答了。

在那裏不到半個月，他們的帳房，便送來了十二塊錢，說是我的月薪，這使我問心有愧了。我來到這裏，既不是教讀，又沒有其它名義，終日間除白天看書，夜來聽蒯先生談話，並無別樣工作，豈不是無功受祿嗎？在那時候，也不能輕視這十二塊錢，一位舉人先生，在蘇州家鄉教書，每月也不過十二元的館穀呢。我因此問問汪允中諸君，他們說：「我們也是如此的，這是蒯先生樂育英才的意思。」不過王小徐，他在十二圩另有職務的，他的月薪是二十元。那真使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我在那裏，差不多住了有一年，在筆墨上，只不過做了幾件事。有一次，有一位先生（忘其爲誰），刻他的詩文集，請蒯先生給他做一篇序文，他便將詩文集給了我，教我給他代擬一序。他說：詩文都不甚高明，你只恭維他一下好了。我便當夜寫成，交給他，不知他用了沒有？又有一次給人家題一幅山水畫，也教我來題句，我寫了兩首七絕，請他選一首，他說：「很好！」也不知用了沒有，倒是有些對聯，我做不少，以輓聯爲多，那都是用了，因爲他是請人來寫的，我都看見。這都是應酬之作，他只給我一個畧歷，或這人有行述，加以參攷，這些諛墓之文，更爲便當了。

在南京

我在南京住了幾個月，到了年底，回家度歲，過了新年，到正月下旬再去。這也是到下關搭了長江輪船到上海，再回蘇州的，此次便老練得多了。到了上海，望望幾位老朋友，無多耽擱，便即歸家。祖母和母親，幸尙康健，吾妻更歡愉，人家說：「小別勝新婚。」真是不差。往訪戴夢鶴，先由祝伯蔭告我，夢鶴的肺病，據醫家說：已到第三期了。到他家裏，我見他面色紅潤，不像是有沉疴的人，談談南京情況，似乎頗爲高興呢。走訪尤氏，巽甫姑丈亦病不能興，令我臥在烟榻之傍，與我談天，語頗懇摯。子青哥我在南京時，常與他通信，他對我歌羨不已。

轉瞬新年即過，我又到南京來了，道經上海，那個上海又增了許多新氣象，添了許多新人物了，不過我都是不認識的。最興奮的，上海除申、新兩報之外，又新開了一家「中外日報」。這家「中外日報」出版，使人耳目爲之一新。因爲當時申、新兩報，都是用那些油光紙一面印的，中外日報却潔白的紙兩面印的，一切版面的編排也和那些老式不同。這個報，在近代的刊物上，都說是汪康年（號穰卿）辦的，其實是他的弟弟汪詒年（號頌閣）辦的，他們兄弟分道揚鑣，編輯上的事，穰卿並不干涉的。汪頌閣是聾子，人家呼他汪聾朋，爲人誠摯亢爽。我即定了一份，要到第三天才到南京。

其時章太炎已有藉藉名，當時大家只知道他是章炳麟，號枚叔，南京那邊方面的一般名流，呼之爲章瘋子，出了一本書，古裏古怪的喚作「廬書」（廬音求），大家也不知道裏面講些什麼。蒯先生欲觀此書，託人在上海購取，却未購到。他託我道經上海時，購取一冊，因我在上海，有些出版的地方是熟悉的，我爲他購取了一冊。那時嚴又陵的「赫胥黎天演論」，早已闢動一時，我購了兩冊，帶

到南京，贈送朋友。

到了安品街，仍舊住在老地方，時屆初春，這個似花園一般的大庭院，已經春意盎然。靠西有一座大假山，假山上有個亭子，署名曰錦堆亭，雜花環繞其旁。亭中有一張石枱，有幾個石鼓凳，我們幾個朋友，便笑傲其間。這時又來了一位蒯老的姪子蒯若木（此君在民初做了一任什麼青海墾殖使的官，我可不記得了），頗喜發表議論，就居住在我的隣室，頗不寂寞。在我們一班人中，蒯先生最佩服的是王小徐。小徐從前是在北京的同文館肄業，通曉俄文，精於算學，他常以算學貫通哲理，是一位好學深思的青年。他與蒯先生談佛學，常常有所辯難，蒯也不以為忤。汪允中也研究佛學，但蒯先生則說他駁雜不純。但汪允中常常寫文章，小徐却從未見他寫文章。直到晚年，他再就於禪悅之理，自離南京後，我久不見王小徐了。他的母親，蘇州最有名新人物，喚做王三太太，開了一個振華女學校，倒也栽培了不少家鄉女孩子。當國民政府在重慶時，有人告訴我：王小徐到峨眉山削髮爲僧了。這個消息，其實是不確的，我却認識了他的女公子王淑貞醫師，自美國習醫歸國後，現爲上海婦孺醫院院長。因爲我們都是尙賢堂婦孺醫院的董事（熊希齡夫人毛彥文也是），我見王淑貞戴了孝（其時爲一九四七年），方知她父親故世了。

夜來，蒯先生仍時來談天，但不如去歲之勤，因他的交游既廣，應酬頻繁也。飯局也大都在夜裏，不是人家請他，便是他請人家，大概都在自己公館裏，有時也在菜館裏，甚至於在妓館裏，秦淮畫舫，此時正趨繁華也。南京的候補道，出門都坐四人轎，倘然是實缺道台，可以旗鑼傘扇，全副儀仗，現在不過是候補道，而且在省城裏，那不過是坐四人轎而已。但是有差使的，在轎前可以撐一頂紅傘，有二個或四個護兵，轎後有兩個跟馬，是他的親隨。不過蒯老雖也是有差使的道員，他沒有紅

傘與護兵，只是跟馬是少不了的。

有一天，他在家裏請客，忽然把小徐、允中和我都招了去做陪客，見一位圓圓的面龐，高談闊論的，他介紹是劉聚卿；一位紫棠色臉兒，靜默寡言的，他介紹是張季直；還有一位是否繆筱山，我已不記得了，這幾位都是他的好朋友。向來他家中請客，我們概不列席的，這一回，不知何故，大約是人數不足一席了吧？那個時候，張季直已是殿撰公了，那是我初次見面。後來我住居在上海，在江蘇教育總會裏，他是個會長，我是個幹事，一個月就有好幾次見面了。

我在南京，不大出門，因為路徑不熟，除非和幾位朋友，一同出去游玩。因此南京所最繁榮、最出名的秦淮河一帶，也難得去的。有一次，大概是十二月（舊曆）初旬的天氣吧，那是郭肖艇兄弟請客，他們預備回到安慶辦電燈廠，我們在夫子廟一家菜館裏吃了夜飯。酒罷，汪允中提倡要到釣魚巷去游玩。釣魚巷是秦淮河一帶妓院薈萃之區。席中有幾位，都是釣魚巷的顧客，都有他們相識的姑娘，尤其是方漱六，還有他特別相好的人。只有我與王小徐，不會到過釣魚巷，對此並不熟悉。他們喝了一點兒酒，意興飛揚，我由於好奇心，也要跟他們去看看，王小徐是一個無可無不可的人，我們那時便跟了他們走。

自然，方漱六最內行，因此便到方漱六所熟悉的一家去。南京的妓院，和蘇州、上海是完全不同了，他們的門口，站立着許多人，當你來時，大家垂手侍立，一副官場氣派。因為方漱六大概是常常來的，他們都認得他，喚他爲方老爺。我們這一組有六七人，以方漱六爲領導，便轟到那個院子裏來了。秦淮的妓女，十之八九爲揚州一帶的人，他們稱之爲揚幫，與蘇州、上海的妓女，稱之爲蘇幫的，實爲東南妓女中的兩大勢力。

方漱六所賞識的那一位，好像名字喚作金紅，文人詞客，又把她的名字諧音改作「驚鴻」。但秦淮妓院中，不靠什麼風雅的名字，她們是尚質不尚文，名字起得好，有什麼關係呢？她們所用的什麼小四子、小五子以至小七子，甚而小鴨子，像這種庸俗的名字多得很。蘇北歷歲以來，都是荒歉，而揚州夙稱繁盛，於是像鹽城各縣的苦女孩子，從小就賣出來，送入娼門爲妓。古人詠揚州有句云：「千家養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當種田。」實在這都不是揚州本地人，但是他們總稱之爲揚幫。這種妓院，規模倒也不小，房屋倒也很好，而且自己都有游艇。因爲南京官場中人，頗多風流狎客，常常有逛秦淮河挾妓飲酒的。至於科舉時代，每逢鄉試年份，更是青年士子獵艷之處了（有些考廝，卽與釣魚巷隣近）。

因爲金紅的房間寬敞，又裝了火爐，於是大家一窩蜂地都轟進了她的房間裏去，只有王小徐一人在外間一個屋子裏。那時天氣已冷，人家已穿了皮袍子了，小徐向來穿的樸素，只穿了一件舊綢子的棉袍，外面罩了一件藍布長衫，也不穿馬褂。我們正在金紅房間裏鬧鬧吵吵的時候，早把那個同來的朋友忘懷了。忽然走進一個女掌班（俗稱鴉媽），她道：「方老爺！你們跟來的這一位當差的（僕人），正在外房等候你們。我看他扛了肩胛，寒噤瑟縮的好像身上有些冷，我就給了他一杯茶，覺得可以暖和些兒。」

我們想：我們並沒有帶什麼當差來呀！方漱六跑到外房一看，却見小徐真個縮了頭頸，手裏捧着那杯熱茶，踱來踱去，正在沉默地推闡他數學上的哲理思想。便被漱六一把拖進房裏去，一面便罵那女掌班道：「該死！這是北京下來的王大人，怎麼說他是我們的當差的，還不陪罪？」那女掌班嚇得真要叩頭求饒了。其實小徐在北京某部，確是當個小京官，至於大人之稱，在南京了無足異。本來清

制，凡四品以上方可稱大人，外官則知府方能稱大人，知縣只能稱大老爺。南京地方，做官的多，給他們升升級，也是「禮多人不怪」吧。

我在南京，差不多有一年多，除看書以外，便請教蒯先生，而以他的素好健談，又誨人不倦，因此也很多進益。不過在他那裏的朋友，除了王小徐是他的年姪外，如汪允中、郭肖艇、陳宜甫諸位，都是他的學生。我沒有來得及進高等學堂，如果進去，也是他的學生了（當戴夢鶴入高等學堂時曾亦有此志願）。但是他的教導我，也和他的學生一樣，我頗想拜他為師，執弟子禮。因託汪允中為之說詞，但蒯先生謙辭，他說：「交換知識，切磋學問，就可以了，何必執師弟之禮？一定要拜師執贄，將置朋友一倫於何地耶？」

金粟齋譯書處

越年，我又從南京回到上海來了。原來蒯禮卿先生在上海有金粟齋譯書處的組織，派我和汪允中到了上海。先是在一二年間，侯官嚴又陵先生，翻譯出了一部斯賓塞爾「天演論」，震動了中國文學界，好似放了一個異彩。這位嚴先生，本來是考送到英國去學海軍的。他是福建人，直到如今，好似

福建人習海軍是有傳統的。回到中國，中國那有什麼海軍，嚴先生一無用武之地，他自己便研習起文學來了，所以他的文筆是很好的。

他爲了溝通中西學術，便從事翻譯，天演論一出版，這個新知識傳誦於新學界，幾乎人手一編。第一是他的譯筆典雅，他曾說：譯外國書有個三字訣，便是信、達、雅。他既說到此，自然便循此三字而行。創立名詞，如天演論中的「天擇」「物競」之類，亦至爲切當。那個時候，白話文還不會流行，什麼人讀書、寫文章，都要用文言。即如以後提倡白話文的魯迅、胡適，最初作文譯書，也用文言的。就因爲他們譯筆好，所以在當時的那兩位福建先生，嚴又陵與林琴南，在文壇上走紅。

但嚴又陵那時是一位直隸（今河北）候補道，屬於北洋，住居在天津。他雖然在文壇上走紅，在官場上却是走黑。照例，他是一位出洋留學生出身，熟悉洋務，應該是走紅的了，其所以成爲黑道台的緣故，據說：他的脾氣很不好，喜歡罵人。對於同僚，他都瞧不起，當然，這些候補道中，有些花了錢買來的捐班出身，肚子裏一團茅草，火燭小心，而他對上司，也有藐視態度。況且自己又吸上了鴉片烟，性子更懶散了，試想一個做官的人，怎能如此的嗎？

他不但走黑而且鬧窮了，他託人介紹，向蒯禮卿借了三千元，蒯慨然借給他。後來他說：要他還債，他那裏還得出，現在他正譯了幾部書，自己既沒有資本出版，給人家印也沒有受主，蒯君道義之交，就把這幾部所譯的書，作爲償債之資吧。那時蒯也承受了，不過那是譯稿，要印出來賣給人家，方能值錢。這些譯稿，計共有七部，便是「穆勒名學」「原富」等等的幾種書。

其時還有一位葉浩吾先生，他是杭州人（葉葵初的令叔），會到日本去習過師範教育，在上海當時也是新學界的人。回國後，譯了許多日文書，並開了一個東文學堂，這位老先生，真是名士氣太重

，什麼事都想做，而從不爲自己的經濟着想。他譯了許多日文書，自己想印而又沒有錢，把譯稿售與人家，人家又不要，弄得很窘，以致生計缺乏，甚至斷炊。在嚴冬時，爲了棉袖子已付質庫，早晨不能起身。於是友朋輩爲他製了一件厚呢袍子，作爲梯袍之贈。也由友人介紹，來向蒯先生借了七百元，也是把他的譯稿作爲抵償。

蒯先生收了嚴又陵、葉浩君的西文東文譯稿一大部份，可有什麼辦法呢？新文學是有時間性的，不比中國的古書，可以束之高閣，藏之名山，爲了開風氣起見，趕緊要把那些印出來才好。因此策動了他開辦譯書局的意念了。不過倘要印書，現在全國只有上海較爲便利，並且出版以後，就要求銷路，求銷路必須到上海，上海四通八達，各處的購書者，都到上海來選取，各處的書商，都到上海來批發，因此他決定到上海來，辦理這個譯書事業了。

這一個機構，就喚做「金粟齋譯書處」，那個名稱，是他自己題的，「金粟」兩字，也是佛書上的典故吧？第一步，先派方漱六到上海去租房子，置傢具，安排一切。第二步，便派汪允中與我兩人去辦理印刷等事。不多幾天，方漱六在上海寫信來，說房子已經租定了，在南京路的某某里（這個里名，我已忘却，其地址在雲南路與貴州路之間，老巡捕房隔壁），於是我與允中兩人，便離開南京，到上海去了。

蒯先生的意思，却教我們兩人常駐上海，方漱六則經理一切，或往來甯滬，管理業務上及財政上事，至於編輯、印刷、校對等，由我與允中兩人分任之。譬如像嚴又陵先生的書，我們是不能贊一字的，但是校對這一件事，却要十分細心。蒯先生也諄諄以此爲囑。一部高深的書，只不過錯了幾個字，往往原意盡失，如何對得起人呢！至於葉浩吾先生的譯稿，因爲他的日本文氣息太重，他是直譯的

，甚而至於就在日本書上鈎鈎勒勒，不再另紙起稿，那非加以修改不可的。

我與允中到了上海後，第一件事，便是尋訪印刷所。那個時候，上海可以印書的還不多，我們所印的書，當然要設備完整一點的呢。第二件事，便是整理稿件，我們決定那一部書先印，那一部後印，雖然蒯先生給我們二人以全部處理之權，如果二人不能決定，還須請問於他。第三件事，那是商量版式、行款、字型等類，允中比我內行，全憑他的設計。當時還是流行綫裝書的，不流行兩面印的裝訂的。

尋訪印刷所的事，我比允中較為熟悉，連日奔波，找到了兩家較為合式的，一家喚作吳雲記，一家便是商務印書館。我們預備出書快一點，所以找到了兩家印刷所，可以分部進行。兩家比較起來，商務印書館規模較小，而設備較新。它是開設在北京路的河南路口，也是一座平房，他們裏面的工人與職員，總共不過三十人，經理先生夏瑞芳，人極和氣，他們的職員都是出身於教會印書館的。開辦這家商務印書館，資本金是三千元。除印教會書籍外，也搞一點商家的印刷品，後來又把英文課本（就是英國人教印度小孩子的課本，中西對照的翻譯出來），譯成了「英語初階」、「英語進階」等書，那是破天荒之作，生涯頗為發展。

吳雲記是一家個人所開的印刷所，地址在蘇州河以北，號稱北河南路，泉漳會館側面的對門。記得這時候，那邊還有一條河浜，更有一座橋，吳雲記就在橋堍下。那個印刷所，比較舊氣一點，有幾間大廠房，工人多，出書較快。當時爲了先印什麼書，我們討論起來。我最初主張印葉浩吾的書，因爲他從日文譯的都是淺顯易解，如關於政治、教育、法律等爲現時所切用，篇幅不大，容易出版。嚴又陵的書，文筆很深，非學有根柢的人，不能了解，故不如先易而後難。

但允中所主張者，也很有理由，他說：「葉浩吾所譯的書，都是直譯的，全是日本文法，非加以修潤不可。但修潤起來，也要相當時日，不若嚴又陵的書，立刻可以排印。況且自從嚴譯『天演論』後，名噪一時，有許多人急於要看看嚴又陵續出的書。也已有有人知道有嚴譯許多書，將即由我們金粟齋出版了，倘若遲遲不出，不免令人失望，所以我們應該趕緊將嚴譯排印出版。」後來寫信到南京去，取決於蒯先生，回信說：「不論嚴譯葉譯，以迅速出版為主。對於那幾部書的印刷費，我已籌備齊全了，不過我們是爲了開風氣，不是想在出版上獲利。到出版以後，可以藉此周轉最好，不然，我們到那時候，另想法子。」

於是我們便與吳雲記和商務印書館訂了合同，我們兩人便分工合作起來。大概是我擔任校務，而允中還擔任修改葉浩吾的譯稿。嚴又陵的，大半是在商務印書館排印的，我因此便風雨不改的天天跑商務印書館了。嚴先生的稿子，他有自己刻好的稿紙，寫的一筆很好的行楷，當然也有添注塗改的地方，但他的改筆，一例是紅墨水的，鮮艷可喜。不比葉先生的譯稿，真是一塌糊塗，我們說笑話，只怕問他自己，也認不出來呢？但是嚴先生的稿子雖然清楚，我總是小心翼翼，無論如何不敢擅改一個字的。倘有一點可疑之處，我惟有携回去，與汪允中揣摩商量，不敢有一點武斷。

我們對這譯稿，要校對四次，頭校、二校、三校之後，還有一次清樣。清樣以後，簽了一個字，便算數了，即使再有錯字，排字工人不負責任（除非校出來了，他沒有改正），校對人負責任了。葉浩吾的書，也有幾種，由汪允中修潤以後，即以付印，大概由吳雲記印行。葉浩吾是一位好好先生，自從我們設立這個金粟齋譯書處後，他是常常來的。允中給他說，他的譯稿要修改，他說：「很好！很好！我是直譯的。」這個日文一長句中，便有很多的「の」字，他都把它譯成中文的「之」字，那

一句中便有七八個「之」字，這個句子就顯得很別扭，很魯蘇了。我們有時搞不清楚，只好請他來，和他商量。

葉浩吾先生本是一位教育家，開了東文學校外，又在「中外日報」擔任東文翻譯。年在五十左右，留着稀疏的小鬍子，很似有一些道學氣，可是我們常給他開玩笑。時常鬧窮，但他有了錢「東手接來西手去」，只要身邊有一點錢，人家向他借時，立刻借給人家，不管自己明日要斷炊了。他孑然一身住上海，他的太太和兒子住杭州，不寄家用去，葉師母常常吵到上海來（他的這位公子，後來便是寫「上海之維新黨」譴責小說之葉少吾）。

葉先生當時還鬧了一個笑話；因為我們所住的南京路這條弄堂，前面沿馬路是三上三下的房子，到後面去，却都是一上一下的房子，可是裏面便有不少的野鷄堂子（上海人亦稱為雉妓）。到了夜裏，便有許多野鷄妓女及女傭們，站在弄堂口拉客。那一天，比較深夜了，葉先生到我們那裏來談天，剛走到弄堂口，便被野鷄們拉住了，喊道：「老先生！到我們那裏坐坐去！我們新到了一位小姐。」葉先生很窘，說道：「不是的！我到金粟齋譯書處去。」她們以為金粟齋也是和她們一類的，便說：「我們那裏比金粟齋好。」於是幾個女人，把葉先生你推我擁的，拖到野鷄窠裏去，那些女人蠻力很大，葉先生一個瘦怯老書生，那裏抵擋得住呢？後來到底花了一塊錢，方許他贖身出來。

談起金粟齋出版的書，嚴譯的「穆勒名學」、「原富」之外，還有「社會通詮」、「羣學肆言」等等，都是名貴之作，雖然比不上「天演論」，可也傳誦一時。但是我們出版書中却有一種，頗受人訾議，還有人寫信來罵我們的。原來在葉浩吾所譯的日文書中，有一冊「日本憲法」還附有「皇室典範」一卷，這不過幾頁書而已。這也不能怪葉先生，我們應擔負這個責任。原來這個時候，中國已有

主張立憲的動機，一班維新黨的志士們，也在紛紛倡議，歐美各國都有憲法，爲什麼中國不能有憲法呢？汪允中和我談論：「現在大家鬧着什麼君主立憲，日本也是有皇帝的，這個日本憲法，不妨印出來給大家看看，以供參考呢。」當時我也並不反對，本來葉譯的書，全由允中主張，及至印出以後，漸有人加以批評，說是日本的憲法，那裏算得憲法，那是他們天皇頒布的，名之爲「欽定憲法」。印出那種書來，將來貽害於人民的。可是在那個時候，清廷專制，也沒有一點兒憲法萌芽，誰也沒有想到中國後來有幾次大革命呢？

金粟齋時代的朋友

我在金粟齋譯書處時代，認識了不少的名人。因爲那個時代，正在戊戌政變以後，來了一個反動，禁止開學堂，談新政，康、梁逃到海外，許多新人物，都避到上海來。再加以庚子拳變，兩宮出走，洋兵進京，東南自保，上海那時候，真是熱鬧極了。

我們這時候的金粟齋譯書處，又遷了一個地方。那個南京路（上海人稱爲大馬路）的老地方是一個繁盛的區域，但我們的譯書處，却並不一定要一個繁盛區域。尤其是後面是個野鷄堂子，燕鶯成羣

，使葉浩吾先生爲羣雌所俘，鬧成笑柄，住在這裏，更不妥當。我們如果找一個較清淨的區域，不是也很好嗎？於是我們和方漱六商量了，預備遷居，擇一個比較清靜所在。這時上海的公共租界，正在向西北區擴展，開闢不少新馬路，我們便向這些新馬路去找尋房子，却便找到了登賢里一座也是三上三下石庫門式的房子，我們便遷移了進去。

那條馬路在南京路的西北，當時還未定名，大家呼之爲新馬路，後來便定名爲白克路，租界收回以後，又改名爲鳳陽路了。那地方最初是一片曠地，荒塚亂草，但是那些地皮商人，已經在那裏建築起房子來了。我們遷移去的登賢里，便是新造房子，圍牆也沒有砌就，僅把籬笆圍了起來。可是鄰居一帶，我們便相識起來。在我們後門相對的一家，便是吳彥復的家；在我們前面，有一片方場，另外有一帶竹籬，便是薛錦琴女士的家。

薛錦琴是廣東人，記得是她的叔叔薛仙舟帶她到上海來的。有一次，靜安寺路的張園，開什麼大會（按：張園又名味莼園，因爲園主人姓張，故名張園，園內有一廳，名安塏第，可容數百人），有許多當時號稱維新志士的在那裏演說。忽見一位女子，年可十八九，一雙天足，穿了那種大腳管褲子，背後拖了一條大辮子，也跑到演說台上去演說，在那個時候，上海還是罕見的，雖然也很有不少開通的女士，然而要她們當衆演說，還沒有這樣大胆的。

一時鼓掌之聲，有如雷動，薛錦琴女士侃侃而談，說得非常慷慨激昂，聽者動容。至於說了些什麼，也是說中國要革新變法這一套，但出於一位妙齡女郎之口，就更爲精采了。因爲她是一位不速之客，登上台來演說，雖然聽她口音（廣東官話），看她服飾（那時候廣東婦女的服飾，與上海絕異），一望而知是廣東人，下台以後，方知道是薛錦琴女士，並且知道也住在登賢里，還是我們的芳鄰

呢。

住在我們後面的一家，便是吳彥復先生，他是一位公子，又是詩人，號北山，又號君遂，他的身世，記述者很多，無容細述。他是一位禮賢好客的人，那時章太炎先生就住在他的家裏，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太炎。在南京的時候，早已聞名，有人稱章枚叔是怪客，也有人呼之爲章瘋子。我見他時，他穿了一件長領的不古不今，不僧不俗的衣服，有點像日本人所穿的浴衣。手裏拿了一柄團扇，好似諸葛亮的羽扇。他老早就剪了頭髮了，亂糟糟的短髮披在頸後，好像一個鴨屁股。他是浙江餘杭人，那時他的排滿思想，已塞滿在他的腦子裏，但他的講話，還是那樣溫文遲緩，並沒有什麼劍拔弩張之勢，不過他這個餘杭國語，實在不容易聽呢。我們偶然請他寫點文字，他也很高興，但一定用黃帝紀元，有人請他寫扇子，他也寫，字頗古艷，別有風姿，我就請他寫了一個名片。

吳彥復帶了他的那位姨太太，喚做彭媽的，還有兩位女公子，住在這裏，但是他家裏的賓客很多，有時開出飯來，便坐滿了一桌。這時從日本回國的，從歐美回國的，從北京下來的，從內地出來的，都齊集在上海，都要來拜訪吳彥復、章太炎。常到他家裏的有沈翔雲、馬君武、林萬里（即後來的林白水）、章行嚴，都是一班有志青年。行嚴這時年少翩翩，不過二十歲剛出頭的人吧，他常到吳彥復家裏去，與太炎先生，討論學術。因爲他與太炎同姓，人家有疑爲他們兄弟行的，其實太炎是浙江人，行嚴是湖南人，可謂同姓不宗。後來行嚴也編過一部「黃帝魂」，充滿種族思想，那時候的種族革命思想，實已深中於人心。

行嚴也常到金粟齋來，金粟齋的後門，正對着吳彥復的前門，兩家賓客，川流不息，因此便顯出更熱鬧了。我們有時吃了夜飯，也便到吳彥復家裏去玩，常見他們那裏高朋滿座，議論風生。彥復先

生對人和藹，每喜獎借後進。他曾經送我一部「北山詩集」，其時我的「迦因小傳」正再版，也送了他一冊，他還做了詩呢，起初我不知道，後來讀梁任公的「飲冰室詩話」，却載有一則，今錄如下：

十年不見吳君遂，一昨書叢狼籍中，忽一刺飛來，相見之歡可知也。相將小飲，席間出示近稿十數紙，讀之增歎。顧靳不我畀，惟以別紙題「迦因傳」一首見遺，錄此以記因果。詩云：「萬書堆裏垂垂老，悔向人來說古今。薄酒最宜殘燭下，暮雲應作九洲陰。旁行幸有婁迦筆，發喜難窺大梵心。會得言情頭已白，鬢髮相見久沉吟。」迦因傳者，某君所譯泰西說部，文學與「茶花女」相埒者也。

任公說這話，那是過寵了，我們何能與畏廬先生的「茶花女」相埒呢？不過彥復何以對此而發牢騷，有人說：那個時候，彥復的如夫人彭媽，正是下堂求去，他未免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而任公也知之，所云「因果」者，乃以掩揚出之耳。

有一天，我從金粟齋出門，看見章行嚴携着吳彥復的兩位女公子，到薛錦琴的家裏去。我問他何事？他說：「奉彥復先生命，拜薛錦琴爲師，薛錦琴是固中西文並茂也。」彥復的兩位女公子，長名吳弱男，次名吳亞男，那時兩姊妹，年不過十一二，我們在彥復家裏時，常見她們憨跳狂躍，不想後來弱女士，便做了章行嚴夫人。因爲大家都出國留學了，想是在國外締結這姻緣吧。及至又二十多年後，我在北京的東站，乘京滬路車回上海，又遇見了章夫人，那時行嚴在滬大病，恰巧邵飄萍來車站送我，鄰室的章夫人，還託邵君打電報到上海去呢。此是後話，在此不贅。

我們的金粟齋譯書處開辦了有半年多後，得到了蒯先生一封信，說是嚴又陵先生要到上海來，我們要畧盡招待之責。嚴先生是住在天津的，這一回到上海來，並不是什麼游玩性質，說是奉命來辦理

一項洋務交涉的。我們得到了蒞先生的信，當然要歡迎他。他在上海也有很多朋友，這次來，他是寓居在一位同鄉的家裏，那也不去管它。約了上海幾位名流，請他吃了一次飯，自由方漱六去安排，不必細說。

那時候，嚴先生的「穆勒名學」剛在金粟齋譯書處出版，因有許多人不知道名學到底是一種什麼學問，名學這個名詞，應作如何解釋？便有人來和我們商量：趁嚴先生此次來上海，我們不如開一個會，請嚴先生講演一番，使得大家明白一點。我們於是請命於嚴先生，他也允許了，便即選定了一個日子，借了一所寬大的樓房，請了許多人來聽他的演講。我們這個會，定名為名學講演會。

這個名學講演會，我們邀請的人可不少呢。除了常到金粟齋來的朋友，以及常往來於吳彥復家中的名流，都邀請外，還有僑寓於上海許多名公鉅子，餘者我都忘懷不記得了，我只記得有兩位，一位是張菊生（元濟），一位鄭蘇堪（孝胥）。這兩位在我却是第一次見面。吳彥復陪了章太炎也來了，還有我們未曾邀請的，朋友帶朋友的也來了不少。關於聽講的事，我們可以拒絕嗎？當然一例歡迎。

本來約定是下午兩點鐘的，但到了三點鐘後，嚴先生方才來了。原來他是有烟霞癖的，起身也遲一點，飯罷還須吸煙，因此便遲了，他留着一抹濃黑的小鬍子，穿了藍袍黑褂（那時沒有穿西裝的人，因為大家都拖着一條辮子），戴上一架細邊金絲眼鏡，而金絲眼鏡一脚斷了，他用黑絲綫縛住了它。他雖是福建人，却說的一口道地的京話。他雖是一個高級官僚，却有一種落拓名士派頭。

我們的設備，也不似學校中那樣有一座講台，只在向東安置一張半桌，設了一個坐位，桌上供以鮮花和茗具。聽講的人排列了許多椅子，作半圓形，那都是方漱六所安排的。嚴先生講演得很安詳，他有一本小冊子，大概是摘要吧，隨着隨講，很有次序。不過他的演詞中，常常夾雜了英文，不懂英

文的人，便有些不大明白。但這種學問，到底是屬於深奧的學問，儘有許多人，即使聽了也莫名其妙。坦白說一句話，我是校對過「穆勒名學」一書的人，我也仍似淵明所說的不求甚解。所以這次來聽講的人，我知道他們不是來聽講，只是來看看嚴又陵，隨衆附和趨於時髦而已。

這次講演，大約有一小時之久，我們雖設有坐位，嚴先生却沒有坐，只是站着講。他演講的姿勢很好，平心靜氣，還說了許多謙遜話。不過雖是一小時，在他也覺得吃力了。講完以後，我們餉以茶點，聽衆也都星散，留了張菊生等幾位。張菊生是他的老朋友，從前在北京和他一起創辦過通藝學堂的。可是他也沒有多坐，便匆匆回去了。

這個名學一門學問，嚴先生雖倡譯此名詞，他也覺得不易使人了解，後來他又譯了一部「名學淺說」；那不是金粟齋出版了。到了現代，有許多研究新學術的人，也不大提及這一門學問。有人說：在日本人方面，則稱之爲「論理學」。我國近代，「邏輯」兩字，頗爲通行，且有所謂「邏輯學」者，聞「邏輯」兩字，爲章行嚴所創譯的名詞，是否從名學而來，會當問之孤桐先生。

我第一次與新聞界有緣的是「蘇報」，前已說過了，第二次便要說到「中外日報」是後起之秀，雖然有「申報」、「新聞報」兩個大報籠罩於上，但不免暮氣已深，況且這兩大報都是外國人資本，外國人創辦（申報屬英，新聞報屬美），報館好似一家洋行，華經理稱爲買辦，主筆呼爲師爺。這班維新派的人鄙夷它，而他們也以注重商業爲本位，只要能多銷報，多登廣告就滿足了。「中外日報」是中國人辦的，當然沒有那種洋商報館的習氣。爲了汪氏昆仲的關係，我們早與中外日報接洽，金粟齋出版的書，必須在中外日報登廣告。後來因爲金粟齋沒有辦發行所，出了書也就由「中外日報」寄售了。

中外日報館我是去過好幾次的，館址至今已想不起來，那規模比了「蘇報」可是大得多了。但是要比現在的大報館，還是不能同日而語。主筆房只有一大間，汪頌閣以總經理而兼總主筆，占了一張巨大的寫字枱，此外的編輯先生，各佔一席。兩位翻譯先生對面而坐，譯東文的是葉浩吾，譯西文的乃溫宗堯（粵人，號欽甫）。說起當時報紙上翻譯，殊令人發生感慨：第一、一般普通的讀者，不注意外國新聞，譬如說：現在某國與某國已在交戰了。他們說：外國人打仗，與我們中國無關。除非說，外國將與中國開戰了，當然有點驚慌，但是說，不打到上海來也還好，東南自保之策，也就是這種心理。第二、翻譯新聞，翻譯些什麼呢？那時各國的通訊社都沒有到上海來，只有英國的路透社一家，中國報館要教它送稿，取價甚昂，以英鎊計算，實在路透社報告的都是西方消息，讀者也不甚歡迎。於是翻譯先生們只好在上海所出版的西報上搜求，如「字林西報」等，倒有好幾家呢。日本有一種「東方通信社」，記得也還未有，日本報館，似已有兩家開設在虹口。不過日本報紙可能常常由大阪、東京寄來，足供葉浩吾的選擇。

我今再提起一人為馬君武先生，君武亦吳彥復家常到的賓客，為人誠摯而好學，我常見他坐在人力車上，尙手不釋卷咿唔不絕。然其天真處亦不可及，當時傳有兩事：其一、這時日本留學生回國者甚多，頗多浪漫不羈之士，如沈翔雲則挾妓駕了亨斯美車（一種自行拉韁的馬車）在張園兜圈子。如林少泉（即白水）則見其穿了日本和服在抽鴉片烟。至於出入花叢，竟無諱忌，某一日，一羣青年，在妓院鬧事（上海人稱之曰「打房間」），據說為龜奴所毆，君武本不作冶游，乃因同伴被辱，前往助戰，亦受微傷。汪允中告我，初不信，明日見之，果額角其有血痕一條。其二、君武迫其母夫人入女學讀書，母云：「我已五十許人了，何能再求學？」但君武固請，至於跪求，太夫人不得已，勉徇

愛子之請，梳辮子作女學生妝，隨少女曾入學數星期。此爲當時友朋對馬君武的趣談。

更有對於我一嘲弄可笑的事，我今亦不諱言。當時金粟齋常來游玩的賓客中，有一對青年夫婦，邱公恪與吳孟班。公恪名宗華，爲吾鄉邱玉符先生之子，夫人吳孟班，亦吳人，他們年齡都比我小，而才氣橫溢，雄辯驚座，不似我之訥訥然的。尤其是孟班，放言高論，真不像是個吳娃。我們以同鄉的關係，時相過從，孟班常說我太拘謹無丈夫氣。一天，在朋友輩宴會中，宣言於衆，說我像一位小姐，於是這個小姐之名，不翼而飛，傳播於朋儕間，如蔣觀雲先生（智由）見我即呼我小姐。三十歲以後，本已無人知我有此雅號，一日，與南社諸子吃花酒，諸真長（宗元）忽宣洩我這個隱名，於是又飛傳於北里間，花界姊妹，亦以小姐相呼，真使我啼笑皆非，甚至老年時，陳陶遺還以此相諷呢。

再說邱公恪與吳孟班這對夫婦吧，我離金粟齋後越一年，聞孟班即以病逝世，或云難產。公恪到日本，習陸軍，入成城學校。但日本的那種軍官學校，課務嚴厲，他雖意氣飛揚，但體魄不能強固如北方健兒，又以他們這對青年伉儷，情好素篤，夫人逝世後，不數月他亦以病退校，友朋們送之回上海，未及一月，亦即長逝。兩人年均未屆三十也。葉浩吾輓以聯曰：「中國少年死，知己一人亡。」蔣觀雲輓吳孟班詩句云：「女權撒手心猶熱，一樣銷魂是國殤。」我今白髮盈顛，回憶五十年前，多情俊侶，再無復有呼我老小姐的，思之不禁有餘哀也。

重印仁學

自從我到了上海，担任了金粟齋譯書處的工作，離蘇州故鄉更近了，因此每一個月總要回去一次，留在家裏兩三天，或是三四天。那個時候雖然蘇滬火車未通，小輪船也甚爲利便。其時東來書莊還開在那裏，由馬仰禹在經理，我還在上海盡一些接洽和運輸的義務。還有勵學社的諸位同志，有的還在日本，有的已經回國，也常常訪晤通信，在當時也可以說到「同學少年都不賤」這一句詩了。

在這個時候，最可悲痛的是我的譜弟戴夢鶴逝世了，他年齡還不到二十四歲，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却爲了肺病而夭逝，真是極可惜而可哀的事。我從上海回蘇州時。常去看他，前兩個月，我去看他，見他面色紅潤，精神甚好，不像是有病的人。私心想念，或者從此會好起來吧。我的母親不是也有肺病的嗎？她現在已經五十多歲了，從前五十歲後便稱中壽了，夢鶴也能活到五十多歲，其所成就當然不小。

最近十日前，得馬仰禹來信，說是夢鶴病重，已臥牀不起了。蘇州人有句俗語，叫做「癆病上牀」，便是說已無生回之望，因爲凡是患肺病的人，平日間往往好似無病的人，起坐隨時，一直到了病勢沉重，不能起身，從此就再不能離牀了。不過上牀以後，也還有能淹遲若干時日的。不意十日後，我自滬回蘇，一到家裏，即見到他們的報喪條子，即於是日就是他的大殮日子。急往弔唁，已陳尸在室，道義之交，知己之感，不覺淚涔涔下。他父母在堂，夫人尚比他小一歲，向以美麗稱，伉儷甚篤，並無兒女。開弔發訃文期，友朋輩欲我寫一文，以誌其志行，隨訃分發。在從前是越禮的，我寫了一文，傳記不像傳記，祭文不像祭文，充塞悲哀，無從下筆。

寫至此，我又回憶到以肺病而殺害許多才智青年的，還有我的表叔吳伊耕先生。他的逝世，比戴夢鶴還早一二年吧。他是富家子，然而這個肺病，專門向那班富家子侵襲，鄉下人種田漢，便不會有這個疾病。他聰明好學，爲我吳葉鞠裳先生（昌熾）得意學生。他的病與夢鶴有異，差不多一年中有半年臥病，不是這裏，便是那裏，以西醫言，則同出一源，所的結核病也。（憶我曾譯過一小說，名「結核菌物語」，結核菌可以走遍全身，肺病即肺結核，此外如癩癧、肛癰等等，皆屬此。）

伊耕表叔之內兄，爲蘇州大名鼎鼎的醫師曹滄洲，曾爲西太后看病，有御醫之稱。但縱使此名醫，也醫不好這個纏綿惡毒的肺病。曹滄洲還歸咎於我的這位舅祖清卿公，過於迷信，專吃乩壇上的仙方。直在那些仙方，吃不好也吃不壞。總之這個肺結核病，在號稱文明的歐美各國，醫學日漸發明者，至今尙束手無策呢。我在八九歲的時候，隨祖母歸寧，常住吳家，由伊耕叔教我讀書，及逝世後，清卿公涕泣語我道：「他生平沒有一個學生，就只有是你。」我知其意，故輓聯上竟以師禮尊之，自稱受業。伊耕叔有一子，甚慧。三歲而殤。於是乃以硯農叔之次子子深嗣之。

我今再叙一悲哀的事，在此時期中，我的尤巽甫姑丈亦去世了。我得信後，立即從上海回去，在他棺前痛哭了一場。因爲我當初從尤宅辭館出來，到南京去的時候，使姑丈有些不大愉快，他是有點守舊的，不願我走新的一條路。就是我在館的時候，因爲我腳頭太散，不大認真，也有些不滿意，常寫一個便條，交子青哥勸告我。我寫給了他的回信，充滿了窮人的傲氣，有些話竟有些頂撞了他。事後也非常痛悔，曾寫信去道歉謝罪。及至聽得他故世了（他已久病），想起我的得有今日，也虧了姑丈提携栽培之力，因此在他大殮之日，我不禁在他靈前大哭起來。

我姑丈故世以後，子青哥真是哀毀骨立，但是他的思想上，可以逐漸解放了。因爲我姑丈還相信

科舉不至廢棄，還希望他作科舉中人，所以不大贊成他讀新書。自從戊戌政變，康梁逃亡，科舉復活，他的信心愈堅了。然而時勢所趨，無法阻遏，自從姑丈逝世後，我在上海時時與子青哥通信，凡是蘇州所購不到的書，都是我從上海郵寄給他，也常常把我所交際的，學習的告訴他，與他討論，與他批評。他也有他的新見解，新議論，有時一封長信，千餘字不足為奇。

有一次，日本的橫濱印出了譚嗣同的「仁學」一書（譚字復生，湖南瀏陽人，為戊戌六君子死難之一），我的一位留學日本的朋友，寄給了我五本。我寄給了蒯禮卿先生一本，送了汪允中一本，子青哥一本，僅剩了兩本，但有許多朋友，知道我有此書，紛紛向我索取。我只能說：再託日本朋友寄來。但日本朋友的回信說：此書出版後一搶而光，只好等候再版。但此是禁書，不知是否能再版，重行寄來，未可一定。

我當時是每天跑商務印書館的，為了校對嚴又陵先生的譯稿。那天我忽然靈機一動，這部「仁學」，是譚先生的遺著，而又是清廷所禁止者，在日本印行，並沒有什麼版權，只要能流通。既是許多人要讀它，我們何妨來重印一下呢。我就帶了這部「仁學」，到商務印書館和夏瑞芳商量。我說：「我要印這部書，你們可以擔任嗎？」他說：「你先生要印什麼書，怎麼不可以擔任呢？」我說：「這是一部禁書呀！」告訴他譚嗣同是戊戌政變六君子之一，為清廷所殺戮的故事。他說：「沒有關係，我們在租界裏，不怕清廷，只要後面的版權頁，不印出那家印刷的名號就是了。」

我這時便把那本「仁學」交給他，請他印刷估價，我說：「只要印一千本，但要用潔白紙張，裏面還有一頁譚復生先生的銅版照相圖。因為我印這本書，不想賺錢，也不想多印，預備半送半賣，得以零擦回一些成本就算了。」夏瑞芳所估的成本並不貴，大約連紙張排印，不過一百元左右。他說

：「你老兄的事，這是核實估價，不能再便宜了。」

雖然如此說，但是我想印這部「仁學」，而印書之費，還沒有籌到。如果交給東來書莊印，也有問題，因為這是禁書，內地不能出版與發行，而且要取得各股東的公意。我私人獨資印也可，可是我那囊中這時還沒有一百元的餘資。我於是寫信給子青哥了，告訴他：我想印這部「仁學」而獨力不支。他立刻回了我一封信，極力贊成，他說：「由我們兩人私人印行好了，如果印費要一百元的話，我出六十元，弟出四十元如何？」不過他要求出書以後，定價要低廉，我們是為尊重譚先生遺著，並非翻印謀利，望弟速與商務印書館訂定。

我與夏瑞芳又磋商了一次，「仁學」便立即開排了。好在我每天要到商務印書館去校對嚴又陵先生的譯稿，附帶的校對「仁學」的校樣。我總是每天吃過午飯後便去，總是在那裏工作一個下午。我自覺我的校對很精細，可能不會有錯字，我以為校對的錯誤與不細心，對於作者與讀者，殊為抱歉。直到後來，我自己寫稿子，對於那些出版家，校對疏漏的，深為難過。往往一篇文章中，只要被它差了兩三個字，竟使這篇文章大走其樣，真使你啼笑皆非，奈何它不得呢。

直到「仁學」印好裝製的時候，夏瑞芳忽然對我說：「這部「仁學」，我添印了五百部。」我覺得夏君是違約了，我們訂定了印一千部的，怎麼他忽然添印五百部呢？印刷所受人之託，擔任了印書的職務，怎可以添印呢？大概夏君也不知道「仁學」裏面，講的是些什麼話，只知道是一部新出的禁書，而又知道是沒有版權關係的（實在我會寫信到橫濱，與原出書人接洽過，還允許送給他們若干書的）。或者有人給他說：譚嗣同遺著很吃香，可能多銷幾百部呢。

但是既沒有版權關係，我能印，他亦能印。而且夏君也還算老實坦白，換了別一個書賈，他也不

必告訴我，別說多印五百部，多印一千部，我也無從知道。我只能說：我印這書是有後台老板的，我不能允許你。他見我有難色，便道：「這樣吧！我多印了五百部，我在印費上，給你打一個九折吧。而且這書也由你精心校對的，作爲小小酬勞。」

這事本想與子青哥商量，但子青哥於印書事，完全外行，並且他一切託了我，即使問他，他也說由我作主。況且我們印這部書，並無權利就想，只有推廣主義，多印五百部，豈不更好？因此我也就默許了夏君，不過向他聲明，「我們是做蝕本生意，半送半賣，定價甚低，你不要和我們來搶生意。」夏君答應道：「我知道！我知道！」出書以後，送給了橫濱數十部，贈給了朋友的也不少，其餘則分散在各寄售所。距今三十年，我在舊書攤上，還看見我們所印的那部「仁學」，而子青哥墓木已拱矣。夏君的五百部，不知銷在何處？我偶然問及他，他笑着說道：「不夠銷！不夠銷！」

夏瑞芳，上海本地人。有人告我：夏在年青時，曾在英租界當一名巡捕（巡捕爲租界中的警察），常在華英印書館門前站崗。遇到了華英印書館中的鮑咸昌等兄弟，勸他何必當巡捕（那時租界華巡捕每月薪水不過數元，尚不及印度巡捕），不如從事於印刷事業。夏亦覺當巡捕無甚意思，他們都是基督教徒，於是便組織這家商務印書館。因夏甚能幹，便舉爲經理。這是後來商務印書館發達後，有人談起的，語云：「英雄不怕出身低」，做巡捕又何妨。但我知夏瑞芳確是習過排字業的，業務繁忙時，他也能捲起袖子，脫去長衫，向字架上工作的。

雖然那時資本不過三千元的商務印書館，頗思有所發展。夏瑞芳不是中國舊日的那種老書賈，而以少年失學，於文字知識上是有限的。他極思自己出版幾種書，但不知何種書可印，何種書不可印。不過他很虛心，人家委託他們所印的書，他常來問我是何種性質？可銷行於何種人方面？當然他是爲

他的營業着想，要擴展着他的生意眼，忠實於他的事業。他又常常詢問我：「近來有許多人在辦理編譯所，這個編譯所應如何辦法？」我說：「要擴展業務，預備自己出書，非辦編譯部不可。應當請有學問的名人主持，你自己則專心於營業。」夏君搖頭歎息道：「可惜我們的資本太少了，慢慢地來。」

夏瑞芳雖然不算是一位文化人，而創辦文化事業，可是他的頭腦靈敏、性情懇摯，能識人，能用人，實爲一不可多得的人材。後來商務印書館爲全中國書業的巨擘，却非無因而致此。但是夏瑞芳後來在商務印書館發行所門前被人暗殺了，這是很可惜的。至於爲什麼被人暗殺，想歷史上當有記載，我這裏不多說了。

金粟齋的結束

金粟齋譯書處的不能維持下去，就是它的經濟基礎不會打好。當時一班有志之士，提倡新文化事業，都是爲了開風氣，並不是爲了謀利潤，因此便不在經濟上打好基礎，這大都是不能持久的。蒯禮卿先生辦這個金粟齋譯書處，最初的動機，便是嚴又陵向他借了錢以譯稿爲抵償，後來又有了葉浩吾

的幾種日文譯本，如果不印出來，不是把它們凍結起來，成爲死物嗎？所以他籌出一筆款子來舉辦，最低限度也要使嚴又陵、葉浩吾的幾部譯稿，可以早日出版。

這個譯書處，只有他個人的資本，並非股份性質。而且沒有規定應用多少錢，沒有固定資本。用完了錢向他說話，又像是一種無限性質的，這個基礎就不穩定了。真是當時說的只能耕耘，不問收穫。蒯先生是世家子，雖然做了官，以名士派而帶點公子脾氣，他不知現代的出版事業，已成了商業化了。還像從前的名公鉅子，出一部詩文集，贈送給人的這種玩意兒嗎？

但是我們當時對於這個譯書處，也寄以無限的希望，鑒於嚴又陵的「天演論」足以開動中國的文學界，以後關於嚴譯的書，一定可以風行海內，不脛而走。便是葉譯的幾部書，也是當務之急，雖然由日本文中譯出，而日文的譯本，不是現在正風起雲湧嗎？並且我的在日本留學的朋友，聽得我在譯書處，他們也來承攬生意，願意給金粟齋譯幾部書，只要開出那一種類。如果出版的書，源源不絕，收回成本，繼續出書，不是便可以成爲一個永久的機構嗎？

原來他們那些當外官的人，經濟是流動的，尤其像那班候補道。有了差使，可以揮霍；沒有了差使，只好坐吃老本。那時蒯禮卿的十二圩鹽務差使，聽說要交卸了，繼續有什麼差使，却還沒有下文。因此之故，他便有了緊縮譯書處的意思。可是金粟齋的開銷也不小，除了關於印書費用以外，我們幾個人的薪水以及房租、食用，還常常要當碼頭差使。有許多當時的維新黨人物，都跑到金粟齋來，是一個文星聚會之所。熱鬧是熱鬧了，花錢也更多了。

我和汪允中兩人，是不管金粟齋的經濟的，管經濟的却是方漱六。有一天，方漱六哭喪着臉向我們道：「老頭子（指蒯公）寫信來罵了，說我們費用太大，要我們緊縮，但他又常常介紹他所認識的

人，到上海來，要我們招待請吃飯，太太又要在上海託買東西，我都是有賬可查的。但漱六的賬，我們從來不看的，他是蒯公的姪女婿，是他親信的人。又有一天，方漱六告訴我們：「老頭子有補缺的希望。」我和汪允中都說：「那就好了，金粟齋當可發展了。方漱六搖頭道：『更糟！誰不知道金粟齋是蒯光典辦的，沒有得缺的時候，尚無所謂，得缺以後，京裏那班都老爺，參你一本，說你『勾結新黨，私營商業』，那就是革職查辦了。』後來蒯公果然被補授了淮揚道，金粟齋却早關門了。」

可是金粟齋是註定要失敗的，我們也不能辭其責，這便是當時我們對於出版事業實在是外行。不比那些舊書坊，它開好了一家書肆在那裏，基礎已立，看機會刻幾部書，與同行交換銷行，就立於不敗之地。我們可不能這樣做，我和汪允中兩人，一到上海，便商量印書事，如何發行，並未計議及此。汪允中還主張印好幾部書，一齊出版，便是在報紙上登廣告也合算些，體面些，或可以轟動一時，那真是書生迂腐之見。當時還以為一出書，便可以收回多少成本，實是一種幻想。因為自己既沒有發行所，須向各書店推銷，這時上海書店還不多，對於出版的新書，信心未堅，不肯大量來批發，至多來批十部五部，試為推銷。出版家沒有辦法，只好用寄售的方法了。

寄售的方法，是賣出還錢，那實在不是生意經。一般書買，售出了十部，只報告五部，有的還是三節算帳。他們當然不能給你登廣告，即使書價可以全部收回，也是鷄零狗碎，增添許多麻煩。書已寄去了好多時，錢老不回來，若是寄售在外埠的，那更糟了，冥鴻一去，永不回頭，誰花了路費，去討回這些微的書價呢？所以不單是金粟齋，當時有好多的出版家，起初是一團高興，到後來半途而廢，便是這個緣故。

金粟齋譯書處不到兩年就結束了。只有支出，沒有收入，成了個無底之洞，如何支持下去。這個

兩年來，蒯先生已經花了不少的錢，怎能教他再維持，就說開風氣，也要有個限度呀。不過金粟齋所存留的譯稿，未印者尚有十分之一二，到此也只好暫時停止了。既已準備結束，也須有個善後方法，房子退租，工人遣散，自有方漱六去料理。但是已經印好的幾部書，如何發行出去，難道束之高閣嗎？

後來我們決定辦法了，和中外日報館商量，金粟齋已印就出版的幾部書，託中外日報館代售，一齊交給他們經理。汪頌閣爲人誠懇，而且在他的報上，常年登出義務廣告（幾年以後，嚴譯的幾部書，如「原富」等等書的版權都歸入了商務印書館了。這個交涉，不知何人經手，我未知道）。至於人事問題，容易解決。總共只有三人，方漱六、汪允中和我。除了方漱六暫時留在上海辦理善後未了事宜，日後自回南京去。不過汪允中和我，與金粟齋脫離關係，便無所事事了。

承蒯先生的厚意說你們不妨仍到南京來，但我們覺得不好意思，因爲現在情形，不同往日，從前是爲了剛卸高等學堂的任，他有培植後進之意，招留幾個青年，此刻恐沒有這個意味了。況且我們也不能長此倚賴他，一無所事，白白的受他供養呢。汪允中也不願回南京去，他在上海已很活動，賣文亦足以度日，並且他已有了女友，我却只好回到蘇州去，再想辦法了。

當時還有一件事，我有幾位留學日本的朋友，聽得金粟齋辦理譯書事，也要求譯一些書，以補助學費，這事通過了蒯先生，他也應允了。有的付了一小部分譯費，有的訂了約，未付款，但是對方已開譯了，此刻金粟齋結束，如何辦理呢？我便請命於蒯先生。他說道：「我知道！此輩都是苦學的青年，不能使他們受虧，我可以照約收受，這不過三四百元的事罷了。」因爲我是介紹人，蒯先生不使我爲難，我也深爲感謝他。

不過我想這些留學日本朋友的譯稿，蒯先生即使接受了，也不能再行印出，豈非埋沒了人家一番心血。而且那些譯稿，多少是有些時代性的，譬如廚子做菜，要博個新鮮，倘成爲隔宿之糧，有何意味。這時我在上海，已認識了好幾家新書店，他們都向我徵求書稿，那時的所謂書稿，自以譯本爲多，但那時出版的書，以文言爲正宗，也沒有人用語體文的。譯筆則以嚴又陵所標榜的信、達、雅三字爲宗旨。我那些留學日本朋友的譯稿，他們是在課餘的工作，只求其速，不免有些粗糙了。本來到了金粟齋後，也要加以一番琢磨工作的。

因此我便另行作一計算了，既是那幾家新書店向我索稿，我便把留學日本朋友的譯本，介紹給他們，便可迅速出版，豈不是好？那時我便開出書名，畧述大意，向這些新書出版家一一兜售，他們正值出版荒，都願意收受。於是我便寫信到日本去，向他們說明，已約定的譯本，照常收受，照常付款，金粟齋雖結束，由我負責。他們當然很滿意，不過這些譯稿甚爲草率，實在有些拿不出手，非加以潤色不可。幸而他們把原本，也隨同譯稿寄來，我也懂得一點日文，有什麼錯誤之處，也可加以校正。不過我雖加修潤，不附己名，仍用譯者原名，不敢有掠美之嫌。

我自從離開了金粟齋譯書處以後，便與蒯禮卿先生疏遠了。本想特地到南京拜訪他一次，汪允中說：「不必了，他也不拘於這種禮節的人。」此刻滬寧鐵路還沒有通，還是要乘長江輪船到南京的，往來有許多跋涉。蒯先生謀補空缺，正忙於做官，不久便實授了淮揚道，我又到了山東，連音問也不通了。直至他以四品京堂內用，放了歐洲留學生監督，出洋時道經上海，這時我已進入上海的時報館了，方去拜謁一次，那天賓客如雲，也沒有說幾句話。我只見他老了許多，鬍子頭髮，全都灰白了，從此以後就沒有再見過他了。

金粟齋出來，便預備回家了，只是我在想：回到蘇州，做什麼呢？還是處館教書嗎？要謀生計，在蘇州更無出路，正在躊躇之際，遇見了葉浩吾先生。他問我：「金粟齋已結束，有何高就？」我笑說：「低就也沒有，回家吃老泡去了。」（老泡乃是一種泡飯粥，回家吃老泡，蘇諺失業之意）葉先生說：「老朋友！到我那裏幫幫忙好嗎？」原來葉先生曾經辦過一個日文譯書館，是個學習日文的機構，那是速成的，只求能讀日本文，不求能說日本話。畢業以後，許多習日文的學生要求工作，葉先生乃設立一個名叫啓秀編譯局以容納他們。因為日文譯本一時風行，葉先生也招徠了不少主顧，以應各新書店的需求。

我想這也好，暫時有所託足，便到啓秀編譯局去了。但是葉先生請我去，不是要我譯什麼日本書，却要我做整理工作。就葉先生自己所譯的稿本而論，也教人看了很費腦筋，這是我們在金粟齋已見過的了。他的譯文，只是在日本原文上的倒裝文法，用筆勾了過來，添註了中國幾個虛字眼兒，就算

數了。有時一句句子長得要命，如果不加以剪裁，把那句子另行組織，簡直拖沓得讀不下去。若是在日文原書上勾勾勒勒，排字工友也弄不靈清。葉先生請我去，就是把他們的譯稿，做這種整理工作。可是葉先生這個啓秀編譯局，我一進去，便知道前途不甚佳妙。葉先生實在是一位老書獃子，他全不懂經營事業。幫他譯東文的，都是他的學生，有些日文未通，連國文也未通，甚難加以修整。他雖然對那些出版家，採取薄利多銷主義，可是過於粗製濫造，也難以使顧客歡迎。

葉先生不是一個自私的人，他爲了辦這個啓秀編譯局，負了滿身的債，甚至把所有的衣服都當光，真是「范叔何一寒至此」。

葉先生是一個人人在上海，他的夫人和他的兒子，都仍住在杭州。每個月要寄錢去杭州作家用的，但他最初不過愆期，後來竟至中斷，雖然杭州的家書如雪片飛來，他是「學得無愁天子法，戰書雖急不開封」。葉師母沒有辦法，只得帶領了他的這位少君到上海來了。但是葉先生無錢是事實，石子裏炸不出油來，葉師母到啓秀編譯局質問他。我們看見葉先生眼睛看了日本書，手裏筆不停揮的譯書，耳朵裏聽厨子索取所欠的飯錢，嘴裏還要與葉師母反唇相稽，我說他真是五官並用，大有毛西河遺風。

我在這裏又有一段插話了，我所要說的是葉先生的這位少君葉少吾。當葉師母帶了他到上海來時，他年齡不過十五六歲，穿的衣服，宛如一個花花公子，袖中的手帕兒，洒滿了香水。我們以爲像葉先生這樣的規行矩步的教育家，必定痛責其子，但只對他皺眉歎息，斥他不長進而已。大概以葉師母的溺愛，免致衝突。向朋友張羅籌款，送他們母子回杭州，以博耳邊清淨。越一年，有人到杭州，遇見了葉少吾，他詢問道：「喂！我們的浩吾，在上海搞得怎麼樣了？」又越數年，他寫了一本小說：

名曰：「中國之維新黨」，署名曰：「浪蕩男兒」，把當時維新黨中人，罵了一個狗血噴頭。但葉浩吾先生他是維新黨中之卓卓者，幸而具有天良，未曾齒及，至於一班父執世交，則難逃筆誅了。

不要以為此書荒唐，當時很有一班反對維新黨的，讀之以為痛快。這個時期譴責小說風行，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皆以罵人為宗旨，讀者都為之提倡。維新黨中，也大有可罵之人在，「中國之維新黨」一書中，自不免添枝加葉，故甚其詞，然此輩所謂有志青年的私生活，亦不能諉為羌無故實呢。辛亥革命以後，葉少吾曾於滬軍都督陳其美處得一職，陳頗信任之，因少吾與上海做軍裝生意的某洋行有淵源，介紹了一筆軍裝生意而囊有餘資了。其時葉浩吾先生已歸道山，而葉少吾則頗為活躍。會北京開議會，四方賢傑，均走京師，少吾亦北上，頗思有所營謀，那時候，上海的北里亦動員。

花界姊妹也到首都去掘金，有一位海上名妓花元春，也到八大胡同樹艷幟，乃部署初定，忽以喉疾殞命。舉目無親，無以為殮，葉少吾慷慨拍胸口說：「花老六我雖與她沒有發生關係（發生關係，上海妓院中已有肉體之親的術語也），一切殮費，我自任之。」於是北京胡同中姑娘，都稱頌他是一位「有良心客人」。乃未及數月，葉少吾亦病死於北京，那時花叢諸姊妹，謂以義氣博義氣，羣起而理其喪。此事大有傳奇性質，自北京傳至上海，各報亦競載其事，有人為作輓聯曰：「秋雨梧桐悲一葉，春風桃李泣羣花」。實在羣花理喪，並無其事，葉少吾之叔清漪先生，與其堂兄葵初先生皆有書致報界辯正呢。

言歸正傳，我在葉浩吾先生處，幫了他三個多月的忙，只拿到了一個月的薪水。他是一位忠厚長者，我不能向他催索，我也不忍向他催索。不過我為了要贍家，為了要餬口，也不能從井救人。有一

天，我遇見了章太炎先生，他問我：「現在何處？」我告以在啓秀編譯局。他笑說：「何不到剛毅圖書館去。」我問：「那裏有剛毅圖書館呢？」他說：「啓秀與剛毅，不是庚子拳變時代的名人嗎？」後來葉先生這個啓秀編譯局，到底支持不下去，負債過多，幸賴他的人緣很好，大概是許多朋友幫他料理過去吧。

我從啓秀編譯局出來後，又到廣智書局的編譯所去，誰介紹我去的，我至今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為我那時的廣東朋友很少，廣智書局裏却全是廣東朋友呢。那時候，上海的新書店，已越開越多，廣東是開風氣之先的，當然要着此先鞭。廣智書局的規模不小，既然有了書局，也想自己出書，因此也設立了一個編譯局，有人說，康南海、梁任公都有資本，也有人說，不過以此爲號召而已。我有人介紹，瞎天盲地的闖了進去，那個編輯所的編輯主任爲誰，我也不記得了。

廣智書局編譯所的情形，和啓秀編譯局完全不同，有一種嚴肅的氣氛，不像在葉先生那裏，可以談笑自由。編譯員連我共有五六人，編輯主任目灼灼坐在那裏，好像一個監考官。譯書是支配的，他配給我一本日文的講下水道工程的書，便是講開發道路溝渠工程的種種事的。我不是一個工程學家，對於那書是很少興趣的。

但我當時有一種自尊心，覺得他們支配你譯的書，而你第一次便退還他，足見得你是無能，我於是勉強接受了，好在篇幅還不算得太長，其中的解釋，也不深奧難懂。就只有許多土木工程上的日本名詞，有的還是用和文拼出來的西洋名詞，這可教人有些頭痛的了。

我那時只得狂翻日本文詞典，請教深於日文的人，購買參考書，日本人所編的「和漢新詞典」，中國人所印的「和文奇字解」（上海作新社出版），乞靈於那些工具書了。不到兩個月，居然全部完

成。這書譯成以後，我就敬謝不敏，從廣智書局出來了。因為裏面全是廣東人，我和他們言語不通，未免有些扞格。再者，他們給什麼工程科學的書給我譯，我的科學知識實在淺得很，也不敢再獻醜了。不過我又想：像這部專講下水道的書，雖然是冷門，也不能不說是當務之急，現在各處正在要開馬路、建工廠，而外國已在流行什麼抽水馬桶的話，這是將來市政上一件重要的工程而必須研究的事，不過我當時譯這一科門的書，不免有點盲人瞎馬了。所以譯完此書後，參加了一個簽條給總編輯，大意是「對於下水道從未研究過，請由專家加以檢定」云云，但我在兩年以後，却見這部書赫然在廣智書局的櫥窗裏了。

從廣智書局出來，真想回老家了，忽遇蔣觀雲先生（蔣先生名智由，號心栽，觀雲其筆名也），問我近況，告以從廣智出來，正想回去。蔣先生說：「不要回去，請到我那裏去，我那裏還有你的一位同鄉蔡君，一定可以和你融合無間，使你高興。」原來蔣先生那時也辦一個譯書處，這個名字叫作「珠樹園譯書處」，那個名稱，很覺美麗，珠樹園三個字，真可與金粟齋三字作一對偶。珠樹園後於金粟齋，蔣觀雲先生是一位詩人，宜其有此題名，當時的一班新文學家，都喜研究佛典，這兩個名詞都從佛典來的呢。

蔣觀雲先生是浙江紹興人，是前清的一位孝廉公，而又是一位學者、詩人、革命家。他有兩句詩曰：「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後人訛為是寫「革命軍」一書的鄒容所作的，其實不過是鄒容重述一過而已。我們在金粟齋的時候，蔣先生常常來游玩談天，因此我們認識他已久了。他為人非常和藹，愛說笑話的。

在那個時候，有人推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為近代詩界三傑，互相唱和。這個珠樹園譯書處，

也有兩位孝廉公，一位是楊秉銓，江蘇武進人；一位就是我的同鄉蔡雲笙兄了。

珠樹園譯書處也和金粟齋一般，如上海所稱的石庫門三樓三底的房子。蔣先生住在樓下，我們都住在樓上，每天飯開一桌，自己有廚房，那比在廣智書局舒服得多了。我和蔡雲笙同住一房，楊秉銓和另一位朋友同住一房。雲笙的年紀，只不過比我大一歲，他名晉鏞，二十一歲上便中了舉人，爲人極慧敏而風趣，我們兩人一見便成爲好友，爲什麼呢？一則我們兩人志趣相同，二則爲了同鄉之故，愈見親切了。

在珠樹園那裏，我自由極了，他不支配你做什麼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但蔣先生却見他寫作很忙，他好像在什麼雜誌、日報上寫文章（中外日報上有時也見他的著作），那時他還自己出了一種雜誌，名曰「選報」，那是選取近代名人的著述的。但雖云選報，也有並未見於其他刊物，而直接寄給他發刊的。這個珠樹園譯書處，我記得我並沒有譯什麼書。不過他們也徵收外稿，請爲檢定這稿子可用不可用，簽出來加以評語，請蔣先生覆核，這個工作我做了。至於蔣先生的選報，我無從幫忙，偶然給他看看清樣而已。

我們在珠樹園雖甚閒適，却不大出去游玩，上海是個金迷紙醉之場，我和雲笙，都是阮囊羞澀之人，也不敢有所交游。只是偶然兩人到小酒店喝一回酒，那時我有紹興酒半斤的量，再多喝一點兒，便要暈酡酡了；雲笙却可以喝一斤還多。不過都守了孔夫子所說的「惟酒無量不及亂」，就是適可而止了。回到家裏，我們聯床共話，無所不談，上自世界大事，下至男女性事，我們常常談至半夜三更，了無足異。

有一次，我們談到一向傳言山西大同府的婦女性器官，有重門疊戶之異，雲笙言：絕對沒有這事

，因爲他有一位親戚，曾經在大同府做過知府，他們的幕僚，也因素聞此傳說，欲一驗其異，那地方土娼極多，歷試之平淡無奇。雲笙又言：「雖然無此故實，然前人筆記却有此記載，我曾假定這重門疊戶爲有三重門戶，每一重門爲之製一聯一匾」。我說：「願聞其妙。」他道：「第一重門的聯曰：『烏宿林邊樹，僧敲月下門。』匾曰『別有洞天。』這聯與匾都用成詩成語呢。」我笑曰：「佳！第二重門呢？」他說：「第二重門聯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匾曰『漸入佳境』。」我道：「好！第三重門呢？」他說：「第三重門聯曰：『雲無心兮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匾曰『極樂深處』。」說罷，相與大笑。好在我們都是結過婚的人，而珠樹園裏也沒有一個女職員，故能如此荒唐。

過了兩個月，我記得已是初冬十月天氣了，蔡雲笙來了兩位朋友，邀了我一同到廣東館子裏去吃火鍋，廣東人謂之「打邊爐」，這是宜於嚴冬的，十月裏似乎太早。但舊曆在江南十月，往往會來一個冷訊。我飯罷回來以後，便覺得身子不舒服，夜來便發起寒熱來。到明天，我以為可以退熱了，誰知寒熱加甚，而且喉間作梗痛。那個時候，蘇滬一帶，正患着這個傳染極速的喉症，當時還不大知道什麼白喉、猩紅熱那種病名，統稱之曰：「爛喉痧」。我一想不好，在外間害病，大非所宜，且使家人焦急，不如歸家爲宜。

我當時即與雲笙說了，通知蔣先生，蔣先生來看我以後說：「你有病，一人回去，我們很不放心」。他便派了一個幹僕，買好船票，送我回蘇州。雲笙還直送我上小輪船，丁寧而別。回到家裏，我已很憊了。因爲我說喉間梗痛，吾妻一看，喉間已有腐爛的白點。她口中還說：「沒有什麼。」我見她臉色發白，兩手震顫，飛奔往告堂上。都知道這是危險的病症。其時蘇州有一位著名專治喉科的醫

生，喚做馬筱巖，他是中醫，吃中國藥，不過他已治好了許多患喉病的人，因此聲譽鵲起，祖母、母親也急了，立刻延請這位馬筱巖醫生，爲我診治。

一清早去請了他，直到下午上燈時候才來，這倒並非搭架子，實在忙不開來，可見那時候患喉症者的多。馬筱巖診病很細到，他說：「是爛喉痧，目下流行的時疫，是一種要傳染人的疾病。」他開了方案，匆匆的去了。當時我們也沒有隔離，小孩當然不許進病房，而老人——祖母與母親，住在樓下，我住在樓上，看護我的僅有我妻震蘇，那時，蘇州地方，還沒有一家醫院呢。

她說：「在未嫁之前，已經生過一次喉病，可無妨礙。」這話不知是真是假。但除了她以外，也沒有別人看護我呢。我心中惴惴然，畢竟我妻是沒有傳染的。

馬筱巖出診到我家兩三次後，我病漸有起色，因爲他診費很貴，我有些吃不消（其實每次不過三四元，在當時已算貴了），以後便坐了轎子，到他家裏這個醫室去就症了。喉症愈後，領下又生了一個外瘍，到一切復原，差不多要兩個月了。當時由上海倉猝返蘇，留在珠樹園的物件，都沒有拿，後來託人帶回來一隻衣箱，箱中一件羊皮袍子，不翼而飛，那也不去管它，大概珠樹園的侍者，實做了順手牽羊，取去禦寒了。病愈以後，祖母不許再到上海去了，於是游歷譯書處的行蹤，到此告一段落了。

到了明年，得到了蔡雲笙的信，珠樹園譯書處也告結束了，其情形與金粟齋相同。真是無獨有偶，他們這些辦出版事業，好似「大爺串戲」一般。蔣觀雲先生呢，說是要離開上海，不是北京，便是日本。可是從此以後，我竟未與蔣先生再一次謀面。倒是在十餘年後，我與他的公子蔣百器君（尊簋）曾見過一面。這一天，狄楚青請客，似專請百器者，因楚青與觀雲，也是老朋友呀。那時百器已卸

浙江都督任。這一次宴會，使我至老不能忘的，乃是第一次見到賽金花。那時她還祇是將近四十的中國年，在上海懸牌應徵名賽寓，百器飛牋召來，他比賽年齡還輕得多呢。

回到蘇州

游歷譯書處倦游歸來，我那時又失業了。爲了生計問題，我不能空閑無事。幸而我以賣文所得，少有積蓄，家用又極省，雖然蘇州的生活程度，漸亦提高，非比往年，但每月有十元左右，亦足支持。我偶然譯寫一部書，得百餘元，足供數月之用，亦頗優游。那時蘇州興學的風氣已開，但私塾還是未滅，且有人勸我設帳授徒的，我再作教書先生嗎？無論如何，這隻冷板凳坐不住了。

東來書莊那時已成暮氣了，自從我到南京去後，我們勵學會的諸同人，除了戴夢鶴故世外，大半亦都離開了蘇州，如汪棣卿、李叔良、馬仰禹，都去了日本，有的學法政，有的學師範。祝伯蔭到上海，到了大清銀行爲行員，後改爲中國銀行後，他一直在那裏。

因此東來書莊無人管理，不知那一位股東，介紹一位經理先生來，是位鎮江人，我已忘其姓，以前在錢業中做過事，對於書業，完全是外行了。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钏影楼回忆录

作者 = 包天笑

页数 = 451

SS号 = 10289823

出版日期 = 1971年06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